



CIVITAS
思想共和國

許章潤

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

關於「中國問題」的「中國意識」



CITYU HK
PRESS

CIVITAS  思想共和國

朱國斌 主編

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
關於「中國問題」的「中國意識」
The Reason of State and the Good Polity

許章潤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309-2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7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Reason of State and the Good Po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309-2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總序
xiii

自序
xvii

作者簡介
xxv

輯一 歷史時刻

第一章 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論綱 3

一、晚近三百餘年，革命是發動裝置，蔚為歷史的扣眼 5

二、現代秩序與雙元革命 21

三、國家、社會與政治的三元一體結構 35

四、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 51

五、文學政治——文人政治 56

六、結語 65

第二章	大時代中的「中國問題」及其體系性解釋	71
第三章	「中國時刻」：優良政體與文明勁道	95
一、文明焦慮		97
二、近代西洋文明的凱歌高奏		100
三、作為「模範生」的中國		103
四、「中國時刻」夢想成真的關鍵		106
五、優良政體		109
第四章	自由、共和與解放	115
第五章	國家建構的精神索引	141
第六章	臨門一腳與國族天命	159
第七章	依然逃不脫「古今中西」的糾纏	173
輯二 政治秩序		
第八章	政治秩序與良善生活	187
一、理想的人世生活不外是良善生活		189
二、政治秩序是良善生活的前提		192

三、政治、政治行為與政治秩序	195
四、有效統治及其控制	203
五、政治的制度化與開放性	212
六、政治以公共福祉為目的，承載道德承諾	223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	229
第九章 政權為主，政府為客	233
第十章 後民族主義視野下的國家政治命題	249
第十一章 「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就是當代的王道政治	265
一、政治的本質與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	266
二、王道政治對於「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理念和價值意義	269
三、王道政治與立憲民主有六大理念親和性	271
四、「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就是現代的王道政治	278
五、以中國文明的成功轉型為這一波現代文明收工	280
第十二章 這天下，原是億萬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	283
一、「打出來的天下」與「談出來的國家」	284
二、權力來源及其正當性	287
三、立國與立憲及其政治承諾	290

四、關於國民與公民，及其愛國與愛祖國的區別	292
五、關於公民理性與國家理性	293
六、開放三大市場與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	297
第十三章 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	301
一、文革陰霾，忐忑不安	302
二、五點重申，以為誠勉	304
第十四章 阻止中國陷入「全面內戰」	315
第十五章 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	337
一、責任概念讓生命獲得了尊嚴	338
二、主權的義項與意象	343
三、人民的還原論	349
四、轉型期的三大定律	353
輯三 政制進程	
第十六章 自由主義如何在中國落地	361
一、中國的復興是中國文明和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	362
二、中國公民需要政治發言權	371

三、倫理綱常與家國天下情懷	378
四、西北邊防、東海邊防與民主和平論	382
第十七章 中國需要趕緊邁向「訓政中期」	389
一、需要「訓政中期」這座橋	391
二、搭建「訓政中期」這座橋	397
三、對決、政治決斷與節制的民主	410
第十八章 以「四民主義」兌現政治正當性	421
第十九章 開放政治市場，迎接第四波改革開放	443
第二十章 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	453
一、固化、僵化與反民主化	454
二、三次改革開放與六次革命	459
三、中國轉型的四大任務	461
四、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	466
第二十一章 南海、中南海與太平洋	475
一、「四喜四憂」：需要降溫	476
二、「國際維穩」：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	482

- 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485
- 四、邦國生存的國家理性 488
- 五、實力政治與文明國家 490
- 六、小結 494

第二十二章 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誰是真正的敵人 497

- 一、東方地中海意象 498
- 二、誰是真正的敵人？ 504
- 三、意識形態、國家關係與民主和平論 507
- 四、國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 508
- 五、中夏安，遠人服 511

輯四 社會基礎

第二十三章 國家建構語境下「社會」的中國意義 517

- 一、經濟社會 519
- 二、倫理社會 523
- 三、市民社會 525
- 四、公民社會 526

五、政治社會	529
六、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	533
第二十四章	重申「經濟社會」 539
第二十五章	摧殘社會，必驅致一邪魅人生 557
第二十六章	現代社會與法科教育 571
一、經濟社會及其法制形態	575
二、倫理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579
三、市民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585
四、公民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588
五、政治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590
六、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	593
第二十七章	保衛和平，才有法治 597
一、戰爭讓女人走開，戰爭更讓法律走開	599
二、為何立憲民主共和國內部沒有敵人	600
三、法治是日常政治下的治國技藝	602
四、政治德性	603

五、民主 603

六、國家理性與公民理性 607

第二十八章 人性之惡與政制之殤 611

第二十九章 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 633

一、背景因素，也就是初始條件 634

二、法治政府與法治國家 636

三、為何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 640

四、中國需要思想市場和政治市場 647

五、法度高於一切世俗權威 648

後記 653

總序

約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全球化」(globalization) 逐步成為公眾和學術討論中一個不可繞開的關鍵詞。從物質形態看，全球化首先是指資本、貨物與技術的跨境流動，基本上經歷了跨國化、局部國際化及全球化這三個發展階段。然而，全球化的影響穿越了資本等界域，進入到思想和學術空間。國與國之間政府和人民的頻繁交流，以及互聯網帶來的充分資訊流動，令到各地人們對世界認知的視野更為廣闊，程度更為深厚，甚至在傳統上被認為發展中或欠發達的偏遠落後地區，人們亦會觀察、思索、追尋社會發展的路徑，希冀能從慣性及舊有的制度和思維中掙脫開來。

全球化令世界當代思潮層出不窮湧現，百家爭鳴、交相輝映，中國情況亦然。世紀之交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和思想界出現了一批有重大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的學者、思想家，他們出世人世，探討學術，砥礪思想，耕耘專業，發表了一批對學術和思想有突出貢獻、對社會有承擔的時代作品。

傳播知識和交換思想是出版人肩負的神聖使命。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決定出版一套全新的思想性與學術性叢書，旨在推動及實踐引領思潮、激發新思想、喚醒公民意識的使命。

本叢書遂命名為「Civitas / 思想共和國」。Civitas（拉丁文），據羅馬共和末期的哲學家、政治家、雄辯家西塞羅（Cicero）的定義，是指由法律統一起來、由公民（*cives* 或 *citizens*）組成的社會團體。法律規定公民責任，同時賦予他們權利。比照今天的話語，它描述的就是「公民社會」。「共和國」（*Republic*）亦源自拉丁語“*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務」。今天，人們使用它來描述一種民主政體。古希臘偉大哲學家柏拉圖曾以《共和國》為題討論正義問題，並首先討論國家的正義和體制。

本叢書取中文名「思想共和國」，除表達現代社會是公民社會、每個公民皆具獨立思考和行動能力之意涵之外，也希望能夠匯納百家、交換傳播來自大中華乃至世界各地著名思想家和學者的新觀念、新思

維、新理論，一方面擴展讀者的思想維度、引領讀者在自由的思想空間漫遊，另一方面啟迪讀者的思想路徑、平等探究箇中的哲理。

在公民的參與意識和權利意識日漸形成並高漲的今日，不同的價值觀並存於同一個時空之下並不一定帶來矛盾和衝突；多元的社會需要成員之間的自由交流和各抒己見。矛盾與多元最能激發思維震盪，啟迪思考，與時俱進形成更多新思想。

時代在進步，進步得益於新思想。

做一個有思想的共和國公民。

是為序。

朱國斌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法學博士
二〇一六年春夏之交，九龍塘

自序

本書同名舊版，曾由法律出版社刊行，輯文二十篇，概分四輯。實際出版時，只保留十二篇，成一小冊。此番新刊承蒙城大出版社朱國斌教授准允，保留了初編所收論文外，並增收論文九篇，合共二十九篇，循其舊例，依其內涵，仍然分列四輯。舊版礙於「意蒂牢結」而遵命刪除文字，亦且恢復，則行文義理，庶幾不致上氣不接下氣。較諸原版，篇幅既有增擴，面向多所拓展，內涵亦望充盈，汗青頭白，不枉經年伏案用功，也不致太過對不住讀者諸君。

就體裁而言，總體以觀，其規制，其風格，既非學院高頭講章，亦非一般時論。毋寧，介於二者之間，但凡持論推理，則以切實學理脈絡為基礎，旨在彰顯思想在將自己現實化進程中可能具有的闡釋力。而於省思這個時代的社會、法政與思想症狀中，展現一己思考可能牽連縱橫之更為縱深歷史背景，於體會世態人心中為人生發聲，在觀照時間長河的翻轉流變之際，為此時代作證。

具體而言，每輯七八篇文字，其內容主旨，大致可以分述如次：

輯一「歷史時刻」，在晚近世界體系視野中，徜徉於革命、立憲與

國家理性諸端，考察其內在關聯，省思大時代中的「中國問題」，追問和憧憬漢語學思對於「中國問題」的體系性解釋，從而，理解現代世界及其文明秩序創生背景下這個叫做「現代中國」的超大規模共同體的誕生過程。其間，優良政體允為犖犖大端，源自文明勁道，而近代中國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糾纏於並依舊逃不脫「古今中西」這一既定大格局，則當下時代，一個收束時段，「臨門一腳」，嗟乎難矣。所謂國族天命，華夏吾邦，走着瞧，其唯此乎。

輯二「政治秩序」，顧名思義，着力在義理層面追尋政治秩序之可欲與可能，特別是它與良善生活的關聯。畢竟，人類群居為生，則維繫團體生活，首需和平共處。而這就是政治，普天之下最大的政治。和平共處以公平正義為前提，仰賴於優良政體。正是在此，古今中外，俗世人群，頓挫既巨，苦惱多矣。先秦諸子，希臘先賢，其傷心應對，苦心焦慮，而多所揭示的一個古典政治哲學意識，也是一個永恆的人類元問題，不外乎就是有限理性的芸芸眾生，如何獲得優良政體，比如，王道政治；進而，以此作為體制支撐，維繫人世的安寧與

和平。換言之，全體公民在政治上和平共處，從而分享這一方水土，這才活得下去；進而，可能活得好，活得更好。此為人世義理與人生情義。而作為政治的最高標準，可能，也就是人類在自我組織安排進程中所能發揮的政治極致了。說到底，這天下，原是億萬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就是當代的王道政治。在此，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要求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其間樞機，總括近世東西的生聚教訓，概莫「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授受以公，臨治以法」，凡此二十四字治道箴言也哉。

輯三「政制進程」，立足現今中國語境，借助發展政治學理念，圍繞理想的政治秩序，追問自由主義如何在中國落地。現代立國，固非自由主義一家所能單打獨鬥，但絕不能或缺這一政治正義。政治有德有方，而政制善治善好，才能造就良善生活與愜意家園，則自由主義尊重個體生命及其公民良知良能之砥礪，正中鵠的。為此，筆者體認，中國需要邁向「訓政中期」，開放政治市場，為此，亟需趕緊開啟「第四波改革開放」，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借「四民主義」兌現

政治正當性。政治正當性首先在於有效回答權力的來源，建構主權，正面回應敵我公私之大是大非。否則，大轉型至此，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是，百姓怕是不會再忍下去的。

從世界體系立言，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誰是真正的敵人？」無論是在國家政治層面抑或國家間政治範圍，這一問題均有待解決。如果說，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及其友愛團結程度，表明既有政體在一國之內善用權力資源的能力，那麼，世界體系中盟友的多寡及其緊密程度，意味着在全球範圍內調用政治資源、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意願和意志，而這不僅關乎國家理性，同時牽連於公民理性，需要政體國體的合力支撐，考驗着中國文明的人生智慧與既有政體的政治能力。正是如此，一種自由民族主義的王道共和法理，可能恰堪奠基，提供「兜得住」的大框架，唯需審慎堅忍，強毅力行。就最近兩年多的中國政治實踐而言，放眼四望，歷經頓挫，含辱忍垢，天道好還，中國終於好不容易走到一個有望歷練政治成熟之際，則天理昭昭，更不能容忍獨夫胡來。

輯四「社會基礎」，旨在說明無論國家理性還是優良政體，究其實，均以社會充分發育為基礎，終究還是為了作育社會。而作育社會，就是切近作育人生；摧殘社會，必驅致一邪魅人生。如同保衛和平才有法治，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沒有一個溫文和煦承載居民生計的社會，要國家何用。社會是天然的，一種自發秩序，國家是後來的，一種人工產物，是為了社會人生才發明調用的一種人類群居的政治範式，而非相反，則有利於此即行，無裨於此便藏。畢竟，較諸國家，社會是人類的永久性家園。由此，反思人性之惡與政制之殤，考察國家建構語境下「社會」的中國意義，重申「經濟社會」及現代社會與法科教育的關聯，均為本輯諸文理述社會主題時着力申說者也。

凡此四大部分，零散紛披，不成規模，不成體系，但分擊合圍，指東打西，念茲在茲，依舊不外「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兩大主題，提煉彰顯的是一種關於「中國問題」的「中國意識」。一己申說，其背景，其觸媒，其所謂問題意識，惟靜惟默，去太去甚，正是這些遠憂近慮，而小命幽微，擺不脫家國天下。就此而言，身家性命

所繫，則己心惻隱，實為大我公義。事實上，往深遠出遙瞰，去末歸本。凡此兩大主題，既是貫穿過往一個半世紀中國歷史的文明意識，也是充盈其間的政治意志，而且，是衝破政權阻隔而接續連綿的近代中國歷史堅忍不拔之政治意志，更是此時此刻華夏邦國大轉型收束時段的命門樞機，其實，是這個叫做近現代的世界歷史的基本脈絡，而無分東西，不講中外，唯見先後，但有高低。如此這般，枯榮得失，正邪全偏，「尚想孔伋，庶其企而」，表彰其旨，道盡心跡。

朋友，這個叫做中國的家國天下，是全體公民分享的公共家園，也是億萬斯年文明化育的意義秩序。考其結構，論其經緯，在現代理想生活意義上，「書誓河山，啟土開封」，終究不過「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兩項，而支撐起家國天下，蔚為中華文明的憲政秩序。總其脈絡，此亦非他，就是「以文明立國，育邦國文明」和「以自由立國，為自由立法」。它們交纏互動，講述了邦國之為政治與文明的統一體，而人民是政治共同體與生活方式的立法者這一凜然故事，旨在以文化維繫歷史，進而在文化與歷史的進程中維繫國家，則國家持節有

度，安老懷少，以優良政體拱衛億萬國民之和平共處。那邊廂，人民守法景德，安生服業，「懷懷焉，浩浩焉」，比質琨玉秋霜，而積勞積慧，航海梯山，合力成就者，也是適所安居、其當獲致而分享者，正為此家國天下者也。古賢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提綱挈領，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含章天挺，此維與宅！」

筆者半生已過，從少幼溫飽不繼，寒蟬僵鳥，道路以目，穀艱存世，到中年衣食無憂，眼見這方水土冬去春回，苦盡甘來，寒灰更然，卻不料，時勢遷轉，尚未水落石出，抑或有所迂迴，彷彿岸谷之變，故而依舊心存危懼。危懼寸心，遂寢食難安，午夜沉吟，總想傾述。若遭刑戮，也有張口喊痛的權利。此生有盡，既棲息此方水土，則其冷暖榮枯，關係身家性命，影響千秋萬代，無法逃避，不可能假裝看不見，則人生無盡，有話說話，人是說話的動物，不說會憋死。身為一介教書匠，說話，把該說的話說出來；說清楚，說給大家聽，蔚為天職。

是呀，如果你口中總是讚美詩，可並非與這塊土地生死相連，不過暫居撈金，而振振有辭，裝神弄鬼，朋友，你讓我怎麼敬服你呢？

而且，化性起偽，懷山襄陵，我們怎麼活呢？

噫嘻，尚饗！

許章潤

孔誕兩千五百六十七年歲次丙申，耶誕二〇一六年五月，於故河道旁

作者簡介

許章潤，安徽廬江人。法學博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說法活法立法》、《法學家的智慧》、《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漢語法學論綱》、《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政體與文明》，以及散文集《六事集》、《坐待天明》。

主治法律哲學與政治哲學，尤其關注「中國問題」意義上舶來理念與固有生活調適過程中的法政方面，而念念於中國人世生活與人間秩序的現代重構性闡釋，汲汲於儒家優良傳統的法學復活和中國之為一個大國的法政佈局與文明意義，追求法律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尋索學術的人道意義。

輯一 歷史時刻

第一章

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論綱

——重讀托克維爾，梳理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的創生脈絡

紀霖宗兄設壇，囑咐我來做演講，半月來一直在想這件事，深感以此論題，鋪展「革命」、「立憲」和「國家理性」，而以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及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作為切入點，實在是非常具有眼光的選題。有此綢繆，因應之下，便想從遠距離、長時段、大歷史的角度，緊緊圍繞着晚近三百年來中國和世界的大致宏觀走勢來談，這樣可能較為恰切。同時，這並不限於此一人一書，而是從此人此書，引申開來，在「現代」和「現代秩序」的誕生這一大背景大變局下，省思「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而藉此更作深廣闡發。其空虛不免，而「大視野」三字庶幾自慰也。

置此整體構想，圍繞核心命題，大致講下列五個問題。一是革命，阿倫特（Hannah Arendt）意義上的革命，而非一般俗常的騷亂、暴動、造反或者「改朝換代」；二是在此情形下，駸駸乎而來的現代秩序與雙元革命的問題；三是因順流而下、遞次嬗變所導致的國家、社會與政治的複雜糾聯。凡此三因素的連環互動，映照並坐實着革命、立憲和國家理性的歷史脈動，構成了晚近現代秩序的核心變量；四是基此流變，由此演繹出的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第五，我想最後談一下所謂的「文學政治」或者「文人政治」這一「托克維爾話題」。

一、晚近三百餘年，革命是發動裝置，蔚為歷史的扣眼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如本節標題所示，晚近三百年來，革命是一個發動裝置，並且蔚為「歷史的扣眼」。就是說，衣服有鈕扣，經由扣眼而扣合，綱舉目張，衣裝遂成衣裝。形制既顯，興致聯翩，遂成所謂繁華。在此歷史時段，「革命」正是這樣一個「扣眼」。實際上，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漫長的十九世紀」，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與戰爭」的年代。

就此，有六點內容需向各位陳述。

第一，何為「革命」？此處所說革命，非暴動、非起義、非改朝換代，而是一種「開端」，一種政體變革。而且，革命是政治權威崩潰的結果，在歷史終結的意義上，其後所建立的政體不會再遭遇革命，由是政權獲得了永久性正當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來表徵。換言之，今天談論革命，很顯然是在法政哲學和歷史哲學，而非一般俗常政治意識形態的語境下，從近代長程社會政治變革和歷史轉型的大視野來談的政體演變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運動。實際上，樞紐時代以還，近代的這一波政體變革，以革命開道，自歐美起步，將全球拉入這一歷史進程，而為萬世開太平。因此，在阿倫特的意義上，「暴動」「起義」等屢次上演的「改朝換代」不是我們此刻所說的革命。革命一定意味着一種「開端」，

一種政體變革。它作為一種政治權威崩潰的結果，導致一種新的政體和政治權威誕生，蔚為政治的創世紀，講述的是這樣一種歷史進程、政治運動和社會、思想轉型。在此，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回顧晚近三百年間發生在東西方各國的具有典範意義的革命，可以發現，革命既是「開端」，則革命之後它所形成的新型政體和政治權威之所以不會再度重蹈「被革命」這類政治覆轍，就在於所謂的「歷史終結」。就是說，現有的人類政治想像力和政治實踐能力，無法再於可見的歷史時期內營造出足堪取而代之的新型政體；實際上，此後人類為了克服這一政體的缺陷而進行了種種試驗。雖然本心本願旨在創造更加美好的治理，結果卻將人類驅進泥塗，不得不遞次宣告退出。從而，歷史終結了，所以上文說「為萬世開太平」。

第二，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引出下面的問題，即晚近三百年間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七大革命。我原來一直講「六大革命」，沒有把德國因素考慮在內。最近思考紀霖兄佈置的命題作文，沉吟既久，遂覺「德國問題」具有典範意義。「德國問題」之所以過去長期未曾提上議事日程，可能是礙於英美文化的強勢主導，晚近德國革命和德意志轉型的重大意義給遮蔽了。所以這次把它單獨提出來，稍微多做一些檢視。

在典範意義上，七大革命，即英、美、法、俄、德、中、阿拉伯（伊朗之為一種亞型）

革命及其特點，各具歷史意義。各位知道，從一六四〇年代開始的英國革命，開啟了「現代」進程，三百餘年間，延綿不絕的所謂的革命的歷史進程，席天幕地，開天闢地。通常說，英國革命從一六四〇年開始至一六八九年大致「收工」，長約半個世紀，逮至「人權法案」公佈，一般的史家認為這時候革命就算結束了。而在我看來，立足於大歷史，則英國革命至少延續一個世紀以上。實際上，一直要到兩次征伐美國之後，英國的外部邊界在北美基本止於美國獨立這一局面，才算內政安頓下來，革命也才算基本結束。內政和國家間政治之互為條件和轉換，於此彰顯無遺。就是說，英國革命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至少延續一個世紀以上，不可不察。與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相比，英國革命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即英國革命一般來講是基於貴族與國王的分權運動而展開的，所走的是一種普通法的立憲主義，以一種法權安排，以一種相對安全、較為不血腥、較為非暴力的方式達成目標。當然，不是說它沒有暴力和血腥的場景，但相對而言它以小規模、少震蕩、低頻度的上層之間權力的分割，尤其是在財產權上的分割以達成妥協來重建英國的現代政體。英國學者麥克法蘭（Ailun Maikafalan）在講述這場革命時喟言，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一種較早傳統的復辟，是對詹姆斯二世圖謀的那種革命的抵制。因此，英格蘭的發展史是一部漸進的、連貫的、進化性的發展史，是一種「變化的同一」（the

changing same)，而非如法、俄、中的革命，疾風驟雨，摧枯拉朽，確實有道理。¹ 所以英國革命一般認為是以自由為指向，而以財產權的分割、以財產作為自由的物質保障和政制保障來實現革命目標為機制的。

法國革命另有一景。它是基於阿倫特所說的「難以忍受的社會狀況」而來的。尤其是對於貧困及其痛苦的意識，以及基於這種意識而來的對於它們的不能忍受，基於對於此間極度的匱乏狀態的深切而不可遏止的同情，基於同情而來的要求社會變革這一強烈的革命動因。其之憤然而來，倏然爆發，確乎特立獨行，多所不同。我們知道，托克維爾反思法國革命，基本上着眼於其為一起重大社會事件，看到它源於政治權威崩潰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並且帶來了最後的政治變革這一錯綜複雜的政治特性與精神個性。僅就歷史進程而言，在我看來，法國革命當然不僅僅指「一七八九」，也不只是「一七九三」的雅各賓專政前後連綿的那幾年。毋寧，法國革命其實包括後來的波拿巴的復辟等等，一直要延續到第三共和國，方始音消響歇，平定下來。也有一種講法，認為第三共和國還不足以收束這一革命勢能，一直要顛簸動蕩，至到一九五八年的第五共和國方始收束。我覺得，以第三共和國作為它的下限，大致不差。這樣看來，它也是一個一百多年的社會政制與思想文化的劇烈的變革進程，歷九死而後生也。

美國革命起於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民族的「家務糾紛」，而終於釀成了一個分家過日子衝動下造成的立國故事。在現代主權意識的鼓動下，美國革命肇基於分家過日子建設獨立的主權公共空間這一契機，由此啟動，導致了內政的相應變革，進而造成了後來包括黑人民權運動在內的解放和獨立的歷史進程，綿互連貫，將立國和立憲糾結一團。在我看來，這場運動起自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日，延續到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方始告一段落。至少，延續至一九世紀中葉的南北內戰，也是個百年進程。如果說這場基於主權獨立衝動和立國動機，而接續造成了政體轉換和社會建設、平權訴求，一波接續一波，因此必須得將黑人民權運動包括在內才算完整的話，那麼，可能這一革命其實一直延續到一九六〇年代才算結束。換言之，逮至其時，其立國政治和立憲承諾方式全部兌現，美國的立國進程才算完結了。雖說這是一種更為誇張的講法，但不管怎麼說，其為一場長時段的故事，延續了一百多年，倒是大實話。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起重要的革命事件，那就是德國的近代轉型，德意志文明的自我更新。德國近代的自我更新不僅起步於、體現在一八四八年那場遍及歐洲的運動，而且表現為一八七一年俾斯麥通過戰爭、計謀和國家理由所實現的德國的統一。其間接續以後來的《魏瑪憲法》，一直到了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柏林牆倒塌、兩德

統一，方告結束。其為一個完整的、長程的革命進程，更是歷九死而後生。直至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也可以說是健康的德意志，才算是最終成形。一場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革命，代價慘烈，觸目驚心。從這個角度來看，以羅馬文明的正統繼承者自居，而以德意志文明作為歐洲主流文明自詡，這場德國人經過內戰、外戰、自我革命而實現的歷史轉型，最終奠定了現代德意志這方家國天下。可能，如各位所同情共感，與「中國問題」最為相像的其實就是「德國問題」，以及下述的「俄國問題」。

我們的鄰國——俄國從彼得大帝改革到後來的斯托雷平改革，再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終至一九九一年的「革命的反革命」，也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艱難歷程。其與近代中國歷史轉型頗多相像之處。最為相像的地方在於，兩個國家都曾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左翼極權專制。同樣相像的，還有它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商社會、從一個以億萬小自耕農和一個高高在上的皇權政制兩級化的結構，就是黃仁宇先生所謂的「潛水艇夾心麵包」這樣一種結構，向理性化的現代國家建構過渡的進程。各自耗時一百多年，而展現出一種有別於歐美型英法道路的形態。

除開上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六大革命以外，諸位可能都注意到了，伊斯蘭世界的自我更新進程，同樣是一場規模宏大而遷延既久的社會政治大變革。實際上從十九世紀開始，

埃及和土耳其學習西方、向西方靠攏進行社會和政制改革，締造現代的軍事和工業，打造伊斯蘭世界成為現代國家和社會。直到兩年前發生伊斯蘭—阿拉伯革命，這一橫跨整個北非和中東、綿延一個半世紀以上的重大的社會歷史轉型，尚未完成，而構成了近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景觀。這場以伊斯蘭文明為主要載體、以阿拉伯各民族為主要的實踐者，超逾一百五十年以上的立國運動，一場重大的政制和社會轉型，構成了通常所說的現代性的全球拓展的重要方面。今天討論近代的革命，當然不能遺漏它們。其間頭緒紛繁，輾轉牽連。僅就伊朗而言，它是波斯文明現代轉型的典範。伊朗的情形複雜，其為波斯民族，不屬阿拉伯大家庭，卻又接受了伊斯蘭教，因而，更多一分糾結，也更添一分為難。伊朗的現代轉型及其與基督教文明的對峙，較諸包括中國在內的大轉型，提供了一個處置大國關係的另一種亞型典範或者次型典範，太值得研究了。其之伊斯蘭憲政主義，囊括神俗及其分權制衡，實在很有特色。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講革命，包括法國革命在內，至少有這樣七大革命。這七大革命，長長短短，從縱橫一個世紀到綿亙一、兩個世紀，構成了近代人類世界三百年輝煌而慘烈的時段，僅次於「諸子時代—樞紐時代」的最為重大的轉型時期。革命不是別的，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發動裝置，也是這三百年來將人類歷史串聯起來，並徹底改變了這個地球

面貌的「歷史扣眼」。

第三，我們仔細審視、分析這七大革命，將之分類，大致可以得出這麼三脈，即「英美型」、「法國型」與「德國型」。第一脈是所謂的「英美型革命」，多半時候，一說現代轉型，通常必說英美一系，概以其為重商主義的民族，秉持經驗理性，持取相對平和漸進的進路，諸如此類。的確，相對而言，英美的轉型比較成功，也比較具有典範性。更主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和平轉型的經驗教訓，等等。相對而言，法國型的革命，包括中國、俄國以及我們的近鄰越南等法國式革命的諸種亞型，雖時空有別，具體訴求表述不同，但均訴諸法式大革命的狂飆突進，在將盧梭式的理想先置於並且取代了洛克式的理想之際，血流成河。凡此政治運動和政制實踐，把盧梭放在洛克之前，則以社會革命為主而以政治革命作為最後的變革結果的歷史運動，堪為狂飆突進式革命範型，動蕩既久，成本太大。當然，另一方面說，此間跌宕，非惟人力所能掌控。自家歷史走到這一步，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然。因而，長程的中國革命，的的確確，是在法國革命範型理想下推動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包括一八六〇年之後以洋務運動為標誌，到甲午海戰而終止的為期三十五年的第一次改革開放，包括一九〇二年啟動的清末變法、北洋的改良、民國的新政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為止的又一個長逾三十五年的第二次改革開放，包括一九七八

年十二月十八日三中全會啟動到今天為止再一個前後接續三十五年的第三次改革開放，凡此三次「改革開放」所累積而成、由「歷史的扣眼」串聯起來的長程中國革命。不過，其間稍有調整的是，第三次改革開放和第二次改革開放的後半段，其實更多地是在向英美革命靠攏。其間牽纏廣博，具體分梳我們可以暫時不管，在此可得陳說者，中國、俄國、法國以及我們的近鄰越南等這些個國家，其社會政制變革基本上走的是法國的路子。

我們過去常常都是以英美型的革命和法國型的革命概為兩支，來總括、比對晚近三百年間發生的重大社會歷史變革和政治運動。然而，我最近在思考紀霖兄給我佈置的這一命題作文時，愈來愈感到需要重新審視「德國問題」。自去年以來，我連續撰寫了兩篇文章，都是關於「德國問題」的。一篇論述閱讀德國歷史學家梅內克的一封信件所引發的思考。一九三九年，納粹鐵騎佔領了斯特拉斯堡，梅尼克歡欣雀躍地給他的學生和女婿分別寫信說這是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時刻。在他的筆下，這不是侵佔，而是「收復」。而且，在他看來，此舉將德國和人類的歷史往前推動了一大步。我閱讀此信，深感驚悚，其認知、其情義，因其著名歷史學家之故，非同小可，所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置此邦國，如何安頓我們的身心〉，發表在今年第一期的《政法論壇》。第二篇題目叫做〈轉型時段的歷史意識〉，主要以中德兩國轉型時段中歷史主義和歷史學派之登上歷史舞台為素材，而闡發其

隱幽，尋繹其異同。大家知道，中國近代一百多年的轉型所予此邦此國的歷史進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並且以文化歷史的反思來反哺民族生活。從康梁以還，漢語學界的歷史學家無不孜孜於此。就「現代中國」及其所表徵的「現代秩序」而言，於塑造國家理性方面真正有影響力的是中國的歷史學家。這一百多年間學有所思、真正具有沉澱性，而作為民族文化轉型寶貴財富沉澱下來的，我覺得可能主要是歷史學家們的作業。

講到歷史自覺引發出來的政治自覺，在德中兩國的歷史轉型時段有所不同，但都上升到國家理性層面，則又一般無二。兩篇文字既畢，我便想「德國問題」堪當一個範型，不幸的是，其典範意義長期為英美的典範性和法國革命的典範性所遮蔽了。「德國問題」不僅僅在於在經濟政治相對滯後、長期為容克集團進行農夫式統治的國度，如何實現社會更張和政治變革，而社會更張的前提是如何克服文化自卑，則其遭遇的「東西文化衝突」，勢所難免，不得不找尋一個出路。此為「德國問題」的第一重典範意義，在中國具有呼應性。第二重典範意義表現，相對落後於英法的窘迫，其如何急起直追，乃至以一種在後人看來多少扭曲了的、過度強化了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來奮力追求，凡此「承認政治」、追求民族文化的「尊嚴政治」，乃至不惜最後有兩次大戰（人家說是「三次大戰」，因為最後的冷戰是以把「東方」的摧毀而告終），均具典型性。不管怎麼說，在立國和轉

型的語境下，自「東西文化衝突」最後走向政治和解、文化和解，在中國同樣具有呼應性。其三，德國如何從帝制國家，大家知道，從威廉大帝開始的貴族自由主義形制，逐漸通過魏瑪共和，然後歷經反覆，建立起了現代立憲民主體制，而且是一個運作非常成功的清廉、高效的現代政制共同體，以聯邦制在歐洲獨樹一幟。此於第三重意義上，與「中國問題」具有呼應性。其四，還有一重呼應性，我覺得不是從「國家政治」而是從「國家間政治」而言，是在「大國崛起」和「大國博弈」的語境下來說的。就是說，雖然今日德國蔚為歐洲老大，但身邊有英法這兩個宿敵世仇，同樣是歐洲的強權。因此，如何使這樣一個三起三落而再度「鹹魚翻身」崛起的歐洲強權，在不引起鄰邦尤其是強鄰產生重大不安和覬覦的情況下，有效統領歐洲，我相信這是德國人現在思考的問題。這個思考與中國今天遭逢文明復興、大國成長以及處理大國關係，也有比較性、呼應性。其五，也是最後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即德國人以羅馬文明和希臘哲學的繼承者自詡，是一個驕傲的文化部族，歷經最近兩百多年的衝擊和磨難，不是以對於英美文明的低頭，而是以文明的自我更新來實現其政治復興和國家重建，成效卓著。這一條和中國今天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頗有呼應之處。

總之，在大歷史背景下，以「英美型」、「法國型」與「德國型」等三型分梳晚近革

命，更具多元性；在開放的歷史可能性意象中反思革命的可能性與國家建構的現實性，也更有助於我們思考包括法國革命在內的近代的「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問題。

第四，上述七大革命、三種範型，均涉及到一個「革命的內在脈絡」，就是所有這些革命其實都是「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之三位一體。若說分別的話，可能，法、中革命偏於社會革命，而英、美重在政治革命。推言之，法國和中國的革命是一種社會革命，或者，首先是一種社會革命，卻帶來了重大的政治後果。對此，各方皆有解說。最近譯刊的《法國大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為英國人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所著。在這本書中，作者說一七八九年的激進改革是政治危機的產物，而不是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² 因此，它基本上是一場帶有嚴重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帶有政治後果的社會革命，其基本定調還是把法國和中國的革命定為社會革命發其先聲，而以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後果作為終局來思考的。相對而言，也有一些研究指認英美革命是純粹的政治革命，是以政治革命作為先導而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是這樣一種社會、政治和思想意識錯綜互動的變革運動。正是立基於此，所以才會說法國、中國和俄國的革命，是「一種平等與唯智主義的解放企圖」。各位，「唯智主義的解放企圖」，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黑格爾（Hegel）在法國大革命時候講的。換言之，這樣一

個唯智主義的邦國和文明的典型性人物，反過來卻說法國大革命是一種唯智主義的解放企圖，實在耐人尋味。是的，其以平等和解放為訴求，固然不錯，但在我看來，無論是法國型、德國型還是英美型，其實都是以思想革命為先導的，以社會革命作為觸發的契機，而以政治革命作為主導性歷史脈絡而展開的。可能在俄國、中國和法國這三個國家，社會後果相對嚴重，同時，基於社會問題而來的這種革命意識相對強烈。相較而言，在英美，尤其是在美國，社會問題先已獲得解決，而政治革命不過是基於社會情狀的持續發展自然而來的一種自我政治武裝，牽扯到所謂的邊疆拓殖後引發內政分立的「立國」問題。因此，它的政治革命的色彩自然更為濃厚，如此而已。但是，在我看來，雖有這些區別，他們還都是以思想革命為先導，以社會革命為契機，而以政治革命作為歷史前景，並且在此歷史脈絡中遞次展開的、三位一體的宏大的社會歷史變革。

第五，在上述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中，貫穿、混雜着「革命激情、現代情緒與世俗憧憬」。而且，凡此「革命激情、現代情緒與世俗憧憬」因素之浮現於革命，意味着革命本身成為一個巨大容器，承載着綜合性訴求，其來源多方，指向多元，已然不再「純粹」了。而這不過就是所謂的「現代意識」與「現代秩序」的特徵所在。各位知道，七大革命的衝動和革命所賴以產生的政治思想及其思想革命，其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情緒。這

種現代情緒表現為革命激情，其指向卻有差別。比方說，法國念念於平等和解放，英美之指向自由（其中，前者英國更多地指向 liberty，後者美國更多地是指向個人的 freedom）。然而，不管鍾情何在，指向哪裏，最後均落實為、體現為一種世俗憧憬，而以具體的世俗生活及其「幸福」來收束。

大致而言，凡此世俗憧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世俗幸福取代神聖幸福成為市民生活的歷史必然性前景。還有一個方面，非常弔詭，也似乎充斥悖論，那就是體現為關於一個地域性組織的集體自私的繁榮昌盛夢，這種地域性組織，作為集體自私的繁榮昌盛夢的所有者和承載者，即國家，一種世俗的地緣政治共同體，在大革命之中和大革命之後，以一種普世性面貌陸續出現在這個星球上，而構成了「雙元革命」這一宏大現代秩序中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文化主體」與「民主國家——政治主體」，雙元並立，是晚近人類政治法權生活的最為宏大的景象。

立志、嚮往並發奮將自己的民族、國家建設成繁榮昌盛的人間幸福樂園，以此為生活的最高理想和生命之精神寄託所在，是一種典型的世俗憧憬，其展現的是不再追求「神聖幸福」之後市民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必然性前景。天國和來世均委身於此世和現世，人作為國民和公民，所實現的是自己的市民本質，甚至於純粹肉身的需求，實在是有趣得很。

是啊，浩然革命指向浩渺的理想，最後的落腳點一是市民幸福，一是市民政治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作為集體自私而存在所隸屬的那個民族國家的「繁榮昌盛」，換言之，一個地緣組織的幸福康樂，而首先是安寧和平，能不讓人感慨繫之。其之取代革命激情卻又摻雜了革命激情，使得它們似乎具有超越性，而究其實，不過是所謂的現代情緒的表達而已。這便讓我就想起了這樣一件事情，那就是當年在法國的街頭暴動者們相遇的時候，會以「公民，今天你喝牛奶了嗎」互致問候，這一口頭語甚而取代了諸如「你好」這樣的習常問候語。——好一個「神俗一體」、「身心兩全」的問候語！其實，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當時也有許多人發表演講，倡說平等、自由和人權，疾呼反腐倡廉，但情形似乎是，芸芸眾生們懂不懂並不重要，只要有聲音大家就歡呼。其中獲得最為大聲歡呼的是一個文盲的講話。這個文盲在學生、老師和記者逐次講完後登上了汽車，因為不習慣演講也可能因為激動而說不出話來，最後憋了一句：「媽的，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結果這簡單一句話，濃縮了無限的無奈、感喟、激情、不滿、憤懣和憧憬，引發掌聲雷動。聊舉兩例是想說明，這種世俗幸福、世俗憧憬作為革命激情和現代情緒冷卻之後的歷史必然性前景，居然出現在革命最為狂熱之際，所以其於最後引出了集體自私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一世俗組織及其國家理性、國家理由，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我所講的第一部分的第五點。

第六，也是最後一點，我想說的是，三百年間的七大革命、三種範型和三種脈動，包括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所予現代世界的不外乎人類解放的政治方案和文化方案，尤其是平等與唯智主義的解放企圖。若以我們既有的有限政治想像力和文化想像力來評估過往三百年與未來三百年的人類政治走向，不妨說，七大革命，包括現在尚未完成的中國革命和伊斯蘭—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其所提供的人類解放的現代政治方案和文化方案，窮盡了一切地緣政治共同體的可能性，其所可能有的的一切善制與善治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也不妨說，革命終結了歷史，歷史歸束於大革命。大革命的爆發既是一個開端，同時意味着歷史在這個層面上終結了。未來兩三百年甚或更久的時段中，人類可能有的政治共同體的更好的可能性在哪裏？我相信現有的人類政治想像力尚且沒法兒提供任何具有現實意義的線索。最近我讀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看到他一直還是在延續其曾經倡說的歷史的終結這一基本主題，只不過是想接續說明，在比較文明和大歷史的脈絡中，為何走到了這一步，為何我們現有的人類政治想像力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其實已經理屈詞窮、黔驢技窮了而已。

如同雨果在《九三年》中的喟嘆，革命「只是各種事件演變的結果。事件在消費，人們在替它償付費用。事件在發佈命令，人們只簽個名字。」³ 歷史走到這一步，實在奈何

不得。這是我講的第一部分，重在說明晚近三百餘年，革命是歷史的發動裝置，而蔚為歷史的扣眼，並引導出以「雙元革命」為主要內涵的「現代秩序」。

二、現代秩序與雙元革命

「現代秩序與雙元革命」這一論題圍繞着國家建構和民主政體建構展開，主要陳說的是國家理性的問題，以及隨之而生、力在致臻民族國家升達理想愜意之境的公民理性。革命的結果是造就了作為集體自私的「民族國家」，同時，基於公民理性而來的優良政體追求催生了「民主國家」憧憬。「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雙峰並立，聯袂一體，構成了現代秩序的核心內涵和主幹制度，前前後後，已然並必將一切政治時空籠罩其間，無所逃遁。如此這般，則接說這一論題乃順理成章。細加分梳，大概包括這麼八項內容。

第一，所謂「雙元」，泛指「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其之先後來到人世，蔚為「雙元革命」。各位知道，晚近三百多年——不論自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說起，還是以英國革命為界，時間段落均大致如此——現代世界最為重大的變革不是科技

革命。科技革命對於晚近人類生活的確產生了至關重大的影響，但我覺得不是科技革命，也不是尼爾·弗格森所講的衛生條件的普遍改善使得人口的繁衍和健康成長造成了七十億人的泱泱大球構成了政治法權意義上的首要問題，因為人口在人類歷史上的漲縮增減是常見的現象，但並沒有造成革命性的政治轉型這樣重大的變革。那麼，英國人津津樂道的自由產權及其法律保護是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呢？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對自由產權的保護不僅英國有，中國歷朝歷代也並非毫無對於自由產權包括地權的普遍交易的保護而一種常態。因此，我覺得這一條不能作為普遍的現代現象來加以考察。在下體認，「現代世界」基於一系列因素而來，並立基於一系列因素之上，造成了「我們」此刻之作為「我們」，而必得面對之初始條件，一種既定條件。我們當然是現代秩序的參與者。可是，它又是作為一個初始條件和既定結果呈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必須首先接受它的存在，再來審視此間所謂「現代秩序」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立的。

我們細加審視便可以看出這個「現代秩序」實際上是一「雙元革命」的結果。英國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此亦曾有過陳說。這三、四百年，繼傳統的城邦、帝國、王朝陸續解體之後，誕生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新型人類政治共同體形式，那就是「民族國家」。那麼，民族國家如何才能是一個合意的、愜意的，從而甚至是一個幸福

和分享的家園呢？甚或，用傳統中國的語言和意象來表達，一種億萬人分享的「家國天下」呢？其間，曾有各種嘗試。所以有現代集權政治的產生，有巴黎公社式的壯舉，也有二十世紀末期的第三條道路的探索。但是，伴隨着現代民族國家而來，在晚近兩百年間以現代政治轉型為契機而出現、而終於登場的，不是別的，那就是所謂的「民主國家」。所以，「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二元一體，搭配無隙，由此造成現代秩序。這是全球範圍內最為宏大的人間景觀，所以為三百多年來最為重大的地球事件。其他的事件，均不過圍繞着它而發生，是在它的時空範圍內發育滋長、輾轉騰挪的。說到底，不過圍繞它打轉而已。所以，雙元革命造就了現代秩序，而現代秩序的核心和制度主幹就是這一雙元革命及其制度肉身和思想經緯。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將此二者統括一體的，乃所謂國家理性。因此，國家理性之為一種普遍理性，具有價值和功利二維。其間，歷史理性與實踐理性、世俗理性與超驗理性、轉型正義與終極理性（或者理由）、「國家理性」與「國家理由」的區別、對應和呼應等等，構成了組織和解說這一現代秩序的重要概念和理論資源。在下讀史，有這樣一個體會，就是說，恰恰是二者之連為一體，迫使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邁向民主國家之境，否則，國家終究不具正當性，而無法落地生根，成為現代世界地緣政治的唯一組織形式。另一方面，現代民主國家

一定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為時空依託，將其安放、安置在此時空，否則，其不僅失去了自家的肉身，無所依託毫無目標，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居間調理，使得二者聯為一體，進而造就了現代秩序。

這幾年隨着國家理性學思在漢語學界逐步展開，到底是「國家理由」還是「國家理性」，曾有零星討論。我查遍西文，從拉丁文到現代英語，中經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到法文、德文一直到俄文，“*ragion di stato*”，“*statsrison*”，“*raison d'état*”，“*ratio status*”，“*reason of state*”，所有這些西文，在表達方面，就這點而言，倒並沒有我們漢語來得便利。凡此西文，基本上無法僅從字面上區辨「國家理性」與「國家理由」，而要於上下文中端詳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又是如何理解的。其間涉及到時代和文明類型這類大背景，也取決於具體作者的言說傾向，而即便同一時代或者同一作者，其不同語境下或有不同含義。可能，更多的時候，它們含蘊了「理性」與「理由」，兩者二位一體，在為闡釋和想像展示了擴大可能性之際，也給閱讀和理解帶來了不少麻煩。基本來說，早期較多意指「理由」，比如說在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時代，指陳為了讓城邦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私產，有必要使它成為一個城邦公民的共同體，當時，為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則所指乃為“*ragion di stato*”。後來時移世易，它在博丹（*Jean Bodin*）筆下成了「帝國理由」

(*ratio imperandi*) 與「治國理由」(*ratio gubernandi*)。還有，當馬基雅維利給他所服務的主公發電，聲稱為了威尼斯的什麼什麼，這時候不妨使用「離間計」，「他們火拼，對我們最有利益」云云，即便在我們的心目中，這一位我們將要挑撥離間而加諸傷害者實乃一介品行高尚之士，我們亦在所不惜。則此時此刻，更多講的是「國家理由」而非「國家理性」。

兩相比較，漢語兼有「理由」和「理性」兩個詞匯，使得我用「國家理由」來支撐早期功利主義的國家實利和實力訴求，而用「國家理性」來表達國家應當如何、怎樣成為一個理想國家的理性和道義指向，更多牽扯到「民主國家」和「公民理性」、「公民理想」這一脈意義取向。總而言之，用「國家理性」這個詞來統括這兩者，在遇到特殊情況和例外時再加以說明，外打正着，我覺得中文比西文來得更高明，也更便利。

第三，由此伸展開來，在「為何要有國家」和「國家應當為何」的意義上，則國家理性當有終極理性（理由）與世俗理性（理由）兩端。就其終極理性來看，則犖犖大端在於：共同體的存續賦予其維持自我保存的道義性，而藉由各種手段付諸實施，以恪盡其成員的功利追求與價值期待。其間槓桿是國家及其權力，於是，統治者轉變成他自身的僕人，立法者就是守法者，反之亦然。由此，構成了國家和國家理性的終極理由。就其世俗理性而言，立足於人世及其肉身，主旨不外乎在於：作為一種集體自私組織，其立國承諾

與公民憧憬，集體承認政治與地緣權力的至上性—超驗性。

凡此兩端，牽連糾結，特予揭示的是，作為一種普遍理性，國家理性具有功利和價值二維的特徵。同時，它是一種歷史理性的載體，也是一種實踐理性的行動主體，如同其為一種世俗理性和超越理性的綜合體。但是，如果我們爬梳剔抉一番，則可以看出，其間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家理性是一個轉型正義，而非「終極理由」。各位，放眼今天的中國，如果說隨着人民主權和大眾民主勢必登場，國家理性這一普遍的理性形式恐怕需要接受公民理性的嚴格審視的話，那麼，「人民的出場」及隨後的立憲民主政體的確立，才使得公民理性坐實成為制度肉身，「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庶幾乎凝結成為既有時空的制度形態，而蔚為政治成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終究不是一個終極理由，而只是一種轉型正義，如此而已。如此層層鋪墊，想說明什麼呢？想說的是，共同體的存續——國家是一個共同體，它的存在和延續本身，就賦予了它自我保存的道義性，這是早年的國家理由說辭。今天，共同體成員的普遍分享、參與、平權獲享自由等等，凡此超驗價值賦予了共同體成員藉由共同體來自我實現的可能性，而這才構成了我們此刻所講的國家理性的正當性。

如此分梳，進而想說明的是，無論是在價值論還是工具論意義上，國家都不是目的，

更不是神聖的超驗價值。毋寧，國家及其地緣權力是一種槓桿，由此統治者轉變為他自身的僕人，權力的僕人。這是早年講國家理由時的一個著名論斷，洞幽燭著。今天借用這一論斷，不妨說立法者和守法者的二元一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分享公共權力上的互為對象性，構成了國家理性的正當性所在。就此而言，「民主國家」必須同時以「民族國家」為前提，所謂民族主義乃天經地義也。有民族就會有民族主義，有民族主義這個民族才能形成國族，從而形成一個國家。關鍵問題是民族主義本身都是一種集體自私，在這種情況下，各自的集體自私如何攘讓進退，才是國家間政治的話題。由此，它需要有自由主義乃至共和主義，以及國際公民社會和全球正義、全球治理來制約，這是另外一回事。

另一方面，民主國家這一理想的政治藍圖，伴隨着公民理性的成長，遂成為壓倒性的現代訴求，也是一種現代情緒。它要求民族國家必須承載立國承諾，兌現公民憧憬，使得地緣的承認政治及其至上性付諸於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權這樣一種立國安排。每念及此，頗感糾結，而事理在此，不得不然者也。

總之，「二元革命」及其所締造的現代秩序，是晚近最為重大的歷史行動，三百多年間最為重大的社會歷史進程，原因在此，而不止於此。

第四，在此，我想簡單梳理一下晚近以來國家理性的基本脈絡。丘立波博士和周保

巍博士於此亦有著述，識見俱全。大概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有三波至四波的運動，與此相應，國家理性有三期發展。就民族國家的產生而言，大約經歷了四次較大的運動。自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法尼亞條約」起其端緒，歷經近世三次資產階級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逐漸將其坐實，第一波民族國家運動造就了英、法等老牌西歐國家，開啟了近世以民族國家作為主要政治和文化單元的世界格局的先河。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後，意、德、日、俄、中等國作為民族國家湧現，為第二波。二戰後亞非拉的非殖民化運動導源於並造就了民族的集體認同，形成民族國家的勃興，為第三波。冷戰結束後再度興起的民族國家運動，諸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紛紛獨立、巴爾幹的重新組合以及東帝汶擺脫印尼組成新興國家等等，為第四波。其間，黑山與塞爾維亞的最終分立，南斯拉夫徹底消失成為歷史名詞，實際上是第四波的延續。當然，這一梳理不可避免地會遭到主要是一種西方意義上的譜系的質問。例如，中國是否一定適合納入這一民族國家誕生的創世體系，這就存在着諸多容許繼續討論的空間。

值此歷史時段，在早期地中海文明，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基本上追求的是一「權勢國家」和「權力政治」。在各國的發展進程，其具體表現並不一樣。對於英美來講，接觸得比較早一點，很快就進入了第二期；德、俄則相對較晚一點，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初期。因此，「權力政治」使得上述幾國家在自己的革命過程和立憲過程中表現也不一樣。比方說英美更多表現為一種實踐理性智慧，這個「智慧」是個中性詞，既非褒義，亦非貶義。這是在「幹慧」和「會幹」的意義上來講的，所以更多是在講如何應用軟硬實力並結合巧實力，諸如此類，來實現自己的立國承諾和政治目標。法國更多的是一種「炫耀型政治」，所以既掠奪被佔領土地，同時更要借此來表達法蘭西文明和法蘭西民族的「輝煌燦爛」。德意志和沙俄包括後來的蘇聯，大家有一個感受，它是一種蠻力政治，蠻是蠻幹。所以老毛子和德意志歐洲的農夫具有共同的特點是蠻幹，這是他們的蠻力政治；「實力政治」本質未變，而赤裸裸化為「蠻力政治」，則表現不同，時艱勢迫，耐人尋味。

大家知道，從博丹開始，隨着民主國家提上議事日程，「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益顯其蹙，彼時彼刻，國家理性遂進展演變至關於「憲政國家」與「憲法政治」的追求。考諸歷史，民主的登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甚至我們不妨說，典範型的民主是二次大戰之後才出現的。此間頭緒紛繁，可得提示的是，比方說，沒有婦女的普遍參與怎麼能說是典範性的、完全的民主呢？所以二次大戰之後兌現了婦女的參政權，才算是真正實現了全民的、典範意義上的民主。不管怎麼講，在博丹之後，慢慢地，「憲法政治—憲政國家」成為雙元革命的核心追求。大概從「一戰」之後，也可能早在維多利亞時代國家就已開始轉型

了，但不管怎麼說，至少從「一戰」之後，進入了國家理性的第三期，雖然這個進程被二次大戰所打斷，但基本進程沒變。此即追求「文明國家—文化政治」時段。今人都知國家最大的感召力和軟實力在於文明與文化，其之體現為政治文化所表達的是政治智慧，但根基還是在積久厚蘊之文明和文化。一言以蔽之，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到「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再到「文明國家—文化政治」，這是國家理性前後三期的不同側重點，講述了近代以來人類長程革命這一大背景下，藉由「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來逐步完善雙元革命的現代秩序成果這樣一個歷史故事。

第五，國家理性的凱歌高奏，行進於現代秩序，蔚為其經緯，造就了所謂的英國模式、法國模式、德國模式與俄國模式，以及可能性的「中國模式」。簡言之，英國模式秉持實利和實力，將政經宗教和文化、語言裹挾一體。法國模式崇尚國家威望，浮華而張揚。德、俄均訴諸蠻力、黷武、鐵石心腸。對此，因篇幅有限不再一一理述。在此，僅就國家理性的中國式發展，略予陳述。百多年來，隨着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出現，而且迅速地在最近這六十多年，承繼前面百多年的奮鬥，終於恢復了自己的大國地位。那麼，貫穿於「現代中國」的誕生，在其國家理性的發育成長展現出何種形態呢？二〇〇八年前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新左派們講「中國模式」，其實許多時候不過就是一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黨國模式，而這是左翼極權政體的普遍特徵。我覺得，與其探討這個模式那個模式，不如在國家理性的意義上，從民族的政治氣質入手，從「雙元革命」這一大背景，來總結中國民族的政治智慧，而提出國家理性的中國式發展形態，可能更有意義。

第六，以公民理性救助國家理性，用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此於精神和制度兩大層面，遞進說明國家理性和優良政體於雙元革命語境中的關聯。就是說，國家建構首先循沿民族主義，滿足國民理性和國民理想，形成一個分享榮光和歷史文化記憶的共同體。此於上述七大革命之國，並無分別。見不及此，說明政治上有待成熟。另一方面，必須看到，凡此諸國，在後來的立國進程中，為了確保分享的可能性，將優良政體建設逐步提上議事日程，並終於形成了各自的政體形態，蔚為國家之本。不妨說，其立國進程說明，將國家建構奠立於並託付給優良政體，才算有了「着落」，蓋因優良政體表徵並承載着國家理性，建構優良政體的努力實質上就是提煉和形成國家理性的有機進程，同時，也是將國家理性肉身化、建制化的國家建構努力，一種國家理性的自我制度武裝和理念昇華。同時，以優良政體來承載國家理性，也就是在規訓國家理性和權力意志，確保國家是並且永遠是一項公共事業。今日環視這個星球，看看「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吾人可得陳說，只有承載於優良政體的國家及其國家理性，才有力量，也才能獲秉偉大的道德尊嚴。

就「現代中國」的創世進程而言，國家作為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的交匯之所，理當成為全體公民和平共處的共和家園，使得國家建構的努力同時是一個兌現民族理想和落實公民憧憬的雙重政治建構進程。沒有民族主義和「文化中國」的武裝，「現代中國」難以立世；缺了自由主義立憲體制和「政治中國」的建構，「現代中國」難以完成現代轉身。就此而言，建成優良政體才是「現代中國」最終圓滿呈現的加冕典禮，而為當今中國的當務之急。無此優良政體，則建設「現代中國」、長逾一個半世紀的長程中國革命將頓失意義。一日無此優良政體的確立，則一日難言轉型的完成，更難言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挺立。而且，歸根結底，沒有優良政體作為制度支撐，一切有關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均無落實的現實基地，寄託其上的理想而愜意生活的可能性更將不復存在。

說到這裏，想起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的一段話，大意是說，民主國家的居民並非天生的一潭死水，「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社會永遠都在運動，它的每一名成員甚至不知休息為何物。但我又認為，它的所有成員都只在某些界限之內躁動，幾乎不越雷池一步。他們每天都在對不大重要的事物進行改變、變更、更新，但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觸動根基。他們熱愛變化，但是他們害怕革命。」⁴ 在我解讀，國家一旦經由「雙元革命」，則轉型完成，大勢已定，居民當然自無大動干戈的必要，卻需好生護持新型秩序賴以奠立的基

礎，而在改良中持續前行。

第七，國家理性誕生之際，正好是現代世界歷史之世俗化展開的時段，也是一個所謂的理性化的歷史進程，則國家理性與世俗化、理性化之分立合轍，交相呼應，實在大有剖析之必要和旨趣。然而，它們在上述七大革命中是如何具體展現，尤其在「雙元革命」中是如何伸展和落實，卻是一個需要探討而依然有待討論的問題。其間，由於文明類型和歷史發展階段之異，導致無法訴諸某種籠統之說。比如說，伊斯蘭—阿拉伯世界的晚近發展，很顯然與世俗化脫不了關係。至少，世俗化浪潮衝擊着其文明價值和生活方式。土耳其、埃及和伊拉克的晚近發展，恰為證明。這便又牽扯到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關係，將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而中國革命則顯然與帝國主義時代，東西文化衝突語境下，後發的王朝政制國家如何自我更新，從而建構現代國家和現代秩序這一國家理性的成長脫不了關係。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概為第七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八，今天觀察法國大革命歷史，則如何以公民理性來救濟國家理性？如何以優良政體來承載國家理性？這是二百年來的歷史話題，也是今天中國的時代話題。在此，我想把上述論旨拉回到中國，在近世中國而立國立憲進程中審視其現實意義。從「民族國家」的意義上來說，「文化中國」是其中應有之義，所謂立國建國即旨在建立「民族國家—文化

中國」；從「民主國家」的立意來看，「政治中國」同樣是其應有之義，中國的政治主體性及其政治成熟構成了現代中國政治建國的主軸。職是之故，如何使「文化中國—民族國家」和「政治中國—民主國家」聯袂而動，造成四種因素兩位一體的「現代中國」之「現代秩序」，從而，將優良政體和國家建構連為一體，公民理性、公民理想和國家理性、國民理想協調一體，實為今日我們總結大革命、回顧雙元革命這一現代秩序創生史之問題意識所在。在此，「優良政體」和「文明觀念」應當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優良政體講的是制度肉身，它使得二元統一；而文明觀念是靈魂，它為二元如何統一提供了一種精神脈絡和理論思路，並賦予其道德力量。優良政體和文明觀念統合二者。捨此，無以成就「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所以，「中國問題」的四項核心內容，即「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講述的實際上是一個「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的四位一體的宏大歷史進程，必將造就的是現代中國這一中華文明的現代秩序。中國的長程革命走到今天，人在途中，有待收束而最終完成，大致情形，不外乎此。

三、國家、社會與政治的三元一體結構

我給大家陳述的第三部分是「國家、社會與政治的三元一體結構」問題，旨在說明二元革命所以發生的縱深背景與現代秩序的具體落實情形，特別是其間所涉及的核心變量。

各位知道，在晚近三百年的現代秩序視野中，「國家、社會與政治」一直呈現為一種「三元一體」結構。最近幾年在下思考這一問題，主要以中國為個案，深感政治哲學所講的政治統治基於「命令和服從」的關係而組成，則「社會、國家與政治」三變量之中，只要有一項立於不敗之地，則基本的統治關係和統治秩序即可得以維持，確乎有道理。相反，如果連一項也不存，則統治關係不復存在，政治權力崩塌，秩序解體，其所呈現的世俗景象便是所謂的「天下大亂」。在此，如果以這三個指標或者變量來衡估的話，則社會、國家和政治三者都有效，即可望形成最佳統治；社會和政治都有效，可能是次優統治；國家和社會有效，是再次優；倘若社會解體、政治崩潰，則為最糟糕狀態，此時此刻，即便存在一個叫做國家的政法架構，也大勢已去，於事無補。

圍繞於此，約有下述五點可得陳述。

第一，是所謂國家、社會和政治的「新」「舊」問題。各位知道，一九七〇年代前後，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James Geertz），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地方性知識》一書的作者，曾於普林斯頓高研院集會研討後發表國族中的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主要以印度等國為標本，後來出了一冊文集，大概書名是《新國家，舊社會》，或者，《新社會，舊國家》。該文集為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多譯作《舊社會與新國家》。其中講到都鐸王朝至英國革命，美國立國之初至南北內戰，大約這個時段，英美兩國的政制變遷和政治轉型。其中一個看法對我特別富有啟發。那就是在他們看來，美國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至少在立國前後的一兩百年裏如此。美利堅國父們信誓旦旦於新制，而由於新舊大陸的時間差，其所實施者不過都鐸舊制。與此相反，英國倒是一個「舊社會、新國家」，在等級和階級的舊社會基座上，英人建立起了現代國家和現代秩序。

將此分析範型引來分析上述七大革命，視角有別，許多問題一下子變得有意思起來。篇幅有限，除開英美兩國外，只添加中國和法國作為樣本，再將政治作為一個變量加進來，稍予分析。

先說美國。我認為美國在一七七六年前後，一直到後來南北戰爭，甚至於到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呈現的乃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新政治」的格局。諸位，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與法國不同，美國在革命爆發之際並不是因為生活貧困、貧富差別加劇，所謂

「難以忍受的貧困和困乏」使得人民對於現實不滿，進而造成社會暴動與政治革命。相反，在英國人到達美洲至革命爆發前的大約兩百年時間裏，美利堅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英國人所行使的統治僅僅是帝權一統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意義上的。至於社會本身，則交由殖民地的人民自己解決，或者，反倒於「漠不關心」中任由其發育。如此這般，下迄美國革命爆發的時候，美利堅的社會肌體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育，自治性蔚為特徵。其中，拋棄母邦的爵位等級，因為出身和名位而將人群劃分為三六九等的社會結構，頗具意義。也就因此，美國夢的最為重要的一大特點是沒有爵位等級，無貴族與平民之分，倒是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更獲崇許。「英雄不問來路」，最後的「成功」，乃是衡估的標尺。

縷紉若許，總體而言，在我看來，美國是一個「新社會」，當時就是「新社會」，革命爆發以後更是「新社會」。但是，美國在革命爆發以後有一個時間差，那就是操持立國的美利堅國父們，包括富蘭克林諸輩在內，他們所理解的、衷心憧憬而心嚮往之的，亦且於政治理智層面高度認可的政體，並不是當時他們在理論上尤為傾心的，比如洛克的也好，或者，盧梭所憧憬的也罷。毋寧，實際上，他們所理解的洛克和孟德斯鳩其實不過是其所信奉的都鐸王制。都鐸王朝的有效統治在他們看來是一種較好的體制安排。這裏面不僅有

認識上的選擇性，還有一個因素，概約「時間差」。就是說，在英國革命到美國革命爆發這個期間，存在着一個制度及其理念在傳播上的速率，導致他們的所見所識，同樣難以超越時代。再者，英國革命後逐漸奠立的新型政體，此時此刻，尚未發育到完全水落石出的時候，一時間尚不足以發揮制度的典範意義。因此，這時候，他們把看來最為熟悉、最為有效，也可能最為認可的母邦「都鐸王制」，幾經輾轉，無意識中奉為立國之本，就不足為奇了。基此制度所建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舊國家」。不過，我要加進去一點來修正吉爾茲教授們的看法，那就是即便我們承認雖然北美大陸是一個「新社會」，但卻是一個「舊國家」，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要說，美國於立國之初所實行的就是「新政治」。

換言之，美國這時所植立的立憲民主政體，作為一種以「我們人民」為旗幟，而奠基於主權在民的政權永久正當性基礎之上的大眾民主形態，才恰恰是在法國革命之前就已經法權化了的立憲民主體制，遂走上了歷史舞台。尤其是在地廣人稀的國度——相對於歐洲母邦，美國不啻浩瀚——在這樣一個國度，如何實現「秩序和自由」的統一，的確確，美利堅驚世駭俗。因此，通過後來的立憲安排，借助社會高度發達這一優勢，而以公共空間承載人民的自由，而將自由通過法權樞機轉化為個人的公民權利，這樣一種作業，可能是法國人在很長時間裏沒有做到的，也是英國人一時間礙於舊社會的身份等級所無法實現

的，而在美國卻實現了。更不用提後來經過麥迪遜所形成的三權分立這樣一個在歐洲只能是夢想，但是在美國卻率先實現的新型權力架構了。凡此種種，輻輳一體，使得「新社會—舊國家—新政治」三位一體，成為美國立國和立憲的基本形制。

相較而言，我個人體認，在大革命中間——大家知道此刻講的「革命」都是百年長程，甚至更長時段的轉型故事，而不只是一場瞬時爆發的起義或者暴動——英國更多的是「一個「舊社會、新國家」，同時，我體認它實行的也是「新政治」，而構成「舊社會—新國家—新政治」格局。前幾天我和一位同行討論這個問題，他不太同意，認為英國是「新社會、舊國家、舊政制」。然而，問題在於，既然說雖然英國在「權利法案」公佈之後基本王權受到了限制，但是社會根基沒有動，它所奉行的還是貴族自由主義意義上的賢明政制而已，那麼，既已引入了一「權利法案」，則意味着在關於人的這種公民位格問題上出現了重大轉型。與此同時，尤需考慮在英國出現的新型社會因素，比如說漫長歷史中形成而有效的社會資質，由此所開啟的一種議會至上，而將貴族工商階層和政客集團，包括整個的知識界上層囊括其中的權力和權利分享機制，其為一種社會結構，構成了權力的社會基礎，將參與政治和分享權力這種政治階梯安排漸臻成熟之境。——所有這一切使得英國至少是在一六八九年權利法案公佈以後邁入了新政制和新政治，而且，它也是人類歷史上最

先邁入新政治的國家，第一個將此新改制以及現代政治，特別是議會民主這一套，推向歷史舞台，而率先進入現代秩序的國度。總括而言，「舊社會—新國家—新政治」構成了英國的基本政治社會形態。

相對而言，法國呈現出另一種形態，也比較有「看頭」。它是一個「新社會、新國家」，但是，「無政治」。它既不是「新政治」，也不是「舊制度」，而是在很長時間裏其實是「無政治」，如果我們不用「無政府」這個詞匯的話，不用「超政治」這個詞匯的話。因為，「超政治」講的是哲學境界，更玄妙一些。「無政府主義」講的是改制和政治的解體或者無能為力。所以，用「無政治」更能表達法國在百年長程革命歷程中的紛繁歧異。一七八九年以還，法國之為「新社會」這一點沒有多少疑問，後來所建立的政體有了一個現代的政制框架，搭建起了現代國家，這也沒有太大的問題，雖然它的反覆性使得它實際到波拿巴復辟的時候其實是以向後倒退向前進的，乃至於宗教亦從信仰新教到最後還原成信仰天主教。還有，爵位制度也是幾經翻覆。總的來講，法國在革命中是在向一個「新國家、新社會」邁進，尤其是社會層面。然而，法國的問題是「無政治」，所謂「無政治」發展到最後忍無可忍的地步，才有第三共和國大幅度地後退向王權政制來收拾這樣一個幾乎為平民潰敗了的國家，這才逐步形成了以政制和政治來統一社會和國家，而形成「政治、國家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形制。

晚近中國情形比較複雜，不好歸結為上述任何一種形態。它是一個「新國家、新社會」，也是「新改制」，抑或，還是一個「舊國家」、「舊社會」乃至於「舊改制」呢？斟酌詳情，拈斷鬚髯，亦難斷定。可能，身在此山中，這便望眼迷懵了。細言之，一八六〇年以還，至少到現在，中國的長程革命尚未結束。在此，我覺得說中國是一個「新國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一九一一」搭起了共和的架子，王朝政制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形成了現在至少形式上搭建起來的民族國家的政制法律屋頂。而這就是一個「新國家」的身形，這一條沒有問題。實際上，不管是民國時段，包括其前期的北洋，及後來的共產國家，中國作為一個「新國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怎麼說，也是亞洲第一共和國。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舊社會」而不是「新社會」，因為過去清末民初的變革並沒有觸及到社會層面，雖然有男女平等、放小腳這些社會的變革，但並沒有連根革除基本的禮法結構。後來的共產革命就不一樣了，翻天覆地，席天幕地。實際上，整個社會的結構被徹底地顛覆了。那麼，在這種情形下，民國政制和共產政制都具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它們作為近代登上歷史舞台的兩種集權形態，民國政制主要是一種右翼集權形態，共產政制主要是左翼集權形態，都具有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自己的政治憧憬和政治理想，也具有落實政制效能和政治理想的強有力的「隊伍」，特別是黨國體制。基此，不

妨說，近代中國是有政制和政治的，而且，是一種「新政制」和「新政治」。總體而言，中國是一個新國家，有政制和政治，甚至可以說是「新政制」和「新政治」。至於它們不是理想的政制和政治？我們此刻暫時無遑定義，但是，其之有政制，也是新政制和新政治，則無疑問。

不過，話說回頭，到目前為止，最主要的問題是相對於法國的「無政治」，中國是「無社會」。所以中國是「新國家，新政治」，但是「無社會」。那邊廂，法國是「新社會、新國家」，而「無政治」。總結而言，法國的形制是「新社會—新國家—無政治」，中國是「新國家—新政治—無社會」，英國是「舊社會—新國家—新政治」，美國是「新社會—舊國家—新政治」。這是我選擇的四個國家，以「政治、社會和國家」作為變量所做的一個大致區分。進一步做下去，就是劃分最優型、次優型、中等型，之後是維持秩序的，最壞的、最差的還沒有做出來。

補充一句，若以「絕對國家」、「中立國家」和「全權國家」立論，則不妨說，十八世紀的絕對國家，是國家含於社會，社會即政治，抑或，無政治；在十九世紀的中立國家或者普遍國家，國家超於社會，政治只屬國家；逮至二十世紀的全權國家，則國家合於社會，國家即政治。凡此說來話長，不及展開，聊引話頭，供各位參考。

這是本節「國家、政治和社會三元一體結構」所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專就法國革命來看，大家知道，托克維爾在這本書裏講了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法國革命的結果，「法國革命的進程在法國革命爆發的那一天就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三」⁵。對這句話，大家各有解釋，結果大致不差。在我體認，這句話構成了本書的一個核心命題，提綱挈領，閱讀時不可一筆帶過。換言之，在革命之前的法國，社會獲得了極大的成長，社會成長於革命之前並且啟動了後續的社會向政治的進程。在此，比如說，有這樣一些標誌性的事件，足堪表徵。

首先，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是貴族民主化與貴族自由主義的產生。各位知道，到了法國革命爆發的當口，一些貴族實現了自我轉型，自由規則觀念萌發，還有一些貴族破產或者棄權，他們融入了一般大眾層面，已然轉型成為革命的鼓吹手。其中，最為有名的不外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他不僅自己跑到美國參加革命，當了將軍，還回國投身大革命，是以對於自身階級的背叛來推動革命進程的一位著名人物。因此，貴族民主化和貴族自由主義的華麗轉身，其實意味着一個新興的階級的產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言而蔽之，作為現代市民階級和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而出現的現代公民群體，其實，在革命之前就已經產生了。

其次，第二個重要的標誌是，貴族在路易十四時代就開始以放棄或者被迫放棄自己的特權而獲得王室的庇護，不僅在於放棄了特權，同時意味着放棄了對於社會所應擔當的責任，而參與王室一統體制下的實利—食利分贓機制，由此造成了以四千大戶吃俸祿為代表的一個龐大的浮華而腐化的貴族階層，而這一階層是此邦此國過去所未曾聽聞的。我們知道，如果這是一個貴族統治的社會，必趨於平權與分散，因為貴族在地方，諸地各有其利，則勢力平衡。但是，恰恰相反，一旦王室坐大收權的話，必趨於一統與集權。所以，有意思的是，路易十六時代，王室的收權似乎造成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但卻由於到了後來分贓機制不平，尤其是法國支援美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困難，使得本來依附在王室周圍的上層階級四千大戶，離心離德，終至分崩離析。

再次，社會變革的根本因素在於第三等級的成長。各位知道，法國革命爆發的當口，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可是，距離上一次三級會議的召開卻差不多時隔一百五十年了。這一百五十年裏，第三等級不期然間悄悄地成長了起來。其之成長，不僅在於他們蔚為社會的「中產」，有些財富，關鍵在於第三等級從過去的不識字、手上有老繭、指甲裏面有煤屑的漢子，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逐步實現了自身的知識化，而成為學富五車之階級。因此，這些人與其新興市民觀念鼓動的天然平等理念，才風助火勢，火借風威，終於釀成了

革命的漫天燎原之勢。當其時，法國社會中的市民階級知識分子和貴族自由主義者，像河流般汨汨流淌活躍於巴黎的大小沙龍，造就了一批重要的革命鼓動家。後面將要講述的文人政治，此為其中的重要活動方式。

最後，特別重要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法國出現了兩種資產階級和兩種貴族，以及「貴族的反動」與「領主的反動」。大家知道，長久以來，法國的地產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都曾勢成水火，或者，至少是矛盾重重。其中，就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而言，於對付第三等級的事業上心心相映，而於王室的杯葛中又各有算盤。以穿袍貴族而言，他們主要壟斷司法體系尤其是高等法院。凡此司法體系，一度被視為最保守的一種貴族勢力，所以在革命之後，法國的司法體系長期受到漠視。直到今天，在整個世界範圍來看，普通法國的法官地位最高，德國一系的法官地位較高；法國和意大利這種拉丁民族的司法體系中的法官地位，不算太高，還算可以，基本上是在官僚集團之下，還保有有一定的獨立性，但較諸英美和德語一系，已然顯低了。最低的當然是左翼極權政制下的法官了，了無獨立位格，則又另當別論了。所以，話題收回來，法國的司法體系之所以從革命前的具有較高地位，到革命後的兩百多年裏，地位一直上不去，包括法國的各級行政法院的法官的地位和同樣在這個位置上的德語一系，包括了瑞士這些國家相比，都要低，當

然跟英語一系比更要低得多，其來有自，原因在此。如此這般，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他們和王室的杯葛，和第三等級的對立，形成了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期間，因為王室要集權，所以他們都是以贖買的手段讓貴族交權，然後讓他們成為分贓機制的食利階層。不過，在革命爆發前，曾有所謂「領主的反動」和「貴族的反動」。「領主的反動」說的是地方貴族的離心傾向。他們向王室提出恢復舊有權力的要求，恢復特權，卻以失敗告終，造成了或者加劇了他們的離心離德傾向。此役中的淪落者和第三等級兩相匯合，造成了一種新興的革命力量，導致「國家、社會和政治」三變量的組合發生了逆轉。過往有一種研究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也有人說法國革命不過是一個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後果的社會革命，或者，恰恰相反，是一個社會革命產生了政治後果。但是，不管怎麼講，我們可以這樣說，法國革命基於思想危機，進而造成了社會危機；社會危機演變為政治危機，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導致舊有權威的徹底崩潰。

職是之故，當我們說「革命」的時候，其實總是「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之三位一體。我相信將此施用於法國革命這一成例，同樣可以作此回答。法國的革命歷史證明，思想革命破題，理念變革在先，方有不滿，其中，特別是對於千百年來延續已久的等級制度的普遍不滿。各位，等級制度自古有之，為什麼到了法國革命前夕大家不能忍

受？原來，是理念變革的結果。貧困和匱乏是一種社會常態，在現代工業社會所造就的所謂福利體制誕生之前，貧困和匱乏是常態，不貧困才是少數人的特權，才是一個例外，而貧困為社會常態，沒有貧困和匱乏的社會生活是不可想像不可思議的。然而，為什麼對於貧困及其長期匱乏一下子變得不能忍受了。在法國革命前夕，它們成了不可忍受的現象。這得歸功於思想革命，是思想理念的啟蒙造成了對於貧困和匱乏之意識，以及，百姓對之不堪忍受。

就此而言，亦不妨說，思想理念的變革造成了社會危機，而既有政制政體接應乏力，則社會危機就會演變成為政治危機。所以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是政治危機導致政制崩潰的結果。這也印證了，或者說我個人的研究也印證了他的看法，就是說法國是「新社會、新國家」，但在長時段裏，包括拿破崙稱帝那一不可一世的特殊時代在內，其實，法國卻依然是一個「無政治」的格局。

第三，包括法國革命在內，凡此「社會、國家和政治」的交錯互動，造成的一個重要的後果是，革命之後，新社會的誕生意味着「等級社會讓位於階級社會」。等級社會在英國的消亡到今天沒有完成，這是大家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實。但是至少在理念和行動

上，等級社會在法國的崩潰始自於大革命，雖然後來有復辟和爵位的恢復，但是等級被階級社會所取代，這是法國大革命的重大變化，從此人類進入階級社會，由於階級社會的階級差別之大造成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革命意識形態，這又是一回事。因此，等級社會之讓位於階級社會，這既是法國革命在「政治、社會、國家」三者之間運動的一個重要後果，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徵。大家知道，如果說用過去的「老話」來講，法國革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不妨說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要建立一個階級社會，而後來作為革命的反撥所出現的共產革命，則旨在消滅階級。那麼，階級社會和等級社會都具有現實的人性基礎和社會可能性，但是無階級，換言之，一個無差別的絕對社會和徹底實現了社會正義的社會，則為不折不扣的烏托邦。所以，共產革命旨在消滅階級，達至無階級，不意間卻在實行這種革命的所有國家，包括俄國、中國、北朝鮮以及東歐國家，造成了更加等級森嚴的權貴階級。我記得以前鐵托有一個追隨者，後來脫離了共產黨，寫了本《新階級》，他有一句話寫得特別好。他說，消滅階級的革命旨在對二日年前發動的大革命進行反動和反撥，不意間，它反而比那場革命走得更遠，更反動，因而造就了一個高高在上，把觸角伸向於思想和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的這樣一個新的權貴階級。如果用這句話來衡量中國的當下，似乎也具有呼應性。

隨着等級社會讓位於階級社會，公權觀念取代了特權觀念，公理觀念戰勝了神聖觀念，這是在「國家、政治與社會」三者之間聯袂互動的法國革命所帶來的重要的轉型和成果。有人說中國近代的轉型是公理觀念取代天理觀念，我想在包括法國革命在內的七大革命的總體背景下，公理觀念之取代神聖觀念其實是一種普遍現象，也是一旦革命發生都會出現的。

第四，上述這七場革命，包括法國革命在內，在「國家、社會和政治」這三個變量中，各有側重，而體現的正是其社會政治形勢和民族的政治文化氣質。在我體認，大致而言，「英美靠社會」，「法德靠國家」，「中俄靠黨國」，大概道盡其趣。在英美一系，大而化之，不妨說社會的自我轉型逐步落實和體現着政治理念，然後將政治做實，再演化為法權結構，包括立憲，包括英國通過十三部法律來體現憲法這樣一種立憲方式。這是普通法法憲政主義的一個重要體現，而終於造成了「英美靠社會」的大格局。那麼，「法德靠國家」，說的是德法兩國在國家建構和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主要依恃的是國家的強有力推動。國家之成為文化皈依的在場性和政治忠誠的載體，追求國家的威望和權勢與國民理想的契合，並由此造成公民理想之將國家的繁盛融會其間的景象。凡此兩國，均不脫此轍，其於德國，尤為明顯。中國和蘇聯一脈，悉為左翼極權政制，走的是黨國一體的路

子，而形成「中俄靠黨國」的勢態。在「政治、社會和國家」三維系統中，中俄的轉型路子將政治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單就中國情形而言，在社會有所發育，而國家初具現代形制的情況下，如何能翻天覆地，則共產革命，包括前期之作為世界範圍內共產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民革命，主要是靠政治來翻轉天下的。政治之自我體制化，將自己的肉身化託付於黨國，其勢強悍，其力威猛。

所以，總括而言，「法德靠國家」、「英美靠社會」與「中俄靠黨國」，凡此判稱，我覺得還是可以成立的。進而言之，其所導致的一個重要歷史後果就是，法國革命是一個產生了嚴重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後果之巨，甚至造成了一種長期「無政治」狀態；英國革命則為純粹的政治革命，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尤其是對私有產權體制所作的普通法安排，醇熟而圓融，展現了工商民族的政治趣味；相比而言，美國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它和英國的相似之處在於更多地採用了一種以立憲為開道工具的普通法憲政，而終於成就了一個法權革命。當年雨果借小說人物之口喟言，「革命在為世界開刀……也許使將來也陷於恐怖」，可謂有感而發的興亡之嘆也！⁶

第五，我想簡單提示一下，英美革命以自由與共和為指向，從而訴諸政治；法中革

命以平等與解放訴求為開端，源於社會問題並且指向社會問題，的確確，具有阿倫特所說的「胃的造反」的特徵；德國革命更多地訴諸所謂的「民族與文化」，卻同樣是以政治來翻轉天下，或者，加一個限制詞，是以「文化政治」來翻轉天下。通覽諸方，總結一句話，革命必須造就了政治，才算一個「開端」。這是今天向大家陳述的第二部分，一共是這樣五點內容。

四、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

在這一部分，我想簡單講一下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問題。各位知道，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諸多爭論中，一個重要的論題就是究竟法國大革命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它的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和思想遺產何在？有人說是「狂飆突擊的革命風格」，有人說是一種「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理想，它們如太陽初升引領着世界各國人民奔湧向前，爭自由、爭解放、爭民主。還有一種講法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從此意味着一個新興的市民階級取代了王室貴族宮闈政治，大眾民主時代來臨，則天地變色，而這才是法國大革命所提供的

最為重要的政治和思想遺產。一場宏大的社會、政治進程既已發生，一變俱變，則形制俱在，後人觀瞻點評，各有心得，本不足為奇。

今日若從「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三元一體視角細細端詳，以此攏括思路的話，我想，的確確，「人民主權」和「大眾民主登場」可能是法國大革命留給我們的最為實在的政治遺產，如同國家理性一脈主要須從英美政治中探幽索微，觀察之，汲取之。晚近以還，特別是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來，隨着多數國家邁進民主政制之境，宮廷政治、秘密政治和神義政治在各國不同程度地逐步退場，而為大眾民主和人民主權這一關於現代政治正當性的政治敘事所取代。而它的政治源頭，正啟自法國大革命，是法國大革命嘉惠人世政治生活的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財富的積累與政治參與慾望的高漲如何演進為既有政治體制安排，從而提供政治參與這一公共產品，而非出於維護既得利益之私，想方設法堵塞基此而來的政治參與，就此而言，則法國的百年長程革命並沒有提供給我們多少實在的智慧，雖然它提出了人民主權的政治正當性和大眾民主這一政治組織和運作方式。反而，英美革命的經驗理性主義，其相對平和的演化式進路，在如何提供政治公共產品，包括政治參與和滿足財富的增長這兩方面，展示了更多的政治理智和法權安排智慧，所予吾人的教益更具現實性。

由此，我想到了「政治文化」這一問題，一個從事政治哲學的各位想必都很熟悉和重視的語彙。在七大問題及其七大革命中，又尤其在英美德法和中俄這六個國家中，「政治文化」是如何提煉和體現的？它們如何影響了各自問題的解決進路，並呈現出何種文明個性？細加審視，繞有意味。在此，竊以為現代政治文化成長的普世性方面，包括平權主義、主權在民這一基於道德主體而輾轉為政治主體的實踐性的理路，其實基本相似，沒有太多值得敘說的地方。然而，政治文化與民族歷史凝煉而成的文明傳統兩相結合所形成的民族的「政治氣質」，可能才是引導我們將觀察向縱深推展之際所當關注的重要問題。比方說，在我們所講的上述六個國家中，法國民族的政治氣質和政治文化體現為社會意義上的「群眾」、「人民大眾」之作為現代歷史的主體，反覆多次登上歷史舞台。與此同時，凡此現代大眾民主政治文化與法國傳統的神秘宮廷政治，在長時段裏無法融合，導致以國務活動家黎塞（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留這樣一種講究國家理性、稅收財政、國家實力和基於國家本位的國家建構觀，與以文人們即伏爾泰、盧梭為另一脈所鼓吹的主權在民、大眾民主這一脈之無法合流，由此造成法國社會直到今天，其張力尚未完全釋放，從而呈現出所謂的法蘭西威望政治式的民主政治文化特性。世界範圍內，包括法國在內的拉丁國族，在政制似乎相對腐敗，屬民主國家體系中腐敗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體系，

具體原因千頭萬緒，但與此種民主的政治氣質實在脫不了關係。其中，傳統的宮廷秘密政治和貴族政治，直到今天，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

相對而言，如果用一個詞來表達的話，我覺得美利堅民族極具「幹慧」。的確，「幹慧」一詞頗能狀述美利堅的政治氣質。有時候，我們碰到一個人，覺其雖無超越心智和高蹈心性，卻有幹慧，兼具經驗理性和實踐性智慧，能做事，會做事。有時候，我們為讀書人惋惜，說此君雖然讀書不錯，思想也有深度，但做事不行，缺乏幹慧。可能，讀書人耽溺於學思，馳跋於神思，在勞動分工中長於為人類擘畫理論演繹，當然就只好將做事一端留給他們了。放眼國中，好像閩粵、江浙一代的商人會幹，但北京的知識分子會說，他們無什麼幹慧。能把二者結合起來的，有人說是上海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有幹慧，又會說，他們表達了一種理想狀態。是否如此，姑且備此一說。話題收回來，我覺得「美利堅」如同其祖邦，從一開始就是特別秉具幹慧的一個民族。美利堅民族的政治文化氣質中充盈着基於實用主義的「動手能力」，其衝動，其勢能。就以法政意義上的「我們美國人民」這一籠統概念而言，實為一大智慧。凡此 *We the American People*，既是指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萬千成員，又指一個邦國中的諸族及其合成的整體性美利堅民族，還可以意指一個意義含混而又清晰的可大可小的一群人，以及與政府和政治權力相對，卻掌握着政治主權和

正當性的普羅大眾。把這樣一個法政意義上的「人民」變成了邦國公民政治意義上的後群眾的、超群眾的、也是法權意義上的具體的公民個人，然後與具體的公民個人的個人自由相連接，以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在於公民讓自己化身為盧梭的公民以及可計數性的選民這一現代法政安排，來緩解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的張力，來舒緩政治意義上的集體性主權在民和個體作為道德主體也是實踐主體之參與卻供給不足的緊張，等等，體現了高度的「幹慧」，妥協、轉圜和圓融。這就是民族的政治氣質。

德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點是將正當性訴諸「民族與國家」，而民族和國家立基於共同分享的歷史與文化。此種歷史和文化，不僅承載民族和國家，而且，直若神聖。如果說美利堅的政治訴求悉依「我們美國人民」為神聖為皈依的話，那麼，德國則以「我們民族」或者「我們的文化和歷史」來表徵，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就英國而言，可能，「臣民觀念」蔚為傳統。然而，凡此種種，不管如何表達，在「人民主權」和「大眾民主」登場這一總體歷史背景下，這一總體的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遞次演化的時代大格局下，各自接應了時代，各以自家的民族政治氣質，完成了從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的政治氣質為何？其之稟性、取向和路徑表達出何種特色？這實在需要細予審察，而於品味咀嚼中陳述之，於準確陳述中審慎因應之。將近兩個世紀的「長程中國革命」，

如果從一八六〇年算起也有一百五十四年了；從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算起的話也超過一百年了，其所表現的民族政治氣質是什麼？事關如何實現從舊有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可謂大是大非，而恰成一個「問題」。在此，「文學政治——文人政治」作為一個覘孔，可能，聊可解頤。

五、文學政治——文人政治

所謂的文學政治、文人政治，如各位所知，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中提出來的一個著名概念。當其時，他是帶着惋惜甚至是指斥的口吻來談論這件事情的。在他的理解中，「文人政治——文學政治」是要為大革命的爆發及其慘烈後果，特別是後者，擔負責任的。今日回看，結合吾國情形，確實觸目驚心。圍繞這一問題，可以提出八個方面供大家思考。

第一，所謂「文學政治」或者「文人政治」，敍說的是大革命之前，現代學科專業尚未分際之時，一群飽學博雅之士，比如說音樂家、詩人、哲學家和思想家，就是我們今日

所熟悉的盧梭、伏爾泰以及百科全書派式的人物，這一個圈子，抨擊舊制，疾呼良制和良治，在人文和政治雙重意義上暢想人類未來，引發民眾共鳴，終至大眾山呼海嘯。其間情形，如托克維爾所論，「每種公共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到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裏通常由政治領袖佔有的位置。」⁷而事實是，通常，他們不曾有過一官半職，也不從事實際的產業，反而是一群以思想為人生，並以此為思考對象、以此為職志的博雅飽學之士，兼具道義良知、社會關懷和言說與鼓動能力。那是一個需要熱情、智慧和能力，而他們恰恰兼具熱情、智慧和能力。此時此刻，「現代」氤氳着並即將臨盆誕生的前夜，也正好養育了這樣一批人物。一八七二年，事隔將近百年，雨果寫作《九三年》，借舊貴族朗特納克之口不無調侃：「試想想看，假使伏爾泰被吊死，盧梭被送去當苦工囚犯，這一切就不至於發生了！啊！有才智的人是怎樣的災禍啊！……一切都是那些濫文人和壞詩人引起的。」⁸

在我理解，所謂的「文人」指的就是這樣一種人或者一類人，而不是舊日中國傳統意義上所說的文弱書生式的文人，更不是冬烘先生、數點茴香豆那個意義上的文人，當然，也不是聶紺弩所謂的文人氣，好嫖好賭好吃好抽的一幫人這個意義上的文人。重申一句，我理解的托克維爾所講的大概是這樣的博雅飽學之士，其最為突出的稟性在於具有道義良

知和鼓動演說能力。

研讀托克維爾，回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透過歷史迷霧，不禁掩卷追問：為什麼這群文人聚集在當時的法國？他們如何以沙龍和公共演講作為介媒，藉由思想鼓動和對舊制度的批判，以推翻王政號令天下？其影響之大，響應風從，令天下眾生癡狂，逢王（朝）必罵，而終至推翻了事！

第二，這便說到當時一個特殊的法國現象，可能也是歐洲現象，或者，一種前現代、反政治的現象，即由於缺乏公共政治空間與自由言說場域，亦無晉身之階，導致「文人」們以文學性曲筆介入世事和時世，發抒人生感喟，抨擊世道人心，並以此關涉政治。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也講到，當時的法國缺乏公共政治空間與自由言說場域，並為此而深惜。像盧梭這樣的平民思想家，既無晉身之階，「身分」捆住了一切，便只好以文學性的曲筆介入世事和人間，並以此關涉政治，算是自找一點用武之地。當然，這並非是說但凡政治自由空間和自由言說的場域不足，則文人政治、文學政治就必然出現，而蔚為一種普遍現象。毋寧，它是特定歷史時段的歷史現象，所以才說是一個特殊的法國現象。就此而言，兩相比勘，今日中國倒還真的有點那股子勁兒呢！君不見，今日網絡空間公知們嘈嘈切切，一些淺學之士惶惶然成了所謂意見領袖，原因在此。真正的飽學之士，

如今天在座諸位，似乎反倒並不怎麼叨叨咕咕，原因同樣在此。一位朋友，大學教授，我當面說他，「你現在叨咕什麼？你寫不出論文就寫這些個兒段子？」他說「很管用，年輕人就信這個啊！」再如，假如我和秋風一起，與一群年輕人坐聊，人家說這是許章潤教授，他們便要查一查這是誰。但一說秋風，馬上「哇塞」。這就是「文人」的厲害。從法國大革命之際的飽學博雅之士，到今日中國網上鼓噪的淺薄之徒，可謂「徒使後人復哀後人」，卻為大眾民主時代的塞博空間的必有項目，同樣是時也、勢也。援引秋風教授為例，只是想說網絡文人與聞人的厲害，與此處「淺薄之徒」不搭界，特此聲明，並請秋風老友諒察。

第三，由此順流而下，文人及其文學性敘述主宰了政治言論與輿論走向，響應風從，並於革命中成為政治領袖；其之闡揚理想，窮竭學思，抨擊時政，獲得一片叫好，致使任何反對聲音均不戰而敗；知識救世激情與以啟蒙的名義而高高在上，所向披靡。一旦革命爆發，這些人成為革命領袖，至少是思想和精神領袖，則登高一呼，其聲勢可以想見。而人非聖明，稍有不慎，廣場效應發作，則危害同樣可以想見。當年「政治風波」，景象略同。事實上，當其時，能夠振臂一呼喊聲嘹亮的，後來都成了「領袖」。今日網上大戶闡揚理想、抨擊時政、指摘弊害，叫好一片，以致於以罵取勝，致使任何反對聲音均不戰而敗。否則，「好嘛，你個『五毛』！」可謂正常而又反常。

不妨說，正常渠道不暢，則普遍的叫罵必然升騰，在將理性思考淹沒之際，裹挾着雙方一起墮入暝暗。正如大道不行，則方士巫師自然暢行。究其實，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例屬「較好的」時期。雖然在一七八七年、一七八八年出現了旱災和水災，歉收導致農民不滿和局地社會緊張，但是較諸路易十四之時，日子倒要好過得多。職是之故，剛提及的貧困和匱乏是人類的普遍現象，但是對於貧困和匱乏之明確意識和不能忍受，才是大革命前的現象，而前述「文人及其文學性敘述」將這層窗戶紙捅破，就是這個原因。當此之際，知識救世激情和以啟蒙的名義而高高在上等特點構成了文人政治——文學政治的一個重要出口，其人憤張，自己頓生高高在上的道義感，而有自我賦予的使命感以為鼓蕩，造就了一個大眾民主新時代。

第四，由此造成文人們與注重實效、講究國政幽微而練達一脈，勢成水火，具象為伏爾泰們與黎塞留們之分流。注重實效、講究國政幽微而練達的一脈以黎塞留們為表徵，孜孜於漸進的政制提升，而着力於國家理由——國家理性的提煉，旨在「做大做強」。相反，文人政治以伏爾泰們和盧梭們為代表，嚮往理想政治憧憬，編織美好社會政治藍圖，循沿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性，鼓蕩起億萬人的政治熱情、社會嚮往和道德衝動。所不幸而幸運的是，凡此憧憬、熱情和衝動，均以法蘭西及其人民來承擔和忍受，於率先試煉中引領一個

「現代」到來，而為世界人類做榜樣。至於由此引發的「大革命」——「蘇俄革命」——「中國革命」這一脈的連鎖反應，則參伍錯綜，又另當別論了。在論及政治負責制的興起時，美國政治哲學家福山曾經喟言，「如果沒有權力和利益的潛在平衡，使參與者認為它是糟糕選擇中最好的，單憑思想觀念，還不足建成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強大國家既執行法律，又受法律和立法機關的制衡，這種奇蹟全靠社會上不同的政治參與者彼此之間維持大致的均勢。他們當中，誰也不是龍頭老大，便不得不達成妥協。我們所理解的現代立憲政體，就是這些不受歡迎、計劃之外的妥協的結果。」⁹ 就此而言，不妨說，歷史過程更多地展現為一種實踐理性，而文人政治更多地呈現為一種純粹理性，則「妥協」與「均衡」道出的實為歷史實踐理性對於純粹歷史理性的勝利。

第五，由此進而造成理想和學理一脈狂飆突進，而現實不恪跟進，則前者強擰後者貼近，只能以後者的無能為力、踉踉蹌蹌及其毀滅為代價。所以，大革命爆發後不是締造了「新社會」，而是一時間無社會、無秩序、無政治，只剩下無政府或恐怖的公安專政，最後只好以復辟來收拾。中國情形類似，如最後退回到一家一戶的單幹，所謂「包產到戶」，重回「一九一一」和「一九四九」再向前進，實在觸目驚心。在此，據在下理解，吾人可得領悟而需汲取的是，理想和學理一路狂飆突擊，而現實無法跟進，則理想和學理要求現

實跟進，只能以強令現實切合學理和理想的方式來轉圜，而實際情形是根本就無轉圜的餘地。相反，勢禁形格，也壓根兒就沒有逐步演進的操作過程，則最後只好以後者的無能為力、踉踉蹌蹌乃至於毀滅為代價，終至於玉石俱焚。要不然，只好用虛幻的標語口號或者空洞但更具激進的理想來做號召，讓激進裹挾更加激進，既在抵消理想不恪實現的窘迫，更在以此為掩飾，則私心肆意一旦羈雜，所謂的事業隳矣！

綜括凡此特徵，理述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不是締造了「新社會」，而是一時間「無社會」、「無秩序」，更且「無政治」，只剩下無政府，終至於出現了恐怖的「公安專政」這一段史事，是想說激進理想尚需「黎塞留們」的國家理性支撐，總得轉化為制度肉身，方始有望夢想成真。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比爾有一句話，大意是我們要用恐怖來對付反革命，遂致革命伴隨着恐怖降臨人世。諸君，但凡想一想中國紅色大革命時的情形便一目了然。隨便什麼人，只要說你「不革命」、「反革命」，即可就地正法。那真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時代。再看看雨果對於「一九三年」的印象，亦可為證。其後果，最後以「復辟」來收拾山河混亂。所以，西文中「革命」的本意原是「復辟」，也真是恰切。因此，波拿巴的復辟，甚至是波旁王朝的復辟，乃至於第三共和國時以大幅度的倒退，甚至很多地方倒退回到一七八九年之前，以此來收拾山河，此為原因所在。其實，大家想一想「一九七八

年十二月十八日」之「改革開放」，改什麼「革」？開什麼「放」啊？說到底就是回到「一九四九」，回到「一九四九」還不夠，直要回到「一九一一」，不也就是這個道理嗎？

第六，「文學政治——文人政治」於世界範圍和人類未來，揭示了政治前景與道義向度；於法國，如米哈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i de Mirabeau）——當年法國有名的政客，也是一個出爾反爾的傢伙，法國很多街道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所言：「理想太超前，事發時只好臨場發揮了！」意思是說我們的理想太過浩渺，係為人類擘畫未來，則一旦革命在具體時空爆發，而無具體措施，一時間倉惶無措，只好「臨場發揮」，拆東補西，所以才會將政治恐怖作為選項，而有公安專政時代的降臨。就此而言，法國的黎塞留們即便「在場」，恐亦無所作為。事後來看，的確確，文人政治——文學政治於世界範圍和人類未來揭示了政治前景與政治的道義向度，但於法國當時而言，這未必一定是好事。就是說，狂飆突進總是要社會及其具體的「人民」來付出代價的。就此也可以說，人類史上，在創造歷史方面，沒有超出法國「文人」的。

是啊，人類歷史上有兩種人最讓我們感慨的。身為知識分子，一種人是羅馬法學家。羅馬法到今天蔚為規範世界的普世性主宰力量，羅馬法學家們徜徉於「人事和神事」，真正是人類的法律導師。還有一種人，在人類歷史上呼風喚雨，顛倒陰陽，而讓一個時代向

他低頭，並且讓此後的兩百多年匍匐在他的思想的光輪之下。他們不是別的，我以為，就是法國的文人。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沒有超過他們的。今天，比如說，羅爾斯等英美一脈的思想家也好，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歐陸一脈的學者也罷，其實，某種意義上，儘管他們脈絡有別，可都是大革命前後鼓噪思想解放、理性啟蒙的這些文人集團影響下的歷史產物，其作為，其思考，不出他們的精神成果的總體框架。所以，這批人是真了不得，不得了。

後來，比如說，馬克思不是更牛嗎？甚至是和耶穌、釋伽牟尼相提並論的嗎？可惜，我要說，這種人出一個人類就多一分災難。這種教主式的人物每出現一次，人類就要動蕩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你看穆罕默德一出，從此耶回兩家對着幹，打了一千多年，鮮血染紅了地球，這不是好事情。好在如今世道，出這種人的可能性少了，至少，暫時少了。

第七，以及之後的一點，講的都是題外話。百年中國，一九四九年前，知識分子好歹有點言論空間。特別是國共割據，各擁徒眾，時空二元，反倒為言論自由劈開一條縫。思想路線之爭終於政治路線之爭和最後的軍事較量，實在是沒有想到的事。可位處轉型時段，思想創造未來，藉由政治和軍事開闢道路，其實自然得很。當下中國，官學商各有話語權，官商一體，更有權勢。特別是官方，對於開放思想市場歷來抱持拒斥性態度，圍堵

惟恐不及，總不是好兆頭。因而，如何在官學商和草根大眾之間，實現良性互動，避免文人政治的無實踐性和無操作性，將盲眾之集聚為「烏合之眾」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從而引導出健康的公共空間和良性的大眾民主，實在是一件輕忽不得的事情。

第八，知識界的力量主要體現為思想啟蒙和道義感召，由此集聚政治與社會力量，甚至可能引發社會、政治運動。然而，知識界的力量主要是思想力量。與其壓制，不如敞開。在此，除開表達自由，通常所謂的「旋轉門體制」，不失為一種積極調校。論及文人政治——文學政治，以此為一種可能性願景，而不只是汲汲於「行政吸納政治」，彷彿更為可取。

六、結語

綜上所述，粗粗收束一下，可以得出下列六點結論：

第一，凡此三數百年，「革命」串聯起歷史，而表徵時代，為諸子時代——樞紐時代之後所僅見，而且，可見的未來也不會再有——歷史終結了。因此，「革命」、「立憲」與「國

家理性」，紀霖兄選擇的三大主題詞，基本囊括了這三數百年世界歷史進程的主流意志，道盡了這三數百年人類社會政治的風風雨雨。歷史終結於何處？歷史終結於「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而以「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兩大框架來收束。前文絮絮叨叨，知無不言，此為第一點體會。

第二，一系列的革命指向普世的目標，結果造就的卻是作為集體自私的民族國家，世俗幸福成為歷史必然性前景，使得革命淪轉為工具本身。其間所謂「普世的目標」，比如「自由」、「民主」和「人權」等等，諸如此類，正大而有光輝。但是，其所造就的卻是作為「集體自私」的現代民族國家，使得革命於不期然間成為工具本身就足以說明，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之輾轉弔詭。尤有甚者，這樣一個普適指向而狂飆突進的歷史進程，最後落實的卻是市民的世俗化的歷史必然性前景，所道出的不外乎一個真理，即一切以人作為旗幟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不管是革命還是立憲，也不論是國家及其國家理性，最終還是圍繞着人生和人心來打轉，而歸根結底，人生和人心是一個肉身與靈魂的二元一體結構，正像所有理想的政治共同體一樣，悉以「政治是城邦與公民及其靈魂的二元一體」概乎其言矣。

第三，其間，立憲旨在坐實立國，兌現立國承諾，借用革命並反撥革命。故爾，通常

而言，革命潮褪方有立憲登場，從而收拾河山。通觀七大革命及其各自「問題」的解決進程，的確可以看出，通常而言，革命之後伴隨而來的是立憲運動。而將立憲鑲嵌於整體的革命進程，一統於兌現立國承諾的歷史進程的，則非國家理性不可。因而，提煉國家理性是兌現立國承諾、坐實優良政體的最高政治智慧。歷史不乏革命熱情，缺的是國家理性，所以才有革命之後的囂囂嚷嚷，乃至於有所謂的「失敗國家」。如此這般，以公民理性來救濟國家理性，以優良政體來承載國家理性，是大革命以來兩百多年間的「雙元革命」所給予吾人最為重要的政治啟示，也是現代秩序最為核心的政治智慧。

第四，在此歷史進程中，也就因此，立國與立憲都是一個提煉現代國家理性的進程，講述了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武裝的宏大敘事；革命既是開端，而終亦必以國家理性來沉澱之，收束之。就「革命既是開端，而終亦必以國家理性來沉澱收束」而言，中國啟自一八四〇年，至晚啟自一八六〇年代的「長程革命」，今天正處於行將結束卻還尚未完全結束之際，則一百七十三年來的歷史轉型，如何為此「長程革命」劃上句號，當然還是非訴諸「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不可，而以倡揚公民理性與提煉國家理性及其良性互動來劃上句號。立憲既在提示國族的價值目標和道德、政治願景，同時作為打造國家的藍圖，堪為國家理性的規範文本。半部《論語》治天下，遂轉為「一部憲法治天下」矣！

第五，由是觀之，政治是人類恆具悲劇性的全體事業，政治智慧是人類的最高智慧，而當下中國亟需政治決斷以展現政治成熟，裨促使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騰轉為一個醇熟練達而又保持道義理想的政治民族，可謂時不我待也！但凡引領歷史的國族，必是獲秉最高政治智慧的文明。值此情形下，如何提煉中國民族的政治氣質和政治智慧，使中國走向政治成熟，蔚為一個政治的國族，是一切追究政治立憲和國家理性的理論體系之衷心寄託所在，也是中華民族得為億萬國民分享的文化、政治家園的歷史和政治前提。

第六，東坡詩詠：「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回首三百年人事而觀瞻人世，為的是於反思人事中洞明人世，進而，改善人生，則秋鴻春夢之間，有信無痕兩頭，難煞了我們！如此這般，則革命也好，立憲也好；國家理性也好，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好；托克維爾也好，我們芸芸此在的眾生也好，今天在此回溯晚近三百年的人類歷史，講述我們當下的種種道德和政治關切，其是否恰如秋鴻春夢一般來去無痕，不過是一場烏托邦呢，還真不好說。然而，倘若無此寄託，那麼，我們活在當下的芸芸眾生，這副肉身，又到哪裏寄託？何處堪當寄託？紀霖兄令我來滬上作此演講，在下臨場惟危，一言既畢，頓覺獲償一次精神昇華，可一點靈魂虛空卻彷彿迅疾竄入，而有虛脫之弱，恐需等到下午各位的辯駁切磋，於呼應中幫我填補了。

篇幅所限，我就講到這裏，更多的闡釋有待於討論中深化。言有盡而意無盡，謝謝諸君的時間、耐心和寬宏大量！

二〇一三年十月，暮秋，修訂於故河道旁

註釋

* 本章為2013年4月25日在華東師範大學「首屆中國與世界深度論壇」上的主題演講，後據現場錄音記錄稿整理。多謝許紀霖教授邀請。成稿期間，多所延宕，幸賴紀霖兄催促和寬忍，終格於成！全文收刊於許紀霖、劉擎主編：《何謂現代，誰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1 艾倫·麥克法蘭著，管可穠譯：《現代世界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203。
- 2 威廉·多伊爾著，張弛譯：《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3 雨果著，鄭永慧譯：《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2版），頁163。
- 4 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76。
- 5 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160。

- 6 兩果著，鄭永慧譯：《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2版）頁222。
- 7 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177。
- 8 兩果著，鄭永慧譯：《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2版），頁338。
- 9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318-319。

第二章

大時代中的「中國問題」及其體系性解釋

本文初稿完成於2011年的暑假。當其時，術後身乏，而心力煥然，願力儼然，思騁八極，按捺不住，隨手寫下了這篇思想札記。原有一個副標題，「從柏林關於俄羅斯思想特質的論述，看對於『中國問題』的體系化解釋」。此次對標題略做修訂，增寫兩條註釋，其他內容則一仍其舊，還算不上一篇論文，權當是思想文化評論一類的東西。

接下來的內容，庶幾乎算作對於前文思緒的接續闡釋吧。首先要說的是，本文並非旨在陳述自己如何對於「中國問題」做一個體系化的解釋，那是筆者的學力和思力所不敢奢望者也。毋寧，循沿知識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的理路，在文化歷史主義語境下，探討當今中國這一「古今中西」時代，也是晚清以還一百七十四年社會歷史文化大轉型的收束階段，圍繞者「中國問題」、漢語思想的體系性思維與體系化建構的可欲性與可能性。再說一遍，本文並非旨在提供什麼體系化解釋，此非一文一人所能力逮，而需眾口喧嘩，仰賴漢語思想界的集體努力，於長時段的思想操練中，積蘊既厚，則異彩必至，而鴻篇巨制橫空出世矣！當下此刻，此文不過對此理論野心和思想願景的可欲性與可能性，略加探討而已。

基此宗旨，圍繞這一主題，向各位略予陳述，約共十八點，概分為上、下兩部。

第一點，作為一個歷史和思想現象，也作為一種理論和思想的譜系，我們知道，兩次人類樞紐文明時代，不僅均以體系化開場，而且以體系化收束。如所周知，在雅斯貝斯所說的「古典樞紐時代」，即前二千二百年至三千年之間這樣一個時段，也就是中國的先秦諸子時代和歐洲的羅馬希臘時代，是謂人類文明的第一次樞紐時段。大概十六世紀以還，現代早期到十九世紀中期止，這一個三百多年左右的時段，是「現代樞紐時代」。兩個樞紐時段，是兩次人類文明大轉型、兩大人類文明高峰、兩波思想噴湧的精神盛產期。細予考察，可以看出，這兩次人類思想的噴發時期——古典時段與現代時段——為「樞紐時代」，誕生於思想家們的腦中，流淌於思想家們的筆下，而最終以思想家們對於這個時代的整體性觀照和體系性闡釋而收束。今日受用而不察，歷千年未變的精神資源，今日世界見諸日用的體制安排和人人相諭共守的意義秩序，基本上都產自這兩波樞紐時段。科技日新月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精神世界與意義秩序卻恆定而有常，如此人世方堪倚賴，而在在說明了精神世界的不朽性，意義世界對於俗世現象界的支撐意義。換言之，大時代必然產生大思想大理論，大思想大理論是大時代的精神結構和德性源泉。它們二位一

體，交相呼應，構成了這個時代，而共同為此時代作證。時代如河流，大思想大理論是潛蘊深藏而又洶湧澎湃的浪濤，驚濤拍岸，山水相依矣，世界成形矣。這是一個基本的思想現象，也是恆舊恆新的歷史現象。首先作此簡單鋪墊，是想說明，體系性思想和體系化思維是人類思想的大時代的必然產物，雖是老生常談，卻不可不察。

第二點，但凡置此大轉型時代，根本性問題突出，人類精神拷問遂逼至死地而後生。當其時，天人關係、生死義理、禍福擔當和進退出處的當下緊迫性驟顯，俗世的政制和秩序常常面臨危機，特別是人性遭臨考驗，而亟需闡釋與重新闡釋，總是要求它的一流大腦概予人生和人心以整體性觀照，作出體系性回應。所以，兩次樞紐文明身當大轉型時代，要求人類思想做出體系性解釋和整體性觀照，而為俗世人生提供路標，不僅在於昭示來程，更在於揭示去路。所幸的是，人類精神在此挺身而出，「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並給予了這樣的思想回應，而沾溉嘉惠人世千年。退而言之，即便是在非樞紐時段，而遭逢次級轉型的時代，這一現象同樣發生，只是其原創性、根本性稍次，義理規模和闡發深度略遜，影響時空和後世受用的程度有限。以中國而言，周秦之變和清末民初下迄於今的轉型固為兩大時代，實為兩次全球性樞紐時段的中國現象，因而有體系性思想的跟進和引領。然而，即便在魏晉之變，所謂變亂之世，既有文教塗炭，而人性惡質彰顯，人世危殆，亦

需精神導引和回應，從而同樣有思想的激發與創發，這也是顯然的。

第三點，從各種主要文明類型和各個主要文明國族的情形來看，也是如此。以近世這一波文明轉型為例，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諸國，分別作為拉丁地中海文明、盎格魯—薩克遜文明、拉丁法蘭西文明、日耳曼德意志文明和「第三羅馬」斯拉夫文明，在因應各自所面臨的文明的運勢和國族的走向的那個關口，無論是在起始時分，還是在最後的收束節點，都以這種體系化思維和體系性解釋來回應其時代，爛漫如花，絢麗若霞，璀璨似火。其間，如所周知，文藝復興以還至十九世紀中晚期，各種思潮和學說，包括馬克思主義這一高度日耳曼式的體系化整體性思想，孕育於這一時代，而造就了這一時代。逮至十九世紀中晚期，德意志式的體系性建構，其於人類精神的體系能力的抉發和展現，着實令人嘆為觀止，不僅為歐洲三百年的精神現象作結，而且引發了所謂人類精神終結的感喟。有關於此，拙文略有闡釋，以後修訂時可能會寫得稍微詳細一點。

第四點，現代早期萌發之際與十九世紀中晚期收束階段，體系性理論和整體性思想湧流奔放，展現了人類精神對於大時代通盤致思、概予整體性回應的思維特質。所涉不僅在於徹底反思人性，乃至於「改寫」人性，貫通生死義理，重理天人之道，而且，更主要的在於，將全體人類政治上和平共處的良善憧憬，窮思竭慮，寄託於俗世的政制和政治，而

為萬世開太平。說到底，之所以富強、民主與文明、和平蔚為目標，就在於貧困匱乏、專制野蠻不講理和戰亂連連成為生活的常態，將人世貶損至地獄之境，故爾，窮則思變，變則通，通而靈，遂有「西方文明」引領世界三數百年的這一波樞紐期大潮。因此，它既是一種事後的反思，痛定思痛，從而是對已有歷史進程的收束，同時，也就是在為隨後可能醞釀出來的文明高峰預作準備。實際上，這一波文明的高峰持續既久，自西徂東，勁道遂怠，迄而至今，在其文明的源頭，彷彿已現衰頹之勢，雖屬事理必至，但卻令人愴然。本文下部敘及文明憂思，則此為憂思之一端也。

第五點，綜上所述，但凡樞紐文明，或者，各主要文明類型與主要文明國族，在此大轉型時代，之所以出現體系化思維和整體性回應，實際上反映了它們對於自家的歷史主體性、政治主體性和思想主體性的自覺與追求。凡此三位一體，才使得整體性思維和體系化思想成為當然的選項。其之登峰造極，乃至有所謂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終結論，凜然、肅然而冷然，終至令人悚然。三位一體的自覺和追求，因應的是民族國家嚆矢之際與民主國家即將登場時分的時代需求，為此歷史進程與精神歷程的實質和精髓所在。在此，歷史主體性解決的是文化合法性，經由歷史敘事鋪陳當下地位，如此心裏才踏實；政治主體性着力於現代國族的政治共同體建構需要，可以歸結為特定的政治建國方案，因應的是全體國民

政治上的和平共處需求；思想主體性講述的是精神的自立和自勵，而於追尋意義秩序的努力中提供俗世人生以德性和靈性。它們分立合力，一口吸盡西江水，共同營建了這一系列國時代和全球秩序。所謂文明立國與政治立國，兩元合意，雙軌並轍，狀述其貌，而道盡其旨。至於政治立國能否進境於自由立國這一政治立國的至高境界，則又另當別論，而考驗着特定國族及其文明的成熟和境界矣！

第六點，把話題拉回到中國。此時此刻，中國正處於一個大轉型的收尾階段。各位知道，如果從一八四〇年算起，迄而至今，中國近代的轉型正好歷時一百七十三年。如果從一八六〇年啟動實質性行動的洋務運動起算，到今天也有一百五十多年了。超逾一個半世紀的轉型，數萬萬人的生聚教訓，所需總結和汲取的，必定不限此世此境，而有為普世人類生存智慧所分享所沾溉者。如在下一再申言，若以「改革開放」為紐扣，則此間一個半世紀中，中國已然歷經三波。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五年，整整三十五年，是中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一九〇二年清末變法修律始，下迄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止，歷經清末、北洋與民國，又一個三十五年，是「第二次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今，正好又是一個三十五年，是為「第三次改革開放」。凡此三波「改革開放」所構成的中國歷史轉型，從一種歷史感，而非嚴格的社會科學的實證分析來看，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言，蔚為「歷史

三峽」，大概需時兩百年。換言之，到這個世紀中期，大致可望走完，則這一波現代文明於赤縣神州語境化了，融會中國文明傳統而本土化了，歷史遂告終結。置此語境，此時此刻，正好是前面三波「改革開放」的沉澱期，又是此刻起步，而於未來三四十年時間裏形將完成轉型的收束階段。這一收束階段，自此刻起步，也可以說就是「第四次改革開放」。如此這般，總共四波「改革開放」，前赴後繼，波瀾壯闊，一匡九合，中國近代轉型恪成矣。就人類已有的政治想像力和道德想像力而言，可能也就是極致了，故爾才說歷史終結了。值此收束階段，一個大轉型「非常時刻」即將轉化為「日常時刻」的這一關口，中國思想和漢語學術難道不需要、不應該做出自己的總結、回應與解釋嗎！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大轉型，呼應的是全體人類第二次樞紐文明的律動，並且構成了人類第二次樞紐文明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而以中國歷史加入世界歷史，為此番樞紐時代作結，其典範意義，怎麼說都不過分。因而，給予體系化解釋和整體性觀照，可謂當其時也。事實上，這一學術思緒和思想作業早已展開，不說外域的嘖嘖喳喳，單就漢語世界來看，包括前兩年熙熙攘攘的各類「中國模式論」在內，其實均為其迴響，而有以然哉，有所然哉。

第七點，也就因此，不妨說，歷史脈絡既顯，而思想資料益又大致齊備，就看漢語思想是否上心、有無勁道了，就看漢語學人是否用功、有無功力了。中國這一百多年來的

歷史進程，它的基本脈絡，演化發展到今天，已然豁顯，大致水落石出。其間來龍去脈，歷經白雲蒼狗，雖多波詭雲譎，但蜿蜒至今，跌宕於茲，基本上一清二楚了。尤有意義的是，就解決「中國問題」而言，海峽兩岸四地，各有伸展，各有側重，而將一個多元紛呈的「現代中國」，其進退出處，活生生展現於世，於「時間的叢集」和「時代的交集」中，昭示着前程去路。實際上，對此進程，各種解釋水準參差，所在多有，缺的是體系性觀照和整體性梳理。比如，就歷史時段梳理來講，全喜教授常講所謂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與未來可能出現的第三共和，敘述的其實是政治立國的理路和人民出場的現代政治正當性，既是政治類型論，也是一種歷史觀。在下常以三波「改革開放」以及可能正在到來、也許此刻已然啟動的「第四次改革開放」說事，津津於近代歷史脈絡的總體性觀瞻，同樣是一種以歷史敘事面目出現的政治敘事。其為小道，小而言之，但涓涓溪流，匯為大海，終將洶湧澎湃，也是可以期待的。再如就理路而言，新儒家自有解釋，如同自由主義敘事與共和主義願景臨床應用於中國語境，多不脫以「立憲、立國與立教、立人」之四位一體來概述歷史，而總括其旨。其間，多有優秀學人的傑出作品，包括葛兆光教授的中國思想史梳理，汪輝教授對於中國現代思想的發生史解釋等等。其側重點和進路各異，但概為體系化解釋的努力，則無疑矣。總之一句話，歷史行進至此，大致脈絡水落石出，或者，到了水

落石出的時候了，思想資料的積累亦且大致齊備，此時此刻，正需要漢語學術和中國思想奮發有為，來給它收束起來。

或曰，吾儕均為常人，最好不要做什麼體系性思想的夢，還不如腳踏實地，做適合自己水準的學問。否則，好高騖遠，一將成名萬骨枯，得不償失，云云。此言詫矣，此言差矣！蓋因個人志趣和能力，與一個文明和國族的思想抱負與理論野心，概為兩回事。個人無此憧憬，亦無此能力，是一回事。然而，此種文明和國族是否不該、不能、不要擁抱此一憧憬，亦無此能力，則是另一回事。可能，恰恰相反，此一文明和國族，正因為養育了無數懷持此番願景、心揣此種抱負的學術勞工與思想苦力，方才積雪封霜，雲蒸霞蔚，造就了自家博大剛健的思想體系。這才塑育了自家浩然典雅的理論體系，而以吉光片羽般的偉大學人和思想大家來表徵，來印證。就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這一廓然時空而言，億萬人超逾一個半世紀的奮鬥，決不能無此體系性思想以為回應，決不可放棄整體性理論觀照以為總結。既然閣下譏諷「餛釘之學」，時時以此自相怵惕，卻又排斥「宏大理論」，指陳別家應當「腳踏實地」，則似乎多所矛盾也。是啊，「餛釘之學」，概為常世消磨，類如有清一世的小學末流。若處非常時段，則愧對時世，有違時勢。此為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宿命，或許，也是對於它的千萬學術勞工和思想苦力的啟示。日月迢迢，此命昭昭。遭逢此

世，生當此時，何樂而不為哉，何苦而不為哉！

第八點，在此收束和總結進程中，與整體性觀照和體系性解釋相伴隨的，必是「自由立國」和「文明立國」的二元一體，而實現政體論與文明論的統一。「自由立國」，概為政治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建國進路，重在民主、憲政與法治，重申公民美德，解決權力的來源、分配和規範的大經大法，從而為全體國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提供體制保障，涵養國族立世存身的德性資源。其間，尤其是經由磨礪權力的「授受以公」法權程序，解決權力的來源及其轉授難題，讓興亡之嘆純粹成為一種文明論的感喟，而非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文明立國」，大致屬歷史主義的文明論建構，追索的是現代人的家園歸屬和文化忠誠，以文明積蘊滋養上述體制保障，進而由心性通達政道，在努力實現天道與人心合德的文明進程中，昭示政道和治道的文明意義。當今中國，晚近五百年來，一千五百年以後的世界，在下以為，但凡成熟的國族，前前後後，基本上都循沿此途以建制立國、營建家國天下，在「自由立國」和「文明立國」的二元一體中，安頓身心。當下中國的諸般努力，實為以「自由立國」和「文明立國」來收束這一綿延一個半世紀的「古今中西」時代，最終落實為「文化中國—民族國家」與「政治中國—民主國家」的雙元革命所締造的現代秩序。它們發育滋長，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且找到它的思想形態和理論體系，既是百

年轉型的根本問題，也是刻下衝刺的目標，而呈現為「中國問題」解決之際的歷史遠景。因此，政體論與文明論，本質上經由此番體系化思維連為一體，而終亦必脫形寄身於「現代中國」也。

基此，可以這樣兩句話作結，而為此間的纏連糾結稍做鋪展。此即「民主的法制化所締造的憲政體制的文明化力量，給政治國家以文明加冕；文明的主體性所提供的超驗價值之寄身於政治建構，旨在讓文明國家獲得自己的政體肉身。」它們講述的不是別的，而是文明立國與自由立國之合為一體的問題，從而實現近代中國建制立國之「立國、立憲、立教與立人」四位一體的政治建國進程。凡此一旦實現，則歷史在中國終結。

第九點，由此推伸開來，延展至國家理性方面，則於理解大時代中的「中國問題」的體系性解釋，再開一視角，又上一境界。大致而言，自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中晚期，近代雙元革命狂飆突進，基本上經歷了地中海文明而至大西洋文明的轉型。時至今日，彷彿蜿蜒到了太平洋文明時段了。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先要說的是，在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時段，「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成為建制立國的核心問題。「權勢國家」講述的是國家間政治中的國族定位和致思方向，將全球博弈的自利主題和自衛主體和盤托出；「權力政治」道出了尚未走上近代立憲民主正軌之際，圍繞着權力的來源、分配和規範的「勾心鬥角」

與「狼心狗肺」。一言以蔽之，是一種秘密政治和宮闈政治，「你死我活」也。各位，此種「權勢國家——權力政治」，並未退出歷史舞台，倒是恆為常態。特別是「權勢國家」的衝動和勢能，蔚為當今國家間政治中的基本動力。而單就「權力政治」的極致而言，今天北韓類的國家政治可謂典型。自從博丹開啟思想端緒，約從十九世紀開始，歷經大革命洗禮，大西洋文明主導下的主要國族基本上都將建制立國的核心問題轉型至「憲政國家——憲法政治」方面，中國此刻所奮力爭取的，其實就是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向「憲政國家——憲法政治」過渡。置此轉型時段，舊的權力政治尚未退場，而憲法政治可能已露端倪。在大中華文化圈，台灣已經完成了這樣的過渡，中國大陸主體正在奮力實現這一過渡。一旦此番過渡完成，將進入第三期，所謂的「文明國家——文化政治」之境。那時節，雞零狗碎，諸如同性戀糾結、「後殖民主義的賣淫觀」和「文身的帝國意蘊」之類話題登場，咿呀呀呀，噁哩哇啦。

上述轉型一旦完成，則「建制立國」事畢，現代中國完型。那時節，理想境界是實現了「國家與文明的統一性，文化與政治的一體化，人民與自由的同一性」。它們聯袂一體，構成了文化中國、政治中國與人民共和，所謂的文明立國與自由立國這一統一體的現代秩序下的現代中國，其基本精神內涵和政治外貌。再說一遍，彼時歷史終結，天下無大事了。

二

接續上述論題，再作陳述，同樣講九點。

第一點，今天暢談「中國時刻的思想創發」，尤為突顯而必須強調的是，任何討論均需置身一定的語境，必須需顧及初始條件。無此歷史前提和邏輯前提，則一切話語失去針對性，從而失卻有效性。東拉西扯，實在沒法對話了。就此刻的主題而言，這個初始條件不是別的，就是大約從一千五百年以後，世界處於戰國時代。首先是歐洲，進入了一個「東周戰國」周期。其間，載浮載沉，翻天覆地，而最為核心的莫過於所謂的「雙元革命」。換言之，「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之相繼誕生，遞次建構起全球體系中最為宏大的人間秩序，也是一種法政架構和文明單元。自此世界成為全球體系，各種文明和各個國族紛至沓來，自覺與被迫步入這一體系，裹挾進這一世界秩序，而共同建構並分享了所謂的世界歷史。這是今天討論一切涉關「中國問題」的各類主題的最為宏觀的語境，也是最為基本的初始條件。因此，置此情形下，以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為綱，雙元革命各擁理念資源，大致構成了現代立國的基本骨幹。前者指向民族國家與文化立國，重在營建家園感，以基於特定歷史脈絡的文化資源養育人生和人心；後者指向民主國家和政治立國，

其因着重解決共同體生活而不得不讓度自由後所形成的公共權力的來源、配置和規範這一性命攸關的根本問題，旨在於政制設置上保證這個家園是一個安全、人道而愜意的生活時空。置此脈絡，以「自由立國」與「文明立國」之二元一體來措辭，對於狀述這一時段的政治建國進程，最為恰切不過。如果不是最為恰當的表述，至少，也是最為接近歷史進程的表述。至於楊念群教授講「什麼是立國？」「什麼是文明？」，這些概念本身就很不模糊，因此，無法進而探討什麼「自由立國」與「文明立國」云云。在下的理解是，倘若照此扯下去，那就扯遠了。要扯到基本概念基本含義基本意旨，那也就意味着是另外一種作業了——雖說凡此概念的內涵多所歧異，但大致分享共同的義項，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否則，一切討論不僅無法進行，也等於無視迄今為止人類思想在此所作的浩瀚努力。這聽起來「嚴謹」，其實是一種取消論，「抬槓玩」呢。

第二點，今天談國家建構也好，說世界體系也罷，一個必要的前提是，必須將「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恰予兩分，而於不同語境分別論處。否則，很可能郢書燕說，而驢頭不對馬嘴。如此作業，就西學看，源自希臘以來關於城邦和城邦之外的兩分法。所謂「城邦之外無政治」，而「政治止於水邊」，云云。就中國言，則國都城郭郊野和家國天下的種種分梳，親疏有致，中心和邊緣廓然，概為遠源。因為所論分屬「國家政治」和「國

家間政治」，不僅指向有別，而且事關目的和結果，牽扯到運用道義評價還是功利算計諸端，自然需要講清道明，然後方可插話，也才可能眾聲喧嘩，進而，有可能於公共討論中形成公共理性。如果在此邊際不清不楚，則儻論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縱言民族與政治，所謂的雙重標準和有恥無恥，不免南轅北轍，或者關公戰秦瓊，所指與能指上氣不接下氣，徒發道義感喟，暴露的是基本理路的錯亂，自然不具說服力。我們常常感喟所謂民主國家對於自家公民的身家性命不敢怠慢半毫，而於他國他族，則打入另冊，不僅同命不同價，而且，甚至於動不動就叫囂「將他們炸回舊石器時代」。朋友，有什麼奇怪呢，這就叫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的區別，而有此雙重標準也。明瞭其間的分際，就用不着義憤填膺，相反坦然而憫然就是了，明白人類原不過一種自愛自利的種群，而國家實在至多只是一種必要之惡罷了。由此伸展開來，當然亦須進而明瞭公民對於民族國家的政治忠誠原以後者向他奉獻保護、尊重和平等的關切為條件的，而這不是宣告雙方道義破產，毋而是一種雙向承認法權的常規常理而已，正為這個俗世人間賴以維繫之綱紀也！

第三點，既然現代立國是一個諸種理念和思想資源——文明立國與政治立國、文明國家與政治國家、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文化歸依與政治忠誠——的雙軌並立，那麼，便牽扯到對於它們的雙重規訓問題，哪一極獨大，均非善福。換言之，既然「現代秩序」是

一個民族國家分立的列國時代，是這樣一種全球體系下的基本政治型態，那麼，秉持民族主義立國天經地義。只要是國家，但凡屬民族國家，則意味着其於民族主義立基。否則，無支撐，非散架子不可。假如依然成立，一定也是病殃殃的。因此，以集體自私為內涵的民族主義，本性如此，毫不為過。要是一國一族居然整天都致力於人類福祉，大公無私，那這個國家要麼神經錯亂，要麼是天國臨世。但是，民族主義走過頭，集體自利變成侵略性民族主義，乃至於軍國主義，唯我獨大，唯我獨尊，則禍莫大焉。禍起蕭牆，全球人類遭殃。此於體積較大、勢能較強的國族，尤為顯然。在此，大家知道，國家間政治場域需要講一點所謂的國際憲政、全球體系、全球治理和國際法一類東西來加以制約。若非如此則不足以限制列強，也就不足以自保（雖說列強不是它們所能限制得住的）並非於霸權均勢中各以威懾墊底，於抗衡中制衡不可。同樣，如果都像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之抗美援朝、抗美援朝越與支援亞非拉那般開支，不計成本，而讓全體國民勒緊褲腰帶，面黃肌瘦，乃至於餓殍遍野，那更不行。當其時，搞這種所謂的普世主義——如同懷宏兄所言，所謂冷戰實際上是兩種普世主義或者普遍主義的對決——卻忘記了民族國家以國族自利為宗旨這一立國原旨，特別是罔顧國家必須以全體國民的福祉為天這一國家的綱領，可謂「光顧着世界而忘記了中國」，也是「只知世界而不知中國」也。所以，以民族主義實現文明

立國，而用自由主義來馴化之；以自由主義支撐政治立國，同時不忘記民族國家的自利立場，如此「雙重規訓」，於相反相成中形成內在緊張，其實是一種互補機制，可能較為穩妥，也更為安全。其實，在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源頭，他們對此心知肚明，老到圓融，而以「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的隱蔽命題，自由主義以民族國家為時空依託」一言以蔽之。它們玩雙重標準，它們耍霸權，蓋在心裏頭自有一套理據，你說再清楚不過了吧！

第四點，談到國家間政治場域的所謂霸權與霸權國家，似應提示的是，霸權國家多半倡說普世主義或者普遍主義，所以其準確全稱應該是「霸權國家的普世主義」。與其說因為它們衷心認可並景仰普世主義，所以成為大國強國，不如說所謂普世主義對於大國強國最為有利，所以才倡說之，鼓蕩之。而且，也只有位高權重，蔚為霸主之際，才有此分心氣與格局。當然，弱小之國，無以自保，通常只好訴諸「國際公義」，可這是另一碼事，暫且按下不表。要說的是，實際上，從英國霸權橫行歐洲以還，霸權國家的普世主義其實概以民族自利為鵠的，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為前提。否則，自然棄之如敝屣。所以，當年格勞休斯提倡海洋航行自由，正是為了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而有以然哉，所以然哉。所以，美國人當年「光榮孤立」，到後來一變而為普世主義最為有力的倡導者，這不難理解，還不都是以自己國族利益為轉移嘛！但凡不符合自己國族利益的，管他「普世的」還是

「地方的」，其要麼「孤立」要麼「抵制」，說到底，都是圍繞自利軸心來打轉的。見不及此，不配談論國家間政治。

第五點，楊效思教授喟言，「歐洲已經進化到歐盟了，我們還在搞民族主義，還在搞民族國家」，此與清末至「五四」時分諸賢之「只知天下而不知國家」相比，可謂「只知國家而不知天下」，云云。此處的「我們」，我猜詳，不限於但首先指的是中國大陸的讀書人，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而需楊教授不遠萬里回鄉來指教。對此，我的總體看法是，此為典型的一元進化的歷史觀，以此通觀天下，進而裁剪天下，而無視文明時空的千差萬別，等於肯認歷史只有一條路可走，其背後潛藏的實為歷史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據在下觀察，當下中國，其學人，其心智，將國族和天下聯袂一體，統籌並觀，可謂前所未有的。此時此刻，中國文明心胸境界之開放廓大，漢語世界知識心智之兼納並包，我覺得已然超過了「五四」時代。看看今天的漢語學術思想場域，實在是世界學術和思想的萬花筒！其利其弊，均在於此。閣下以為「中國內地」皆為鼠目寸光之輩，看不到凡此「歷史進步」，其心意感銘，其心智或有不智，多少有點「小看了大家」的意思了。再者，民族國家是否走向消亡？歐盟的路是否即為人類未來政治上的不二選擇，可能都還有待觀察。而儻論「已經進化到……」云云，實屬自作多情。可能，對歐盟各國來說，民族國家壁壘和

界限的消除有限，為的還是置身太平洋文明時代，歐洲之自求多福，圖的還是「歐洲國家」的福祉，同樣是一種集體寄託與集體自私，恰恰是以我們歐盟與他們非歐盟為兩分法也，等於是將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劃而為洲際政治格局了。君不見，歐盟各國之所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從最早的煤鋼協定和關稅同盟，到現在的歐盟，就在於以這樣一種政治準邦聯的聯合體形式，有效促進各自國家的利益最大化；而之所以有些國家動不動要退出，或者威脅要把誰誰開除，就在於其國家利益受到了這種聯合體形式的威脅，或者其國家利益的滿足危害了歐盟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因此，大致而言，民族國家作為一種經濟共同體、法律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乃至於一種倫理共同體，是當今這個戰國時代的基本世態。此種基本政治格局和全球體系，在可見的未來，恐怕消亡不了，也不會走向衰落——顯而易見，要是有一種新興政治單元足能取代民族國家，則意味着晚近「雙元革命」的成果可以功成身退，歷史於終結之後再開新篇，那才是開天闢地呢！試問，以人類現有的政治想像力和道德想像力，可曾、可能、可會推出此種成品？

由此談到第六點，就是剛才大家提到的，「身、家、國、天下」的問題。在下最近有本小冊子，題名《家國天下：思想史論文集》。是的，「家國天下」是文化中國積久錘煉的一個偉大修辭，不僅表達了一種普天之下的人道胸懷和包容精神，所謂的「世界主義」和

「世界精神」，更是一個將個體性位格、社會性關照、普世性情懷和齊生死、一物我的人道精神熔鑄一體、萬象歸本的偉大格局。換言之，它並不否認個體、家、族、社群與邦國之各美其美。相反，它正是各美其美，方始有美美與共，從而，適成天下也。在此，宇宙主義和家國歸依、文化關懷與普世情操，獲得了有效的統合。置此晚近百多年來的一古今中西時代」，中國人於「家國天下」的大框架中思考中國與人類問題，當下的具體處境和未來可能的前景，其實貫穿的還不就是這樣一種情懷嗎！實際上，華夏文明素有家國天下情懷，一種廓然大觀的世界主義和世界精神。自《書》、《易》以還，歷儒學合成，「家國天下」的意象和胸襟，遂成中國民族性格，所謂天下一體，和而不同，而天下猶一家，中國為一人。職是之故，我覺得漢語世界與中國當今的漢語學術學人也還可以，不是那麼太孤陋寡聞吧。

第七點，何懷宏教授講述的似乎是一種文明憂思論。大家知道，這種文明憂思論，在近代一百年間並不少見。一九〇〇年前後，隨着千禧年思想和觀念的流佈，此種憂思愈甚。當年斯賓格勒慨嘆西方文明的衰落，其實體現了思想者面對變亂之時的一種深層的文明憂思，背後潛含的則為對於人性之深度疑慮，卻無計可施。言說至此，我想引申一句，既然這是一種文明憂思，即概為對於文明運勢的一己思考，那麼此種憂思紛湧，在我觀

察，則多半處於新舊轉換時期，或者出現大變革的前夜。就此而言，也許像懷宏兄的這樣一種思考，恰恰預示着中國思想在未來時刻終將有所噴發、有所創新、有所貢獻於人類的某種思想前兆，或者，也是一種思想演練的個案。畢竟，晚近百多年裏，在文明論視野下，中國文明於世界文明貢獻有限，與十三萬萬人的邦國規模和五千年文明的浩瀚時空，實不相侔。在此，重申一句，我和楊念群教授的看法不太一樣。在下以為，十三萬萬人，一百多年來，以超過七代人的奮鬥推轉浩瀚文明轉型的長程歷史故事，如果不能給予整體性觀照和體系性說明，才是中國思想者的失職，而為全體漢語學人之恥。所以，這個體系夢還得做，做到夢想成真的時分為止。「釘釘」二字，我覺得具體的歷史研究若無理論的提攜和思想的觀照，可能精密而翔實，但是一不小心淪為「釘釘」，也是有可能的。可能，我們看法有別，蓋在歷史學敘事和原理性建構本有差別者，而不可強求對方也。

第八點，的確確，放眼今天的世界文明格局，可以看出，地中海文明與大西洋文明依舊蔚為霸主，然文明勁道不足，疲態已現，也是顯然的。究其實，此間文明的內在德性資源與文明內在的緊張感彷彿疲憊不堪，對於現實的回應不足，不像現代早期和兩次世界大戰前後那樣呈現一種勃發之勢。原因很多，一是文明本身確有衰老的問題，用着用着用老了，功力、心力和願力都不足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所構想

的道德義理與政治圖景，經過三、五百年的奮鬥，已經完全現實化了。好比政治自由主義在歐洲和美國的今天已經成為制度肉身，所以左派成為反建制的力量，秉具道義，而在中國則恰恰相反。既然道德願景、政治圖景等文明的核心憧憬均已現實化了、肉身化了，則「大功告成」，自然無需現代早期那般，嘯嘯乎勃發僨張之勢，遂風景不再。

第九點，每一文明時代均有自己的主導型文明。就拿晚近來說，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前赴後繼，一脈相承，聯袂登場，主導了三、五百年的世界，滋養了這一時段億萬子民的生息，讓這個世界喜，令這個世界憂。其他各種文明，包括曾經泱泱乎乎的中華文明在內，都只好臨風起舞，起而轉型也。而隨着時移世易，其之似乎窮盡了想像力，特別是不再保有昂揚的道義自許，惟剩下自利衝動，彷彿愈來愈明顯。其利其弊，均早展現，生聚於「落後就要挨打」和「以西洋為師」夾縫之中的華夏子民，對此並不陌生。尤其是它無法應對資源與發展的可持續性而表現出內在德性的匱乏與文明張力的弱化，因而有可能被新的文明形態所取代，這亦非杞人憂天。但是，這個文明時段究竟還將延續一百年、兩百年還是三五百年，這就要看未來怎麼走了。

在此，我想說的是，沿着文明憂思論或者歷史主義的角度，此時此刻，可能正處在前一個文明時代，即地中海、大西洋文明高峰時段開始向低走下，而未來有可能在東亞出現的新

的文明高峰時段正在穩步持續遞進的交替時刻。換言之，這是另一個文明高峰可能出現前的潛伏期。因而，我們可能的確生活在一個平庸時段，也是半黑暗時期。在此平庸時段和半黑暗時期，諸神殞滅，萬籟無聲。置此初始條件和具體語境，即便我們對於中國文明和當下漢語學術的整體性觀照和體系化思想，滿懷憧憬，充滿期望，其之注定終究是黃粱一夢，亦未可知。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而雨打芭蕉，零落人憔悴！在此，中國文明承接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而來，或許，為此衰頹之世接濟新知，提供德性資源與文明活力。此為文明論與歷史哲學，展現的是心願，而非歷史實證論，想各位同情共感者也。

就此打住，就教於各位賢達，而為可能接續而來的文明高峰，預先脫帽致敬，三呼萬歲！

註釋：

* 本章原為2013年12月21日，在北航高研院「『中國時刻』的思想創發」研討會上的發言，載《天府新論》2014年第1期。

第三章

「中國時刻」：優良政體與文明勁道

——與秋風教授的對話

最近一兩年，秋風教授的理論立場發生了重大轉向，從激進自由主義直接推轉為儒家原教旨主義。到哪兒都以儒家面目示人，說什麼都要拿儒學判准來裁斷。開口「作為一個儒家，如何如何……」，閉口「在儒家看來，怎樣怎樣……」。理路豹變，心態虎變，姿態犬變，連服飾也跟着轉型了。開會演講，總是一身新中式，非唐非漢，亦唐亦漢，那架勢，那氣度，配上一頭銀絲，有點意思，有點風采。好嘛，春色三分，一分思想，一分熱情，還有一分交給了行頭。朋友們都說，現如今，像他這樣滿懷理論熱情的，少見！

歲末風寒，雪後行雲，他和全喜教授合作籌組「知行年會」，單獨拈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為題，吸引了一千人眾。在下欣欣然，陶陶然，坐享一天的駁論，發現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家都是一副挺享受的樣子。這說明，每到歷史關頭，歷史意識必然浮現，時代意識更且洶湧澎湃。它們不來則已，來則浩瀚，本於心，發乎情，訴諸理，而三山五嶽，心同理同矣！

本來，心情和思緒自有軌轍，觸景生情，思從境來，理論不過是情思的邏輯化，難能自抑者也！

一、文明焦慮

是啊，不知不覺，這幾年，沸騰的中國依然沸騰，卻進入了一種政治悶局。而且，悶局彷彿凝集成為僵局了。習常媒介用語「改革的鎖定狀態」云云，概乎所指，而大致能指。轉型呈現膠着之勢，也就是眾生焦灼之際。「破局」於是成為一大熱題，各式人等，嘈嘈切切，長籲短嘆。此時此刻，歷史意識突然竄入，歷史論題糾結人心，看似跑龍套、繞邊轉，實則刻意造局，進圖破局。因而，此時此刻，歷史意識就是一種時代意識，也是一種政治意識。以「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來標領議題，不僅道出了一己的憂思和情思，而且，反映了當下中國的歷史文化意識與時代政治意識的焦慮、不安和不滿。同時聚議此題，而人見人異，答案軒輊，說明處此悶局和僵局，我們又回到了「中國究竟向何處去」，特別是，「中國能夠向何處去」這類常問常新的大是大非了。轉型一日未到盡頭，則一日就得追問、再問、三問，不休不止。

就此次會議的論題而言，它追問的是，中國混到今天這一步，獨領風騷、佔據世界歷史和人類精神潮頭的時候來了嗎？

在此，世界歷史是一個時空意象，也是一種文明意象，修辭本身就展現了特定文明對

於「時間」的爭奪，以及用時間觀來爭奪歷史主導權和文化話語權的努力。本來，「世界歷史」範疇的提出就是已然掌握了人類進程主導權的文明共同體的傑作。否則，無此意識，也無此心胸、氣度和能力。就如「天下」和「天下主義」，哪裏是僻處一隅的蕞爾小邦能夠想像得出來的。說到底，時間是一個主觀的創造，而非客觀的存在。一如你我都在體驗生活，但只有少數人才能表現生活；任何文明都不免於時間的提問，但如何講述好時間的故事，並將自家的敘事脈絡變成大家的時間概念，這才是一個文明的勁道和高度所在！這不，今天是「二〇一三年元月二十四日」，大寫的「公元」紀年其實是耶誕紀年，以耶穌老爺子的生日為起點，而以渺不可尋、單線一元的未來為終點。炎黃文武周孔程朱陸王的後人，億萬眾生，懵懵懂懂，一律改用耶誕紀年，號稱「公元」，卻不感驚扭，似乎也無此意識，說明在改元更張的本初時刻，我們在時間上早已喪失了歷史意識和主導權，也就是不再掌有自家文明的自我詮釋能力，甚至，了無此間的自覺。不過，話說回頭，時間不就是這麼回事嘛，有什麼你的我的，用着順當就行了。既然用到今日，就接着用下去吧，到時候覺着驚扭，大家都不順心，再改就是了。

倘若這樣說，這樣想，雖然未曾解決問題，但卻取消了問題，這也能偏安一隅的。要是按照一些新生代儒家們的倡議，改用孔誕，說不定未曾解決問題，反而再添新問題，這

亦未可知。就像「公里」變成了「千米」，瞎折騰，衙門裏的想當然，大家覺着太過拗口。再說，單標孔誕，不說別家別派，就是老莊人家，可能也不答應嘛！畢竟，人家還是長輩呢。再說，孔誕之前，炎黃老祖往哪裏放，人家不是資格更老嘛！話說回頭，當年那股子維新浪潮打過來，恨不得連面皮也要改裝，懵懂而決絕，但要不是它們摧枯拉朽，諾大中華也許混不到今天這般光景呢！痛是痛點兒，可轉型哪有不痛的。不管怎樣，東家長西家短，它們說明，要標領世界歷史精神和世界歷史潮流，將地方性時間變成全球性時間，嗨，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時間觀念事關文明史觀和世界觀念，牽一髮而動全身。能夠提出「世界歷史」和「世界體系」這樣一類概念，語詞彰顯的是文明的力度，恰恰是普遍世界歷史觀念及其不言而喻的主流文明的話語權，霎時陰，霎時晴，了不得呢！

那麼，「世界歷史」和「中國時刻」之間究竟是個怎麼回事兒呢？或者說，刻下的中國是不是正處於「世界歷史」進程之中、何時進入「世界歷史」進程、以及能夠標領「世界歷史」進程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就無法回答有無「中國時刻」、是否進入了「中國時刻」這一命意的可能性與可欲性。過去有一種講法，說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中國進入世界歷史的紀年。這等於說，此前中國的古典文明是「史前史」——這前一個「史」字代表世界歷史，也就是「一脈相承」的西方文明史；後一個「史」字表徵中國歷史，也就是一種

地方文明的自我敘事，無關大局。朋友，倘若今天這樣分梳，講明箇中原委，讀者諸君可能讀着讀着都要笑出聲來了，就像參觀十九世紀西方人種學家曾經精心構築的人類文明階梯圖表，或者，聽意大利法醫隆勃梭講他的天生犯罪人論。但大家笑過別忘了，這是許多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曾經共同分享的一個講法，敘事紛繁，影響久遠呢！

二、近代西洋文明的凱歌高奏

其實，這是典型的羅馬——基督教文明的近代世界歷史觀，自一面看，充滿了偏見而短視，自另一面看，倒也不無道理。在下後來根據那天會議（按：北京航空笈天大學首屆知行思年會）發言整理出來一篇長文，〈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一個基於「中國問題」的「中國意識」〉，對此有所說明，這裏不再贅述。只想指出的是，某種文明對於其他文明，特別是對於異質文明之體察、容納和省思，從而揭示出全球視野下相互關聯中的人世生活的普遍意義，得為其自家歷史之構建普遍世界歷史的必要條件。換言之，不管它們是何種形態和程度的文明，各自分散的文明的獨立成長不足以構成世界歷史。而某一文明自己的獨立

成長，不管其規模大小，若無對於其他文明，尤其是對於異質文明的省察和容納，從而融入一種「全史」概念，也不足以標領世界歷史。

就此而言，一種文明或者文明史觀要具備可欲的視野和格局，對於人類歷史的內在普遍關聯性提供了最具統攝力的理念，做出了最具解釋力的雄辯闡釋，則此文明史觀及其背後的文明實體，敬歎盛哉，方可以說是引領世界潮流和時代精神的普遍歷史，也就是所謂的「世界歷史」。就此而言，倒轉一層，當日全喜教授說中國一八四〇年以後才算進入「世界歷史」，雖然不落羅馬——基督教文明的近世西方史觀窠臼，但也未嘗不能自備一說。朋友，晚近三、四百年的歷史主流是西洋文明的凱歌高奏嘛，包括中國文明在內，還不是悉數裹挾進來了，而在國際分工的大格局中，演奏着規定的聲部。承認這一點，不丟人。今日嘯嘯乎「中國時刻」，正在於分工漸變，而聲部有別也。畢竟，萬年的文明史上，一波又一波的文明浪潮遞次席捲過來，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這三、四百年，正好是「西洋文明」浪打過來了，一浪一浪，排山倒海，打到了太平洋的西岸，把中華文明裹挾進洶湧澎湃的時代之中。還能再打多久，就看這浪潮有無後勁了。也許這浪潮調轉潮頭，向着大洋東岸逶迤而去，終亦必捲千堆雪！

在這個意義上，並且僅僅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式的世

界歷史觀儘管充滿傲慢和偏見，但的確表明了世界歷史觀、世界體系是近世西人創造並主導的，而中國在近代是作為這一普遍觀念體系中的一環節一部分，以容納、省察和思考這一普遍關聯性格局中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文明走勢，在彷徨端詳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的世界與中國的關聯性之中，既兀然又恍然、毅然復決然地進入了世界歷史的。就此而言，洋人將世界歷史回溯到希臘精神之引領世界，玩的是歷史還原論的把戲，未免太過自愛。它這樣說，這邊廂，秦漢大帝國的老祖宗們肯定就會偷着樂了。毋寧，世界歷史的創世紀是晚近三、五百年的事兒，大家於此時段前後相繼匯合於同一時間單元而已。在將自己匯入世界歷史的同時，也就是在協同創造世界歷史，到了今天，就算排隊，好像輪都該輪到中國文明引領一下潮頭了。

如果此說成立的話，我們拋開中國何時進入世界歷史，如果不曾進入或尚未進入的話，則輝煌的中國古典文明是否只是世界歷史之前史的偏見，拋開這一切的話，那麼，「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意味着當下中國文明已然或者有望對於世界歷史提供最具統攝力的理念與最具解釋力的雄辯解釋，從而標領着普遍歷史精神和世界歷史潮流了。

果真如此嗎？

三、作為「模範生」的中國

在當天的會議中，特地自滬上北馳的許紀霖教授展示了「新天下主義」和「文明帝國」兩個概念。可能，在本家宗兄許教授心中，「中國時刻」就是中國治下的世界秩序，那時節，千萬朵紅花向太陽，千萬張笑臉朝華夏，「現代中國」呢，施施然，巍巍然，統領世界歷史，「文明帝國」者也。注意，本家宗兄許教授用的可是「將來式」，不管是「最近的將來」(near future)，還是「稍微遙遠的將來」(far future)，反正，可能有那麼一天！

會議主題創設者秋風教授的結論自不待言。不過，他不耐煩這一「將來式」，直接用的是「現在進行式」。在他看來，也是他的論文的開篇第一句話：「人類歷史已然進入世界歷史之中國時刻」。這個時刻有多長呢？「這個時刻將會持續一代人或者半個世紀」。而且，「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主動權在中國手裏。新儒家如此判定後卻又陳言，在此期間，中國和世界都將經歷一次重大轉型，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對此尚未做好準備」。換言之，這一時刻還沒到來，大轉型只是個將來式。而且，也才一代人，最多不過半個世紀，兩代來人吧。就是說，從此刻開始再過三、五十年就沒了。此於歷經兩百年艱難轉型，犧牲億萬人性命，如此體量的中國文明而言，差不多就是「曇花一現」也。快來

看啊，秋風教授不僅自相矛盾，而且虎頭蛇尾啦！弄了半天，混個世界老二就算是「中國時刻」了嗎？

朋友，華夏古邦，老大尊榮，卻為西洋、東洋列強欺侮了一百多年，好不容易這才稍稍伸直點兒腰，讓大多數人吃飽了飯，覺得自己是個人，做一番如此暢想，喊一嗓子，沒什麼非分的嘛！其實，按照洋人的講法，比如那個在中國紅火得很的英國人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通俗歷史的梳理，十六世紀以前，要是東方和西方碰面，誰欺負誰還不好說呢！文明出現了「大分流」，強弱大逆轉，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事情嘛，連洋人自己也沒有想到呢！換言之，也「沒做好準備」呢！的確，十六世紀以還，決定五百年來人類歷史走向的「地中海文明」興盛起來，以此積攢，十九世紀英語國家為主導的大西洋文明蔚然成形，氣象不凡！整個二十世紀，固然是美國的世紀，更為準確地說，是英語世界的世紀。大西洋兩岸英語文明兄弟聯手，上陣父子兵，這才演繹了一出帝國式的全球秩序——經驗理性、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不可小覷也！置此大歷史中，這個叫做「現代中國」的故事，這個有關「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暢想對其做出的當下理論演繹，都發生在這一英語文明單元裏頭呀！至少，沖決、超出了這一英語單元，才算是「中國時刻」也。用一個最為直白而簡單的例子來解釋，就是只有漢語或者中文成了國際通用語言——套用刻下

不明所以的媒體人士的用語，將其中的「英語」改為「漢語」：「國際會議使用漢語是國際慣例呀」——那時節，才是「中國時刻」之不證自明也。否則，中國時刻云乎哉！就此而言，國朝學人，舉國文武，還在競相標榜用英語在外刊發表論著，而為了彰顯軟實力，政府居然掏銀子鼓勵英譯漢語成品於外洋上市，則何來「人類歷史已然進入世界歷史之中國時刻」？

不錯，此時此刻，世界彷彿進入了「太平洋文明」。這不，中美兩國隔洋相望，既團結又鬥爭，既合作又拆台，共同主導世界的態勢似乎正在出現。所以，媒體多事，把這叫做「共治」。類似於兩宮施治，而舉國無主也。其實，說是「共治」，中國位居劣勢，情形多半是被鬥爭，被拆台。而且，雖說是「共治」，但兩國各擁資源。就今日而言，中國手上資源不多，依然有求於人。大家都往對岸移民、轉移錢財，都想要對岸的學位，甚至還要死要活恬然去嫁對岸的兒郎，就說明強弱陣勢未改，還啥子這「時刻」那「時刻」的。最要命的是，說到底，所謂文明復興究竟要復興些什麼，好像不成問題，又未必很清楚。畢竟，中國是以繼受大西洋文明以及更為深厚的地中海文明來圖謀自家文明復興的，是以對於五百年來世界歷史精神和世界歷史潮流的歸依為代價為條件來富國強兵的。換言之，中國文明的復興恰恰是以接納和消化西洋文明為契機與條件的。因而，在近代西洋文

明面前，中國至今好像只是完成了一個學徒過程，混得不錯，算是一個模範生而已。對於晚近強勢的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中國要麼「順應」，要麼「反抗」，要麼於順應和反抗中進求「超越」。當前如今眼目下，好像躍躍然嘗試着「超越」的前戲了，而這是不是就等於到了什麼時刻呢？難言哉！

是嗎？不是麼？

四、「中國時刻」夢想成真的關鍵

這便引出一個問題來了，就是我們念茲在茲，以一百七十多年流血犧牲而打拼出來的「現代中國」，在實然、應然和可欲這三個維度上，究竟是個什麼？由此，它們引出了基於「中國問題」而來的「中國意識」了。一言以蔽之，這一百多年是一個告別王朝政治，邁向民族國家的立國進程，也是一個剔除帝制傳統，迎接民主新政的立憲進程。其間，「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源於並構成了「中國問題」，所謂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體者也。這些都從心願變成了現實，自紙上落地於

制度，則「現代中國」生焉，轉型完工矣！眼下依然處於轉型時代，則「現代中國」以富強、民主和文明作為追求目標，顯然尚未完工嘛。相對應的，在國家理性意義上，「為何要有國家？」、「如何才有國家？」，以及「國家應當為何？」，分別對應了富強、民主和文明，將此四位一體坐實，欲求其肉身化也，同樣也還尚未完全肉身化嘛。對於一個「現代中國」而言，至少可以這麼說，這些指標未必是充要條件，卻的確是必要條件。「中國時刻」？是的，那好，「玩命吧」，就朝這些目標奔就是了。

如此這般，在這樣一波遠自地中海文明而來的新一輪現代文明的接力賽中，倘若「中國時刻」到來，當它具象為實然的、成熟的「現代中國」，而據此對於這一波文明做出中國式的偉大而切實的回應的話，那麼，也只表明中國在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接力賽中是一站接棒手而已。換言之，一個順應者的最好結局——此於文明立論，而非政治說話，相信大家都明白。在秋風教授的心目中，中國的富強、民主和文明達到一定程度，足以標領世界歷史和文明潮流，就意味着以「中國時刻」的到來終結了這一波現代文明，基本的背景則是地中海文明五百年來改變地球的這一波現代文明，似乎在老歐洲出現了某種衰退的跡象，在新大陸也似乎勁道不足。與此相反，東亞文明半個世紀來的發展似乎對此文明成功實現了反轉與復興，以對這一波現代文明的創造性的繼受而似乎後來居上。後來

居上，而終結這一波文明，意味着至少以一個充滿創造力的文明對話與善意溝通的開放進程，來賦予這一波文明新意，而於可能迎來這一波現代文明的又一高峰的意義上迎來歷史的終結。那時候，可能就是許紀霖教授所說的，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帝國」呱呱墜地的時候了。

說不定呢，你說呢？

設若中國文明作為終結者來結束這一波現代文明，並引領其登上又一高峰，那麼，在此過程中，究竟能夠為這一波文明提供什麼樣的新意，再增添什麼樣的勁道，以扭轉其衰頹之勢，才是問題所在，也是玩命用功的方向所在。如果衰頹是一個事實的話，僅僅止其衰頹，是不夠的。所以不僅在富強的意義上，而且是在文明的不斷進取中，「中國問題」的解決究竟以地方性生存智慧提供了哪些普世性意義，為此一波文明增添了何種程度的勁道，才是中國夢想成真的關鍵。「將來式」也好，「現在進行式」也罷，這才是真正的節點；「中國意識」也好，「俄羅斯意識」也罷，其描述和回答的重點在此而非彼也。

其中，不說別的，僅就政治而言，優良政體蔚為關鍵。就是說，中國不僅需要承接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的政治成果，而且，需要多少有效地避免它們的糟劣窳敗，在賦予自家的統治正當性的同時，高自標領了一種政治道義和道德理想主義。朋友，回頭一看，

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其最為華彩的樂章，不是科技進步和全球資本，也不是財產權的保護、醫療衛生狀況的改善或者消費社會的成形，更不是津津樂道、不知所云的什麼全球化，而在於它為人類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政體，紓解了永恆困擾人類的統治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問題，將「政治正當性」和「政制合法性」奠立於一種和平的法權程序主義。要不是這一齣演得好，即便物質豐裕、科技進步，它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正因為優良政體降生，從此，國家是一項公共事業，政治是一個開放、競爭和多元、可協商的公民空間，蔚為天下常識，這才換得了如此長時段的發展和繁榮也。因此，「中國時刻」必定意味着在此略勝一籌，方始順應而超越也。否則，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大西洋和地中海文明的模範生，合格的順應者而已，有何「中國時刻」可言。

五、優良政體

總而言之，「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一命題的提出，確切而言，不僅反映了中國將近兩百年轉型時段的歷史意識，而且是它臨近收尾階段的歷史意識和政治覺悟，也就是一種

具有深切歷史感的世界體系觀念，同時，也是渴望催生這一世界體系觀念的基本動機和素材。它在表明「現代中國」的冉冉成長的同時，道出了追求文化和政治成熟的漢語文明心智日趨浩瀚，也日趨開放，並且充盈着溝通和理解的善意。在此基礎上，命意者渴望提供一種促成基於中國立場的全球視野的政治觀念，塑造一種中國治理下的世界秩序，心意感人。正是心心相映，這才引發出筆者之兩篇論文，以作為回應。因此，如果這一目標是可欲的，那麼，未來一、兩代的華夏兒女，都將一直圍繞着這些問題打轉，而以解決這一問題為「現代中國」的最終成形加冕，也為一種新型世界秩序接生。

當今世界，天下三分。盎格魯—美利堅跨洋文明聯盟，蔚為霸主。這一文明聯盟由同宗同文的英語國家所構成，除英美兩國外，尚有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等英語兄弟，佔據着世界上最為廣袤的領土和資源，早已於近代三、五個世紀的合縱連橫中排兵佈陣妥帖，老辣而圓融矣。在家親兄弟，上陣夫子兵，大英帝國雖然煙消雲散，但它的遺產早已迭經轉化，可能還夠它們享用一陣子的。在可貴的未來，這一陣勢最為悍烈，也一時難以撼動。實際上，最近二十多年裏，在全球場域中打打殺殺的，主要就是這一支凶悍的人類，正屬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說的掌握了「宣布例外的帝國主義特權」的全球勢力體系。而之所以二十多年裏打打殺殺，就在於這一時段中的既有國際格局多有

沖決之勢，致使當權者因為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恐懼，進而瘋狂。¹其次，以歐洲主要國家為陣勢，構成了另外一極。其間文明積蓄最為深厚，極具自我修復能力，承平既久，眼下似乎老大不振，但如果危機真的降臨，其翻騰展挪之潛力，不可低估。畢竟，人家也是世家子，有股子勁道。再說，它們也有不少遺產可用，單就「法語非洲」而言，就非今日正在那裏忙活的中國所能匹敵也。再次，以中、日、韓經濟體為主體，影響圈可能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整個「東方文明」或者「東亞文明」，蔚然一極，今日最富活力，也最具衝擊願望。雖說東亞的三大經濟體刻下正為領土糾紛而兄弟鬩牆，但經濟上早已聯為一體，解也解不開，是大家都承認的不爭之事實。三國若能加速經濟和政治整合進程，則「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onwealth) 水落石出，有望取代英語文明聯盟。這時節，所謂「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還真的就可能不請自來呢！

就此而言，「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不是沒指望，但還早着呢！為此，中國文明需要於優良政體一端加速用功。東亞整合不順，近鄰屢以「自由與繁榮之弧」互相標榜、互相要挾，自反面說明了中國文明尚有這一短板，大家都心知肚明，可能，也都心急如焚。而且，更要命的是，也是在此特別需要思考的是，「中國時刻」與那個真正關乎我們這些平常個體、叫做幸福的物件兒，究竟有些什麼瓜葛呢？不將這些問題納入思考，則「中國時刻」

雖至，可能輝煌，卻必然蒼白；一定浩瀚，但人煙稀少矣。

二〇一三年元月二十四日夜於故河道傍

三天前接悉林端教授溘然長逝，今天一早再驚老鄧走了。一週之內，兩報噩耗，連喪兩友，吾心悲甚。古詩詠嘆，「古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稀」，恍然兮，惚然矣。回首一百多年來，「落後挨打」成為中國讀書人最為傷痛的心結，整個中華民族強行軍趕超，大家都為此透支生命。沉坐良久，奮筆疾書，一氣呵成，以此文哀悼兩位在天學友。願一筆一字，飛上天庭，報家園平安，歲月靜好。

註釋

* 本章原載於《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

在〈今日之民族主義〉一文中，帕沙·查特吉指出，「西方大國面臨的經濟困局與它們無可匹敵的軍事優勢之間出現落差，這很可能導致帝國主義民粹勢力重新抬頭，就跟十九世紀末的情況一樣，強盛一時的大國經濟衰退會為赤裸裸的權力展示提供豐富的營養。」在此，帝國內在於現代國家中，展現為一個代表全球主權的虛擬帝國，「掌握權力的人如果被恐懼攫住，從而選擇把宣布例外的特權攥在自己手裏，他們的行為就會變得更加不受理智控制，更加危險。民族國家的肌體也許大不如前，但帝國顯然還未真正死亡。」帕沙·查特吉，杜可柯等譯：《我們的現代性——帕沙·查特吉讀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141，144。

第四章

自由、共和與解放

——關於英、美、法革命的不同旨趣和致達民主的獨家路徑的政治哲學論綱

大不列顛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國家，率先告別了中世，將「現代」領進了人世。自此，人間別開生面，大家恍然原來還有這麼一種活法。它有趣復無聊，貪婪還節制，殘酷無情卻又生機勃勃。這個「現代」，同時意味着民主登場，據說，英國也是地球上第一個民主國家，用民主詮釋「現代」，為「現代」張本，更不用說那源遠流長、亦新亦舊、引以為豪的普通法傳統。不過，推究其源流，細審其發家致富的歷史，後人發現，它本無藍圖。毋寧，摸着石頭過河，一步又一步，跌跌撞撞，在試錯中慢慢趟到了彼岸。世代接續裏點滴積攢的人性啟蒙，終於在某個歷史時刻，不知經由哪個結點或者何種契機，一時間轉化為社會和政治的啟明。經歷歷劫，英人提煉出經驗主義的看家本領，並且一路循沿着經驗主義的固有路徑，順風順水。普通法體系其實就是習慣法的文人化結果，也是法律家職業集團千年文火慢燉的老湯，一如所謂的民主本不過源自恃勢分利的討價還價，逐步水漲船高，最後居然引入了一人一票、同票同價、「人民登場」這一齣。

是的，依據一種歷史還原論，大約自「大憲章」開始，中經「光榮革命」這一走獸蛻變飛禽的試煉，英人以自由（Liberty）為鵠的，在追求自由的進程中，實現了現代治理，

所謂「民主」「法治」者也。換言之，它本無一種叫做「民主」「法治」的制度願景和政治預期，是在無此預期及其宏大描述的情形下，為了應對眼面前火燒眉毛的急差，不期然間踏上了後來稱之為「民主」「法治」的這條道路。這就是希臘以降古典政治哲學的路子，直接面對現實政治生活，剖析其機理，提煉其道理，再輾轉而為學理。鬧大了，就嚷嚷是普世公理，也真的就是普世公理——它把別的理兒都比了下去，別的理兒似乎就成了什麼「地方性」的了。先有實，後有命名，追授就是反思，也是凝思，以利再行，而創造新的現實。「民主」「法治」諸項，「現代國家」的玩意兒，屬後世好事者之「煙絲皮裏純」。其於先發國家，是不期然的結果，而於後發國族，卻是理想摹本，鼓動當下行動的未來願景，直是要死要活呢！

人間許多事，好事與壞事，賞心樂事與傷心糗事，開頭莫不如是。因此哲學家感慨了，「習慣的鎖鏈在強大得難以掙脫之前，又總是細微得無以察覺」。意猶未盡，怕人聽不懂，再加一句，「踏進地獄的道路在修建通往天堂的電梯時一並完工」，云云。就英國案例而言，其間往返，不僅是歪打正着，「運氣」使然，而且，表明了英人奮力找尋愜意生活的意願和能力，一方面不服不行，另一方面鼓噪還原論的吹牛皮也沒啥意思。苦寒之地，人民要麼勤勞，窮則思變，要麼抱殘守缺，苟活了事。後來人思忖自己的祖先是在「漫不

經心」中締造了一個全球帝國，並且同樣似乎是在「漫不經心」中喪失了這一帝國，楚弓楚得的一筆糊塗帳。¹其實，何去何從，端看機運，而不止於機運！而時者，勢也；命者，運也！中國古典智慧經風歷雨，早已看個通透，因為通透所以大而化之，終究不了了之——曾經的漫漫征程裏，也確實夠用了。

二

相比而言，「美國佬」——那時還沒有「美國佬」——是在奔向共和的獨立戰爭中，以個人自由（freedom）為鵠的，為此建制立規，而達臻民主之境的。拓殖地的人民誓言分家立業過日子，不再受母邦轄制，要將那制度性羞辱連根拔掉，寧願在共和的旗幟下單挑，於和舟共濟中開張自家的基業。這恰恰是源於母邦自由的思想，也是源於法式平等的理念，兩相交匯，有以然哉。為此，他們不惜動刀動槍，兄弟鬩牆，鬧翻了事。幹的是立國的勾當，出的是一口惡氣，圖的是不受欺辱、自由選擇的舒心日子。因此，它首要獨立，建國，向外要平等，標立新社會，而國家還是那個舊國家。或者說，表徵國家的政制原不

過老套路，源自對於母邦的政治想像和政制模仿。維持大型共和國的秩序與自由之兼得的悖論，使得聯邦制成為必然選擇。後世之人，遙看先賢，以新舊對舉、社會和國家兩清，品評當年的英美，指謂前者是「新國家、舊社會」，後者是「舊國家、新社會」，說得在理兒。²

的確，掙脫母邦者，雖說開口洛克（John Locke），閉口孟德斯鳩（Montesquieu），但內裏，其立國規制不過拷貝自都鐸朝綱罷了。那邊廂，此套舊制，母邦漸然棄如敝屣，煥然一新了。新大陸不明就裏，還在蕭規曹隨，原來有個時間差呢！要說「創新」，新大陸的利害之處是「社會」變了，天翻地覆了。在國家尚未變天之際，這個叫做「社會」的實體不期然間成長壯大，任何政制便再也無法強其所難。當年托克維爾邊走邊看，邊看邊唱，以「自由的技藝」（the art of liberty）和「自由的習性」（the habits of liberty）兩辭，分別為民主政制的制度實踐和人民生活的政治實踐定位，伸言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後者才是真正的立國基礎，此可謂一針見血。轉用吾國先賢的表達，則技藝者，政也；習性者，俗也。宋儒呂祖謙就曾伸言，「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蓋善政未必能夠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³ 往前推，荀子早就講明瞭，「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

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⁴ 職是之故，「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⁵ 在此，良法屬政，屬技藝；君子為俗，為習性。它們道出的還是「社會」比「政制」強，所以，可能也比國家強的道理。

英美立國，走向現代，也同一上述理由；以社會為本體；法德依恃國家；蘇俄和國、共都靠黨國。到後來，程度不等，似乎都萬流歸宗，均須向社會本位的路子靠攏，才能收拾得住。至於靠攏的幅度，多則多矣，少其少矣，也是社會說了算的，蓋因「民情」不同嘛！然而，基本路向如此，概難否認。其中，中俄雖說均以民族國家、邦國主義定位，可卻依然殘留着帝國情緒，混雜着普世主義新潮，一度標榜「全世界無產者」如何如何；老美新貴，更是真正的現代帝國，把全球治理變成了警察治理，開口閉口普世價值，骨子裏卻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現實主義，徹徹底底的自我中心。這便又說明，縱使社會成長，性格早已積澱於國族生活深處，同樣動彈不得。雖說如此，但其時，美利堅這個新社會整日階兒鞭打黑人，槍殺褐人，趕殺黃人，其邦雖新，而心性有待提撕，格局終究有限。所以說，自立國而至於民主立國，並終以公民自由立國，需轉不少彎子，包括立法廢除萬惡的種族制度，容忍黑人民權，前面尚有百多年在等着呢！

三

法國革命驚天動地，不大的地界兒，卻攪翻了天。其之餘音，裊裊婷婷，今天猶在全球打圈兒，讓人類不得安生。想當年，它標舉「自由、平等和博愛」，真正是激盪億萬人心呀！想一想，這些褲子都穿不全的邊緣分子，小老百姓，啥時候這麼理直氣壯過！眾愚登場，眾聲喧嘩，眾擎易舉，眾志成城，一時間大家其實也還都不太適應。今天巴黎繁華尤盛，五色雜處，黑白搭配，讓人看花了眼，時不時鬧點兒動靜。遍布街頭巷尾的小吧、小館、小旅舍、小會所，不少還在醒目位置依舊鐫刻着三詞箴言，怕也是信不信先掛上，既然掛上了就掛着吧。其實，無論「自由」、「平等」抑或「博愛」，還真的都有自家的包容復兼排外的政治邊界！此非唯「無產階級的馬基雅維利」馬克思及其主義的一家之言，而是不太矯情，也不太天真，對此都心知肚明，而以悲憫待之耳！這不，「博愛」(fraternité)本為「同胞情誼」或者「公民友愛」，以身體所在的政治邊界為限，超出邊界，例屬化外之地。但是，詞語一旦流走世間，迭經時間，便獲得了自主性，生長、揮發出逸出效應，宗教般「無遠弗界的普世之愛」遂逐漸成其通義了，也是人力無法掌控者也，⁶讓原本更為沉厚博大的「交相利，兼相愛」，彷彿害羞得沒話說。話題收回來，雖則他們

口口聲聲，自由來自由去，為農生為農死，其實，高盧雄雞追求的是「解放」，以「解放」和「平等」為宗旨，重在「人民的出場」，而掩壓了liberty，也一度放逐了freedom。「巴黎市民又上街了」，街巷政治，廣場民主，兩百年的動能，刹不住車，要的是平等，自由不過是平等的調料，就像民主是自由的官方名稱。法國人將官僚做派演繹得無以復加，令人深惡痛絕，革命前後一脈相承，區別只在多了這一枚官方名稱。而名實扣合，大家便能忍受了。這便是「技藝」的超絕所在，「習性」依了它，它就餵養着「習性」！

實際上，當年喬治·桑（Georges Sand）夫人對此早已洞若觀火，在她看來，「革命乃是福音派宗教生活的一個階段。儘管充滿混亂、血腥並伴隨着持續的恐怖，革命是對耶穌所倡導的『平等』原則的奮勇爭取和追尋。『平等』是指引我們前進的火炬，它代代相傳！即使面臨腳手架、屠刀與烈士的遺體，我們仍要埋葬那個尚未完全摧毀但注定時日不多的異教舊世界！」⁷那邊廂，托克維爾對此亦多所闡發。例如，在著名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就以「大革命如何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自問自答，說明凡此革命理念幾經輾轉，直達人心，蠱惑人心，幾具宗教般感召魔力。其聲勢，其後果，如作者所言：

大革命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由此，它終於帶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時人為之震恐；或者不如說，大革命本身已然成為一種新宗教，雖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為既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活，但它卻像伊斯蘭教一樣，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⁸

所傳播的信仰，非他，就是上述三詞箴言，尤以爭取「解放」的「平等」最為打動人心；它是上帝，也是來世，從而才能打動人心。眾力輻輳，終於，大革命成為一種新宗教。而任何宗教，都有其異教，因而，以革命的名義迫害，遂浩浩乎人世矣！革命到後來，居然開始吞噬自己的兒女，大規模、按步驟、不分青紅皂白地殘忍吞噬，是一切法式大革命的共同特徵，原來有以然哉！因此，不難理解，只有法國人才會堅認，真理，或者說，「時代的真理」，表現為「革命、激情、發明和創造」，它們源自「政治、愛、科學和藝術」。⁹ 卻原來，一切皆自「習性」而來，什麼革命不革命，平等還是差等，人民或者君王！

歷史視野中，多元比勘，如果說英國人是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摸索出民主，「老美」為了共和大業而順帶過渡到民主，那麼，法國人則是因為致力於「解放」才想起了民主，用

上了民主，用民主保障自由，以自由爭取平等——而平等，從來就不曾真正光顧過人間，所以愈發地叫人想念，想得心裏癢癢，懊惱而興奮。激進的平等主義，如論者所言，恰恰為國家對人的體制性暴政鋪平了道路，所以才會有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和拿破崙的所作所為。¹⁰ 當年，普魯士人洪堡曾於大革命當日徘徊巴黎，就近細觀，雖擁抱高蹈的法國理念，卻對革命中的平等主義成分深感不安，實在有以然哉。¹¹ 其後，在黑格爾看來，唯智主義的解放企圖是高傲而瘋狂的罪孽，是一種注定要失敗的惡；法國大革命就是一種唯智主義高傲行徑造成的後果，是一種褻瀆生活的嘗試，一種撇開宗教和神去構建社會的企圖。雅各賓派的抽象理性主義有毀滅之效，但無重建之功。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自然法信徒和世界主義者看來都是自命不凡的饒舌者，他們很容易變成無情的暴君。的確，其間，動不動上街，間或人頭滾滾，盒子炮亂飛，不是太好玩，一般人玩不起，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要玩。

在此，革命所涉及的「自由」和「解放」兩項，分別源於並因應着「政制問題」與「社會問題」，都為立國大業的頭等大事。就法國情形而論，「社會問題」成為革命肇因，在於神聖幸福不再，世俗幸福進入了市民生活的歷史必然性前景。因而，不是自由，而是富足，是平等與均富，成為革命的魂幡。朋友，革命是世俗化的酵母，它本身也是世俗化

的產兒！由此可見，社會問題成為政治力量，或者，被塑造成為政治力量。後世馬克思們所着力用功的革命發動裝置，靠的就是這一機理。所以，不難理解，所謂「人權」變成了「無套褲漢」的權利，表明革命出現了轉折，意味着窮人「持續的匱乏和極度的苦難」變成了證真其歷史正當性，從而成為滿足「胃的需求」這一「生命過程本身的迫切性」的確鑿證據。——持續的匱乏一直存在，只有此時才變成了政治力量，漢娜·阿倫特的識見高人一籌者在此。「端起碗來吃飯，放下碗來罵人」，吾國曾有的喟嘆，情形相反，而道理同一，不奇怪。也就因此，此時此刻的革命所追求的不可可能是自由，而只能是「解放」。解放意味着暴力的正當性，對於暴力與自由之間必然性的肯認。於是，革命變成了烏合之眾的持續騷亂——「巴黎市民又上街了！」所以，阿倫特所說的「同情的激情」在法國擔當主角，而在美國革命中卻不曾發揮過任何作用，就在於美國此刻不存在法國式的社會問題，引發法國革命的社會問題早已獲了解決。因此，如果說在美國的情形是，「他們最終在普通百姓實實在在的行為中，即在百姓們每日渴望賺錢的自由裏，渴望去追求現時的幸福的舉動中，找到了新型的民主粘合劑」，¹²那麼，法國則是「胃的造反」似乎主導了一切，並決定了革命的指向是胃口。「胃口」並非一定是要即刻餓死的，雖然普遍不可忍受貧乏確實存在，但常常源於比較之下的差等，一種更加令人不可接受的難堪和羞辱，一種讓

人絕望而見不到頭的普遍挫折感。所謂「比較之下」，不僅是橫向的比較，而且是與自己曾經有過的，特別是剛剛經歷卻不幸遽逝的一度「繁榮」相比。同時，也是與一度具有而「不幸卻未曾兌現的願景相比。當其時，新興資產階級投資購買官職，為的是參與秩序，可是它的價格卻不斷下降，遂致失望乃至絕望蔓延。一直政治秩序的參與者卻因秩序本身無力為自己買單，以致於威脅到他們繼續作為秩序的參與者的安全感和預期，此時此刻，巨大的恐懼伴隨着挫折感而來，促使他們要重締秩序，而第一步，是先推翻既有的秩序。這同樣是一種「胃的造反」。

與阿倫特的判認有別，法國史家馬迪厄（Albert Mathiez）感喟：「這次革命並非爆發在一個貧窮的國家裏，反而是在一個極度繁榮的國家裏。貧困有時可以引發騷亂，但不能造就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激變往往源起於階級間的不平衡。」因而，它的實質在於，並且，見之於若干標榜為「革命」的暴力，證明確確實實在於，「改變制度及轉移財產」。¹³但是，即便如此，它並沒有改變其他法國革命史家奠立於史實的更為有力的解釋，例如，以研究法國革命名世的英國史學家威廉·多伊爾就曾指認，一七八九年政治危機到來的時候，正值物價高昂、工資下降、失業猛增之際，實際上，一七七〇至一七七八年，「繁榮時代」由於連續歉收而告終結，而這有助於解釋為何那年春夏暴動遍佈城鄉。因此，大革命

爆發於一個嚴重的經濟危機時刻，群眾的介入是災難而不是繁榮的結果。也就因此，巴黎群眾最為迫切的問題還是餵飽肚子，「攻陷巴士底監獄也是一場糧食暴動」。¹⁴

根據上述理由相比而言，還如美國史家伍德（Gordon S. Wood）所言，「美國的革命者們似乎總是出入於客廳或者立法大廳，而不是活動在地下室裏或者大街上。」¹⁵ 沒有社會問題橫亘於前，美國革命遂着力解決政體問題，然後再以此因應社會問題，其進程一直至少持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此處的社會問題不是「持續的匱乏」，而是「種族」、「宗教」和「男女」，其平等與共存。事到如今，解決得不錯，白宮裏終於出了個黑主，欣欣然也，凜凜然也。依照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說法，美國總統的實質是「民選的皇帝」。如今，皇帝輪流坐，種族溝壑彷彿一夜間沒了。美國憲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之所以被視作「第二部憲法」，原因在此，不得不然。

另一邊廂，法國革命既然基於「同情」，以因應社會問題，遂將政治進程擱置，一直要到一九五八年的第五共和國及其立憲，才告最終解決。上引托克維爾鉅著申言，大革命代表着法國的「青春、熱情、慷慨、真誠的年代」，其論不虛。但自熱情洋溢的青年而臻達老到圓融的中年，實現共和國及其全體成員的政治成熟，還真的要等到第五共和國才行呢！其間紛亂，恐亦非托翁熱情洋溢之際始料所及者。若以吾國情形比附，則「民國」旨

在解決政體，為「現代中國」搭起一個政治框架，卻無社會基礎；「共產」針對社會問題，「同情」發揮着匪夷所思的作用，但卻以暫時屏蔽政治為條件。因此，像如今，海峽那邊政治問題基本落定，全力要對付的是社會問題。海峽這邊則正面臨解決政治問題、政體轉型過關的險隘，看上去亟需「維穩」屬社會問題的考題，其實多半源自政治問題的難題。革命抵到頭，轉型的最後時刻終究來臨，如明道先生儻論，「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¹⁶，這才會最後鬧得轟轟烈烈來。

四

實際上，法國革命前，大而化之，存在着兩種思路。一是關注財政、稅收和國家能力的國家理性一脈，所謂的「黎塞留路線」，審慎而周刻，以應對現實為核心，充盈幹慧；另一脈是盧梭、伏爾泰的「革命學思」，熱烈且張揚，將暢想未來當做現實號角，滿懷理想。二者未能合流，終而分道揚鑣，導致「大革命」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驟然爆發，一發而不可收拾，「把世界翻個底朝天！」與此相反，美國革命並非是由「文人和職業革命

家」所領導的，而且由一群秉具實踐理性的幹才充任了歷史機遇賦予的角色。這群後來獲稱作「國父」的富貴階級，既受母國文教熏陶，亦復感受法式理想並影響了後來的法國革命，具有「文人」與「黎塞留們」的雙重經驗，因而得能擔當其雙重職責。他們既具「幹慧」，復秉理想，更兼利害，大勢當前，於是成大事了。上述法國式的二元強烈對立，在此居然消隱於無形，已然非「經驗主義」「實用理性」一類語詞所能打發。在美利堅獨立革命中拋頭顱撒熱血的「文人和職業革命家」及其對立面，形形色色的拉法耶特們，許多是來自法國的志願者，在此先行試煉了一把，後來回到母邦，呼風喚雨，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今日大家看電視聽廣播，萬里外欽羨美利堅政學兩界的魚水情誼，一大感喟是其地學府和官府既井然分際，又棧道暗度、陳倉明達，今天學府教書匠，一轉身，明日華府國務卿，就在於人家原有這個傳統，當年舉事的時候不巧就這麼形成了，不算稀奇。拋開德性和心性不論，不妨說，一流的大腦才能有一流的視野，進而可能成就一流的事業。帝國的繁華和罪惡，硬幣的兩面，本是一本帳。

就此，如前所述，因為社會早已成長發育，不存在急切的社會問題，因而，對於美國革命而言，革命是為了保留已有的公共空間，而非憑空創立。因為經驗告訴他們，皇權之下是存在公共事務和公共空間的。而在法國，文人們不曾意識到這一可能性，或者，路易

與黎塞留們未及提供這一現實性。而現實的政治權威危機迫在眉睫，歷史不遑給予二者達成諒解與共識的機會了。雖說「國王就是法律」，但實際上，不說那出入宮闈的四千大戶，就是直屬的吏臣，吃他的，喝他的，亦且陽奉陰違。畢竟，公共自由是被建構出來的，也能被毀滅掉。而公共幸福是被體驗出來的，是存在公共自由的結果。換言之，公共幸福即關於公共自由的愉悅感受。美國人於立國之後，迅疾經由立憲，將對於公共自由的追求化為公民自由，化解了源於革命進程中呈現出來的私人與公共、個體福祉與公共幸福的對立和緊張。法國相反，未能以公民自由化解上述緊張，於是，但凡妨礙上述四種利益的均為革命對象，例屬「暴政」；革命一經啟動，便不受革命者控制，從指向君憲的有限革命，一路狂奔，撲向共和國建構，卻終究吞下了「革命」原是「復辟」這一苦果。

美國革命亦因此與法國革命相反，以公民自由為基礎，強調立憲政府，由立憲來組織權力，而非否定或者迴避權力，經由施行有效統治，走向政治文明。有效統治恰恰在於分權，縱向和橫向上的權力的分享與約制。畢竟，革命不是革命家所發動的，相反，革命和革命家都是政治權威崩潰的結果，而非原因。具體而言，法國革命是君主制的政治權威崩潰了，內外交困之下已然無法再為其生存買單了；不是社會經濟發展有以然哉，而是政治危機導致了社會革命，進而造成了政治革命。此情此景，一如君主制的封建轄制愈來愈

不再為從來就生活在「新社會」的新大陸的民眾所信受，從而直接訴諸政治立國。將眼光放遠，從最寬泛的意義上來說，以法美革命為標誌的西方現代轉型，是古羅馬宗教、傳統和權威三位一體瓦解過程的連鎖反應，正如「歷史三峽」的遠源應當追溯至王安石變法失敗。也就因此，如果革命未能提供有效統治，則革命無異於另一場災難。人世終究要有政治和政治秩序，這是政治動物的遊戲規則，須臾不可或缺。因而，革命承接了政治權威崩潰的後果，並着意開啟新型秩序，另造權威。一旦成功，此時此刻，「歷史終結了！」長程跋涉後，歷經世世代代，等待着另一輪文化轉型，再終結一回。法美革命就是上述三位一體格局瓦解後，將「開啟」和「終結」聚集一身的歷史時刻。在此視野中，與美國革命相反，這邊廂，法國革命的「文人和職業革命家」訴諸天賦人權，未曾劃分人權與公民權，導致權利的絕對性，政府遂建立在流沙之上，無政府主義應運而生，將此革命進程幾乎拖宕至「第五共和國」方始宣告成功。的確，在當時的法國，革命起源於對於苦難和匱乏的同情，源於對此憐憫的無限化，而這同時意味着仇恨的無限化。「訴苦運動」的根由及其政治功能，只有從此溯源，才能理解。可是，其若無法轉化為對於公共空間中的公民自由的追求，則不僅無法化解，反而可能變成一種破壞性力量。從而，正是仇恨左右了法國革命的進程，而非正義。又因為苦難是具體的，而這些仇恨都是抽象的，因而是冷漠甚至殘忍

的。「人民」取代了「共和」，而非如同美國那般自始便高舉「共和」大旗，而恰成暴政。進而，「公意」置換了「同意」，代表了一種必然性，恰與解放和自由相悖。對於忠誠、美德的絕對化，以及對於背信、「背叛革命」、「出賣革命」的處罰，換言之，對於善的絕對化，恰恰造成了偽善，甚至是普遍的偽善。革命成為普遍偽善的萬能飾口，其結果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社會的自我發育所形成的公共空間，是自由的蘊涵之所。在此空間內，個體有望成為公民，「人民」不再只是「百姓」，而進階成為一種建構性的政治存在。所謂自由，從來都是在分享公共權力的進程和結構中才能實現的，所以，都是公共自由。換言之，只有將對於自由的憧憬經此公共化後變成公民自由才能導向以自由立國，亦即於分享公共權力的政治進程中對於公民自由的感受和理解。進而，由此實現現代國家建構中政治權力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有效消解它與國家的普遍性、抽象性之間的緊張，最終導向優良政體。反過來說，優良政體是承載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實現二者於張馳有度中和諧共處的最佳制度安排。中西方既有的歷史表明，經過那麼多年的選擇，承受了那麼多的苦難，立憲的自由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公民自由，乃是一種最優化的立國之道，也是上述革命早早晚晚的殊途同歸之處。

五

由是觀之，「革命」是一個開端，意味着解放，卻未必帶來自由。僅僅當革命締造了公共空間，使得私人轉化為公民，即進入公共空間和政治議程，成為公共存在，自由才能實現，而獲秉一種政治生活方式。而「政治」不是別的，如希臘先賢所言，它恰恰是一種城邦與靈魂的一元結構。在此，自由的承載體不是國家，也不是個人，而是作為具有公共相關性的公民政治生活方式，一種政治公共空間。說到底，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由此，它消解了或者調和了國家與個人的緊張，一統於一個「分享着公共政治空間」這一生存論意義上的人類境況。一種不是最好，但是較好的瞬間。就是說，政治是一種公共事務，自由則屬世界性、公共性的利益。一句話歸總，自由者，公民自由也。革命能否如願凱旋，就看經此進程，是否養育出了自己的「新人」公民。就是說，「人民」只在非常政治時刻與立憲時刻登場，「公民」是她的日常政治形式。大革命是非常政治時刻的頂點，如何從此頂點平穩過渡，進入庸常時段，非有公民接續不可。在此無所進展，最好的情形是，革命等於復辟；最壞的情形是，一場浩劫。由公民組成的人民，才是自我立法與相互立法的理性分享者，因而是立憲共和的基礎。否則，人民無異群氓，革命不過就是一遍又一遍發生過

的「起義」與「改朝換代」的翻版而已。因此，重複一遍，革命能否養育出自己的公民，進而讓他們成為將人民主權轉化為公民自由，並於相互立法中分享公民自由的權利義務承擔者，是考察革命成色的核心標誌。

在此，法國大革命將政治推向全民，也就將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群眾——推向歷史舞台。群眾經由政治，不再是霍布斯筆下的「雜眾」，相反，一路撲騰，終於登堂入室，於其後的立憲民主體制中取替了上帝，並且獲得了一個集體命名，「人民」。從此，一個「大眾民主」時代降臨人世，階級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自此，政治的含義逐漸從宮闈和大國間的博弈，外展至更為廣闊的舞台，並使後者在國家政治舞台上終成主角。但是，如何讓他們收拾住解放和平等的動能，回歸常態政治條件下分享自由的公民位格，法國人似乎一下子相當按捺不住，更喜歡街壘式的暴動。相較而言，英國革命舞台上的主角是「國王」與「貴族」，一種「前群眾」的政治存在。這個前群眾變成群眾，再變成公民，經歷了差不多兩百多年！美國革命一下子將「我們人民」推出，演繹了「後群眾」或者「超群眾」的整體陣勢，促令新大陸這個「舊國家」，騎在「人民」或者「我們人民」這趟風馳電掣的列車上，齊唰唰邁向了「新社會」。這個新社會不是別的，正是工業化社會的「大眾民主時代」。大眾民主意味着公共空間，孤立、分散的個人置身於此，成為一種公共

存在。群眾，一種前政治的存在，由此華麗轉身，蛻變為「我們人民」，一群作為公民和選民發聲的政治博弈者。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這便是一種分享形式，也是一種製造分享的制度可能性的公共行動。除非將他們重新推回到「群眾」或者「老百姓」這一位格——就如阿倫特所言，將「階級轉變為群眾」，一個無陣營從而無陣勢的芸芸眾生，否則，自由。一旦存在，便不可扭轉，也無法撤銷。極權政治的誕生，其姻緣在此。因此，護持群眾的「我們人民」位格，就是保衛民主體制和開放社會，而要讓「我們人民」存身，就得容忍並護持「大眾民主」，並落實在立憲民主的總體格局之中。美國立國之後幸而在此一路平穩，端賴經由立憲的公民自由也！

由此不妨說，「我欲」並不能構成權利的政治基礎，「我能」才是權利的真正基礎。而「我能」以政治共同體的存在為條件。本來，無論是自由、平等與博愛，還是獨立、共和與解放，它們都是反抗的主題，不料卻成了現代政體合法化的意識形態基礎，更是具有普世性的人類解放的現代政治方案與文化方案的核心內容，說明立國進程與國民與公民的塑造進程是統一的，早晚的問題而已。在此場域，換言之，一個人只有將自己匯入公民聯合，才會存在權利問題，進而有政治，有他或者她的能與不能。也就因此，個人自由與公共自由之間恆具緊張，因而需要「公民自由」來調節和化約，承上而啟下，而一統於立憲，以

提供政治的真正基礎。如果說經由公共政治進程將私人變成了公民，人民才會成為一種政治存在的話，那麼，反過來說，「人民出場」之後，必須是「公民在場」，並由具體的「公民在場」來形成和彰顯「人民出場」，才可能形成政制和政治，進而經由立約完成立國。原來，立憲、立國與國民和公民分享着同一歷史前提，現身於同一歷史進程。

行文至此，設身處地，由此直落當下，這樣說一切就明白曉暢了：對於此刻的吾國吾民而言，可能，在社會的成長和公共空間的發育中，公民自由而非僅僅針對匱乏與平等的解放訴求，是其中富含教益的項目。也就因此，不能將億萬人對於公民自由的追求簡單化約為民生項目，更不能以迎合民粹來獲取對方的政治支持，一如不能「以治安來對付政治」。可能，這才是最具有警意味的項目。對於民生的無限許諾，以福利的透支來換得政治正當性，總是暫時的，也是脆弱的。道理很簡單：欲壑難填，而資源有限，透支福利不惟不負責任，簡直就是透支未來；以維穩策略下的治安術，暫時屏蔽、消解政治參與熱情，注定了只能是揚湯止沸，效果或許是災難性的，這道理同樣很簡單：民不畏死。現實的，也就是功利和德性最大化的做法，還是要開放社會，開放政治，經由立憲時刻一統於立國政道，予國民以公民自由中，坐實公民位格，從而，讓國家蔚為國民的法律共同體，進而，是公民的政治共同體。

六

上述四種「自由」以及「共和」與「解放」，「社會」與「國家」，「群眾」與「百姓」，「國民」、「公民」與「人民」，以及「民生」、「治安」與「政治」，卿卿我我，縱橫交錯，構成了三起民主個案各自的題詞，也是三大革命的不同旨趣，表明「現代」自登場起就是一個複數，哪裏有什麼現成的模子。各項議程，緩急有別，輕重不同，走到哪一步非解決不可，自然就冒出頭來了。對此高度敏感，秉具問題意識，或迎難而上，或順水推舟，當事人德性與幹慧齊至，遂有成矣！波蘭和蘇東一九九一年變天後，忽略社會問題，一心關注政治和經濟轉型，結果導致二〇〇九年哈維爾所說的「回到麪包」的窘境，說明了前一層意思。補救及時，險隘終渡，佐證了後一層意思。可問題是，不管怎麼說，倘若缺了這幾樣佐料，雖然有一個好聽的名字，譬如，「人民民主共和國」之類，但動不動就「五不搞」，就斷然不是「現代」，而是前現代，非現代，反現代，抗拒現代。總之，就是不現代。雖然，現代並非一個純粹的褒詞，但如同其從來就是一個複數。這時候，生活陷

入較差的人類境況，既無個人自由，更無公民自由，悶局的結果可能是爆炸性的瓦解，玉石俱焚矣！

各位方家，三方四國的人民，不知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二〇一二年五月於清華無齋

註釋

- * 本章原載於《財經》2012年第9期。
- 1 參詳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社，2002)，頁56。
- 2 參詳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 3 呂祖謙著：《東萊博議·卷八》。
- 4 荀子著：《君道》。
- 5 荀子著：《致士》。
- 6 有關於此，參詳Paul Spicker,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6).

- 7 喬治·桑 (Georges Sand)：《我見證的歷史》，轉引自皮埃爾·特里奧姆夫 (Pierre Triomphe) 著，秦川譯：《基佐的歐洲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58。
- 8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52。
- 9 陳永國編：《激進哲學：阿蘭·巴丟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9。
- 10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 (Georg G. Iggers) 著，彭剛、顧杭譯：《德國的歷史觀：從赫爾德到當代歷史思想的民族傳統》(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頁 5。
- 11 實際上，在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記中，洪堡譴責了法國人當年八月四日之夜做出的廢除封建權利的決定。在他看來，當時的許多貴族，其中絕大多數是窮人，放棄了原本屬富人的權利，「放棄這些特權來得太快了，這沒有任何益處，而只有壞的結果，因為它們助長了空想的平等觀念。」事後看來，其觀察頗具歷史感。轉引自前揭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的著作《德國的歷史觀：從赫爾德到當代歷史思想的民族傳統》，頁 59。
- 12 戈登·S·伍德 (Gordon S. Wood) 著，傅國英譯：《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ix。
- 13 馬迪厄 (Albert Mathiez) 著，楊人梗譯：《法國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5-6。
- 14 威廉·多伊爾 (William Doyle) 著，張弛譯：《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23、188-189。
- 15 戈登·S·伍德 (Gordon S. Wood) 著，傅國英譯：《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ix、3，並參詳第十四章「利益」。
- 15 朱熹、呂祖謙：《近思錄·制度》。

第五章

國家建構的精神索引

——今天中國為何需要省思「國家理性」

「國家理性」概念問世的四百年，恰好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史。漫漫四個多世紀裏，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運動自西向東遞次展開，蔚為時代主綱，構成了最為宏大的歷史進程，裹挾並決定了其他一切社會歷史運動與政治法律進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巨型秩序的君臨天下，現代「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這一基本人間秩序形態之應運而生，是現代歷史中最为重大的人類事件。從此，一切人世制度實踐和意義言說，包括戰爭與革命，生存和發展，資源與環境，自由抑或解放，均難以超脫此一總體語境，也可以說，均圍繞着如何打理這一巨型秩序而生發，而運作，而載浮載沉。期間，為此提供合法性敘事和正當性說明的，從而構成其精神向度的，正是「國家理性」，或者，「國家理由」(*ragion di stato, statsråson, raison d'état, ratio status, reason of state*)，綜合性地回答了「為何要有國家？」、「如何才有國家？」以及「國家應當為何？」這三大根本問題，一種「現代」誕生的政法維度。在此，依據歷時性敘事，就世界各主要民族國家來看，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史經歷了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到「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再到「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等三大演進階段，分別對應着國家建構的理念、文化和政治等三大任務，

講述了一部有關「富強、民主與文明」的章回故事。正是在此語境下，自近代早期的地中海文明，進而到大西洋文明，而至刻下的太平洋文明，「國家理性」潛遊人間，席捲全球，在充當現代民族國家精神導師之際，形塑了有關此一基本人間秩序的心智和心性。

畢竟，從近代早期的地中海拉丁文明萌發這一概念之日起，「國家理性」所要因應的便是現代國家漸次成形的又最為宏大的政法現象，而沒有什麼比現代國家的出現更為根本性地決定了晚近人世生活的方方面面。換言之，晚近四百多年間，人世紛紜，千頭萬緒，國家建構蔚為其綱，而國家建構既是一個自然的發生史，又是一種有意識的自覺自為的歷史進程。「國家理性」潛含其中，俯臨其上，超然於前，挈領着這一巨型秩序的生成、發展與演變，而恰為其心智與心性。一部晚近四個多世紀的人類政治社會史，就是國家建構的自燃成長進程，也就是國家理性載浮載沉的觀念史。

因此，「國家理性」一詞之創用，在於將「國家」和「理性」二者有機地聯繫起來，而催生出「這是（以及應當是、如何才是）何種國家」與「這是（以及應當是、如何才是）何種理性」的問題，以及這一「理性」如何才能致臻此一「國家」之境與這一「國家」如何才能無限接近這一「理性」的追問。凡此問題與追問，構成了四百年間國家建構的觀念史，也是國家建構的實踐史，遞次參差，輾轉推進，最終導致現代政治與現代秩序的誕

生。不論西方還是東方，也無分辨人們實際上究竟得到了何種人間政治法律形式與社會歷史狀態，以及這一政治法律形式與社會歷史狀態是否屬一種愜意的人間秩序。

二

「國家理性」意識萌發於十六世紀中晚期，濫觴於近代早期的地中海文明，特別是意大利諸邦的早期國家建構實踐，後從拉丁世界播散至日耳曼文明、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以及東亞世界。迄而至今，這一學思經歷了四個主要階段。自一五六七年意大利佛羅倫斯「諮政會」(Consulte e Pratiche)第一次創用這一語彙，到佛羅倫斯歷史學家弗蘭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和德拉·卡薩(Della Casa)兩位分別在《關於佛羅倫斯政體的對話》和《致查理五世的獻詞》中率先表諸文本，再到喬萬尼·博塔羅(Giovanni Botero)對其進行了創造性的正面闡釋，到其後傳播至歐洲其他地區，是謂國家理性學思的第一波，基本處在醞釀於學者心胸，而初試於現實政治的階段。其後，自美國立國，中經法國革命、普魯士德國誕生到沙俄改制更張為止，形成了第二波。實利政治、實力政

治、威望政治和蠻力政治紛沓登場，批判的武器變革了武器的批判。十九世紀晚期以降，伴隨着殖民勢力東漸，這一理念佈散於東亞等地，促成了「中華民國」、獨立後的土耳其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等亞洲新興國家的誕生，催生了諸如「三民主義」、「凱末爾主義」等新興國家理性立場，是為第三波，恰與第二波相反而相成。二戰以降，對於國家的反省，特別是對於其背後所隱含的現代性的野蠻性的追問，應對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格局的衝擊，以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續性諸題，形成了「國家理性」學思的第四波，武器的批判再度輾轉為批判的武器。

具體而言，馬基雅維利——博塔羅時代以降直至黎塞留專權、俾斯麥鐵腕統一德國，民族國家由雛形初現而逐漸完型，其總體追求的是所謂「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特別是德國的建國歷程，將「實力政治」(realpolitik)的國家理性故事演繹到登峰造極。其間，以工具理性取替道義理性，將作為倫理存在的傳統共和國(civitas)的公民理性，換而為利益政治運籌和基於工具理性追求的赤裸裸的功利考量，構成了初期國家理性的重要內涵。在此，「國家理性」就是「國家理由」，而「國家理由」就是「利益理由」，「理性」、「理由」與「利益」在特定語文(如法語raison d'état)中的重疊，正如其內在原本一體，恰恰說明了「國家理性」或者「國家理由」的本質。同時，如此作為，在於通過標舉一個叫做

國家的地緣政治結構，訴說着一種關於集體承認政治和集體福祉關懷的政治理念，希望以一種新型利益及其認同的政治形式，來取替君主個人或者政治家族的利益。馬基雅維利的理論及其後歐西晚近的實踐，提煉了國家人格，將國家從權勢者手上掌握的「權力機器」，變成了「國家」(state)，而不再只是「權力機器」，更不是那個權勢者。從而，它在摧毀舊有利益及其認同的政治合法性的同時，為一種新型人間秩序單元的問世鳴鑼開道。就此而言，的確，它回答的是國家存在的「理由」或者「理據」，解答的是究竟「為何需要國家」或者說「現代民族國家」的問題，回應了人們在民族國家體系取代帝國體系、封建體系、王朝體系或者城邦體系的倫理共同體之際，有關這一新型人間秩序的疑惑與焦慮，對於這一人世共同體的嚮往與託付。¹

大約自博丹開始，「憲政國家——憲法政治」作為一種被逐漸把握着的人類理念，進而作為一種歷史存在，慢慢浮現，並終於在兩百年間獲得了自己的肉身，成為一種「理想國家類型」。由此，國家不僅意味着「權勢國家與權力政治」，而且是權勢國家與憲政國家的合一，權力政治與憲法政治分別因應「國家間政治」與「國家政治」，於分梳清晰中暗通款曲，在各享其位之際又聲氣相求。就對外關係而言，主要體現為前者，爭取的是權勢國家與實力政治；就內政結構來看，則憲政國家與憲法政治才是不二法門，而且，主要以後

者來鋪排自己的合法性敘事，否則，便是納粹德國、日本軍國體制和蘇俄暴政的下場。由此可見，「國家理性」不僅在於「國家」前史的心智努力，而且在於「建國」之後，如何兌現「立國承諾」的道義指向和政治內涵。畢竟，「國家理性」講述的終究是「為何要有國家」（理由）與「國家應當為何」（理性）的二重稟賦。而「為何要有國家」不僅在於以「國家」取替君主、家族或者政黨的私利，更在於導向一種理想而愜意的人世生活，尋繹合理而公正的人間秩序，特別是理想政體。它不僅是對於民族國家實然狀態的描述，而且是對於其應然位格的期許，更是經由提出德性訴求對於這一人間「利維坦」的規約。因此，「國家理性」是關於「為何要有國家」以及「國家應當為何」的歷史解釋、政治期許、法權規範和道德訓誡。它們共同決定了一「如何才有（應然的）國家」的手段選擇的工具理性。國家理性提供的是從「為何要有國家」，到「如何才有國家」，而終歸於「國家應當為何」的連續、綿密的致思進程。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理性本為國家張本，卻終於同時意味着對於它的規訓。如果說「為何要有國家」與「如何才有國家」主要關涉治道，那麼，「國家應當為何」則蔚為政道，它們合為一體才是完整的現代國家的心智和心性，一種康健有力的國家精神人格，而共同講述了民族國家創世歷程的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民族倫理共同體因而經由統一的

政治邊界進境為經濟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進而凝聚抽繹為一種文明共同體，塑造了一種「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的整體陣勢。換言之，如果這個「統治法」同時涵育充沛的自然法式追問的話，國家理性即國家的精神人格，其實踐政治效應即現代治國方略（而不僅僅是「行政管理」或者「公共管理」），省思國家理性，就是在提煉現代政道與治道，也就是當國家理性概念從拉丁世界傳佈到日耳曼世界後所孕育的那個德語法理概念「統治法」（*ius dominationis*）。如果說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歐洲，「國家理性」在提煉治理術的同時助長了專制主義，而為現代民族國家誕生的轉型前史中的一段過門，那麼，今天繼續探索其意蘊，審問其功用，便在於鍛造政治審慎，弘挾政治常識，保持國家的公器性質，恰恰為了鈍化和消解其「專制」特性。

晚近西方文明及其政法結構蔚然大觀，根本性地改變了人類的社會政治進程，深刻地影響了包括中國近代歷史——文化轉型在內的全球秩序，並終於推導出新型的世界體系，此為綱領所在，不可不察。

三

當今中國，位處百年轉型的收束階段，對於國家理性的自覺及其涵育，亟當提上議事日程。事實上，「鴉片戰爭」以還一個半世紀裏，旨在解決「中國問題」的百年奮鬥歷程，圍繞着「救國」與「建國」的諸般措置，就是一部於重構現代政治中對於中國文明進行自我理解，從而建設現代中國國家理性的歷史。隨着中國文明的復興，值此戰略機遇與重大挑戰並至的關鍵時段，直面環華覬覦、鷹視狼顧的周邊情勢，撫拂「先發達起來」的國族的「不平衡」，省思和重建中國的國家理性，更顯迫切。²

歷史而言，晚近中國的國家理性的建構進程啟端於外侮，而肇興於自救，終歸於尋繹優良政體和有效政治的政治自覺與文化自覺。大略來看，這一思慮初在將國家與朝廷兩相剝離，使國族和天下井然分際，突顯國家利益本質及其現代轉換，繼而於國民與國家、人民與政體的類型化框架中，省思公民個體的自由與幸福，將民族心思凝聚於優良政體的追尋。因此，中國的民族自救和建國運動自始不僅動用民族理想為幡，而且仰恃立憲，啟動公民理想，終於在今天匯合成追求「富強、民主和文明」齊頭並進的時代奏鳴。

如果以前述「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憲政國家—憲法政治」與「文明國家—文

化政治」的遞次推展為據來展開國家建構和國家理性命題的話，那麼，它們所對應的正是一「富強、民主與文明」這三大主題。首先，就「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而言，它突出地道出了「國家能力」的建設問題，而恰相對照於現代化進程與國家建構的酷烈拚搏中、世界範圍內的「失敗國家」現象。這一命題可以分為「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兩方面來看。就「國家政治」而言，首先形成穩定、有效和分享基本共識的政治秩序，確保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是政治的第一要務，也是政治的底線目標，而為國家建構和一切立國承諾所不可或缺。就此而言，經過中國百年轉型的接續奮鬥，其主要指標已然基本實現，今日的難處在於將其推展到憲政民主之境，而牽扯到下述「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的問題。要就「國家間政治」立論，則今日中國尚需磨礪前行。曾幾何時，西方列強打進堂奧，帶給中華民族無盡創傷，教給中國人的第一課自然就是「落後就要挨打」，而使得「發展是硬道理」成為民族共識。它不僅造成了清末、民國與人民共和國三段政體盡可能孜孜致力於發展經濟、強化國防的矢志奮鬥，而且，為晚近隨伴着中國文明復興而逐漸顯露的大國成長，提供了政治解說。在國家理性的成長史上，有關「國家間政治」曾經出現過四種模式，即追求實利的「英國模式」、展示威望的「法國模式」、崇尚實力的「德國模式」和宣泄激情的「俄國模式」，³今天中國文明的復興和中國之為一個大國的成長，有可能提供一

種新型模式。此一模式，以對於全球秩序和世界體系的常識結構為憑，而以和平共處的普世情懷立世，不僅追求民胞物與，而且倡揚天下一家。無以名之，或可稱為「天下模式」。限於本文主題，在此不遑詳論。

其次，就「憲政國家——憲法政治」來看，牽扯到「國家應當為何？」這一根本追問，其表現為當下中國建設優良政體這一迫切難題。實際上，自「一九一一」共和初立，憲法和憲政即已蔚然於建制，蕩漾在人心，憧憬於理想，終究於內憂外患中讓位於「救亡」之急。此後，內戰與抗戰接續，革命共改良一體，烽火連天，青黃不接，自然無遑及此，說明憲法政治只能是和平場景下的法權結構，憲政國家更且需要民主政治、個人權利、市場經濟、表達自由等一系列配套措置聯袂登場，始望成形。此刻中國，如果說市場經濟雛形早立，個人權利藉由法權安排和公民維權實踐沛然成長，那麼，落實民主這一立國承諾，磨礪優良政體，建設中華文明的憲政秩序，實為「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的切實含義，便是當務之急，可能，也是刻下中國的一個軟肋。正如承認高韜超越的自然法的存在，恰恰意味着肯認了具有真正的此世義務和當下責任，國家建構中基於自我保存的權勢之維和對於實力政治的追求，必然以「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相平衡，因為前者總是傾向於不惜損害後者來實現自身，而這最終摧毀的是國族共同的生存基礎，如同前述德、俄、日曾經之

所為，正好違背了國家理性。權勢和獲得權勢作為一種手段，固然不可避免地會遭遇道義衝突，卻絕不能放任其達致「毫無保留」或者「不擇手段」的地步，否則，利維坦本身會將「國家理性」吞噬，走向自己的反面，晚近中國和世界歷史對此早已一再證明。此情此景，正如論者所言，「國家的根本福祉本身並非僅僅通過權勢，也通過倫理和正義來保障；而且，說到底，這些東西的瓦解危及權勢本身的維持。」⁴這也就等於從反面說明了一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必然登場的歷史合法性與政治正當性。

最後，就「文明國家——文化政治」來看，「國家理性」命題不僅意指國家本身應當成為涵育文明成長的最佳基本單元和有效促進機制，而且同時意味着國家是並必須是一種文明共同體，既奠立於這一文明，又是這一文明的傳承者、守望者和捍衛者，國家由此成為一種國民空間，為全體國民提供最為深沉的歸屬感，營造生死以之的家園意象。同時，它意味着國家必須着力於人類知識、文化和思想的建設，而偉大的國族無一不是挈領人類認識未知世界、發掘普世價值的引擎，從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導性與文化領導力。不是霸道，而是王道與文化，致誠天下，始為偉大國族。進而，它真誠宣諭：激發與涵養美德，並促進公民的德性，增益國民的教養，涵育良善心性，豐富和提撕人生意義，是國家存在不言自明的目的，也是它的責任，本身就是國家的美德。另一方面，依據美德來激發和培植國

家倫理，使國家保持美德，則又為美德的使命。經此轉折，如論者所言，「國家凸現為一種旨在提供最高生活品質的道德體制，一個民族原始衝動性的權勢意願和生存意願最終被轉化為道德上自覺的民族思想模式，它將民族國家視作永恆價值的一個象徵。」⁵ 由此可見，國家成為一個倫理共同體，一種分享着共同價值和道德理想的公民空間。國家不僅是一種具有自覺忠誠的共和主義共同體，而且是一種包容紛繁異質性的廣闊單元，恰為調和與實現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的共同體，一種公共空間。

在此，共同體意象恰與「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相對立，標榜的是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但是，與此同時，此種共同體格局卻又為「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所當追求，否則，至少就「國家間政治」而言，「權勢」何來？靠什麼來繼續？借用流行詞，則「文明國家—文化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共同體局面屬所謂「軟實力」，作為「硬實力」的「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恰恰不得不依恃於它，在當今世界，恐怕更是須臾不可離開於它。因此，「文明國家—文化政治」陳述的一條公理就是，國家不僅是利益政治下的利益共同體，而且是基於共同的理想主義的信念共同體，從而，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真正令人眷念、不捨隔離的家園。

上述三項，對應於「富強、民主和文明」這一總括性政治憧憬與秩序圖景，說明現代國家是權勢國家、憲政國家和文明國家的綜合體，現代政治不是別的，乃為權力政治、憲法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三位一體，而分別因應着「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的紛繁世象。朋友，對於國家這一我們擺不脫、繞不開、既恨且愛的巨型秩序，如此陳述，既是一種歷史主義概括和理性主義寫照，又何嘗不是一種人道主義憧憬，同時，更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無選擇的選擇！

總體而言，迄而至今，中國的國家建構進程尚未完成，不僅海峽兩岸三地的政經體系有待整合，限定了當下主權的時空語境，而且，以大陸中國為主體和主題的法權佈局亦尚未完工，期待着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助產士。尤有甚者，作為現代國家支架的優良政體在建構有待時日，決定了在生存論的意義上，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未見定型，說得嚴重一些，可謂尚付闕如。因此，探查和申明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於追求其歷史進程中辨析其心性，將建構其心智的願景託付於制度實踐的政治考察，遂成當務之急。進而，在申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的主題性的進程中，突顯其政治、制度與思想的主體性，就是對於文明論語境下的優良政體及其法權安排的尋繹。經此砥礪，積勞積慧，引領中國走向成熟國族，正當為漢語學思砥礪自強、孜孜用力之所在。

四

有鑒於此，二〇一〇年初夏，本刊（按：《戰略與管理》）編輯部於清華大學法學院召開了「第一屆國家理性研討會」，期於法政、歷史、哲學和國際關係諸端，形成交匯省察，於引發漢語學思的積勞積慧中，求裨於當下的國家建設實踐。本輯「筆談」，匯聚了當日討論的要點，既在觀念史的梳理，亦着力於法理解析，同時，並於國家間政治落筆，於省思中國的心智與心性的致思進程中，提煉中國的國家精神人格，探究可能有與應當有的人間秩序。其實，漢語學界對此概念並不陌生，本輯「主題論文」所刊各文，或梳理外域國家理性的概念史，或講述中國近代奮力於現代國家建構的典型個案，即為對此所作的一般理解和闡釋，而於晚近中西思想的交融互動中，爬梳抉發，回環往復，圍繞的還是中國的成長與中華文明的復興這一世紀主題，縈念於懷的總不外為理想的人世生活與永久和平的人間秩序這一千載夢尋。此外，幾篇譯文和評論文字，各有立場，也各有擅場，不乏佳構，對於我們的當下思考，想必多所啟發。

伸而言之，經由「國家理性」建構「共和國」，旨在解決權力與權利，族群共處、文化多元與統一的國家意志，公共秩序與民主政治，以及公共理性與個體的私性空間的多元

性質等等多維緊張關係，最終使得「中國」不僅是一種政法存在，而且是一種倫理存在與文明氣象，達臻康德式的自由人的政治聯合。這當然也是作為漢語學思的本輯思考的基本立意所在。如果說運用「國家理性」這一統合性概念，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性思考來反省、措置「國家」之為一種人世生活方式和人間秩序，究竟所求何為，那麼，其寄託在此，可能，其啟示亦且在此。畢竟，無論是在「國家政治」還是在「國家間政治」的意義上，政治事務始終兼具集體位格，人類的政治事務恆恆具悲劇性質，而對於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罪惡的世界，人們必須抱持希望。凡此提醒並要求我們，當此時刻，常識理性、審慎政治和歷史大視野，以及在均為鍛造中國的國家精神人格所不可或缺。而塑育「由衷的倫理精神和剛健有力的政治靈魂」這一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進求中國的康健成長，要求我們對於國家的功能和意義反覆重述、不斷追問，便既是對於國家理性的持續發現和拓展，也就是在運用國家理性以規訓國家，從而迫使和誘導國家成為國民的理想居所與公民的共和國。所謂「道在天下，亙古長存。其在天為命，其在人為性，

其在物為理」。而無論是盡心、知命與踐性，還是窮思處物、格致義理，無不交集於此，而託命於共和融融的國族共同體。此謂之道，當下之道，而道必行之於天下矣！

二〇一〇年八月，酷暑中於清華無齋

註釋

* 本章原載於《戰略與管理》2010年第9-10期。

1 此種理論邏輯，實為當日現實情勢使然，而不得不然。例如，美第奇家族統治佛羅倫斯長達六十年，死後居然追謚為佛羅倫斯「國父」，曾被仇敵流放的老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一四三四年重返佛羅倫斯後，即刻施行惡政，「為了讓自己隨心所欲，隨時樂意觸犯法律和違反道德。」對於人們指責他鮮廉寡恥，以及「愛自己甚於愛祖國，愛身前甚於愛身後」，他回答說：「國家不是靠念主禱文（玫瑰經）就可以控制得了的。」如果有人對他說，其言其行，適足以禍害佛羅倫斯，他則以「與其失去一座城市，寧可去禍害它」作答。在「國家理性」的意義上，這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以「國家利益」取替這樣的個人或者家族利益，實為當務之急，回答了一「為何要有國家？」這一問題；二是統治一國家已然逸出了傳統的公民倫理，而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導向，政治惡蠅為利益政治，道出了回應「國家（政治）應當為何？」之迫切。上述美第奇語，引自：毛里齊奧·維羅利（Maurizio Viroli）著，段保良譯：《尼科洛的微笑：馬基雅維利傳》（上海：世紀人民出版社，2008），頁11。

2

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僅就晚近二十年的情形而言，政府自身經由良性因應各種民間社會的民主法制訴求而進行的艱難轉型，社會的成長和國民文化自覺與政治自覺的漸次發育，特別是現代法制與政制逐漸進入政治畛域，實為在內政意義上鍛煉國家理性。在「國家間政治」的意義上，遠自清末以降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有變法改制以及其後的種種因應以求保國保種，近至處理東海、南海和西北邊陲諸題，調適台海間距，特別是把握中美互動等項，更為磨礪國家理性、提煉國家精神人格的有效形式。所謂「多難興邦」，是並僅僅是在此意義上才能成立，也才有意義。

3

劉毅博士經由比較後指出，俄國推展的基本上是一種「蠻力政治」，德國曾經信奉「實力政治」，而英美自有其盎格魯—撒克遜的「巧實力」傳統，「巧實力」的概念雖然新鮮出爐，但其實踐運用卻是英美幾百年來一以貫之的政治傳統。筆者於引述上段文字後在此意欲補充的是，其實，英美不僅「巧用」實力，而且首先是「巧擁」實力，一切以實力或者實力政治為前提為後盾，尤其是殖民時段的英帝國，卑鄙無恥卻落落大方，貪婪無度而又審慎自制，自非今日這般景象也。參見劉毅：〈大國崛起中的政治反思〉，載許章潤主編：《憲法愛國主義》（「歷史法學」第三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37。

4

弗里德里希·邁內克（Meinecke）著，時殷弘譯：《馬基雅維利主義——「國家理由」觀念及其在現代史上的地位》，〈導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54。

5

同上，〈導言〉，頁64。

第六章

臨門一腳與國族天命

通常的一種說法是，回頭一望，近代中國將近兩百年的長程轉型奮鬥，多所跌宕，多所耽擱，要不然……期間，洋務運動失敗了，戊戌維新失敗了，清末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也失敗了，梁漱溟、胡適之們都失敗了。最後，還是共產黨人有辦法，找到了救國建國的真理，終於如何如何……這才怎樣怎樣……

這不是一家一人之言，長時間裏，為左右兩派所分享，令政學齊痛而頓足。其實，它們也是維新和保守諸公的共識，而不論維新幾許、保守者何。口誦心傳，幾經流轉，似乎成了歷史事實，不爭之定見。大會小會，張口就來，白紙黑字，下筆成章，歷史真的彷彿就是人寫的。在此，一些極右翼人士或者教條式自由主義者可能不全盤認可這一脈絡梳理，卻非不承認「失敗了」，包括自家理念和政治脈絡的「失敗」。實際上，他們承認「失敗」，痛惜「失敗」，懊惱的不過是為何「失敗了」、最後的主兒為何「成功了」、以及將來如何贏得「最終的勝利」，等因奉此，蜂趨蟻附。

其實，此處的關鍵在於，「成功」抑或「失敗」，究竟以什麼做標準。特別是「成功」與否，端看標準何在。否則，公說公理，婆說婆理，頭緒既亂，世事愈來愈紊，而史事如墜雲霧矣。有鑒於此，如果所謂的成功並非僅指什麼人最終位登大寶，或者何方實力終於奪得了政權。那麼，不妨設想兩種方案，於區別中論短長也。

其一，若說標準在於將中國完全領入「現代秩序」，締造了一個「現代中國」，徹底完成了中國的現代轉型，則迄而至今，明擺着，尚未完工，何來成功？誰又敢說自己絕然成功了？事實是，無一家一派得能儻言成功，也絕無一家一派隻手獨力，就可締造成功。這不，「寶島」台灣坐擁一方政體，至今「中國」作為國民國家尚未最終整合成形；南海諸嶼，為外鄰所竊據，天天撈魚又撈油，撒着歡兒蹦達，你乾瞪眼沒轍；一兩億國民輾轉於貧困，一天生活費不足六元人民的幣，更有那數千萬不恪溫飽，尚在前現代掙扎。凡此種種，只要沒瞎眼，一樣沒轍，有待解決，怎好意思標榜「成功」呢！更不用說「完全成功」之暈暈乎乎、「徹底勝利」之昏昏昭昭了。

其二，若說所謂成功只是立足當時語境，局部性、階段性地恪盡其責，將此長程轉型

的時段性使命付諸自家的有限實踐，做一點算一點，走一程是一程，於不同場次上台扮演了「歷史的工具」的角色，則上述諸役，各盡其責，皆有其功，而連環相扣，通達於今，並且，尚需引向未來。至於角色演得好壞，是否唯妙唯肖，則又另當別論。但是，置身轉型壯劇之中，它們和他們都在該登場時就登場了，也都全副身心進入角色了，恬恬然、怡然地入戲了，而歌哭隨心，起伏有形，無一不是時代的壯舉和壯劇也，無一莫非生命的禮贊和精神之燦爛如花也。有的悲劇氣氛濃郁一些，淚流滔滔，傷心着呢；有的喜劇色彩絢爛一些，歡笑連連，高興得很。但是，無論如何，它們都是煌煌歷史之正劇也，我華族全體同胞浴血奮鬥之正史也！

前說之謬，在於只見局部和短程，未見全體和長程。中國近代的民族國家建構和新型政治的建設進程，還是已故唐德剛教授的說法較為允當，也更為切近史實。在唐先生看來，整個中國的長程革命，於「歷史三峽」當中，那一百多年，上述諸役都可說勝利了，也都可說成功了。不過，它們都是一種「局部性的勝利」和「階段性的成功」。換言之，它們各以自己的階段性功德，疊加累積，造成了一個百年綿延的創制「新中國」的歷史進程。若非前後相接，添磚加瓦，哪有今天？倘若一役畢其功，豈只非歷史，直若反歷史，若非操切急躁，就是痴人說夢。抑或，自己騙自己，更騙同胞也。橫空出世式的創世神

話，多半是假的，這一百多年裏，東方西方，早已教訓多多嘛！其實，不僅是我浩浩華夏，晚近諸邦，自地中海文明而大西洋文明，而太平洋文明，不管英吉利長還是美利堅短，也不論德意志凶蠻抑或法蘭西狂飆，雖說聞道有先後，術業各專攻，但尚無一族一邦，輕易轉身，一跳就跳進「現代秩序」的，一生就生下個「富強文明」的安琪兒的。漫漫轉型路上，東洋西洋，南方北方，還不都是流汗又流淚，流血復流亡，一不小心，玩砸了，還流產呢！

由是觀之，朋友，什麼他們都失敗了，只有我們才成功了，話不能這樣說嘛！否則，無異把無數先烈的鮮血等同於泔水了，更無視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層累地遞進、於接續中翻轉的演生過程這一確鑿事實了。歷史在前，不僅是先前，也是眼面前，那麼，做人做到這個份上，就沒啥意思了。其實，老輩兒的共產黨人還是有心胸的，到底是創業維艱，知深知淺。這不，《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列數先賢大德，自孔夫子而孫中山，悉奉「志士仁人」，展現了大歷史視野，也展現了磊落的襟懷也！

是啊，如果說「新中國」或者「現代中國」的確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也就是一百多年的轉型歷史念茲在茲的奮鬥方向，那麼，這一「新中國」，這一「現代中國」，啟自洋務運動，中經清末變法修律和辛亥硝煙，接續以「人民共和國」，到今天還依然人在途中，有待收束！「復興」抑或「崛起」，迄而至今，都是一個進行時態，而非完成時態。

為什麼這樣說呢？此間的歷史脈絡究竟是如何鋪展的呢？

前文以「近代的民族國家建構和新型政治的建設進程」統束這一長程跋涉，未曾具體點明的是，它是一個「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的四位一體，最後烘雲托月、雲蒸霞蔚的，是那個叫做「現代中國」的物件兒。「新中國」之新，「現代中國」之為現代，就在於它是一種現代秩序，不僅意味着以國民國家取代王朝政制，而且其以富強為指向，求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作為新型政道和治道，並提供億萬萬國民以存身家邦，也是億萬萬公民得以託庇的政治共同體，而恰恰蔚為一種家國天下。以此標舉，則前揭一切革命、流血和奮鬥，都在為此添磚加瓦，一方面固然以自己的階段性努力載記於史，另一方面，非前後接續、長程跋涉不足以成就大業。

說到「前後接續」，則歷史弔詭，超出人類想像，也是這個長程跋涉裏最為觸目而驚心的章節。君不見，鎮壓百日維新的劊子手恰恰是繼承維新政治遺產而啟動清末變法的改革者；埋葬滿清王朝代之而起的民國政體沿用的倒是變法修律的法律遺產，接收的是大清王朝的浩瀚疆域；一如踵繼而上的人民共和國，接收了遠自洋務、近到「四大家族」的工商業基礎，再接再厲，變本加厲，這才有後來兀自矜誇的「兩彈一星」嘛！也才能這翻番、那倍增嘛！

在此視野下，清末變法實為一種「改革開放」，而為後來更為徹底的更張改制預張聲勢。「一九一一」接續而來，為「新中國」搭建了一個大架子，蔚為民族國家建構歷程的起步，也是民主共和這一新型政體的試煉。它將先前半個世紀的轉型努力以「民國」概為收束，同時，並開啟了後續奮鬥的大框架。當其時，憲法有了，中央政府有了，幾個什麼院都有了；看那國民軍隊的繽紛軍服，採擷中西，而終究不中不西，卻也煞是堂堂皇皇呢！至此，立國立憲，開了個頭，可說「形制初備」嘛！老大中華一轉身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雖說根基未穩、牙牙學語，但你能說它是「失敗」或者「徹底失敗」嗎？歷史進程轉而再轉，「一九四九」來了，往另一方向用力，於摧折社會的同時將國家建構的方方面面再予坐實，單就規模和力度而言，也不容易。至於此前的洋務運動，是「歷史三峽」中的第

一波「改革開放」，至少，為近代中國奠定了民族工商業的基礎，蔚為百多年來的一「古今中西時代」的開端。北洋水師雖敗猶榮，就在於儘管一戰而敗，但現代中國的海軍就此起步。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紀念中國海軍的創生，這才是起點，則中國之擁有現代水師，早逾百齡矣。

由此順流而下，清末變法重拾戊戌維新的方案，走的是更為細密化的戊戌的理路，下啟北洋與民國的政制，如前所述，構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二波改革開放」。這一時段，前後三十來年，大開大合，翻天覆地，席天幕地，蔚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樞紐期」呢！此後的各種方案，各家套路，左衝右突，終未能超出其願景和框架，也終究無法迴避其理想和訴求。毋寧，拾取其中一脈一系，發揮之，光大之，愈趨極致而已哉！轉眼，磕磕碰碰，「一九七八」的改革方案，說到底，還不就是回歸「樞紐期」，以向後靠攏來往前邁步嗎！這就像「一九九二」，以南方之空間爭取重啟改革之時間，是在「一九八九」的基礎上之再出發也。「前後接續」，於此又演出了一幕。歷史之弔詭與悲辛，盡皆在此，不待人謀矣！之所以「向後靠攏」，是因為這「後」就是「前」，其之普世性關懷與理想型願景，當時無法兌現，而今終究要兌現，最終必須要兌現，因而，壓抑不住，遂再度現身而獻身矣。

因此，統而言之，面對超逾一個半世紀的轉型歷程，我們只能說這是一場接力賽，

起點是清末的鴉片之戰，中經民國，包括北洋，再到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其序幕，早在乾隆爺不見卻終究撞見馬戛爾尼之際，就已登場了。論過程，它是上述四位一體的大業；論終點，則是下文將要說到的「富強、民主與文明」三位一體的「現代中國」了。這是一個兩百年的轉型嘛，見不及此，瞎嚷嚷什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走過了西方國家兩百年的道路」云云，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不待人笑，先已自笑了吧！事到如今，轉型方向和理路愈益顯豁，就看是否能夠完成臨門一腳了。如果最後臨門一腳精當有力，嘩啦啦，轟隆隆，則整個轉型完工，「現代中國」最終下線，那才叫做個「終於勝利了！」也才能欣然然之「終於成功了！」那時節，「忽報人間曾伏虎」，才真的「長使英雄淚沾襟」呢！

三

回頭一望，自地中海文明以還，歐羅巴不期然間進入列國體制，一頓折騰，幾番風雨，在自身豹變的同時，導致全球秩序劇變，造成一個以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為軸心

的一波新型文明浪潮，所謂的「現代秩序」者也。其中，自現代早期開始，以民族國家領銜現代秩序，蔚為綱領，遂成要務。期間，若從荷蘭、英國開始，推演至亞非諸邦，最近幾百年，尤其是最近一百五十年中，國家建構中概有三大願景，缺一不可。

一是「富強」。國家強盛，民眾腰包裏有票子花，是大家讓渡部分自由立國的契約論理由，否則不做無用功。百姓於此自有算計，遵循的是大眾選擇路徑。此於國家建構立論，說明了「為何要有國家」，要求和倡揚的是民族主義，高尚點兒的衍生效應當然包括愛國主義，由此而有公民之「愛國」與國民之「愛祖國」之雙元向心力。以富強為導向和願景，意味着天下熙攘均為利益往來，國民財富的最大化成為國家的宗教，由此延展開來的列國體制下的全球秩序，禍福相倚矣！多少甜蜜與苦難，衷心憧憬的和平與總是無情爆發的戰爭，都和它扯不斷關係呢！其情其景，真所謂「怕黃昏忽地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

二是「民主」。事關內政建設，直接決定着「富強」之後的分配正義和交易正義，攸關小民百姓能否活得像個人樣，人口眾多之後是否人煙鼎盛，而非如梁漱溟先生感慨之「人口眾多，人煙稀少」。它所解決的是神聖權威和獨斷論正義解體之後，人間秩序的正當性問題，將統治和政治的微妙，鋪排於大眾民主的世俗主義政制安排。其中，優良政體堪

當樞機，落實的是自由主義的內政訴求，兌現的是人民共和的家國願景，昭示大家「國家應當為何」。如果說富強旨在提供鈔票，則民主還要給大家選票。有鈔票，又有選票，兩手都硬，這日子就過得舒心多了。統治的正當性和政府的合法性立基於「兩票」之上，危乎殆哉，從而引出了下述有關文明的話題，於補充中支應之。

三是「文明」。這是關於文化命脈的敘說，不僅聲索「國家應當為何」，而且，直指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一個有關此在當下通絕超越意義的整體性文明品質。若無對於生命的終極關懷和終極想像，缺乏有關人生意義的道義願景，則富強和民主的功利算計愈甚，人生或許反更苦不堪言，物質的高度豐盈卻導致文明自身的朽壞。畢竟，終究而言，經濟繁榮、國家建構和內政的民主化，表象殊異，最後均非落實到文明層面不可。而文明的勁道、力度與善意，其之充盈自我拯救努力和生命意識之煌煌泱泱，反過來就體現在營造理想國家與構建愜意內政的俗世能力上了。「兩票」均有，而文明質素不敢恭維，更了無文明氣象，那就實在對不住票子們了，可能也保不住票子們了。因此，不僅國家本身應當成為涵育文明成長的最佳基本單元和有效促進機制，而且，同時意味着國家是也必須是一種文明共同體，以激發與涵養美德，進而促進公民的德性，增益國民的教養，涵育良善心性，豐富和提撕人生意義作為自己的天職。古往今來，偉大的國族無一不是提挈人類認識

未知世界、發掘普世價值的引擎，從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導性與文化領導力。

凡此三項，缺一不可，構成了晚近民族國家建構和世界歷史的基本脈絡。通常所說的「國家理性」，不止於此，但要義在此，而分別對應了「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憲政國家—憲法政治」與「文明國家—文化政治」在現代秩序中的遞次推展。但凡成功國族，無一不是順此理路，丁一卯二，三位一體，慢慢熬出來的。「國家理性」之為一種建構性因素，含蘊着理想和道義，這才使得我們棲身的冷冰冰的邦國，有可能是一個「家國天下」的溫暖處所。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優良政體。否則，要這個叫做國家的壓迫機器幹嗎？

四

前文說「最後臨門一腳」，內涵不少，尤指優良政體也，因為在百年轉型的大視野觀察，刻下最需完工的就是這一項，現代中國文明政治秩序建構譜系中緊缺的也是這一項。因而，刻下造成政治緊張、大家念茲在茲的，更是這一項。能否於這場百年轉型的「接力賽」中最終締造優良政體，展現中華民族營造自家政治秩序的眼界、心胸和能力，才是考

驗這個泱泱族群生存智慧的大是大非呢，也是刻下政體面臨的最為險峻而必須攀越之崑崙山水也！無此一役，則前此接力賽跑都可謂白費功夫了。而此後能否保住其脈絡，守住其果實，亦成疑問矣！畢竟，置此全球化戰國時代，生存意味着又總是意味着實力的比拼。優良政體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大的實力，真正的第一生產力也！

置此情形下，如果歷史願景僅指「富強」，卻不得不伺候一個強大而專橫的政府，我們可能寧願只要一個「弱國家」。但是，問題在於，討論任何事情都不能離開「初始條件」。換言之，「日居月諸，照臨下土」，這是先驗於、先天於我們的存在本身。今天我們在「中國」立論，則「中國」的歷史、體量和勢能，特別是它的泱泱文化傳統蘊涵，其中多數尚未獲得有效啟明性的重新梳理和闡釋，使得它的現代建構進程一定得包括上述三項指標，而缺一不可。「弱國家」的結果，在世界聯為一體卻又「政治止於水邊」的今天，不僅可能導致邦國之分崩離析，而且，更主要的是，必定「挨打」，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國民之境遇可想而知。所以，靜心一想，才發現內有「宿命」也，由不得選擇，也無所選擇，只能就初始條件談方案，想點子，求出路，彷彿這就叫「大有大的難處」。不若那小邦，和平年景，「閒居外物，靜言樂幽」，看風過池塘。一個文化傳統蘊涵浩瀚、歷史悠遠綿長的大國，無法將安寧小邦的幸福當作夢境。而此即為宿命，可能，也就是華夏之天

命也。就拿前述「富強」來講，中國要麼是個富強之國，要麼只能淪落為任人宰割的病夫之邦；蠅營狗苟，只想當「老二」，病殃殃的，一定當不穩，因為你這般體量和勢能，誰相信你只甘於此。因而，這才引申出有關「大國的成長」一類的想入非非，連篇累牘矣！進而，「文明帝國」也好，「中國時刻的世界秩序」也罷，浮想聯翩，神馳八極，說的不過就是這麼回事。

生當此邦，經史相續，善繼善述，惟危惟微，其幸耶？其不幸耶？同樣還是一個宿命，難能道斷！

不過，要是上述行文中的「弱國家」其實意指「弱政府」，或者，「小政府」，則意義立變，而人心寧不逆轉乎！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新春試筆，二月十一日改定於故河道傍

註釋

* 本章原載於《財經》2013年第8期。

第七章

依然逃不脫「古今中西」的糾纏

前幾天參加清華大學史天健教授追思會，臨其境，緬其人，憶其事。史教授其實尚未來校工作，但已落實了工作關係，年後就來，卻不幸因小恙而殞大命，也是長期超負荷折騰，有以然哉。

當時，一個感受油然而生。我們這一代人，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出生，現在五十歲到六十歲這一批，已然開始排隊進入隕落列車了。而就我們的思考來看，如同上一代及其父兄輩一樣，將近一百年的時光裏，大家均跳不出「古今中西」這個魔咒。這一百多年，「古今之變」源自「中西之變」，造成一大變局，三千年未之有也。迄而至今，中國的一切，不論是政治設置、文化反思，還是制度實踐、民生運作，乃至當下「維穩」、「保八」、「倍增」一類的致思取向，均跳不出「古今中西」四個字。真所謂禍福憂樂，唯此為大矣！

凡此三代人，以及更上一代人，還將包括今天在座的年輕一輩，都將依然在此四字的拉扯、糾葛和撕裂之中，在相互的對話和反駁的緊張之中，急急惶惶，踉踉蹌蹌，找尋自己的理論邏輯，找尋種種思想方案，進而找尋安頓吾國吾族吾身吾心於這方水土的實踐邏

輯。梳理歷史邏輯的案上勞作，旨在釐清生活的法子，而為當下的雙腳尋找一方踏實的土。除非你用腳投票，一走了之，抑或你「身在曹營心在漢」，一切惟老美馬首是瞻，否則，你將依然身陷這四字之中，直到中國近代轉型完成，「現代中國」水落石出，「中國問題」冰消雪化那一天。

由是觀之，歐洲的境遇，英美的幸運，以及日本的機動，進而論及中國必須找到一個審慎中道、貼切中國發展條件的在境性理論方案、思想方案和政治方案等等，衷心以為，議題既好，心意更好。「好」就好在持論背景開闊，而立意切近己身；既尊重已有的思想前提和現實的初始條件，又不忘於開放性的視野中放飛想像的翅膀。說到底，我們今天依然是在「古今中西」這一「現代早期」的建構中來談論中國的法律，梳理中國的法律思想，構想中國的政治體制。凡此一切，既逃不脫「古今中西」，又必須切近落實為當下中國的具體措置，以求過渡，進求轉圜。換言之，當下中國的任何具體措置，眼前看着大，也確實都是犖犖大端，但也不過就是「古今中西」這一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一環節一分子，則大而小，小而大，遠近宏微，端看語境了。

聽完各位發言後，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旨在「釐清場景」也。

把範圍縮小，僅就漢語法政學思而言，今日中國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轉向。這個轉向啟動於最近幾年，似乎正在展現出自己的思想力量，拓展了一個新的場域。其間，諸見雜陳，頗見力度。最近，陳端洪教授和高全喜教授的兩篇重要論文可為代表。一篇是端洪的〈人民既不在場也不缺席〉，另一篇是全喜教授關於「人民也會腐敗墮落」的論述。就最近三十年間漢語法律學思而言，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還，伴隨着中西文化討論的重啟和深化，九十年代初期展開的人文關懷討論，影響深廣，使得有心腸的法學家們基本上是在歷史文化尋根的意義上來建構漢語法意，重構中國法律思想的制度敘述體系。此一脈絡，延綿將近二十年，直到晚近幾年間情形丕變。就是說，在知識結構上，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社會理論大量進入法律哲學，法哲學研究的政治哲學化，所謂的「法政一體」，以及社會理論和道德哲學思考的同時進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法學家、漢語法學從業者的思考維度，重塑了他們對於知識產出的品種及其品質的追求。張龔和王旭發言中所用的話語，與我們這撥五十歲上下的學術從業者差別不算太大，基本上還能聽懂，但對六十多歲以上的人，是不是還能聽懂，是否具有溝通和理解的可能性，就不一定了，正為此種轉向的語

詞例證也。

由此可以看出，「法政一體」式的致思進路，其所動用的理論資源，已然從往昔的歷史尋繹和文化追問，旨在期期於理論正當性建構，過渡到今天以對政治正當性的追問為問題意識這一重大轉型。將它們引入法學思考，不僅拓展和深化了漢語法意，而且表明了思考者的時代情境變了，八十年代經由文化追尋和歷史維度的引入來建構自己的理論正當性的努力，已然告一段落了。相反，以「法政哲學」一言以蔽之的致思進路，以此統合中國當下的法律政治思考的時段，則悄然到來，可能不會「不帶走一片雲彩」，並且在未來很長時間裏，它都將是一個重要的理論方法、研究進路和省思視角。直至「中國問題」之一「提煉優良政體」任務基本完成，方始衰微，而交棒於公共政策者流，再圖新招。那時節，或許，什麼「語言學轉向」一類的把戲就要登場了。

這是今天靜坐聆聽的第二個感受，重在突出「問題意識」也。

三

職是之故，在此情形下，幾位談的什麼「現代性」，恐怕就不只是站在自我文化立場對於一種有關現代人世生活，包括法律生活所涉及的所謂「理性的自我立法」之反思，而且，是包括在現實條件下，你對這種反思本身之反思，而於重新回答中開啟思想的航船。恰恰在此維度，不肯定是張龔還是王旭說的，現代性的時間觀與價值觀必將浮出水面。我想，有關「現代性的時間觀和價值觀」是一個開放的話語，你可以盡情發揮；超越中國文化層面，在一般層面立論，必然涉及此在性、此世性等等。比方說，當下性的、線性的時間觀，功利主義以追求此在為價值考量的歸宿等等。凡此種種，固然皆為題中應有之義，但其間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所謂的「世俗化」和「世俗性」，這是現代性自西徂東所造成的一個重要後果，又或實際是推動它的一個重要前因，並且是主宰我們今天人世生活的一個不可逃避的趨勢。朋友，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放逐了神靈，也放逐了倫理本位的世俗人世也。因此，今天談論中國語境下法律的現代性、政治安排的現代性等等，所有這些，倘若缺了世俗化這一維度，不能對世俗化之如何降臨大地、並且在中國當下做出了何種表達這些問題做出了自己的理論回應的話，那麼，在下以為，一般意義上關於現代性的泛泛而

論，恐無意義。

比方說，世俗化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人間性」，自此一切政法措置的半徑皆以邦國榮辱、人生得失為圓心打轉，「利害算計」成為此在人事的中心所在。今天口傳心誦的「法律不外人情」，情之纖微之至亦即理之至高至玄，而亦當為法之連綴縫合之功云云，初看起來，一方面旨在回應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興起的歷史追問和文化追問，回應了「五四」以來基於歷史情懷的關於法的意義追問，而彷彿意味着某種「傳統的回歸」，實則不寧唯是，而更有深意存焉。它不在別處，就在近代以還普世浩浩之世俗化運動所造成的法律的「人間性」品格，而有以然哉。對此深長思之，歷經五代人，方始得出此一思想善果，恰相證明了反思之反思的辨證流程。在此背景下，重申「法律不外人情」，看來是在重述老命題，實際上老命題重獲反思的理論背景和思想資源已然不一樣了！如此這般，將現代性維度及其時間和價值觀引入討論，開端既好，則工作坊之前景亦當可觀，應可指望矣。

這是我想說的第三點，蓋求「突出重點」也。

四

最後，就西方語境下的「西馬」和當下中國的「新左派」，略微致意。從譜系來看，西方語境下，自當年「老馬」，即馬恩一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往下，經歷了「正馬」、「西馬」、「新馬」到「後馬」、「殘馬」的流轉過程。「正馬」，自詡正統的馬派，包括兩部分：一以考茨基、列寧、史太林、托洛斯基為代表；二以東方的中、越等為典型形態。「西馬」，又稱為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於一九二〇年代興起於中歐（德、匈）與南部（意、法），秉持青年馬克思所受的黑格爾哲學，着力於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生存目的、追求自由與解放，以及歷史辯證法等等。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西馬」尤其泛濫於西歐，與英美的新左派、南斯拉夫的實踐學派互通聲氣，都強調歷史、社會實踐和文化批判。「新馬」則興盛於一九七〇年代以後，英美澳加、南美、日印和北非等地，同時出現激進思潮，活學活用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重予分析和抨擊，導致整個歐美學術和文化界裹挾其中，更摻雜着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現象學、語言哲學等諸般思緒，生態保護、女性主義和少數族群覺醒、中心與邊緣的世界體系一干話語，亦且投懷送抱。「後馬」翻騰於一九八〇年代以還，戴卓爾夫人和列根主政英美，奉行新保守主義

的政經政策，阻遏了新馬的流行。此刻，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興起，排斥馬克思式的「大敘述」。哈貝馬斯、布迪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攻訐歷史進化論，強調反思，分析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使得馬克思主義無主體（無共產黨和普羅大眾）、去中心（不再以普羅大眾的社會運動為中心）、失目標（不再強調全體人類的徹底解放，僅追求當下弱勢群體的團結奮鬥）。當下世界，尚有若干信奉馬列的，可謂「殘馬」。其間情形，在下講課時曾做過一首打油，自以為道盡其態：「難兄難弟，中越古韓。勉力撐持，日見其難。寰球鶴立，山高水寒。與其孤單，趁早撤攤」。

由此可以看出，從第一代到現在的第六代，有一件東西很重要，引自我昨天閱讀的余英時先生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話，頗具啟示。余先生大意指謂，當一切基本制度安排已然落定，人世走上正軌之後，出現的便是「社會常態」。此時此刻，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的諸般變種左派，他們的反抗、呼號，他們的批判、解析，他們的話語和行動，可能並無「建設性」，卻激發良知，啟示新銳，有助於呈現「常態社會」的常態化和平庸化所遮蔽而為我們習焉不察的種種事物。在揭櫫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空間之際，它們至少解放了我們的想像空間，而思想和理論所需要的，也是思想者最恐丟失的，就是這種想像力了。就此而言，今天的工作坊以及引入現代性概念的諸般勞作，至少有助於我們放開歷史的視野，敞

開理論的心扉，而重塑一種新型人世生活的可能性。

不過，置身轉型時段，倘若一國基本制度還在發育成長進程之中，或者尚未落定，大架子還沒搭起來便否定一切，反抗一切，動不動就質疑，則非惟無助於轉型之遞次水落石出，恰恰相反，倒可能意味着專制的開始。舉例而言，諸如「後民族主義結構」等「後」什麼什麼這一套思考，如果說對於煥發「老歐洲」的活力，對於建設「新歐洲」以免現代性基本完成之後，遽現平庸化、常態化之悶局，阻遏思想的停滯，還多少有所幫助的話，那麼，其於中國的當下思考，雖則暫時也算是打開了一下窗口，但意義不會很大。畢竟，「現代中國」初現人世，但轉型尚未臻達水落石出之境，尚需承接前思，啟迪後學，以圖邁步，恪盡其功也。

說到這裏，不禁想起上個月讀柏林(Isaiah Berlin)〈歐洲的分裂與統一〉一文時的感受。在這篇文章中，柏林講歐洲的「分裂與統一」，其實說的是歐洲思想的「分裂與統一」，所以「統一」首先是理念的統一，而「分裂」同樣首先是思想的分裂。所以，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實際均為思想狂飆突進的時代潮流之下，浪漫歷史主義、浪漫政治主義和理性中道的經驗主義之爭。思想路線之爭導致了政治路線之爭，最後以軍事上的對抗來決一勝負。¹ 讀畢掩卷，腦海裏蹦出了這樣幾個概念，也算是「民族性研究」，叫

做「一度僵化停滯的中國民族，野蠻莽撞的俄羅斯民族，未經馴化的日耳曼德意志民族，奸詐市儈的不列顛民族，虛榮而浮華的法蘭西民族，然後還有天真自大的美利堅民族」，噫嘻，尚饗！

總而言之，中國未來的法制也好，普天之下人世生活的安排也罷；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政治成熟也好，思想的想像力和政治的想像力也罷——所有這一切，置此「古今中西」時代，設若達致理想狀態，首先總得避免上述六種情形。所謂理想狀態，指標甚眾，但中道平和與審慎理性，既有文明理想和道德願景，又有求真務實的經驗現實勁道；既有家國認同，又有普世主義。凡此種種，總是不可或缺者也。中國文明要是於此各方斟酌有度，採擷有方，並強毅力行，那時節，當然是一派好風光了。

君且試言，君且拭目，看風水輪流轉吧！

二〇一二年九月至十一月整理於舊河道傍

猶記得會議當日，在下因為名醫判決在世尚有三五年，乃輾轉求醫，一早依約趕赴醫院，不料恰遇高爵通行，車阻醫院隔街，整整一個半小時。中心焦急如焚，而長街靜滯，空蕩無人，留待大人先行。交警全副武裝，萬眾止步，萬口啞聲。待至車隊呼嘯而去，趕至醫院，已經中午十二點，幸虧醫家未走，千恩萬謝。過後到人大開會，早已疲憊不堪，竭力撐持，尚幸捱到底。判處死刑之軀，十五日後接受手術，從此無膽少肝。轉眼一年有半多矣，我們依然還在「古今中西」之中，而且，未來三五年，乃至於三五十年，恐怕還將在此時段矣。噫嘻！尚饗！

註釋

* 本文是2011年1月15日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律現代性工作坊」的發言整理而成。

1 以賽亞·柏林，呂秀坤譯：〈歐洲的分裂與統一〉載《扭曲的人性之維》（江蘇：譯林出版社，2009）。

輯二 政治秩序

第八章

政治秩序與良善生活

經濟持續增長、收入大幅提升、生活條件續有改善，特別是個人行動自由度大幅拓展，在養育身體、增益生計、愉悅心靈之際，卻反而讓人頓感生活意義迷惘、生命價值飄忽，乃至於惶惶然，手足無措，構成了此刻中國人生的一大現象，也是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大問題。而收入分配不公，國族整合面臨嚴峻挑戰，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需要既有政體提供新型正當性說明的迫切性日甚一日，凡此種種，從另外一面說明「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的創生尚且人在途中，有待接續努力。其正面意義在於，人心終有向善和向上的永恆潛力，非浮華和享樂所能遮掩，擋不住對於那個叫做「人生意義」的生命本原的宿命追求；其所透露的負面信息就是，當下中國文化尚未提供或者尚未足以提供此種「人生意義」，以致於俗世囂囂，億萬心靈漂浮。雖說這一時代的基本特徵就是八面來風、價值多元，本不可能締結一種鐵板一塊式的心靈景象，但核心理念和主流價值砥柱中流，卻是大型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撐性因素。故爾，反過來，上述林林總總在將生活、生命和人生的本相抖擻殆盡的同時，更進一步可能提示當下的就是，人生本不過如此，生命就是一個焦慮的過程，因而，於此肉身享樂延綿和精神高拔超邁兩端打轉，左右為難，實為常態，無需大驚小怪，更不用驚惶失措。

不論如何，反思財富的公平分配，籌謀社會正義如何實現，牽涉到我們每一個人如何過好生活，什麼樣的生活才是理想人生等重大問題。在此，拓展開來，它牽扯到政體與文明的關聯，需要對於生活世界、規範世界和意義世界概予通盤思量，將當下生計和道義寄託善予曲連溝通。如果說人類天然是政治的物種，那麼，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必然關涉優良政體。換言之，經由營建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來護衛良善生活，服務良善生活，終究可能造就一種良善生活，遂成一大問題。

本文就此切入，夾敘夾議，旨在說明政治秩序是理想的良善生活的制度保障，追問何種政治秩序得為可欲、理想而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最後導向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略法理解釋。

一、理想的人世生活不外是良善生活

如何過好生活？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值得擁有的理想人生？我們能夠擁有何種生活和何種人生？凡此問題，伴隨着個體人生而來，也是整個人類的永恆苦惱所在，不因富足而化解，也不因所謂文明的成長而消散，而是這就是文明本身。舉目四望，不說別的，單就過

往三四百年而言，人世煩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蔓延全球，財富極大豐富，超邁千年，全球化旗幟下人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是，生活的意義和生命價值這類問題，不是消隱了，相反，卻更加彰顯，甚至，更加緊張了。

由是觀之，若要達臻理想生活，固然指標多多。別的不說，首先，溫飽、富足、無凍餒之虞，蔚為起碼的指標。其次，安全和安全感，人身和財產非因社會失範而可能隨時遭遇飛來橫禍，也用不着夜半敲門而膽戰心驚，就像往昔蘇聯黑色幽默所狀述的，同樣是起碼的指標。再次，還比方說，快意。我活在這個世界上，輾轉於這個社會裏，除了溫飽以外，除了感到安全以外，還覺得十分愜意，比較愉悅，朦朧然甚至還有點主體感，無需整日為自己的尊嚴可能遭受羞辱而擔憂。此雖屬溫飽之後的「高端」要求，卻不能說是過分的指標。最後，進而言之，我可能會就有關社會和全體公民和平共處的公共事務，大是大非，渴望有所指陳，期盼參與的機會。總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可能都會構成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的指標，而成為美好人世與愜意人生這幅應然畫卷中的一抹濃墨重彩。

當今中國，普天之下，朋友，芸芸眾生追求的這一活法，世世代代渴求的此間人世生活，那男女老少孜孜夢想的這一人間秩序，包括上述指標，但不止於此，不是別的，一言以蔽之，不妨稱之為「良善生活」。

換言之，在獲得基本溫飽之後，多數人，甚至相當多數人，不再為自己的安全擔憂之後，我們在對這個國家未來的發展和此刻的進步感到歡欣，並且融入到這樣一個滾滾洪流之中的同時，關於人世生活的意義、平常過日子的愉悅感覺、社會氛圍的融洽、彼此相處的尊重等等，這樣一些指標和考量，均不可或缺。此時此刻，衷心嚮往而孜孜以求的，其實，正不外是一種「良善生活」，而這應當是這種「良善生活」。不在大富大貴，不在尊榮顯要，更不要太過以競爭作為一種人生價值，而在踏實、安祥、愉悅和幸福，活得有意義，自尊，互敬。

如所周知，晚近一個半世紀裏，中國一直身處轉型過渡的歷史時段，至今未能出脫。宏闊轉型，整體變革，秦漢以降，兩千年一遇，所要塑育落地而生死以恃的，一言以蔽之，非「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莫屬。在此大框架內，不管我們追求的是法治國家與民主社會，還是市場經濟與個體自由，抑或父權式大包大攬的政制與分配製供給，雖人心各異，指向多端，義項紛繁，但有一條卻跑不掉，也去不了，而且，蔚為根本，就是這個理想社會一定是一個良善、愜意的人間居所。其為可欲，其堪居住，說一千道一萬，還不就是這樣一種「良善生活」嗎！

二、政治秩序是良善生活的前提

那麼，如何才能享有良善生活呢？剛才繞着它講了若干指標，比方說全民溫飽乃至於小康，人身和財產獲享基本安全，不用為夜半敲門而膽戰心驚，以及法制與參與等等。然而，去末歸本，擘肌分理，則如前所述，既然人類群居，和平共處最為重要。而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講述的是一個叫做政治的故事。政治非他，旨在建構主權，提供秩序，分清敵我，劃分公私，而一以決斷來彰顯。職是之故，如何形成一套確保和平共處的政治體制，一種有效拱衛人世基本秩序的政體，堪稱命脈。實際上，當今中國，追根究源，思前想後，大家念茲在茲的，甚至倍感苦惱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建構優良政體，進而，藉由優良政體所鋪排的政治秩序來營建偉大社會，保障良善生活。

在此，不妨說，政治秩序是良善生活的前提。政治秩序缺失，則群居頓成混戰，弱肉強食，民不聊生，還談什麼安全與安寧，還怎麼過日子。政治秩序窳敗，不公不義橫行，綱紀崩馳之際人心思變，沒法過日子，更不用說好過日子與過好日子了。在此，可得首先陳說的是，有政治秩序比失敗國家和失範政治要好，然後才是追求良好的政治秩序。優良政體是政制的極致，也是政治的鵠的。否則，就前者來看，「失敗國家」堪為樣本。就後者

而言，「失範社會」正為其例。因此，不僅是政治和政治秩序，而且，是優良政治及其政治秩序構成了良善生活的基本保障。

由此牽扯到「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在此，政治領域是公共領域的核心，沒有超出公共領域的政治領域。它們共存於國家，而使得國家成為最大的公共機構，也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和政治領域。晚近以還，正是從宮廷政治和秘密政治中蛻身而來，將自己進境為一項公共事業，理想的政治兌現了自己乃眾人之事這一承諾，成為全體參與者橫向聯合、彼此承認的紐帶。經由政治，國民和國民才凝聚成為人民，一種政治存在和政治力量。它們和他們一統於這個叫做國家的法政屋頂之下，恍兮煌兮。反過來不妨說，沒有政治和政治領域，從而建構起合意的政治秩序，便沒有真正的公民，更無人民的存身之所。那同樣具體化為億萬肉身的形形色色的個體，叫「老百姓」，或者，「人民群眾」，一盤散沙。散沙一盤，是無法確保享有良善生活的。

綜觀世界，一個有意思的情形是，似乎當今歐美世界的公共領域日趨衰落，取而代之的呆板的技術官僚式的日常管理和「毫無意義的媒體景觀」。其中，政黨立場趨同，使得政治爭論成為一場營銷秀，以致於選民對於政治興味索然。凡此種種，給人造成了一種「公共領域衰落」的印象。與此相反，當下中國，尚無成形公共領域與參與式政治，但人

民的參與願望和參與熱情高漲，對於通過公共活動而建構公共領域的必要性，日感迫切。呼喚以人民作為主體的「政治登場」，遂成時代最強音。究其緣由，還是大家感到非得經由政治和政治秩序來保障良善生活不可。的確，政治這一觀念意味着對於命運的必然性的抗爭和挑戰，表示基於個體性的當下存在對於有關自己的一切全都早已被安排篤定這一觀念不服，真心不服。我這一個體因而在表達不服、進行抗爭中獲得了個體性，世界因這個體性而獲得了世界性。世界承載於億萬個體，千差萬別的個體性構成和彰顯了廓然燦爛、大度無疆的世界性。所謂良善生活，就在於體認並承認這一個體性和世界性，前提則是承認和賦予個體以政治意義。換言之，政治和政治秩序是經由此種個體的參與介入後才存在的，因而，政治秩序成為他們獲享良善生活的前提。

也就因此，如果這個社會是一個正派社會，如果這個社會給我們每一個人，像你我這樣的芸芸眾生，靠工薪吃飯的勞動者，提供了能夠過上一種良善生活的平等起點的話，那麼我們要問，作為管理這個社會的公共權力，作為這個社會掌管分配正義、校正正義的治理機構，特別是其中的政府行為和公民的互動所形成的關係（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政治關係），以及基於這種政治關係所達成的政治建制（我們把它叫做政治秩序），它們能夠做什麼？應當做什麼？以及在中國的今天它們尚未做的，而我們要逼迫它、催促它一定要做的？我由此牽扯到如何認識政治、政治活動和政治秩序這三大概念。

三、政治、政治行為與政治秩序

在此，我需對上述「政治」、「政治行為」或者「政治活動」，以及「政治秩序」三項，略予分疏，細予辨析。一個基本看法是，但凡人類社會，只要脫離了自然狀態而進入文明狀態，就一定存在政治行為或者政治活動。發動政治行為，從事政治活動，是文明狀態中人類這一物種的建構性因素。遍觀寰宇，君不見，不管歐亞，無論東西，當今之世，任何國家和地區，前民主時期也好後現代社會也罷，它們悉為政治共同體，既是政治活動的場域和舞台，亦恃政治活動來網羅組織。無此政治活動或者政治行為，則其無法運轉，也難以存身。放遠眼界，則君臣內鬥和宮闈政變，例屬政治行為；太子立廢和帝后區隔，涉關王權穩固，同樣是一種政治行為。另一邊廂，舊日國共內鬥以及共產黨的「十次路線鬥爭」，鬥個你死我活，今天大家齊聚一堂學習「三個代表」，研討「先進性」，則此「學習」「研討」，也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活動（在下無黨無派，沒有資格「學習」「研討」，所以單位黨員組織就此徵求意見，乃以「不像話，一個禮拜才學一次，那怎麼夠呢？起碼一天學一次，一天學五個小時，然後再寫八千字的讀書筆記」作答）。此外，大家知道，每天央視晚間「新聞聯播」上演的，人物連番登場，場景次第轉換，握手、視察、講話、

親切關懷、諄諄訓誡、頻頻舉杯，這些雖屬日常行政，但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以日常行政活動所表達的政治行為。政治和行政的劃分，樞機在建制，而具體人物的日常生活動，究其意蘊、目的和形態而言，則常常二合一也。

不過，在現代政治意義上，即便它們都被稱為政治行為、政治活動，也不等於此刻中國就存在「政治」。我們知道，如果政治指的是與經濟、文化、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概指政治人物基於特定政治目的，圍繞着公共權力或者社會管理而從事的活動，那從三皇五帝至如今，從英國的光榮革命以及更早的羅馬下迄於今，則無時無刻無處不無政治。但是，我們今天要說，在「一七八九」之後所謂的現代性這一維度之下，以「政治」修辭為名實，則它們又難當「政治」。為什麼？因為政治既是一個與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相對應而提出來的概念，同時，政治一定是平等主體基於自我利益和共同體的共同福祉，以政治權力為核心，圍繞它的產生、分配、運作，以及它所追求的公共目標而展開的公民行動，一定具有主體間性。特別是它以公開競爭的方式解決權源懸念，予政治以公開參與、和平競爭與理性辯駁的可能性。如此這般，才算是政治。

換言之，建立主權、提供秩序、分清敵我和劃分公私，構成了政治的本質，而悉均圍繞着權力打轉，展現為決斷。在此，平等主體即「我們公民」，其之基於政治平等地位，

旨在約束這個政權，為使這個政權更好地為「我們公民」而非僅僅是為權力自身服務；為了讓這個公共權力致力於共同體的福祉，而不僅僅是為了一黨一派的利益來活動；為了讓這個政權盡心盡責於這個社會長遠福祉和整體利益、社會的良善這類目標，而非僅謀個人、宗族、家族或者黨派的私利。此時此際，我想，才能說這是政治，這個國家存在政治，而非只是宮闈權力爭鬥。在「權勢國家—權力政治」這一現代國家初級版本中，此或為政治；在現代國家升級版本的「憲政國家—憲法政治」語境中，卻斷難稱為政治也。

說到這裏，我想跟諸位分享這樣一個故事。去年（二〇〇八年）回顧總結「三十年改革開放」時，曾有人喟言，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沒有全心全意於經濟建設，亦無像樣的學術活動，有的只是政治，天天搞運動。換言之，天天搞政治。最近三十年裏，政治逐漸退場，「告別革命」，一心一意於經濟發展，市場繁榮，學術進步，思想活躍，云云。讀者諸君可以看出，此處所謂政治，指謂一種俗常意義上的政治活動，大家平日說討厭政治，其實討厭的就是這類政治活動，而非政治本身。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召開「三中全會」為止，這三十年裏，的的確確，舉國天天都在「搞運動」，幾乎人人都生活在一種政治運動的氛圍中間。然而我並不認為那就叫政治，那就意味着存在政治，反倒可以說那個時候有政治運動、政治活動、政治行為等等，但卻不存在政治。是的，恰

恰不存在政治。因為那時不存在你我之間（公民之間）的平等地位，因為那時一切以階級關係，即所謂剝削階級、反動階級、五類分子與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革命群眾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態為界來標定和分化人民，而不存在普天之下基於憲法的規定而標誌的「你和我」、「你們和我們」這種平權主體意義上的互動關係，值此情形下，怎麼能說存在政治呢？區分敵我固為政治的本質，但是，其將敵我關係等同於人際之間的唯一關係，將此劃分推向極端，意味着取消了個體性及其所締造的世界性，適在取消政治，恰恰是反政治。還有，當時的這種政治活動、政治行為，是在政黨主導下，或者說林彪、「四人幫」主導下（最後把責任都推給他們）的一種「運動」，這個「運動」是為了（比如說）「搶班奪權」，或者「捍衛」什麼什麼東西。值此情形下，不是說我們為了讓公共權力更好地圍繞着全民福祉和國家利益打轉，不是為了我們這個共同體的全體利益，以及基於分權制衡原則上的組織流程來運作，怎麼能叫政治呢？只能說，它是政治運動、政治行為、政治活動。說到底，一切基於敵我關係立論，彷彿印證了政治的本質就在於區分敵我這一施密特式命題，但是，究其實質，其將這一有關例外狀態和非常時刻的命題日常化，而用之於日常政治，無邊無涯，就已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折不扣，恰恰抽空了政治，將政治放逐，反政治。

在此，「公民」這一概念本身即已昭示，公民之間基於彼此合意關係，即你願意我願意，便可行使一種權力，此即「團結的權力」，或者叫做「橫向聯合的權力」。換言之，我和李先生、劉先生二老（三味書屋的兩位主人），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有權基於雙方平等主體聯合的意願，團結起來，搗鼓一個協會，成立一個什麼研究會，甚至於成立一個政黨。此時此刻，我們基於協會、研究會或者政黨的立場，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參與公共事務，而圍繞着公共權力的產生、組織、運作和活動，遞次展開相應活動。如此這般，才能說這叫政治。否則，僅僅作為「參政」「議政」的一個傀儡，在那個大堂裏天天舉手，喊口號、贊成、擁護、同意、一萬個高興，這叫什麼？這叫雖有政治活動，但不等於存在政治。相反，等於是將政治放逐，恰恰於消解政治中反政治。

大家知道，政黨是為了權力而存在的，天然為權力而生，為權力而戰，為權力而死。奪權，進而，於掌權中受託運作權力，施行自家的政策，是政黨的天命所在。什麼權力？政府的權力，一種主權之下的治權。主民在民，故爾以儀式化的選舉來彰顯，而政府的權力例屬主權之下的治權，由政黨輪流執政。這是晚近兩百年來發源於西方，卻已不期然間蔚為普世通則的現代政治。在此情形下，如果一個政黨不以奪取政權為核心目標，以掌權作為自家的奮鬥宗旨，相反，卻只滿足於「議政」，那麼，它要麼不是真正的政黨，不是

一個真正的公民政治聯合意義上的社團，要麼別有所圖，苟延殘喘。好比說一個男人（或者女人），雅不願完成自己的性別角色社會化，而僅僅處於一種幼稚狀態，然後說「我很傻很天真」，此時此刻，只能說「你這個人實在白活一輩子了」是同一個道理。

當我們講政治和政治行為的時候，其間存在着一個重大區別。政治是主體平等的公民之間，基於橫向聯合的權力，為了參與到政治進程中間，甚至於為了獲掌公共權力、直接運作公共權力而進行的活動。這才叫做政治。否則，只能是普通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或者一般的行政行為而已。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即基於政治的政治秩序，其之建構、運作和維護，需予正面應對。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即便不僅存有政治行為，甚至政治本身，但也不等於它就已然建構起自家的政治秩序。此類例證多有，史不鮮見。比如，在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尤其是十多年前的東歐轉型國家，它們擺脫了舊日的一黨專制之後向現代立憲民主政體過渡，旨在實現政治民主化。此時此刻，不妨說它們既有政治行為，也有政治本身。但是，可惜的是，十多年前，包括波蘭、匈牙利諸國，以及俄羅斯，雖然已有民主政黨，也有政黨彼此之間的角逐和競選，換言之，存在政治，但是社會秩序一度紊亂，財富分配不公，兩極分化，黑幫橫行，更不用說權力與資本勾兌，狼狽為奸，乃至於形成了如同我們今天在中國

所看到的這樣一種「資本託庇，權力尋租」結構。此時此際，大家遺憾地發現，即便其有政治行為，有政治，但是好像不存在我們所嚮往的那個應然景象，即「政治秩序」。

這是怎麼回事呢？轉型時段，牽連古今，因素眾多，這裏不遑細說。只想提請讀者諸君注意的是，針對於此，很多人可能會說，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在一個大一統的政府的全權管控之下，社會安定，市民安居，某種情形下甚至會出現所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動人景象。同時，雖然大家收入都不高，但看似平均主義的體制下，彼此並無攀比，反而活得安穩。沒有盼頭，也就不會滋生想頭，從而打消任何念頭。今天大學生臨近畢業，小兒女，四處求職，踏破鐵鞋，聽說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大學畢業居然政府「統一分配工作」，無需自家求職，彷彿多所憧憬，好像希望奔回三十年前去。但是，轉念一想，三十年前的分配體制根本無視你的個人意志或者其他的主體性要求，徹底將你當作一顆螺絲釘，「黨叫幹啥就幹啥」，自家唯一的選擇是「服從分配」。這樣一想，那個時代其實並非可欲的時代。然而，即便如此，又好像相對來說，一切似乎並無此刻這般張皇失措，或者「沒有這麼亂」，沒有這種失落感與無能為力感。其實，此處與其以政制和政治為解，不如以「天助自助」的生生大化洪流中的「自由偏是重負」一言以蔽之。

但是，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說那時節存在「政治秩序」呢？

朋友，那時節當然存在「秩序」，而且，是鐵一般的「秩序」，奠立於浴血建構、強毅力行的「政制」或者「政治秩序」，卻不存在政治，故爾，也不存在什麼「政治秩序」。政治秩序一定是我們感到比較滿足、同意、認可的社會狀態與人世生活，其奠立於政治之上，表現為政治行為或者政治活動，而達成一個時代與社會的合意政治狀態。這裏，關鍵是「政制秩序」與「政治秩序」並非一回事，需要兩相區分。任何人類群居的文明狀態都意味着存在政制和政制秩序，其為群居的基本底子，一日不可或缺，否則便是所謂亂世。但是，只有合意的政制所達成的政治，才可能締造政治秩序，或者，導向政治秩序。當然，此於在下本文定義語境中立論，若在一般發展政治學暢論，並非不能說存在政治秩序。事實上，它真的是一種政治的秩序呢！

至此，把話題收回來總結一下。當今中國，我們感到世道不公，我們覺得這個社會出了點兒問題，我們甚至覺得官商勾結、權錢勾兌的這種「商業共產主義」，或者「共產資本主義」，並非我們所追求的、期期於最後實現的良善生活，因而，需要我們拷問，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否存在、究竟該如何改良政治、政治行為和政治秩序。至此可以說的是，中國今天存在政治行為，卻似乎並不存在政治本身；中國今天存在秩序，甚至還是比較好的政制秩序，即便小偷多了，即便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多了，即便在新疆邊陲地帶民族

關係出現了緊張，但是相較於那個動亂的年月，那個亂世，我們也很樂意地承認，這是一個相對而言有序的社會，基本政制和政制秩序運行有效。然而，我依然要指出，它不存在我們所渴望的政治秩序。真正基於公民平等主體人格，基於公民橫向聯合與團結的權力，去追求社會共善，去參與到國家權力的產生、組織、運作之進程中去，從而追求合意的結果，這樣一種意義上的政治和政治秩序，的確確，尚付闕如。因此，保衛社會，建設政治，建構合意的政治秩序，是今天中國繞不開的話題。不管是位尊九五，還是如你我這一班靠工薪來討生活的芸芸眾生，要想過上良善生活，終究繞不開政治和政治秩序這一關。

四、有效統治及其控制

值此情形下，本節和下一節將就政治秩序談四點看法，探討如何獲得合意的政治秩序，從而如何獲得理想的良善生活。

建構有效統治

鑒於百多年來，中國一直處於新舊遞嬗的轉型時段，因而，實現有效統治過去是亦依然是當務之急。在下以為，此於今日中國，尤具現實意義。我說「有效統治」，尤其是一「統治」一詞，可能立馬心生反感，或者以功利主義政治觀乃至於馬基雅維利主義相詬病，至多允以為「現實主義政治觀」。然而我要說，「有效統治」這個詞實際上講的是國家理性與政治理性意義上的有效治理或者說管理、調控這意思，恰屬政治之「提供秩序」這一本義，也是一般行政的用意，而為日用起居所不可或缺者也。此刻的中國，時值「第三波改革開放」的最後收尾階段，有效統治不可或缺，更是自不待言。以有效統治作為基本的底子，一步一步，走向那個轉型的終點，完成這場已然持續兩百年的大業，是中華民族和「我們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意其義，均在於此。

大家知道，一八四〇至今（二〇〇九年），將近一百七十年，中國近代史目睹了總共三波改革開放。「第一波改革開放」起自一八六〇年，終於一八九五年，耗時三十五年，以洋務運動為旗幟，革故更新，自救自強。中國不僅在器物層面上向西方為代表的現代世界敞開大門，引入西方的造船軍械等技術，而且，引入流程管理、工藝管理等社會技術層面

的規範，並留意其政法人文之維。「第二波改革開放」啟自一九〇二清末的變法修律運動，到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戰爭爆發為止，同樣是三十五年，全盤引入西方的法政人文，包括憲政體制，在立憲民主、代議體制和現代司法等各方面，全面向大西洋文明主導下的現代世界體系頷首致意。在下有一個私見，覺得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七年這二十五年，是中國一百七十年近代歷史中最為青黃不接，卻又最為輝煌的時段。蓋此刻天塌地陷，而改天換地、鋪天蓋地，是一個向二千年舊帝制、舊文物告別，席天幕地般全面鋪展開來建設新制度、新文物的時代。「第三波改革開放」，大家都知道，起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三中全會」，一直延續至今。

綜觀歷史，超逾一個半世紀，這三波改革開放體現的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也是中國近代政治的主流歷史意識。在此一百七十年的歷史接力賽中，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共產黨政府，分別擔當了第一賽手、第二賽手、第三賽手和第四賽手的接力職責。追本溯源，剖肌析理，一百七十年大的轉型至今可謂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換言之，「第三波改革開放」到了最後臨門一腳的時刻。在此，最為重大的事件，也是最為深刻的變革，就是民主政治可能正在敲門，或者，正在用腳急急踢門。直面歷史進程，理性面對民意，不再把一般民意呵斥為「一小撮壞人，利用不明真相的群眾」云云，一旦具備這個視

野，改這個口風以後，對此就會坦然而釋然。可能，正因為此，所謂的「民意」彷彿開始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或者，民意迫使肉食者不得不正視它，不再公然將它做妖魔化處理。一旦民意鼎沸，包括網絡民意在內，迫使當政者不再把它做妖魔化處理之際，可能，也就是民主政治用腳踢門而「芝麻芝麻開門吧」的時候了。換言之，「提煉優良政體」意義上的民主政治的到來，就是臨門一腳的事了。所謂建構有效統治，不僅是在此轉型進程中立論，而且，更為主要的是，為了朝向此一改制方向轉型而設論。

可能有人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個人有這種確信。因為，經由比較，我感覺一九八七年的台灣和二〇〇九年的大陸很是相像。此刻不遑細說究竟為何秉有這一印象與確信，我想把話題收回來說的是，此時此刻，有效的秩序管控，依然是中國最後完成政治民主化，實現社會文化歷史轉型必不可缺的基本條件。如果說所有的政治與政治秩序均旨在提供一種公共產品，包括秩序乃至於良善秩序在內的話，那麼，我覺得今天以「有效統治」來揭櫫政治秩序的第一層面，就是旨在助力於建設政治，從而，形成一種和平過渡的轉型態勢。畢竟，和平轉型是最優選項，一切均應圍繞着這一選項下工夫才是。此為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諸位如果對我這句話還有疑問的話，在下不妨列舉一些此刻發生於中國大地上的種

種失序和無序狀態來予以說明。比如，前幾天中石化的陳同海貪污一點九億判死緩。諸位大概還記得，不到一年前，廣東的農民工保安，二十四歲青年許霆，按了一百二十多次的ATM機，偷了十七萬，被判無期徒刑。後經學界、媒體和民間呼籲，司法體制啟動糾錯機制，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諸位想一想，在當今中國社會，如果說政府代表軀幹，知識分子代表良心的話，那麼，司法系統應該代表這個身體的免疫系統。可就是在这片中國大地上，一個二十四歲的農民工，偷竊十七萬遭判無期，相較於貪污一點九個億只判死緩，兩案發生在同一年，司法結果卻有霄壤之別，說明我們的免疫系統出了毛病。一旦免疫系統出了毛病，上至最高法院副院長幾個月前落網，下到基層司法機構與當事人、律師乃至於黑社會的勾兌，已然成為普遍現象，那麼，諸位不難想像，這個社會已然失控、失序。凡此失控、失序不是因為良民百姓造反，而是官員本身不按一統體制的指令行事，或者，體制本身釀就了此間的機遇和際遇。諸位想一想，如果說得嚴重一點或者「蠱惑人心」一點，這是什麼景象？這是一「王朝末日」的景象。可是，我們知道，此刻中國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啊，的確是近代中國史上發展最好的一個時期呀！此時此刻，居然出現這種現象，怎能不讓人深思。所以說，它不是「王朝末日」，不過恰恰說明政治秩序尚未建構完成，沒有到位，所以才出現這種失控現象，自反面說明「有效統治」的必要性與可欲性。

如果諸位再想一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所謂央地關係，最近幾年來出現的緊張，包括「政令不出中南海」，包括宏觀調控也好，控制信貸也好，防止耕地流失也好，凡此種種「中央政策」在地方並沒有獲得相應正面配合。與此相對，地方基於自主性、特殊需要，迫切出台的改革措施，也受制於中央僵化的體制而得不到有效落實。凡此齟齬，雖屬正常，但卻說明在央地關係這樣一個過去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曾經討論過的問題上，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失控或失範。大量部級官員落網僅為冰山一角。我個人猜想，就像市面上流行的「段子」裏所講的，那種民粹主義口吻所講的，「隔一個槍斃，有漏網之魚，可是全槍斃又會冤枉好人」。凡此情形說明了什麼呢？用官方語言表達，叫做「組織幹部隊伍出現了問題」；在此刻的語境中，正不妨說這個社會的政治秩序尚未搭建成功，一種基於優良政體的政治秩序沒有到位，有以然哉。

因此，無論是維持基本的生計，還是指向良善生活，政治秩序作為政治的基本公共產品，不可或缺。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義是要實現有效統治。托克維爾論述美國民主時的那句著名論斷，為後來亨廷頓引用以講述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均旨在說明首先要有政治秩序，無論它是何種政治秩序，哪怕是極權政制和政治秩序，也總是優於無序。所謂「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

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然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¹ 在此基礎之上，再尋求立基於優良政體的政治和政治秩序。老右派的話，雖然可能會讓一些人聽着不舒服，但實在是實際而通達的辟論。

迫使統治者被統治

如果說政治和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義在於建立有效統治的話，那麼，緊接着的第二要義，也是確保第一要義不致淪為純粹壓迫的同義詞，就是「迫使統治者被統治」。換言之，要使管制這個國家的集團和權力，接受被它管制的這些個人和這個社會反過來進行控制、進行統治。因此，政治秩序的第二要義，就是要「對有效統治進行有效控制」，限制政府或者迫使政府控制自身，形成有效的統治與人民制約這一統治之兩相平衡，進而造成自由和以自由立國這樣一個主題之間的良性互動。此為今日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可能也是今後若干年裏中國政治最需用力之處。其實，它不是別的，就是「讓守法者同時成為立法者」這一康德式政治願景。

諸位知道，在今天的中國，一方面，公權力並沒有像「文革」時期那樣深入到每一個

角落，畢竟，市場化造就了某些並非政治所能全然控制的機會。另一方面，公權力的肆無忌憚又是晃蕩在眼前的現實。不管是鄉鎮一級的公共權力還是城市的街道辦，更不用說公安或者城管又或是作為「最純潔」的部門——大學的行政權力，我們眼睜睜看着它們墮落，都說明權力在對這個國家和社會進行管控的同時，社會對它失去了管控的制約力量。因此，迫使公權力控制自身，從而對有效統治本身進行有效控制，遂成政治秩序的第二層要義，也是建構真正有效而優良的政治和政治秩序的必要條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今天中國處在最困難的時段。茲舉一小例。清華大學東側不遠，就是五道口，交通繁忙，十幾年來似乎一直是市區最堵的一個道口。值此情形，清華大學也好，北大也好，所在的社區也好，都有若干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有若干縣市兩級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按照一般常態，身為該選區的選民，「我們」有權力也有義務給代表或者委員打電話，請他們聯繫城管，聯繫市政，聯繫公安，看能不能採取措施，將此地交通改善一下，「他們」則必須作答，有所動作。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求告無門，連「他們」在哪，或者，「他們」是誰，什麼電話和聯繫方式，都一頭霧水。而且，好像「他們」也沒有接聽訴願的義務。即便「他們」接了這個電話，真的去找人，人家理睬他嗎？你這個花瓶擺設，還真敢來管事了？輕則敷衍了事，重則不嫌他「多管閒事」才怪呢！

值此情形下，我們身為選民、身為納稅人，與我們所服務的、所養活的公共權力之間，失去了聯繫的管道。甚或本來就不存在什麼聯繫管道，只能乾着急，瞎操心，再不然訴諸「公眾抱怨」。網民沸議，一呼百應，此為原因之一。可能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建議，你可以向報社投稿啊，可以給黨政部門寫信啊。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泥牛入海無消息，一去不復返嗎？無此代議管道，失聯，雖有代表卻無代表性。中國社會最近幾年來遂出現了一個重大的事態，即將私人利益，得不到保護的、正當的或者不一定正當的私人利益「問題化」。所謂「問題化」，就是說把它變成一個問題，一個愈大愈好的問題。愈大愈引發關注，就愈容易獲得解決。所以，一些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其實是基於這一思路橫空出世的。它再度提出了「我們公民」，千千萬萬的百姓，如何對於有效統治和統治集團，直接或者通過其代表而實現有效控制的問題，如何實現權力的授予者和接受委託的當政者之間建立起真正有效互動的問題。這是今天中國正要完成，尚未完成，但是必須完成的一個政治秩序的建設進程。一日不完成，這個社會沒有安全感；一日不完全，政權合法性危機一日不解決，就只能天天相互提防，大家都過不好日子。

五、政治的制度化與開放性

接續上節的話題，欲使上述兩條得以兌現，則本節下述兩點必不可少。一個是技術性的，一個是價值性的。

政治的制度化

先就技術性的一面來看。根據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發展理論，大家知道，政治意味着從政治行為進境為政治活動，從政治活動拓展為政治運動等一系列過程，然後經久歷練，大浪淘沙，再蛻變為政治制度，蔚為形制。既然它是一個系列的過程，那麼，即便就是在轉型社會，也是急不得，慢不得。經此過程，建規立制，定型為程序，然後政治才會獲得制度化的肉身，演變為一般政治生活的流程和習俗，成為一種政治文化。

有人可能會說，今天中國有很多制度啊！是的，可我們還知道，所謂制度並非等於制訂了規章規範，然後發佈出來就叫制度。真正的制度不僅形諸規範系統，還要表見為操作系統，尤其是在規範系統和操作系統之外要有一個監督系統，而這個監督系統甚至有權力

撤銷規範和規範系統，有權讓操作系統服務於、服從於監督系統。

今日中國所面臨的一大窘況就是「政治制度的匱乏」，或者說新型政治的制度化匱乏，尤其是監督系統缺位，使得規範系統、操作系統和監督系統未能整合一體，於自身的現實化中實現政治。此非今日獨有，實為百年轉型建設新政治進程中一直面臨的問題。所謂「新政治」，不外「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所囊括的政制與政治文化。在此體系語境中，我們知道，如果欲行有效監督，則非要外部力量不可。如同兩支球隊比賽，施行監督的首先是裁判，然後是巡邊員，然後是周遭的觀眾。好比我們要對李先生、劉先生這個書店的物價實行監督，除了物價、稅務和工商部門以外，可能我們慕名來此的購買者也是監督者。然而，不管怎樣，我們不可能指望李先生監督劉先生，劉先生監督李先生——他們都是利益關聯者，一個統一的內部利益共同體，怎麼可能實行有效監督呢！因此，值此情形下，若要發揮監督系統的作用，首先必須確保其為操作系統外部的力量。換言之，我們今天看到的紀檢、檢察部門，概莫自家人監督自家人。一定要有外人，外人是誰？獨立媒體；外人是誰？沒有執政權力，可是時時刻刻都想奪取權力的那個公民團結聯合組成的組織，叫在野黨；一定要有外人，這個外人是誰？千千萬萬拿工資後扣下一部分，這部分叫稅，也就是保護費，交納之後看仔細了，你是不是給我保護好了。在此，獨立媒體也好，

納稅人也好，都是分散力量，不一定能發揮多大作用。誰最具備恪達使命的勢能？組織起來的，具有統一行動系統，為了一個目標，於步調一致秉持高度行動力，此一團體，不是別的，就是通常所說的在野黨、反對黨。正是在此，英國政治給世界晚近政治的一個最大啟示，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一定要容忍一個「國王的忠誠的反對者」。這些反對者即在野的政治力量，它對於此刻的政權天天惦記着，天天嚮往着，恨不得天天找你的漏洞，然後把你推翻然後他上來，則其如同牛虻，才是最有力量的監督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的制度化，千頭萬緒，千門萬戶，從哪一條路走起呢？有人可能說強化黨內監督力量；有人可能說將檢察制度和什麼什麼制度結合起來；也有人可能會說發揮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作用。我覺得這些都是皮毛，都是障眼法，不着邊際。最為有效的措置還是要使政治制度化，此為建設政治和政治秩序的不二法門。其間，容忍外部監督，蔚為法寶。而外部監督的最為根本、最為核心的一條就是，允許存在一個合法的反對者，所謂「國王的忠誠的反對者」。他們不會真的為你好，卻整體上有益於國家和民眾；他們不會真的愛護你，卻為了自保，多半不敢公然禍害國家和民眾。要相信這樣的力量存在，才能使得政治制度化。這是從技術層面來講的。

政治的開放性

從價值層面來講，今天格外需要強調一個概念，即「政治的開放性」。換言之，政治是眾人之事，億萬公民是政治的主體，享有進入政治議程、參與政治博弈、表達政治意願的權能。而政治圍繞着公共權力的產生、組織和運作展開，則公民及其組織化生存同樣藉此展開，利用權利而指向權力的授受、對於權力運作的監督以及對於自家權利的伸張。如此，則宮闈政治、秘密政治和私性政治，反公開，反政治，均為背道而馳者。

茲舉一例來說明。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沒有在讀的大學生，或者最近幾年畢業的大學生。諸位可能都有這樣的經歷，到黨政機構求職，中共黨員身份是前提條件。否則，即無求職資格。在校生入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百，在我看來，不是源於信仰，許多時候，其實源於求職，一個飯碗問題。

諸位，這裏出現了一個我們習而不察但卻觸目驚心的事情。這個國家號稱人民的國家，人民當家作主，而所有的大學生都是人民的子孫，是國家的未來，不管他是不是黨員，是不是團員，只要他是這個國家的建設者，這個制度下的守法者，一個滿腔熱忱的青年，他都有資格來申請這一份工作。至於他適不適合這項工作，最後會不會獲得這個崗

位，那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他有這個資格。此於普天之下所有男人和女人都
有資格成為父親母親，並無二致。你不能一開始就宣布你不能做父親你不能做母親，因為
你不是什麼什麼成員。

此為現象，背後潛含政治的開放與封閉這一大是大非。本來，成功的國家，即便一黨
專門治理，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也要把門開一點，此為「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政府治港，
從來不曾予香港任何民主。一百五十五年裏，殖民當局說一不二，哪裏把治下的人民當作
平等的主體。隨着港人受教育程度提升，本地精英茁壯成長，不僅滿懷參政願望，更希望
直接管理香港，造福鄉梓。但是，政治之門緊閉，沒法通過民主渠道進入體制。怎麼辦？
港英當局「猴子掀門簾」，露一小手，把門略開一個口子，容許本地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
進入管理階層，充任公務員，然後委以行政之中消解其對於政治的衝動，化解其經由民主
進入政治議程的必要性。今天大家都知道，這叫「行政吸納政治」。比諸刻下中國，不存
在什麼反對黨，正像我們不奢望明天早晨起來中國就是世界頭號強國一樣，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兩三代人的奮鬥。但是為了社會穩定，為了全體中國人尤其
是年輕的一代人看到希望，值此情形下，不妨先將行政的大門打開，讓年輕人，不論他或
者她是何種政治身份，只要是守法公民，受過合格教育，都有權力申請「公務員」這種崗

位。否則，行政大門緊閉之際，等於將政治的大門關閉，則森嚴壁壘，儼然區隔，反無益於「吸納」也。換言之，這無異於將這些本願進入體制，為你打拼、為你效力、為你流汗、為你做牛做馬的這一批熱血合格青年排斥在外，從而間接直接培養了一個心存怨恨的群體。對於一個聰明的政權何政府來說，自然不會算不過來這筆帳。

職是之故，最低限度的政治開放性，用憲法上的一個常用表述就是，任何人——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與公民，不分膚色、種族、性別、年齡、民族以及政治面貌——均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有權參與政治進程。其次，政治的開放性意味着政權及誰來掌握政權、運作政權，是向全社會、全民開放的。換言之，如果有人不服，說「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我們幾個人搞一個團體，也要來管這個國家，而且我確信我管的一定比你好」，朋友，他們有權試一試，讓他們也有這麼一個機會。這是政治開放的較高層次，大度而自信。

大家知道，除了剛才所講的這兩種進入政權、開放政治的辦法之外，還有些技術層面要考慮。比方說，立憲民主政體有個通例，為各國所仿效，就是議會開會或者辯論，電視直播，公民有權現場旁聽。如果今天我們在這裏開會，那邊設立幾個旁聽席，大家拿出身份證安安靜靜的走過去旁聽，這是在受教育，也是在行使監督權。我們既不想讓你傷筋動骨，也不會希望立馬出現戲劇性變更，但是可不可以把你們開會討論問題的過程，以允

許公民旁聽，允許電視直播的方式來開放一下？這也是政治開放的技術要素。可是我們知道，現在不行，「國家機密」啊，云云。其實，政府運作是有機密的，議會開會則一般無機密可言。你不能說政府密商發展還是不發展航空母艦，而你偏要去聽，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每個人內心都有一種衝動，即一定要把秘密講出去才有快感，保密和洩密，都有隱秘的衝動和快感。所以，情形常常是，如果你想把什麼事情泄露出去，最好千叮嚀萬囑咐「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啊！」一轉身，他或者她，完全有可能告訴別人，然後再重複一句「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啊！」此為人類心理，也是人類的弱點，沒辦法。

再說一遍，政府是有秘密的，一定有，並且要求保密。但是議會之議事，在中國即政協和人大開會，應該說沒有秘密可言。為什麼？討論預案和決算，討論五年發展規劃或者一年發展規劃，討論各種法案，這些東西是什麼？是你我共同過日子的家常，關乎普天之下的中國人安排生計，牽連着普天之下的中國公民的油鹽柴米，有什麼秘密可言呢？大政方針全不過在於安頓家常，政協人大這些袞袞諸公原不過是安排家常的打工仔，商量的就是我們過日子的家常，有什麼秘密可言！在此，一定要有這種觀念，即沒有秘密可言，應當開放。這也是技術層面的政治開放的應有含義。

由此轉進一層，思想市場意義層面的開放，亦為題中應有之義。大家一定都會想到，

我們這樣的國家應該根據何種思想來治理？在此，一個基本的理念是，中國人不管是官員，還是我們普通的百姓，我選擇何種信仰，我們基於什麼樣的政治理念來生活，這些同樣例屬應當開放的領域。換言之，你練這個功，他練那個功，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你不到天安門廣場殺人放火，你不強迫別人去練），你儘管去練。如果你練了以後走火入魔，打雞血，那是你個人的事情，我們可以叫「二」來幫助你就是了。這是意義層面、思想層面上的政治的開放性。

以治安對付政治

由此涉及到兩個派生的問題，即「以治安對付政治」與「政治的情色化」。先說「以政治對付政治」。大家知道，最近十來年，中國出現了一個現象，叫「群體性事件」。上個月湖北石首，數萬人集會不散，動用了幾萬警力才把他們驅散。再往前，大家知道，貴州瓮安曾有數萬人包圍縣政府，把門窗玻璃都給砸了，煞是令人驚詫。去年一年，這樣的事件差不多十萬起，有的是因為徵地拆遷，有的是因為冤獄上訪，有的是因為對行政權力不公不義表達憤慨。總之，幾十人、幾百人，甚至數萬人，聚集於街巷，墮突乎市井，燃

燒激情，表達訴求，通常情況下是和平地表達訴求，在中國的今天，把它叫做「群體性事件」。

考諸官方的對策，基本上是這樣幾種。一是叫做「把矛盾消滅於萌芽狀態」。可是，諸位，既然已經成為事件，說明「萌芽」已經長出來了，它就不再叫做「萌芽」，這個時候無萌芽可消滅。第二種對策是首先將事件定性為「一小撮壞人利用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一方面將這些遭到蒙蔽的「群眾」等於「群氓」，全無主體性可言，另一方面要揪出幕後黑手，兩手抓。這種做法現在愈來愈少，我估計很快不敢也不會再用了，因為它睜着眼睛說瞎話，只會激起民憤。第三種與第二種相關，其基本指導思想是武力彈壓。我們知道，今天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這一思路也逐步遭到拋棄，除非你「打砸搶」。第四種對策是「花錢買平安」。你不是說拆遷補償不夠嗎？我們給你錢，你別鬧，此為「花錢買平安」；對案件判決有異義？要自焚？好，我們給你改判，同樣還是「花錢買平安」。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現代社會公民基於政治參與衝動和權利意識，其以不特定多數人為形式，基於共同利益，向政府公共權力「討個說法」的群體活動，一種基於良心的公民自我組織化形式，沒被當成政治和政治行為，而被當成了社會治安事件。此種思路及其對策不是別的，正不外乎「以治安對付政治」。

本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行政，更不是治安，就好比治安事件不等於刑事犯罪。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我們看到一個年輕人整天苦悶，茶飯不思，日漸消瘦。你如果認為他或者她人生目的灰暗，人生觀錯位，於是帶他或者她去讀什麼《三毛流浪記》，讀阿城啊，讀用下半身寫作的東西啊。朋友，這不管用；抑或帶他或者她去學《毛選》，樹立「科學發展觀」，即更不濟事。為什麼？因為他與她正處在青春期的性苦悶之中，在此情形下，你要讓他或者她做什麼呢？哎呀，「你去找個女／男朋友吧！」或者，勸導他與她：花季年月，荷爾蒙發作，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這是你的權利，善加利用吧。可能，此時此刻，他與她才會眉頭舒展，心情舒暢，感覺到人間溫暖，乃至於覺得「偉大的祖國呀，你是人間樂園！生活在這個時代是多麼的幸福啊！」云云。又比方說，你要求農民工兄弟必須「五講四美三熱愛」，不要隨地吐痰。可是，諸位，建築工地或者築路工地上不隨地吐痰到哪裏去吐痰呢？

凡此種種，都沒有對症下藥。今日中國，日新又新，轉型到了關鍵時段，冒出這麼多的「群體性事件」，不奇怪。其實，它們多數是一種維權政治，還有一些基於政治參與願望與民主政治熱情，反映了社會和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民間社會要求進入政治進程的強烈願望。值此情形下，倘若依然將它當作治安事件，奢望花錢買平安，或者，一味依恃

警力干預，抑或，通過黨政幹部親臨現場溝通來平息事態，而不去追究事情的根本原因，只能救水火於一時，而不能長治久安。因此，將治安與政治分疏，使政治展現出開放性善意，用政治來對付政治，才是建立政治秩序，從而建設良善生活的重要政制前提。

政治的情色化

在這個意義上，不妨用一個詞來批評今天中國關於政治問題的一種現象，姑且謂「政治的情色化」。其為譬喻，意指由於政治尚未開放，困居宮闈密室，神秘兮兮，引誘得人們愈發想去一探究竟，欲罷難休；由於政治不開放，導致參與熱情受阻，心情壓抑，遂轉化為其他衝突，甚至於犯罪，而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個體排遣情色誘惑的辦法；由於政治不開放，一部分人壟斷公共權力，大部分人無法進入政治博弈場域，模擬性地道盡了有權有勢的男性對於情色的壟斷，既為傳統中的家常便飯，也是資源壟斷的傳統手法。凡此種種，旨在狀述當下中國有關政治的封閉性和非開放性，其之現象、表現與做法，一言以蔽之，在反諷、形象化和比喻的意義上，姑且稱謂「政治的情色化」。此情此景，差矣！此意此境，不詳！

六、政治以公共福祉為目的，承載道德承諾

上述關於政治秩序與良善生活的論述表明，建設良善生活，除了開政治參與、政治的制度化、開放性以及對於統治本身的有效控制之外，還有兩個指標不可或缺。一個指標是讓政治與政治活動致力於公共福祉，第二個指標是要讓政治與政治活動承載道德承諾。

政治致力於公共福祉

先說政治以致力於公共福祉為目的這一問題。從功能上來講，一國的政府行政運作，換言之，政府行為、政府活動，作為政治和政治活動的行政表達，以致力於公共福祉為通達政治秩序的橋樑，進而逐步抵近良善生活之境。

由此牽扯到現代國家治理的兩個核心問題。一是財政支出的大部分要向民生傾斜。諸位知道，迄而至今，中國的大部分財政收入用於政府開支，開度於政府日常運作的自我循環。中國人均養活的公務員數量，據說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具體數字大家可以查考）。要讓民生開支佔據政府財政開支的首要地位，方可在制度上迫使政治與政治活動致力於公共

福祉。由此，需要建設現代公共財政制度，通過人大的預算和決算，掐緊政府的錢袋子。

二是要對社會弱勢群體，包括殘疾人、低收入者、單親家庭、偏遠地區、農民兄弟、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城市的低保戶、離退休職工等這些階層和人員，給予更多的分配傾斜。在此，如何實現向他們的傾斜、姑且以城市水價為例來做個比較。現在有一種說法，實際上在中國的多數大中城市裏早已就是現實，那就是居民用水都在漲價，沒漲的也在醞釀漲價。為什麼如此急吼吼地漲價？第一，水是寶貴的資源，漲價提高單位用水成本，可以有效防止浪費；第二，高收入人群跟低收入人群的水價一樣，如果前者每天用水十噸，意味着其實享受了更多的福利。而一個窮人一個禮拜不過耗水一噸，意味着他並未享受到低水價的好處。因此，在供水一方看來，漲價勢在必行。可是，我們知道，對於一個年收入五十萬元以上的人來說，你一噸水漲個五毛錢、一塊錢，並不能降低他的消費慾望，於其開支不過九牛一毛。然而，對於一個月收入不過一兩千塊錢的北京市民來說，一噸水漲五毛錢可不是個小事。值此情形下，實際上依然是高收入者在享受低水價的福利，而低收入者並沒有享到提價以後帶來的實惠，反而可能因為漲價而壓抑消費。在此，是否可以根據收入水準實行階梯水價分別收取水費？以及，實行季節差價和不同行業的階梯水價呢？比如，對於洗浴城收取的水價高於普通居民，對於工業用水和餐飲業用水的水價高於普通

市民家庭。像一般市民家庭，比方說低保戶、月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群，予以繳納低水價或者免收水費的待遇。可不可以這樣？雖然這具體措置牽扯多端，麻煩多多，但試舉此例是想說明，現代治理就是麻煩，不避麻煩而切近時需，才能真正體現公共權力以造福公民福祉為目標這一政制功能，從而於彰顯一種政治美德之際，爭取政治的正當性。

是的，有人可能會說麻煩。諸位，現代治理本身就意味着麻煩，但凡摒棄蠻力政治，以造福公共福祉為目標施政，一定意味着麻煩。國家及其政府覺得麻煩而放棄應允作為，例屬瀆職、失職、缺位、不作為，等於在合法性與正當性兩翼，自毀長城。好比長期以來對於城市小販，採取「一趕二禁三沒收」的政策，全然不曾慮及「小販」之於市民生活和城市生態的必要性。可不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包括像巴黎這樣的大都會學習，利用某些城市街道街區，比方說天安門廣場，雙休日，規定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自由擺攤？可不可以讓我們美院的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給大家畫像？一張像幾塊錢幾十塊錢，遊人享受到中國頂級美術學院的學生服務，價廉物美，而為生活添采。可不可以容忍耍雜耍的，雙休日到天安門廣場給大家玩玩魔術、拉琴唱歌？可不可以，比方說，有的人家裏主婦能做一手好菜，甚至會製作特製的蛋糕點心，允許她星期六的早晨，提着一籃子蛋糕，上面蓋一塊紅布，然後打扮梳洗一番，推着小車到自家門口的街道，參加市集，三五塊錢十來塊錢的賣

給大家，路人在品嚐之餘，既感受蛋糕之香甜，更充盈生活美好與人生滿美之慨，而這才是和諧社會呀！北京有很多街道，並非條條都重要繁忙若長安街；北京有許多街角，亦非要害如天安門。因而，在此地段，可不可以星期六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變成菜市場？進來賣菜的人只需要交點管理費，四點以後收攤，然後市容、物業趕快來打掃，恢復通行，可不可以？這不是如巴黎、倫敦等大都會裏日常習見的共同做法嗎？倫敦的落丁山區，以此一景，招攬遊客，卓有成效呢！凡此種種，都牽涉到一個以具體行政落實政治和政治行為以公共福祉為目標的問題，究其實質，則關乎政治的開放與政治秩序的建構。

承載與兌現道德承諾

由此還帶來了剛才我講的一個問題，即政治必須承載與兌現道德承諾。黃仁宇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有名的論斷，他說現代社會「是一個依據數目字管理的社會」。換言之，現代社會不僅需要精確的統計，裨既在知情，並備諮考，而且基此實現職責分明的問責，按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官僚化體制，縱橫交錯，對於「人口」進行有效管理。其為現代治理，經由行政落實政治，並可能抽空政治。由此所造成的一個現狀或者結

果就是，現代西方以經營管理式的方法來打理公共生活，利弊皆在其中，均為現實。當年梁漱溟先生在一九三〇年代就曾說過，老中國以人文代宗教，以家族代社會，不像現代西方世界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公司化的組織，因此，其條理、建制和戰鬥力，悉均不同。但是，我們同樣知道，假設這一切如此這般全都實現了，它必然帶來一個負面效果，就是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盛行，對制度本身，尤其是對於法律、政策與公共權力本身的正當性的追問，可能常常會在消費主義式的民生訴求中消失殆盡。所謂「利弊」之「弊」者，此為其一。

置此情形下，公權力的統治行為一般通過行政命令或者國家立法來實現，而立法本身的正當性，行政命令本身的合法性，卻常常為人所遺忘。因為既已經過了一系列程序，「程序」表徵合法，天下定矣。可是我們知道，僅有程序並不一定代表合法，就好比我們的個體消費、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的徵收，都是經過合法程序制訂出來的。但是費稅的起點，費稅徵收過程中對於多子家庭、貧困家庭、高收入家庭、正在學習的家庭和已然進入人生後半段的家庭等等，不加區分，所以農民工一個月拿一千六百塊錢要交稅，和一個年收入百萬以上的人要交的稅，在同一稅率面前，對他們的負擔並不一樣，遂至表面公平之下潛藏着嚴重的不公不義。

在此，縱便所得稅法的訂定程序合法性本身完美無缺，其實體規定卻有違公正，導致法律的道義缺失，因而無正當性。也就因此，政治必須在「承載與兌現道德承諾」這一命題意在指陳，對此正當性的追問應當成為中國刻下拷問政制和政治的重要內涵，由此提升法律的道義水準。換言之，行文至此，講了這麼多，想說的是，縱便將來中國進境於所謂的一「數目字管理」時段（姑且不論這一論斷本身是否真確），將公共生活作經營管理式的打理，可對它的道義追問不能放鬆，不僅涉關立法之際如此，尤其是要追究政權和政府是否秉具道德理想，時時不忘以道德理想對於這個民族和這群人民的生存論意義。

在此情形下，諸如「小康」這樣一個純粹物質性的指標，就不足以表徵美好人間和良善生活。是啊，田園情懷、美妙夢想、鄰里關係的和諧、人際關係的美滿、社會充盈着温情、人人相與情厚，凡此指標皆不容或缺。僅僅講井井有條、調度有序、GDP保八，不是理想社會，其他的人性化的因素一樣要考慮，而這些人性化的因素就是此刻所講的道德承諾，或者說道德指標，而公共權力必須兌現這樣的道德指標、道德承諾。否則，我們難免懷疑公共權力是否真正秉持政治秩序的善好理念，從而懷疑其是否真正致力於良善生活的建設。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所思所論，基本時空語境是在刻下中國，此時此刻我們腳下的這片大地。如所周知，刻下中國的法政名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涉關三個關鍵詞，此即「中華」、「人民」與「共和國」。今天追問政治建設，探討奠立於政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尋找通達衷心憧憬的良善生活之道，無法超脫這一既有時空環境，不得不在此一時空想點子，找辦法。可能，正是因為對此一方水土的摯愛，激發出這一知識好奇，鼓蕩起這一理論熱情。職是之故，需要對這三個詞七個字概予檢討，於細緻省視中賦予它們更加誠實的解釋，從而，於力爭名副其實的努力中造福於其所攏括的這一方水土。

「中華」，在描述與規範交集的意義上，其所締造的是一種民族主義意象，編織了中國時空下以「族民」作為成員身份的億萬國民的集體認同。從而，以「中華民族」收束攏括民族政治，以族群政治化解民族政治，意味着中國認同的大前提，以及在此前提下各自民族和族群認同的亞身份。凡此「大前提」與「亞身份」的貫通不悖，構成了現代中國民族身份建構的基本特色，並由此形成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基本形制。換言之，它不僅意味着中國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而且將族群成員的政治參與、社會成果分享和文化個

性表達等各個方面概予連綴。否則，西北邊疆的紊亂還會持續存在。

「人民」，不僅說明了中國的政治主權歸屬，而且蘊涵了民主主義的政治寄寓。在還原論和類型論的意義上，人民係由天民、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所構成，意味着他們的統一與同一。由此構成「人民」的真切內涵，一種立憲主體，同時並為憲法政治的主題。說來有意思，「人民」至大至宏，但是，如果不把它具體化，便很空洞，就是個抹桌布，隨意用來擦擦東西而已。諸位可能知道，市場化改革之前，國中餐館，服務員對你態度不好，你說牆上不是寫着「為人民服務」的「語錄牌」嗎？怎麼態度還這麼差呀？他說，我為人民服務，又不是為你服務，你囉囉嗦嗦個什麼。所以，「人民」一詞，在法政學者看來，非要把它具體化不可，非如此不足以坐實兌現。怎樣具體化呢？概為上述還原論和類型論所表達。就是說，要表達為公民，要成為國民，要成為我們這個社區的一個社民。而關鍵是，不管是社區的成員，國家的國民，政治共同體的公民，我一定要成為一個「選民」才管用。你說我是國民，享受什麼權利義務，包括生產、結婚、工作的權利，還有當兵打仗納稅的義務。你說我是公民，有很多的權利，亦須承擔相應的義務，都沒錯。然而其之兌現才最重要。在此，「選民」這個身份，使得我對此享有一定的力量。換言之，我有權每隔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表達對於「兌現」程度之滿意還是不滿意，對於享有兌現義務的公共

權力之同意還是不同意。諸位，想一想，我們芸芸眾生，平常有什麼權力呢？平常的權力就是活着嘛，幹活、吃飯、回家睡覺。可是為着活得安全和愜意，我就要有所表達。選民身份讓你的表達有力量。我對你不滿，平時對你一點辦法都沒有。但是四年之後，「老子不投你票」，這才管用。否則，所謂的市民、公民和國民這些個身份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人民」這一概念需要落實為國民，表達為公民，坐實為社區的社民，而尤其要把他變成選民，這時，才叫真正的人民。

「共和國」，敍說的是一幅共和主義圖景，而以「天下為公」作為自己的根本政治原則。「共和國」意味着統合人民民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政治德性、公民責任和社會公益各種元素，形成一種複合政體安排的意象，而恰成一種公共政治事業。由此，國家治理蔚為一項公共政治事務，應當訴諸公共理性，託付於公共空間。尤其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共和國一定意味着「折中和諧」，使族的共和、民的共和和制度的共和，在複合中混融共處。如此這般，它才叫做共和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聯邦制還是單一制，只要有助於過好日子，混融共處，都可以成為選項。中國的最終統一，此為索引之一，自不待言。²

註釋

* 本文為2009年7月18日作者北京三味書屋的演講整理稿。

1 參詳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頁6。

2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更為詳盡細緻的解釋，參詳拙文〈民族國家：雙重規訓與政治成熟——一個主要基於近代中國語境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權解釋〉之第四節，載許章潤主編：《憲法愛國主義》（「歷史法學第三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77-135；翟志勇：〈中華民族與中國認同——論憲法愛國主義〉，同上，頁136-172。

第九章

政權為主，政府為客

——關於立憲民主與國家理性內在關聯的政體論

想當年，呂不韋喟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斯有所然，竟無所然。轉瞬將近兩千年，黃梨洲由此申論，「天下為主，君為客」，言有所指，概乎能指。因為主客既定，則民貴與君輕，一人與天下，輕重、大小與尊卑，遂涇渭分明。而且，若說「民貴君輕」不過標示了「輕重」，則呂黃此論，早已自本體論上剝奪了君主的主權位格，提示其另有所屬。屬天下，而天下是萬民之邦，非一姓之宅院。晚近民主立憲理念舶來，一呼百應，原有內在因應，有以然哉，期以然哉。迄而至今，體制無落實，但理念確乎一脈貫連，愈見洶湧，只差臨門一腳，但等午時三刻。¹

一

以此作譬，在現實政治立論，今天引入「政權」與「政府」兩維，則一國之內，若非專政，現代立憲民主政體意味着「政權為主，政府為客」。其源於「主權在民，治權在賢」。兩相呼應，互為因果也。

在此，政權源於主權，確切而言，來自人民主權。主權在民，彰顯的是親親與尊尊。

另一方面，治權託付政府，由政黨經由公開性競爭獲致，委諸賢達，表明尚賢與利用。政黨非他，公民經由橫向聯合、實現政治上組織化的生存方式者也。藉此方式，他們有可能獲致相互承認並訴諸尊嚴政治，彰顯並捍衛自己的主權者位格。由此，政治遂為一種公共空間和公共理性，不過是天下分享着的公共資源，也就是天下。此為現代治道的精髓，也是天下終為天下人之天下的樞機。親親、尊尊和賢賢，終於於正德、利用與厚生，而於各正性命中成就現代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之道。

准此立憲民主之制，政權的正當性獲得了根本性解決，從此政權得享「永久性正當性」。與此相應，政府經由民主程序獲享治權，亦即政權的臨床施治之效，而秉獲「周期性合法性」。政權之為主，在於其永久之正當性，一經奠定，毋庸考問；政府之為客，立於周期性之合法性——在此周期內，政權歸你掌管施行，天經地義。一恆定、一周轉，兩相合一，緊張而舒坦，則經緯永固，天下太平矣！

其間最為神奇之處，在於就人類現有的有限政治想像力而言，立憲民主解決了權力的穩定性這一根本問題，以訴諸人民主權的方式終結了歷史。置此立憲民主政權之下，政府只是個僱工。幹得好，接着幹。幹不好，「走人」。這便又同時賦予了權力以流動性及其效能。而無論是幹得好還是幹得差，真出力還是磨洋工，自家說了不算，要看主權者

的意思。主權者太過抽象，難以捉摸，遂化身為千千萬萬手執選票的公民。市民結合為國民，國民變身為公民，公民化身為選民，逐層遞進，他們出場，鬧哄哄參選投票，將自家的觀感和理解凝注於紙片片一張，演繹着「人民登場」的政治活劇，彰顯出主權者的神聖位格。惹不得，欺不得，怠慢不得。平日裏分散孤立的個體，此時此刻，經此政治機制，聚囂為眾，一種政治有機體。事畢奔散，各歸其位，做工務農，經商治學，讓千挑萬選出來叫做政府的那個龐然大物代為縮事。朋友，置此經理體制之下，你說這政府不是個打工的，又是個什麼！你說這樣免了大家拿盒子炮上山亂打一氣，能不算一種較好的體制安排嗎？

於是乎，政治緊張獲得了紓解的機制，同時將天下恆定於人民主權，再緊張也不致於崩盤，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由此往前，推而言之，政權反不得，但可以罵，治道在罵聲中有望改善。政府可以反，更可以罵，政道因而不致懈怠。「反政權」涉嫌叛國，該治就得治。「反政府」則為公民的固有權利，只要非暴力，口誅筆伐，怎麼反都成。

倘若心智無此雅量，制度無此彈性，結果只能是大家時刻都將神經崩得緊緊的，日子就沒法過了。無論是一「內緊外鬆」還是一「內外皆緊」，都不是個事兒。朋友，當今之世，立憲民主，乃一種尋常世相，大家都認可。而事實證明，論動機、論效果，也確實不壞，

你「不搞」，動不動就「不搞」，怎麼混日子！實際上，就連「搞」還是「不搞」，也不是你一家說了算的呢！因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時勢比人強，本不是大道理。

二

立憲民主是一種將權力的秘密性降至最低程度的政體，或者說，將「隱匿的權力」與「秘密決策」降至最低程度的政體。其中，權力之不可見、之迴避於公共監督的可能性，經此政體安排，減至最低。幾百年來，自西徂東，大眾民主登場，現代傳媒囂嚷，公民社會鬧騰，反對黨天天搗鼓，為的就是這個。

權力天然具有隱匿性，恆具威脅力，因而恆具悲劇性——對於權力的擁有者和權力的對象，雙方都恆具悲劇性。往前推，甚至法在官府，秘不可聞，則威不可測，今人聽來奇怪，卻曾經是一種治道呢！所以，子產鑄刑鼎，佈法於天下，百姓得與聞，蔚為開天闢地也！這說明權力真是社會異化的產物，既凌駕於社會，動用公共資源，則難免人心隔肚

皮，彼此猜忌，因而，在它看來，只能秘密行使。藏則威，動若霹靂，霹靂之來，猶如覆巢，則安有完卵。那邊廂，於一般大眾，躲匿於權力，深層裏懷疑並對立於權力，遂成心理定勢。由此往下，千百年來，「公開的權力」與「隱匿的權力」並存，統為權力整體，卻又儼然分際，一種危乎殆哉的遊戲，讓萬民戰慄。今日預算和決算是大眾話題，雖然未必人人盡可與聞，也未必人人盡願與聞，但例屬公開項目，則是通識、通例和通則也。不若往昔，它是頂頂當真的「國家秘密」呢！這說明，權力在陽光下運作和權力之向大眾開放，是實現權力的擁有者和權力的對象同時獲得解放的最佳機制，也是讓權力成為公共資源和公共空間的不二法門。立憲民主政體恰恰滿足了這一要求，訣竅不外乎就在「政權為主，政府為客」。

不過，雖說立憲民主政體將權力的秘密性降至最低，但還有保留，或者，此處有一分別，即在內政意義上，權力的「隱匿性」當減至最低，而在「國家間政治」層面，則奉守保密原則，至少，是不言而喻、相諭共守的保密原則。國家政治之「透明」與「國家間政治」之「保密」，因應的正是這一轉換與轉圜。國民和公民以「國防開支欠缺透明」為由頭質問黨國，義正詞嚴；若訴諸他國，除非手握強權，否則無異緣木求魚，吹沙成飯，或者，牛頭不對馬嘴。也正因為此，一旦黨國以後者關係回應國內質問，那就不僅登錯了舞

台，念錯了唱本，而且，更為嚴重的是，表明天下已非天下人之天下矣！

古來西哲教諭，城邦之內有政治，城邦之外，「非神即獸」，說的是「人是政治的動物」。但凡政治動物，就愛操心邦國大業，包括國防預算。你老人家不理會這種動物的特性，將他們悉數以神與獸打發，你說，這不是「登錯了舞台，念錯了唱本」，又是什麼？「國家理由」於此縱容包庇，「國家理性」則絕不容忍。

三

由此，「國家理性」不是「國家」加「理性」，而是一個「現代」問題，一個關於現代秩序的政治、法律和倫理位格的問答。換言之，相對於上帝、道德、人民和公民理性，「國家理性」解決的是「為何要有國家？」、「如何才有國家？」以及「國家應當為何？」這一現代秩序的創世紀。此處的國家，不一定就是民族國家，反倒是一種新型政治共同體的提煉及其成熟，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端看如何打理天下。因而，「家國天下」，庶幾統括。其中，以民族國家堪稱典範。後發國家受其影響，遂以其為定制，實屬無奈。就馬基雅維

利時代而言，「國家理性」對立於公民理性，容忍基於國家利益而施展國家技藝，哪怕它們非道德、不道德甚至於傷天害理，蔚為「國家理由」，秉具理智與算計這一語詞的基本含義。正因為此，它們同時開啟了逐漸限制基於單純利益算計而肆意伸展國家技藝的德性大門，使得「國家理由」逐漸邁向「國家理性」。

朋友，這「國家技藝」裏頭，啥玩意兒都有呀！除開運作國家及其政體所必須的智慧 and 技術，自負面看，舉凡暗殺、賄賂、色誘、顛覆、改變、出爾反爾、朝三暮四、圍魏救趙、假途伐虢，以及什麼苦肉連環空城反間，無所不用其極。掉幾滴眼淚，拉個手，假模假式，乃至於「大義滅親」，小兒科嘛！預算是秘密，因為不少就算在它們頭上了。這當口，人民不過是一幫「雜眾」(multitudes)，「國家技藝」當前，什麼客不客主不主的。直要國家理性追問到「國家究竟為何？」這一步，等到「立憲民主」這一現代秩序降臨，主、客位格才算豁然開朗而塵埃落定呢！從制度實踐來看，這也不過就是一、兩百年的事情。

就西洋語境而言，「國家理由」與「國家理性」意旨有別，而措辭上則無所分別，都表諸 *reason of state* 或者 *raison d'état*。此種區分非惟始自今日，而是隨其自我成長逐漸豐富才

出現多元理解的。其間的分水嶺就在於分別政權的正當性與政府的合法性，將主客儼然分際。毀譽之間，常常導源於理解的不同，就是說，命名與賦意的差異。刻下於中文語境立論，措辭上僅以一字之別，區際反更豁顯，可謂始料不及。理論旅行之際，因着語言及其背後承載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此種歪打正着的現象頻現，早為晚近三數百年的世界文明史所一再證明。中文世界以「市民社會」與「公民社會」分梳 *civil society*，以對應於兩類社會形態，而主要西文語種則無此效能。就如此刻所說政權與政府的區際，舶來西洋，而早融於中文意義體系一樣。因此，與現代早期馬基雅維利主義風行之際一味強調國家利益至上意義上的「國家理由」不同，此刻中文語境下的「國家理性」一詞，更多地是在內政建制化、一體化和民主化的意義上，在國家德性和公民理性的意義上，回應「什麼樣的國家才是正當而有德性的理想國家」這一追問，梳解的是國家的政治成熟以及用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的是是非非。

四

說到國家的政治成熟，那麼，既然「政權為主，政府為客」，而且，「政權之為主，在於其永久之正當性」，則為何「政權為主」？換言之，政權從何而來？政權本身的正當性何在？為何它享有永久正當性？凡此種種，事關「成熟」與否，並非不證自明，相反，卻時刻處於質問之中。「權力自何而來？」、「為何你有權力？」以及「你是如何獲取權力的？」等大是大非，構成了政治的一級問題。政府如何組織，奉行何種政體，如何才有效能，以及何種公共政策更受大眾歡迎、更具政策效率等等，次生而來，例屬政制，屬二級問題。政治解決得好，政制緊隨其後，則萬事大吉。

在此，說一千道一萬，只有加上「權為民所賦」，才算回應了「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一根本追問，將政權的「永久正當性」奠立於人民基於同意的授權基礎之上。人類現有的政治想像力和制度想像力所能窮盡的優良政體，不外乎就是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個體橫向聯合基礎之上，以「同意和授權」為機軸而構成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亦即「立憲民主政體」。它不是別的，就是自權力源頭較好地回應了政權的正當性這一根本追問，從而賦予政權以永久正當性。其予主權與治權、政權和政府、政道和治道以清晰分梳的同時，

將政治的穩定性和政制的效能有機統一起來了。朋友，「立憲民主政體」同樣也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辦得大家心情舒暢、心甘情願呢！

同樣在此，十分弔詭而略需梳理的是，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仰賴於人民定期出場所啟動的「周期性賦權行為」，表徵政權之委託於特定政府之掌管與運行。擬制而言，也就是託諸部分人民自身，代行全體人民之事，因為經由選舉脫穎而出掌管政府的政黨，正是「部分人民」的政治聯合。而人民之所以具有周期性出場賦權的勢能，在於人民是不證自明的主權擁有者。就是說，人民主權是現代立憲民主秩序的預設條件，其正當性本身不容挑戰，否則即無現代秩序，也無什麼周期不周期賦權一說。「現代」登場人世之後，上帝已死，「奉天承運」那勞什子不再是正當性本身，相反，人民成為替代者，第一立法者，一個凱爾森意義上的基礎規範。但是，恰恰在此，人民不證自明的主權，卻需要人民通過周期性的賦權行為來彰顯，其主權者位格在於其具有周期性賦權的行動權能。換言之，不證自明的永久性正當性需要經由周期性的賦權始得證真。否則，縱便天天將「一切權力屬人民」掛在嘴上，「人民」也天天自言自語「當家作主」，則除開表明言說者之口是心非和人民之無能為力，等於什麼也沒說，至高無上的「人民」仍依舊不過是待宰的羔羊，一眾出力幹活、交糧納稅的「百姓」而已。「市民」、「百姓」和「群眾」都是私性存在，非政治

的存在，「國民」、「公民」和「人民」才是公共存在，一種政治存在。其間轉圜的樞機，主要就是「定期出場」，從而以周期性賦權這一出了。

由此，人民必須定期出場，才能表徵和捍衛自己的主權者位格，彰顯「權為民所賦」的政治權能。重申一遍，人民必須定期出場，才能兌現人民至高無上的主權者位格和權能。人民的出場主要有「革命」和「民主」兩種方式。理想而言，公開、直接、競爭、差額的選舉方式，「一人一票，同票同價」的民主機制，就是直觀地、階段性地和儀式性地履行「人民賦權」的過程，也就是一種人民主權的展示過程。拋開「革命」這一選項不談，「權為民所賦」的派生性權力，也是人民主權內在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就是「權為民所賦」。由此，「賦權」與「褫權」兩項，構成了完整的人民主權。它們具體真切地體現為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一種定期表演的政治項目。按照現代治道，國家是一個超大型公司，政府只是作為代理人來進行治理；全體人民作為股東，在賦予其權力的同時保留着撤換代理人的權利，經由階段性、儀式性和公開化的民主程序，隨時可以收回這一權力。換言之，「權為民所賦」這一命題意味着「人民出場」，必要時得撤銷授權，而「撤銷」的權限甚至比賦權更為重要。經此過程，奠立於「權為民所賦」基礎之上的政治統治兌現了兩個立憲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也是其賴以實現的基本機制。

第一，經此機制，人民主權建制化為國家主權，國家主權在具體化為特定政府的治權之際，並落實為人民的立法主權，實現「主權和政權」、「政權與權力」以及「人民與政府」之間彼此互為犄角、良性互動的政治局面，一種「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格局。不僅提供了穩定性這一政治要求，而且，滿足了效能和流動這一政制特性，反過來有助於政治穩定。

第二，經此機制，政體兌現了承認政治，政制體現出尊嚴政治。基於「同意」的雙向承認，以及承認政治所牽扯到的尊嚴政治，構成了現代政治的骨幹。這是人民的主權者位格的程序設計。沒有承認、基於承認的同意，以及因為「我同意授權於你，我並且有權撤換曾經授予你的權力而來」的權利，則尊嚴無從談起，「人民」將成為笑談。值此情形下，政府基於「人民出場」式的選舉結果，按序更迭，不礙事，因為政權在那裏，穩穩當當的。政府倒台，治權易手，恆屬常態，恰恰說明政權不倒，才能如此流轉不息，讓天下人都操心而放心，世事無常而有常。

「人民主權」因應「國家政治」的正當性，「國家主權」處理「國家間政治」的合法性。前者為政權的正當性背書，以人民福祉為宗旨；後者撐起民族國家在國際法上的獨立、平等位格，賦予政府以合法性，以突顯國家利益、實現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為目的。這是現代國家理性中最为核心的內容，也是它最为華彩的樂章。中國此刻急務，僅就國家政

治而言，不外乎是以制度性安排和實踐性操作，將「權為民所賦」形諸公民的政治實踐，真切回應「一切權力屬人民」這一表徵現代政治的根本承諾而為萬世開太平。用個未必恰切的表述，「攘外必先安內」，則此為內急也。

五

在這個「現代」橫空出世的創世紀中，與西洋東洋列強們被迫簽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僅逐漸將「中國」清晰化了，而且，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國家理性，使得「富強、民主與文明」作為邦國願景的突顯過程也就是中國文明的政治、法律與道德主體性的建構過程。迄至「國家理性」學思進入漢語學思並且「古為今用」，返西洋之本而開中華之新，其所標示的就不僅僅是中華民族建設「現代中國」的百年奮鬥，在心智與心性上開始走向成熟，而且，是一種基於文化自覺與政治自覺的清醒、自明與自信，一種關於國際視域中的人我關係、群己格局的審慎、平和與豪邁。此時此刻，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借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蔚為大局，也是急務也！

就國家政治而言，政權為主，政府為客，而「政治止於水邊」，一切從「承認」和「同意」起步。無承認，即無政治，從而無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無同意，即無和平，同樣無政治。就國家間政治來看，一面看，國家利益至上，集體尊嚴至上；另一面看，人世為主，國家為客，而城邦之外有政治，一切為了大同人間，念想的是永久和平。不管它是什麼樣的國家，玲瓏城邦還是浩瀚帝國，綿延朝代抑或民族國家，到頭來，等待它們的都是雨打風吹去。可人間常在，人世永存，國家不國家的，不算個事。萬民熙攘，好過日子，過好日子，好好過日子，才是根本，也是一切政制設置、政治德行和「國家理性」的終極目的。此為希望，而希望，「高尚的希望」，如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所詠，「你楚楚動人又慈悲為懷，從不鄙薄那些不幸人家……一直奔走在天堂和塵世之間。」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於明理樓，十一月二十六日修訂

* 本章原載於《財經》2012年第31期。

1 托名呂尚（即姜太公）的後世之作《六韜·文師第一》如此寫道：「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貴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第十章

後民族主義視野下的國家政治命題

所謂「國家政治命題」，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循沿如此歷史和思想脈絡，大概是這麼一個意思。就是說，近代中國一百多年是一個大轉型時段，從一八四〇年起算到現在是一百七十五年，從一八六〇年代「洋務運動」起算則為一百五十五年。不管怎麼算，這一百多年是秦漢以還最為劇烈的大轉型時代。這一波大轉型所要達成的一個文明願景、一個政治理想、一個我們能夠分享的價值共識，就是要建設一個「現代中國」。既然是「現代中國」，一種華夏邦國的新型國家形態和中華文明的新型政治形態，當然有別於通常所說的「老中國」，有別於作為朝代國家和廣袤帝國的「帝制中國」，則其新在何處，如何推陳出新，佔據着百多年來的中國心智，成為中國文明百多年來的首要問題。

換言之，如何從帝制朝代國家轉變為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意味着什麼？此刻到達了哪一時段、地步與境界？其間涉及哪些最為要命的大經大法？凡此種種，是一個已經進行了理論探索並且用實踐來回答，而且還需要進一步探索與回答的問題。

二

整體而言，包括中國在內，從歐洲、北美到東亞，大多數文明在最近兩三百年裏均經歷了這樣一個往現代國家進發的歷史進程，或一帆風順，登堂入室，或屢經頓挫，踉蹌踉蹌，或一敗塗地，折戟沉沙。無論如何，大多數文明均不約而同地在按照這個叫做「現代國家」的模子來塑造自身，而奮力拼搏，力爭躋身其間。現代國家的建構基於多種現實情境，涉及多種理念資源、多種制度資源和多種實踐進路。凡此情境、理念、制度和進路之間，似乎水火不容，也可能暗通款曲，存在着諸多緊張關係，形成推動現代國家的張力，也造成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困境。正負皆真，不足為奇。其間，民族主義和立基於此的民族國家這一立國模式，蔚為主流，佔據着理論運思和實踐進程的核心位置。其與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優良政體建設，遙相呼應，構成了所謂現代國家的主要面相。

拿現代中國的成長來說，遠看中國這一百多年，近觀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糾結，一對歡喜冤家，堪為一例。蕭功秦教授所講的歷史主義與普遍主義，兩種理論方案和實踐路徑的糾結，包括國共兩黨作為革命黨所選擇的路徑不同，最後動用槍桿子、刀把子一決勝負，反映的也是這種緊張關係。百年中國，文化保守主義也

好，政治激進主義也罷，都牽涉到這層關係，而無不圍繞着如何建設「現代中國」激昂登場。值此情形下，如果現代國家的建構不僅基於這種緊張關係，而且，能夠容含這種緊張關係，尤其是在政治框架裏面，在現代國家制度的大框架中，分流合擊，能夠將它們有效折中調和，不至於崩解，從而使得「現代中國」終於咕咕墜地，在民族國家和優良政體兩面，均有成效，則其設計間架，堪稱理想方案。

當然，此刻的中國早已是「現代中國」。實際上，「一九一一」之後，中國即已開始了向現代中國艱難跋涉的長程革命。問題在於並且僅僅在於，在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的意義上，此刻中國面對依然存在的這些緊張，所謂的「主義之爭」，該怎麼辦。

三

置此語境之下，今日的中國，如同上世紀三十年代，各種思潮湧動，多元理論方案競爭，構成時代一景。期間，政治自由主義文化與保守主義這對歡喜冤家，自然再度蔚為主角。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時相對壘。普世文明取向和特殊歷史主義路徑，齟齬不斷。共

和主義、社群主義、基於文化鄉愁與政治願景的儒家憲政主義之翩然登場，各領風騷。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凡此理路，各具神通。在此，如何達成妥協，彼此調和，而共同服務於建設現代中國這一分享的共同願景，才是上策，而善莫大焉。

畢竟，其之律動，旨在致力於十三萬萬人的當下生計和未來福祉；其之功利，在於「現代中國」這一法律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大框架內的和平共處。說到底，搞來搞去，鬥來鬥去，不外乎還是全體人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這件事情，唯此為大，則有什麼不能商量的呢！

四

由是觀之基於這一總體目標和問題意識，我挑選了當今中國對於國家建構、對於建設現代中國來說，依然需要面對的，還沒有解決的，從而還必須繼續努力的六種最為緊張的關係，逐一揭示分析。一言以蔽之，它們均為關於現代中國的思想方案與實踐路線，關乎中國這一政治共同體的基本理念和設想，因此，以「國家政治命題」籠統，得謂允恰。

今天在此概予分析揭示，自然會烙上自己的時代印記。當此之際，原教旨民族主義

的負面因素固不待言，早已顯露無疑，而啟蒙式的自由主義也有它的弊端。尤其最近幾年，世界民主潮一波一波，但在國家建構失敗的國度裏發生，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務須警惕，使得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自由主義理念，特別是佔有性個人主義的弊端，不可一概而論。還有，我們過去常說要在政治上警惕專制，但是不是需要同樣警惕華爾街式的資本專制？對此同樣亦當時時恍惕才是。弄不好，雙重專制並行，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將是最壞的結果。

職是之故，為防最壞結果出現，「妥協」是本文最為重要的特徵，也是面對紛紜歧異，筆者的卑微心意。有鑒於凡此政治命題均發生在後民族主義、後國家建構的意義上，則如何實現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並以此作為最終目的，才是大賢大德。故爾，拙文所述，得謂一種公民模式的後民族主義國家政治命題。

五

第一個命題，牽涉到歷史文化認同與普世文明、國家利益本位與世界體系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認同，同樣需要堅守自己的國家利益本

位。它們蔚為立國之本，須臾不可懈怠。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生活在現代世界列國體制治下，這是一個「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中國」，也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世界」，彼此相互塑造，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更是這個時代的顯明特徵。因此，全球格局和對於現代性普世文明的接納，包括政治上的共同價值的含詠吸納，為舊日中國所必須，也為當今中國所無法迴避的。其間牽涉到的這種緊張關係，從宏觀大歷史觀察，表現為近代中國關於如何建設「新中國」的思路和方案，其實有前後相續的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也是清末至今一線牽連的版本，就是要建設一個獨立富強、具有完整主權和集體尊嚴的現代中國。因此，這是一個以「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為藍本的，以「國家理性」為導向的現代中國。與此同時，在此基礎之上，一個新的政治內涵版本漸次出現，即在中國已經成為獨立主權國家之後，需要以民主法治來撐持。沒有民主法治作為政治肉身，則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即便有民生，也無民權，人民因而，毫無尊嚴，中國也就沒有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因此，以「憲政國家——憲法政治」來撐持的國家新版本，勢必登場才好。實際上，在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共同體與中國之為一個政治共同體這種雙重視角之下，民族國家以歷史文化和國族利益本位來自我定位這種「以文明立國」路線，與政治國家以民主法治來定位這一「以自由立國」路線，它們所形成的二元軌道，

百多年來，一直並行。問題在於，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如何措置，因而有從「軍政」到「憲政」的路線圖，也有「新民主主義專政」的政治設計等等。一種看法認為，在此博弈中，「救亡」終於壓倒了「啟蒙」，也算一解。

盛洪教授講到「世世代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意象和意向。是啊，不僅是此時此刻的我們，而且包括我們的列祖列宗，也包括我們的子孫萬代，這樣一個歷史長河中的意象和意向，揭示了歷史文化主權及其主體的文明內涵。正是在此意義上，當下中國基本解決了民族國家「以文明立國」的問題（當然是基本解決，尚未完全解決），但如何實現「民主國家」這個目標，要以政治立國，以自由立國，而且是以憲法規定的每個人的自我主張這種個人自由來立國，要實現在一切公共事務上公開運用理性這一康德式的啟蒙與自由，並依此為政治收束，結束這場大轉型，則依然有待跋涉。環顧四周，這一點大中華地區只有台灣初步實現，中國大陸主體此刻仍然處在後集權時代的七人寡頭統治的威權主義時代。記得蕭功秦教授對此曾有分析，大意是「後集權主義時代的全能型國家」，很長的一個專業修辭，大意如此。

六

第二個命題，關乎民族理想與公民理想的緊張關係。當今中國，也是百年來現代中國的建構歷程中所遭遇的難題，在於既要形成一個民族國家，秉持獨立主權，以獨立、富強和繁榮為鵠的，這是民族理想。與此同時，當今中國還要養育公民精神和公共德性，造就一個自由、平等與公正的華夏人間，這是公民理想。在此，億萬國民不僅是國民，有民族理想，而且是公民，懷持公民理想。公民理想講的是平等、公正、自由、博愛、寬容，講的是普世之愛與永久和平。這樣一來，中國作為世界一部分之普世理念與中國之為一獨立國族的本位立場之間，中國這一國族必須堅守自家的利益本位、文明價值與不得不置身於全球體系與世界內政這樣一個宏觀視野之間，必然存在緊張，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必須擁有自己的國家理性和我們十三萬萬人之為政治共同體的公民必須養育公民理性，凡此二者間的緊張，同樣構成了百多年來，也是當下此刻，建設現代中國所不可迴避的矛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對此作二維處理，即將「人民」這一集合政治概念，還原為「生民」、「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這幾種原始身份，而於不同維度，疏解其間的緊張關係。

由此深入到第三個問題，即統一國家內部的族群互動與民族政治。此事既關乎當下中國的國家建構，也必將關涉政治民主化進程，沒法迴避。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按照官方講法，係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準確而言，應當是中華民族包含五十六個族群。有鑒於王朝改制的一統帝國轉型為民族國家之後，隨之而來的是近代以來一直存在着的時緊時鬆的民族關係族群關係問題。時至今日，西北邊陲居然無一日之安寧，則原有的理路和政策，包括民族區域自治體制，恐需多所調整。我和紀霖教授曾在杭州師範大學同台做一個講座，一名學生提問，說你們這些想法都不行，要是當年沒有王震將軍率領十萬大軍進駐新疆，能有新疆今天的安寧嗎？我的回答是，前者不論，若論今日新疆，還真是無一日之安寧，實際上新疆天天都有事，這不是秘密，又作何解？

由是觀之，怎麼處理此間的民族政治，疏解緊繃的族群關係，可能不是重拾「王震將軍」就能解決的。換言之，既非民族主義思路獨力可支，亦非共和主義思路迎刃而解，反倒需要將它化解成若干不同的具體問題來具體應對，這總好過囫圇吞棗式的整全方案。

比如，要是基於公民理性和民族自決理論，則通過民族自決公投來決定，行不行？

應然而言，依從民族自決理論，當然可以。但是，問題在於，無論是執政當局抑或普通民眾，哪怕就是民主政體的執政者，能否允許此種集體公民自決，令人懷疑。再說，自決真能解決問題嗎？且不說集體自決之裹脅性，縱便自決之後，會不會反而問題更多，一般普通民眾因此福祉遞減？有鑒於此，中國從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的一個做法是順應後民族主義需求，將公民的集體自決轉化為個體自決，按照「用腳投票」的方式，由公民個人選擇居住國。實際上，據說中國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簽有協約，如果你不願意住在中國，可以移居自己族群為多數人口所在地，這樣便局部緩和了這個矛盾，也是一策。

當今中國對於少數民族國民的政策優惠，無論是在就業就學方面，還是在習常所謂「無知少女」方面，都是真實的，卻似乎沒起到應有的作用。一些漢裔中國國民對此以「綏靖主義」和「贖買政策」相詬病，這其實是國民對於一國之內屋頂下發生的自我歧視的不滿，對於平等的呼求。既然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則除了文化自覺、文化尊嚴、保持本民族的族性的文化憂患意識之外，有無分享政治的制度平台，可能也是一大問題，甚至，是更大的問題。問題所在，便也就是解決方案所在。問題提示我們，較諸文化特性和族性的保留，經由分享平台所實現的政治參與，可能同樣重要，或者，更為重要。

過去曾經有過的一種做法是把少數民族成員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階級意識來取代民族意識，也曾在一段時間起到一定效果。但是，現在這個做法的紅利已經消失殆盡。所以，如何在立憲民主這個大框架下，以分享政治，或者以較大程度上真實的自治為制度框架來緩和族群關係，破解民族政治僵局，還有待後續雙方的真誠努力與細緻操作。

八

第四個命題，牽涉到普遍正義和特定文明的歷史時空這一問題。今天中國的歷史觀，基本上是基督教一元突進的進步的歷史觀，反映了中國於十九世紀中期所謂「進入世界歷史」以來，被迫受制於基督教西方文明時間體系這一事實。不過，話說回頭，基督教西方文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和力量，正因為在此時段引領了人類文明的主導性理念和核心價值，形成了主導性力量。對此為了抗拒而抗拒，似乎也沒必要。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的成長，「老中國」變成「新中國」，成為一個超大規模的現代中國，重返大國甚至超級大國的行列，這樣一個民族國家的建立與成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

其他亞非歐民族之建構一個民族國家所能比擬，相反的是一個文明的復興。這一文明復興，因為有十三萬萬國民和悠久文明為本，有超大規模的體量和豐沛的治理經驗，在文化上自成一套，有過往的「世世代代」，所以，一定會給既有的基督教西方文明主導的世界格局帶來巨大衝擊，而且，這個勢頭會愈來愈明顯。實際上，最近十多年來，這個情形愈益明顯，已然開始改變地緣政治，並有可能修訂文明版圖。

由是觀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將普遍正義和中國人所理解的世界觀念，如何將基督教文明建構的普遍歷史觀和中國文明的時空觀恰予協調，並落實在「國際政治議程設置」方面，這既是避免政治衝突、減少軍事危險的基本文化作業，也是文明自我建構的必由之路。在我觀察，它們不過剛剛起步。鑒於下面還將談到的文明論意義上現代中國的貢獻，及其與現代早期地中海文明與大西洋文明的內在關聯，中國文明的復興更多地是在補充和修繕既有政治格局與文明境界，不會也不可能是一種顛覆性力量。當然，若從既有現實利益出發，考慮到蛋糕的分配，基於並囿於自家兩百年來的優越地位，而對中國成長和中國文明復興出現嚴重不平衡心理，則為另一回事了，誰也沒轍。

九

第五個命題，涉及一元進步歷史觀與多元的人間秩序的緊張。就當今世界現實政治層面來看，主導性的世界體系依然是跨大西洋兩岸的盎格魯—撒克遜英美文明。此一文明奠基於十七世紀晚期發展起來的近代地中海文明基礎之上，而以一八一五年英國率領的反法同盟戰勝拿破崙，從此確定英帝國的世界海權霸主之後，所逐步形成的跨大西洋聯盟為標誌。換言之，迄而至今，以五個英語國家及其邊陲地區，包括日本、印度在內所形成的這一當今世界體系為骨幹，雖歷經挑戰，卻老辣圓融，依然蔚為宰制性體系。這樣一個全球權力架構，在跨大西洋權勢體系、跨太平洋權力體系和有可能正在形成的跨歐亞權力體系中，作為一元性的、主宰性的架構，依然位居當今世界權勢中心。

與此同時，無論是在文化的意義上，還是在文明的意義上，抑或在現實政治與普遍人性交錯觀照的意義上，多元的秩序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必將是此在人間的現實，可能，也是造福人間的福音。畢竟，普遍的人性要求豐富多彩的人生，然世界怎麼可能只是一種樣子。尤其是中國文明的復興，其將會造成何種繼受與創發之間的緊張關係，正有待吾人拭目以待也。

由是觀之，如何使得一種多元的人間秩序，一種文明的多元景觀，能夠在尊重承認現代性的基本價值的前提下遍地開花，相信並不是一件壞事。相反，它致力探討的這樣一個後現代時代的人類，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發展路徑的可能性。由此，在尊重現代性主導下的普遍歷史觀的同時，構建中國的世界概念，是中國文明復興成長的題中應有之意。畢竟，古典樞紐文明以降的世界，東西南北平行發展，蔚為第一世界。晚近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以來，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世界的歷史，為俗世人類提供了第二世界，其基本格局延續至今，相沿未改。自此以還，隨着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大陸的全面復興，尤其是中國重返大國行列，人類有可能迎來平等互動的第三個世界。

至於弱國外交與普遍正義，限於時間關係，茲不贅述。

十

經以上看來面對一個既定的世界，探索可能的世界，追求另一種活法的努力本身，就是在彰顯一種歷史主義的獨特徑路，從而也就是在為普遍主義的洪流注入涓涓溪流。在

此，普遍與特殊的各自正當性及其張力，只能顯現在個別性之中。就是說，每一個別的存在，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以此觀之，中國不僅是特殊的，中國也是普遍的，蓋因中國是一種個別的文明和政治的共同體，應然而言，也是人民與自由的統一體。

因此，基此立論，在此申說，上述六種關係，既是理念之爭，復為價值之爭，也是具體路線之爭，同時，更是對於當下現實矛盾的反映和反應。此處提出的粗淺看法，意在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行不行？需要討論，在時間中打磨，於實踐中修訂。

註釋

* 本章原為2015年5月30日作者在天則所「法學與政治學理論創新研討會」上，就其文〈公民模式的後民族主義國家政治命題〉所作的簡短闡釋。全文原刊於《中國法律評論》2015年第2期。

第十一章

「立憲民主、人民共和」
就是當代的王道政治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鳳凰網的「鳳凰大學問沙龍」欄目邀約四位學人，就儒家思想在當今世界的生命力，特別是對於中國轉型的意義，各抒己見。在下跑龍套，忝列聚議。其他三位，都是儒學專家或者思想史家，就此主題展開討論，可謂行家裏手。我在法學院討飯吃，對此論題，連票友的資格都不算。私揣主持者叫我來講，可能是考慮到紀霖兄所說的儒家義理如何當下肉身化蔚為時代的癥結。而法學家作為一個工種，類似「工科師傅」，主要做制度嫁接，或有拾遺補缺之助，遂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與王道政治的關係為題，從政治的根本問題意識起論，梳理王道政治理想與現代立憲民主政治的理念親和性。

一、政治的本質與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

任何命題的提出，既是基於一種知識脈絡，同時更主要的是有感於當下的時代困境，立足於這個時代需要解決什麼樣的核心問題。對於它的真切感知和準確闡發，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問題意識。時代圍着它打轉，在回應自家困境和逐步逼近問題核心的進程中，演繹

着時代風雲，而終究成就一個時代。

以此觀之，今日中國最為核心的問題，也是這波延綿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的一級問題，就是如何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轉型之後，最終驅使「中國政治上軌道」。換言之，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大轉型，與曾經的「英國問題」、「法國問題」、「德國問題」和「俄羅斯問題」等近代重大轉型案例並列，構成了所謂的「中國問題」。它們聯袂而來，接續努力，演繹出刻下億萬人生活其中的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就「中國問題」而言，核心在於「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集「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四位一體，這其實是一個政治建國的歷程。在此，如何「提煉優良政體」，促使中華民族走向政治成熟，既是這波轉型的起點之一，而終亦必構成其完美收官的終點，其展示了並且考驗着中國文明的政治智慧。畢竟，說一千道一萬，政治和優良政治，才是維繫人間秩序、造福人世生活的最高智慧。

對此，新儒家一脈，立德立言，尤見功力。所謂天道、地道和人道的「三重合法性」，所謂「儒家憲政」，多立基於中國文明資源，自成一說。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學思接引現代西式學理，不僅將一種異質因素植入中國文明，增大了中國政治文明的現代含量，而且，在回應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的意義上，希望於融會貫通中促成中國式新型政道和治

道，同樣厥功至偉。就此而言，不管具體理路存在多少分歧，儒學儒義與自由主義學思，其實是相反相成的盟軍，也都肩扛着行百里而半九十、必須持之以恆走到底的重負。蓋因政治總是與權力相關，涉關權力的來源、分配和運用，圍繞着權力打轉。總而言之，「建立主權，提供秩序，區分敵我，分別公私」，凡此四項，蔚為政治的本質。以此為軸心而鋪展的權力安排，得謂真正的政治。各位，但凡一種政治體制，總需在此四大項目上多所建樹，獲得社會多數人的認同，然後行得通，有德有方，我們才能說它享有正當性與合法性。同樣在此，對於現代中國語境下的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的追求，構成了新儒家和自由主義陣營的又一交集之處，也是它們孜孜奮鬥的共同目標。

進而言之，在今天中國的思想競技場上，無論是儒學研究者和儒義信奉者，還是自由主義一脈學思，他們分享着一個共同的政治理念，即都指認刻下政制例屬一種過渡政體，有待以「立憲民主與人民共和」來收束。進而，他們多半認同「立憲民主與人民共和」是中國政治的最終出路，也認同這是多數中國人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政治價值。實際上，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文化意識，其焦慮，其縈念，其追求，不也同樣在此嗎！以此為大轉型進行政治收官，允為當下以還一個時段的時代任務。促使這一安排成為政體核心，遂成兩家一切學思和流派積勞積慧的核心所在。至於具體何謂「立憲民主」與「人民

共和」，什麼樣的政道和治道才可承載，也方能恪盡其意其義，則公說公理，婆說婆理，是一個開放與多元的論域，新儒家也好，自由主義也罷，都無法壟斷包辦。當然，有些基本的底線，以及基此達成的共識，還是必須的。在此，如果像前此少數專家儻論只有一「儒學」和「儒家」才能救中國，「儒家憲政」是中國政治的惟一選擇，或者，恰恰相反，徑認某一種自由主義政治方案是中國政治的不二法門，因而排斥其他理論想像與思想方案，則只好各說各話，沒法對話了。幸好，中國思想日趨成熟，在協力共進中多元分趨，彷彿再次印證了中國文明容涵「一個文教，多種宗教」的廓然大度，這樣的情形並沒發生。

二、王道政治對於「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理念和價值意義

在此，新儒家需要多方採擷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而自由主義同樣不妨審慎莊敬地理解中國古典政治智慧，於對話中積攢中國的政治文化資源，在往還辨析中相互啟明，提升中國文明政治文化的資質。正是在此語境下，如果從傳統尋找資源，而做嫁接的話，筆者體認，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經史義理、詩禮文教、倫理綱常、王道政治和家國天下」五

項，犖犖大端，得為中國古典文教的核心。其中，尤其是王道政治的理想和家國天下的情懷、氣度與格局，構成了華夏文明的古典政治智慧，極有融通於立憲民主與人民共和的理念資源與價值意義。特別是王道政治，其為一種政治設計和政治理想，高自標立，連通德性與政治，照顧現實和理想，是關於如何統治、什麼樣的政治得為善好的、可欲的政治安排的哲學理念，恰恰可以為我們提供助益於「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想像和價值空間，需要我們重予創造性解釋。

因為今天中國的急務在使政治上軌道，盡早逐步結束政制的「過渡政體」狀態，以及此種政體下的「臨時憲法」性質，所以，才有找尋各種資源以為轉圜，從而為現實破局的需要。中國文明古典政治智慧的梳理，便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在此，如前所述，一種政治體制一定要獲得社會多數人認同，行得通，有德有方，才能說它享有正當性與合法性。設若這一政制雖然當下囂囂乎，可一般的多數民眾卻並不認同，則所謂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云乎哉！這一現象引導、迫使我們思考「什麼是政治」這一問題，引發出如何建立主權、如何提供秩序、如何分清敵我、如何劃分公與私等大是大非。同樣正是在此，王道政治的政治想像和價值理念，包括天敍天秩、天道至誠、大中至正、仁義不二、理性中庸、中道

平和等價值理念，以及對於詩禮文教的強調，而非僅僅依恃「王法無情」或者「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對於建立有效而可欲的統治而言，均有超越時代的永恆意義。

三、王道政治與立憲民主有六大理念親和性

粗予梳理，可以看出，在下述六個方面，王道政治理想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具有通融勾連之處，可能為中國最終走完建立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為旗幟的新型政道和治道的百年長旅，提供傳統政治文明資源。

第一，王道政治理想奠基於「天地人」一以貫之，「人心與天道合德」的天人關係基礎之上。所謂「王道通三」，「三才共生」，由此而在中國文明的譜系中，高自標立了一種卓越的德性超越向度，其下落為天理正義的政治正義觀與自然法式的正當法觀念，將俗世政治架設於超越的道德基礎之上。在此，對於天道天理的敬畏，不僅表現為一種莊敬而神聖的政治態度，而且，具體落實為對於人世生活的細緻經營，不違乎人性，就是在循守天道，遵奉天理。故爾，宋儒才會喟言，「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

也」。天道就是人道，輾轉推導出「天理國法人情」三位一體的運思方式和解釋框架。此間精妙，正如筆者在一篇論文中所言，其將現象界與超越界曲連貫通，於內在精神脈絡上牽線搭橋，肯認了它們的精神同質性，進而，打通了其相互釋證之可能性。同時，又嚴伸現象界實在之法與超越界永恆的天道天理之井然分際，實際等於提醒它們各守本分，彼此不得篡位，而立法極，而立德極，而立義極，而立人極。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成熟的政治體制必有自己的政治正義論和正當法觀念，如此這個政治體制才能立得起來。在此，德性的超越性作為觀念前提，自「內聖」一面，發揮支撐與驗證作用。而王道政治立基於「天地人」一以貫之這一基本理念基礎之上，上接天地，下通人道，在賦予現實政治以道德基礎的同時，並以此時刻警示和鞭策現實政制向此政治境界靠攏，這恰恰具有天理正義的稟性。實際上，經由現代法權安排，將此天理正義觀化轉為公理正義觀，是百年轉型中一直在做的一項法學作業。

由此涉及到王道政治理想所賴由立基的中國古典心性論，特別是它對於人性的高度警惕。中國古典心性論的特色在於，其雖然對於人性並不信任，但是對於人心之秉具理性這一點卻又滿懷希望，在總體持取悲觀基調的人性論基礎之上，對於人心能夠發蒙啟蒙，從而能夠體認到德性的超越性，與人性之間保持道德緊張，實在是滿懷信心，一往情深，並

在「內聖外王」這一總體構想中，將俗世政治建立在德性的超越性基礎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王道政治所提供的此種政治正義論與正當法觀念，與立憲民主所依恃的人性論及其所要求的廣泛政治基礎，不謀而合。其實，往身處說，它們都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思維，也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但同時懷持理想，具有唯理論傾向。不抱空想，但希望人間事業力爭光明，只能依恃人性自覺和德性引領，同時訴諸外在制度間架的羈縻。此亦非他，表達為人性之常與政治常識的政制智慧，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同時，這種「王道通三」的德性超越性，派生出「法天而治」的自然法觀念，並且推崇「聖人政治」這一傳統的神聖政治觀念。一方面，自然法觀念要求人間統治者必須依循天道天理而治，申說在人間法律之上，還有法度存焉，而俗世法律永遠不得違忤法度。實際上，中國文明歷來具有敬天法祖的自然法精神，同時，一貫秉持崇古法聖的歷史主義。儒家人文主義關於人心與天道的合德這一價值主張，早已成為自然法的一個向度，而此種自然法不僅以天道天理為本體，以情理法理為世俗形態，而且，其將天理、天道與情理、法理交纏落實於民族生活的規範世界，而一總於人心向度，當又別開新面，尤其在於彰顯了法理的人道意義。另一方面，傳統的神聖政治觀念持守賢愚之分，不僅對於政治人物提出了高蹈的德性要求，避免民主滑向民粹，而且，它契合於「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憲

制下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這一兩分法。更主要的是，我覺得它着意於天人之分，不僅劃分出德位的各自界限，肯認世俗之位永遠不得超越於超越之德，人間的權勢不能逾越德性，而且，它更在於肯認了世俗的政權，任何世俗政權，任何世俗的法律，之不能逾越天道天理，不能超越於自然法這一理念。因此，從神聖正義、政治正當性到自然法，到人間的政制和世俗法律，這是一個森然有別的地位。如此這般，遂在學理上徹底取消了一切以自家意思冒充和僭篡自然法的可能性，一切將世俗的人間統治打扮為神聖統治的可能性。

它實際上意味着對於世俗權力及其統治者的道德約束，而有一個天命觀蘊含其中。在此天命觀看來，天命有常，但是流轉不息，符合其政治正義論，契合於自然法的天道天理天德，則統治長存。否則，必為非法，缺乏正當性，而成一短命的統治。依據公民不服從理念，治下的人民有權推翻它，「誅一夫」，另尋良制。此間理念和價值，與現代政治，與現代立憲民主所講的憲法至上、法律統治至上、法律統治所確立的法權具有永恆高於世俗權力的階序安排，同樣恰相契合。

第二，王道政治的理想意味着一切統治都要奠定於「同意」的基礎之上。「命令」與「服從」關係，是一切統治的基本機制，由此而有「同意的政治」之必要。有「同意」才會

有「服從」，才會有真正的服從。「同意」意味着一種契約關係，將政治奠立於公民契約基礎之上。王道政治意味着以理服人，實際上等於是說大家同意，統治才會有效；大家一致同意，才可能談到上政治的正當性。同時，它意味着憑藉自己的優良政治表現，而非強詞奪理與單純武力壓服維持統治。

由此，王道政治引申出來的一個可能的含義就是，之所以能夠統治，是因為人民的賦權，遂與「權為民所賦」、「主權在民」這一現代民主政治理念掛起鉤來。如果說「德性在天」的話，則下落塵世，恰可謂「主權在民」。兩相結合，將德性的超越性與主權在民的大眾民主觀念連綴一體，恰恰是一種政治正當性，不僅有助於建設「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政道和治道，也有助於緩解當下普世存在的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正當性危機。

第三，王道政治理想指認世俗政治秩序不外是天地人和諧的體現，其「元無少欠，百理具備」，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爾，和平文化與以道義立國，而非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分化政治與專政霸道，才是真正的立國之道。就此而言，王道政治意味着講理的精神。剛才盧先生講到，中華文明是一種華夏理性文明，具有早熟的理性精神，而排斥以力壓人的專政霸道。我記得梁漱溟先生當年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申說「中國是一個理性

之國」，實際上講的都是中國人以講理不講理作為人禽之別，進而講有無政治正當性這一價值理念和判斷標準。不講理，訴諸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專政，恃此建制立政，此為霸道。這樣的體制既不具合法性，更無正當性。

當今中國，最大的道理是法律至上，是憲法至上。它意味着法度高於法律，俗世權力不得違忤法制，更須羈縻於法治。此為底線，實為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公約數，也是不論各黨各派、各家各說能夠分享的世俗層面的公共和平的準則。進而，它實際上標立了德性的超越性與理性的自我立法這一命題。由此往下延伸，則中國的今天，保衛和平才有法治，保衛和平才有中國的現代進程。

所謂「保衛和平」，其間脈絡婉轉，其實講的是，在立憲民主的人民共和國之內，不再有敵我之分，而是只有守法者與違法者的區別。換言之，立憲民主的共和國內，不再有敵人，而只有違法犯罪者。蓋因所謂和平，主要意味着在立憲民主國家，不再有敵人的概念，不再有敵我之分。在立憲民主的共和國，國家是一個公共事業，整個中國是一個公共場所，人民是這個公共場所和公共事業的所有者與主權者，只有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摩擦，而無一部分人對於另外一部分人進行專政這種敵對思維。相反，如果這個國家不是以全體人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作為政治正當性的追求目標，而訴諸敵我思維，訴諸一部分人對於

另一部分人的專政，則此階級劃分基礎之上的統治體系。這樣的政治，還不足以稱為講理的體系。換言之，它沒有建立在「同意」的基礎之上，其得合法乎？其得正當乎？

第四，由此往前推，詩禮文教，謂為國本。以「詩禮文教」立邦治國，意味着文明開化的進取精神和向上心，意味着邦國與人民對於基本倫理底線的奉守無違和對於公民美德的涵養，意味着「鬱鬱乎文哉」的雅致國民風範與普遍循禮守法的行為方式。進而，它意味着一切政治，包括立憲民主在內，必須擔當起自己的文化主權，肩負起傳承和弘揚本國族文明的責任。此為理想之自我立法，也就是道德主體的自我立法。

第五，王道政治憧憬普天之下無凍餒，無恐懼，以此為自己的理想社會圖景。如孟子所言，「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其為可欲的人世生活和理想的人間秩序，不也就是「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所標立而所追求的社會景象嗎！其古今千年，一線牽連，不絕如縷，正是人類精神的強韌所在。

第六，王道政治同時意味着家國天下的世界精神與天下情懷，一種四海一家的格局與全球正義觀念。在此，「公的天下觀」蔚為樞機，意味着「四海為一家，天下如一人」。但是，與此同時，並不排除國家間政治中的敵我劃分。而這種敵我之分，用中國傳統語言來講，就是「文野之別」，「華夷之別」，一種基於文化同質性和價值同質性的排他性政治判

斷。換言之，置身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是否遵守當代世界主流文明價值與普世人類理念，是否符合中華民族及其億萬國民的根本利益，成為敵友之分的標準。

四、「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就是現代的王道政治

綜上六個方面，旨在從王道政治的傳統資源中闡發解決當下政治正當性的有益因素。綜理古今，考稽中外，我想說的是，現代世界範圍內，優良版本的政治，一言以蔽之，不外乎「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也可以說，「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就是現代的王道政治。所以，剛才我所講的「王道政治」的上述六項文化資源，恰恰可以作為「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在中國今天落地的理念資源。其間樞機，總括來講，可以表述為這樣六句話，此即「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授受以公，臨治以仁」。基此立政，循此而治，這樣的政治統治，才會獲秉真正的正當性，也才堪當有德有方的政治統治。

如同「德性在天」，「主權在民」將權力的正當性安置於一個俗世的超驗本體，所謂的「我們人民」，一勞永逸地為現實政治奠立超驗基礎。此雖弔詭，卻正自恰，滿足了俗世政

治的超越性要求，將德性與政治勾連一體。法國大革命以還，大眾民主登場所造就的此間格局，並不排除「治權在賢」。換言之，在體現大眾民主的「主權在民」草根政治的同時，還有一個精英政治的安排，以「民選」的政治精英專責理政，在前者賦權的框架內，行使政制與行政職責。前者享有政權，後者受政權所有人的委託，行使治權。賢愚之分，轉化為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的分際，同時對各自均提出了德位相符的「問責性」要求，正是現代政治的精髓所在。

「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承接主權與治權的區劃，將它們具體肉身化為政權與政府的並立。就是說，在主權在民的大格局下，主權表現為政權，一種中立性間架結構，一旦「權為民所賦」坐實，則政權獲秉正當性，任何人不得「推翻」、「打倒」。但凡現代轉型完成，坐實了「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國族，多半不用為政權的穩定性擔憂，所需考慮的是政府的穩定性和有效性。因為政府是政權的受託者，為政權服務，行使政權交託的各項具體政制和行政，本質上屬「打工仔」性質，所以，這份工做得好，就接着做，否則「炒魷魚」換人。政權則不然，事關「人民」或者「我們人民」的本體正當性，一旦落地，在新型而可欲的政體有望取代之前，動彈不得，不要碰。能夠碰，不妨動動的，是政府。也

就因此，如上文所揭，任何人不得「推翻」、「打倒」政權，卻人人均可對政府提出質疑，乃至於着意翻轉也。

上文說「一旦『權為民所賦』坐實」，則如何如何，就在於「我們人民」的賦權需要展現為一種具體直觀的形式，落諸一種公開透明的法權程序，以此公開的授權，主權者賦予政權以正當性，政府作為政權的受託者，受此政治託付，秉持道義，循守法治，做好這份工。此即「授受以公，臨治以仁」的含義。此處之「公」，不僅指一切權力的授受出乎公心，依於公德，而且，更主要的是指一切循守公開透明的法權程序，依據公民理性在公共空間展開，而恰為一項公共事業。

五、以中國文明的成功轉型為這一波現代文明收工

最後想說的一點是，這波中國文明大轉型已然行進了一百七十多年，即便自「第一波改革開放」的洋務運動算起，也已經超過一個半世紀了。這是承接現代早期地中海文明以來的這一波世界文明大轉型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場景下構建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的中國

式努力的持續展現。迄而至今，隨着前揭各個主要轉型案例均已「收工」，中國需要以自己的努力成功轉型為這一波文明大轉型做一個徹底收束。換言之，我們走到了一個即將「結束的開始」。那麼，用什麼來收束這一波濫觴自現代早期以還的世界文明大轉型呢？於政體言，比較來看，「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堪當不二選項。以此落地生根於中華大地，結束這一波現代文明大轉型的浩瀚歷程，便是對於它的完美收官。

本來，「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是地中海文明與大西洋文明的制度結晶，中國文明轉型的百年奮鬥，其實只是將它們落地嫁接，並無原創意義。但是，因着東方中國文明的悠久浩瀚，其之落地生根本身，並無任何成例媲美。其本身既為一種創造性進程，而且，因着中國文明本身蘊涵深厚，必將對此多所調適，而做出中國式的創發，某種意義上，可能意味着這一波現代文明就此登頂，歷史在此終結了。

而王道政治講道理，講和平、講理性，訴諸人心，與動不動就靠武力鎮壓的專政意識，區分敵我的二元思維，徹底劃清界限，恰恰可以抵抗列寧主義的暴烈，修正政治自由主義的偏頗，接濟代議民主體制的不足，從而建立起現代文明體系下的中國政治。在建立主權、提供秩序、區分敵我和分別公私諸端，為文明轉型，特別是中華文明的政治轉型的最終完成，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註釋

* 本章原為2014年6月21日作者於楓藍劇場「鳳凰大學問沙龍」上的演講，據現場速記稿整理。這場活動的主題是「儒家思想對於中國的現代轉型有何功用」。對談者有許紀霖教授、盧雪琨教授和姚中秋教授。

第十二章

這天下，原是億萬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

資先生（按：資中筠先生）娓娓道來，講的是一個民主協商、立憲建國與人民共和的故事。是啊，這是一個歷史故事，也是一個政治敘事，更是一個涉關芸芸眾生平安居家過日子的生活瑣事。在下與諸位一道，凝神斂息，聆聽下來，獲益頗豐，而不禁浮想聯翩。

在此，略從以下六點談體會。

一、「打出來的天下」與「談出來的國家」

資先生在歷史脈絡和比較場域，經由梳理相關現象，而尋覓現象背後的制度原因，追溯其意識形態情結，據此展開自己的理路，可謂開合有度，而意味盡在其中。這不，資先生首先提出來的「打出來的國家」與「談出來的國家」這一兩分法，蔚為綱領，實堪玩味。不過，這裏我想僅就修辭略作一點修改，覺得以「打出來的天下」或者「打出來的江山」與「談出來的國家」兩相比照，恰予措辭，似乎更為貼切，至少，更能狀述前者所在地域當事者的心態臆度，也許，還有那一份「顧盼自雄」。就是說，「江山」與「天下」，不脫帝制王朝家產的痕跡，而有歷盡煙火、盡歸吾穀中之「凌厲中原，酒酣耳熱，顧盼自

雄」也。除此之外，資先生並提出了有關國家的第三種形態，作為「打出來的天下」的一種異形，所指實為當今本朝和「金三胖」統治的北朝鮮，其為範例，正為一種權貴的江山，不折不扣的家天下也。

各位，資先生說「打出來的國家」或者「打下（按：出）來的天下」具有四個特點，不僅表現為「天下」為我犧牲億萬身家性命所俘獲的財產，私囊中物，因此具有代際的繼承性，而且在於將「天下為私」而非天下人之天下，其與「公天下」截然相對，可謂昭彰。資先生還講到，置此情形下，愛國等於忠君，必然輕視個體生命，實行愚民政策；可能會考慮民生，但不會由此發展至重視民權特別是個體民權這樣一種現代境界。凡此種種，在下以為，均絲絲入扣，鞭辟入裏，辛辣之至卻又平靜道來，真所謂「四兩撥千斤」也。

我體會資先生所講的第三種形態，即「黨天下」、「官天下」，其之所謂「保江山」，「紅色江山代代傳」云云，其實乃是「王朝政治」假借「人民共和」的名義在現時代之翻版，不脫秦漢之制也。猶所記得，一九八九年，王震將軍——報上說他是知識分子的誦友，其實是讀書人的打手——好像在會見什麼「知識分子代表」時講過一句話：「我們犧牲了兩千萬人頭打下了江山，你們這幫傢伙想奪取的話，拿兩千萬人頭來換。」此處的

「你們這幫傢伙」概指當年自願不吃飯的一批師生和市民。各位可以想像，此為二十世紀後期，啟蒙運動已然發生將近四百年之際，東方中國的「家天下」、「私天下」、「王朝天」的觀念，居然赤裸裸地叫囂，則中華民族於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文明之需要精神啟蒙和現代洗禮，昭然若揭矣！其實，直至今今天，此種情形依然，只不過不好名面上再作此叫囂罷了。

那麼，「打出來的天下」能否過渡成為「談出來的國家」呢？特別是能否實現「和平過渡」呢？資老師說她不知道，我同樣不知道。不過，事關中國的未來歷史發展前景，雖說不知道，但卻希望如此，也確實需要如此，卻是人心所向，而情同理同，四海一心。如果從世界範圍的比較政治來看，則事有前例，倒也未必太過悲觀。比如台灣也算是「打出來」的，「中華民國」同樣是打出來的，但台灣於晚近三十年裏順利實現了和平政治轉型，可謂大中華文明圈「先民主起來」的樣板。今日台灣政權的民主更替已然上了軌道，有模有樣，雖然問題依舊多多，舊恨復添新愁，包括民粹主義、民主治理之有欠成熟、黨際鬥爭極化等等，但民主轉型及政權的和平、公開、理性授受已然完成。此所謂「授受以公」也，實堪欣慰。凡我中華子民，遠視近觀，均當慨然於心吧！那邊廂，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之後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從共產專制轉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當然也有問題，如有了

「民主」後，卻一度匱乏「麪包」，等等。但我相信，事實上也是，經過那樣一段顛簸之後，還不都解決了。所以，我相信資先生、千帆兄也好，在座各位也罷，都希望「打出來」的天下「能夠和平、漸進、有序，一步一步，走到「談出來的國家」之境。我們這些人，從胸有點墨至胸有丘壑不等，而手無寸鐵則同，天天坐在書房裏冥想天下，彷彿為家國天下而憂而慮，其實本性溫善，防範這些人有什麼意思呢？有時想起來不免覺得好笑，手上有武裝力量，三紀用兵，卻又心虛，坐臥不寧，正說明光靠「打」不是個辦法，而有「談」的必要！

二、權力來源及其正當性

資先生的講座其實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也是古往今來法政哲學的基本問題意識，即「憑什麼你來統治？」「你的統治權力從何而來？」或者，「為何你有權力？」事到如今，全面的愚民已然不可能，外部世界撲面而來，整個地球連為一體，先發起來的國族彰顯的榜樣力量，包括海峽對岸同為炎黃子孫「先民主起來」的生活實踐和政治實踐所提供的典

範，迫使我們，也迫使他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換言之，十三萬萬共和國的公民本應分享的家國天下，為何只信「黨」而不信「民」，為何「人民共和」難以做實，而官僚資本、權貴資本代際繼承，整個中國不幸被挾持為「家產」、「私產」？其所據為何？憑什麼？如果你所提供的論據不過是說「打出來的」，則值此民權時代和平權時代，立憲民主與人民共和蔚為正統與政統，還這樣說，豈非自絕於時代，從而自絕於世界。資先生說現在好像不太好意思這樣提了，或者，不敢提了。我猜想，背後提而當面不敢提了，私下提而公開不願提了，羞羞答答地提卻無法厚顏無恥地提了，如此而已。

除此之外，也有人說刻下的「權力交接」類似於一種禪讓制，而自上而下的權力授受彷彿一種「分封制」，頗有盛世古風，三王之治呀云云。殊不知，此為「天下黨有，私相授受」，恰相忤逆於「主權在民、授受以公」之權力大道，談何正當性？其為一種修辭，玩玩自娛，是他們的事情，大家實在不必當真。

問題在於，將政治奠基於程序公正之上所組建的民選政府這一範型，是晚近三百來年間，尤其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世界人類所能獲秉的普世價值，也是現代文明於政治領域的精髓所在。今天，我們要問，中國作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所在的棲息之所，一個煌煌五千年文明的古國，能不能渡過這座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還能不能以黨天下的家產為盾來

躲避十三萬萬人關於天下為公的追問？在此，政權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取決於權力授受程序的合法性，「私相授受」絕非自求多福之道。因此，重申「權為民所賦」這一晚近世界的政治常識，蔚為時需，而重在以具體制度坐實之。說「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不錯，你即管說你的，卻有一條不能迴避，那就是「權為民所賦」。如何賦予你權力？誰賦予你以權力？當今中國，刻下的世界，人類現有的政治想像力和政治智慧所能提供的一個較不壞的選擇，不外乎是把「我們人民」化作選民，一種可計數的政治存在，每人手上拿一張選票，一票一價，在公開、直接、競爭性的透明程序中，於公共場域的公共選擇博弈中，做出自家的選擇。倘若你被選中，則閣下接受委託，執掌權力，其方式正不外乎依靠政黨來組織政府，依法施治；設若未能選中，或是因為你品性卑劣，為選民所不齒，或者你意識形態悖離於普遍人性和大眾價值，或者因為你行為乖張，顛覆而無能，尤所甚於前總理李鵬，則落選靠邊，夫復何言！

置此情形下，博取執政權的民選程序是一個基於公共選擇而凝練公共理性的自然淘汰過程。也就因此，既言「權為民所賦」，則啟動這一自然淘汰過程，也就是啟動政治改革和政制建設，特別是啟動將全國人民化身為具體可計數的選民資格的直接民主選舉程序，那實在是躲避不了的事情，也是早晚的事情！畢竟，凡此程序正義已然成為現代政治合法

性的唯一標誌，則中國迴避得了？當然不可能。這是我聽了資先生講座後的第二個體會。

三、立國與立憲及其政治承諾

資先生在中美比較框架中談這個問題，是以一種「理想型」作為鋪墊，而旨在陳述己說。當年「老美」立國之初，制憲會議的代表們關於《憲法》舉行了五百六十九次投票，因此，僅就內政立國而言，美利堅的確是一個「談出來」的國家。換言之，是通過討價還價、政治妥協和協商民主而建立起來的一個民主政權，同時，是一個循依嚴格的法治程序締造出來的共和國。在「民族國家—文化立國」和「民主國家—政治立國」這一締造現代秩序的雙元革命意義上，與母邦交戰完成的是前者，而「五百六十九次投票」所締結的是後者。內外有別，卻又關聯溝通。就後者而言，職是之故，從一開始，它是或者可能是一個億萬公民分享的政治家園。當然，此處的「億萬公民」尚需兩百年磨洗，將外延擴展至有色人種和婦女，方始周延，而名實相符也。

如此這般，資先生的描述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近代立國、立憲應當是並且可

能是怎樣的一種進程？資先生講到，此前兩千多年是王朝政治，以打天下坐天下為正統。一九一一年之後，政統遽變，辛亥一役，中國從此告別了王朝政治舊體，而步入一個現代政治歷史進程——所謂新中國、新社會，實開啟於彼也。因而，近代立憲、立國，離不開這新中國、新社會之「新」。而「新」在何處，則上述雙元革命也！

迄而至今，中國究竟走到了哪一步？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將眼界稍稍放寬。在此，我有一個深切感受，即香港作為中國政治版圖的一部分，是「先法治起來」的地區；台灣作為大中華的一員，是「先民主起來」的地區。中國大陸同為炎黃子孫，傳統和背景類似，刻下所缺，正不外乎民主與法治也。而就中國主體的大陸情形來看，法治之難行，恰恰因為民主為法治的基礎，無民主基礎，則法治云乎哉！刻下，舉凡司法獨立、權力制衡、遏止腐敗諸項，並非取決於立法條文如何規定，而是取決於是否啟動了民主進程，因為民主意味着整個社會多元化的政治力量之公開博弈。這才是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最為強勁有力的基礎。捨此而繁文縟節，等於在繞圈子，終歸無所用心，解決不了問題。這是我聽資先生講座後的第三點體會。

四、關於國民與公民，及其愛國與愛祖國的區別

資先生講到了一個問題，我聽後將它翻轉為政治哲學術語，即「愛國」和「愛祖國」不是一回事，切切不可混同。過去講忠君就是愛國，今天卻要分梳這樣的概念：作為國民之愛祖國，以及可能都愛祖國，與作為公民之愛國家和他們可能不一定非愛這個國家不可，實乃並行不悖。換言之，作為公民，沒有義務非愛這個國家不可。為什麼？因為國家是我們公民讓渡權利而共同締造的政治家園，以互惠關係為基礎，而牽扯到相互承認的法權。就是說，國家有德性，以民權、民生至上，照顧億萬公民的身心，則對你奉獻政治忠誠和法律信仰，蔚為互惠一方公民之義務，也是「雙向承認法權」的應有之義。基此，我服從你、我熱愛你、我為你完稅納糧、我為你當兵打仗。但是，如果這個國家背信棄義，視民眾如草芥，根本沒把億萬人民當做國家的真正主人，則不過是稅基的數字，乃至於人盾而已。置此情形下，公民自然有權用腳投票，既可以改變國籍，另擇忠誠，也可以公民不服從方式表達不滿與反抗，而重締一個新國家，或者，新政權。

當此之際，我愛祖國，但不愛這個國家，怎麼不可以呢！無論是在政治自由主義還是共和主義公民美德視角審視，此上合天條，中順人情，下符法理，可謂至恰。此從羅馬

古典政治文明和中國古典政治智慧兩方來看，均有所據，而它們實為現代秩序源遠流長的精神之母。從前者所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來看，則國民可以愛自己的祖國，但作為公民有權力對抗我的國家，因為我的國家不仁不義，因此我對他的抨擊、批判乃至於強力反抗恰恰表明我愛這個國家。這就好比斯諾登同學其實是最愛美國的公民是同一個道理。從中國古典智慧來看，邦國有道與無道，構成了行藏之準則。邦有道行之，邦無道藏之；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孫行。凡此種種，同樣正相合轍。

抹黑對方，比如動輒指責你「裏通外國」，結果不僅於養育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操無益，而且，造成了一大批民粹主義的懵懵懂懂的愛國賊，一有風吹草動上街就砸同胞的汽車，可堪訝異者也。這是我聽資先生講座後的第四點體會。

五、關於公民理性與國家理性

公民理性指向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德性和集體善好，基於公民理想，而以個體主義的自由、幸福為指歸，同時並不排除共和主義的公民德性價值觀念。國家理性基本上以集體尊

嚴和民族主義為指向，圖謀國族的繁榮富強，以及必要的治理術，強調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體系的完善，等等。相較於國家理性，公民理性恆具弱勢，因而，如何在此以公民理性和公民理想救濟國家理性，而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防止國家理性的裹挾獨大，從而，迫使這一方水土真正成為億萬國民分享的政治家園，也是億萬公民皈依的文化家園，考驗着一個國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德性，則刻下中國於此兩面均有待提撕。特別是於「優良政體」一面，更面臨轉型壓力，而需好自為之。

有人說，常常有人說，一旦啟動政治轉型，中國就會出現混亂，所以政治轉型急不得。若說政治轉型需要審慎，則無人得持異議。但是，假若因其複雜而敏感，便拖宕不決，甚至以為畏途，則坐失良機，坐困圍城，實為不智。既然轉型是早晚要做的事，何能搪塞而拖延。其實，很久以來，從官方到民間，都有這樣一種講法，認為在中國今天實行憲政民主會出現三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經濟滑坡；第二種可能性是邊疆少數民族會獨立；第三種可能性是整個社會梟雄並起，群龍無首，一下陷入無政府狀態。我想，凡此擔憂純屬子虛烏有，說好聽一點是杞人憂天，說得不好聽一點是用來嚇唬我們的，或者，嚇唬自己的。為什麼？因為民主憲政作為現時代的政治治理方案和立國方案，本身就是維繫國家的大經大法，而恰恰強調法治並立基於法治的嚴肅性，經由為政治權力設限，為經濟

發展、社會進步提供基本保障。在此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短時間的GDP下滑，但從長遠看，則恰恰有利於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為什麼現在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都是民主憲政國家？這你如何解釋？

其次，指謂實現憲政民主就會導致邊疆少數民族紛紛獨立，整個中國解體，亦屬不當。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唯一的歷史前景。實質上，通過多元文化的分解及其所構成的憲政愛國主義，早已為多族群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提供了解決方案。假若尚未實驗，就以這樣的歷史必然前景而置事關整個國族前途之政治轉型於不顧，可為不智。憲政愛國主義從來不曾迴避國族的領土完整性。再說，政治轉型敘說的是內政的民主化，其於民族國家建構維度並不衝突，而是「民族國家—文化立國」與「民主國家—政治立國」這一雙元革命下的現代秩序的有機統一整體。

再次，指謂社會出現群雄並起、群龍無首的狀態，就更是不着邊際了。為什麼？因為，這就牽涉到你所說的「動亂」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說的「亂」是多種政黨和社團出現，大家紛紛走上街頭，我認為是民主來臨時刻的正常狀態，是對專制集權的反撥，沒什麼不好的。而且，經過這樣一個時段以後，我相信，經由公共理性的篩選和大眾民主實踐，這個社會將會走向有序政治、常態政治，這個社會與政治共同體的民主也會逐漸習慣

並成熟於民主政治實踐。民主政治是一種有序政治和常態政治，中國人歷經百年奮鬥，有能力運用這樣的制度。甚至，運用得更好。台灣、香港是很好的例子。現在有一種觀念特別需要破除：動不動以「亂」作為阻止進一步發展民主憲政的藉口。到底什麼叫「亂」？民眾上街遊行叫不叫亂？當然不叫亂。倘若無序，則正說明公共權力特別是警察權力沒有到位，沒有透明公開的讓我如何申請、如何舉行、怎樣舉行以及派人現場維持秩序等一整套法律法規安排。如果有，我相信以北京而言、以全中國而言，每天有幾十場遊行示威是常態。美國、法國這些國家，哪天沒有遊行示威？這是一種民主常態，不是亂，可能，恰恰是一種出氣裝置，而現代複雜社會正需要此種裝置也。好比最近西北某地把一個十幾歲少年抓起來，後來又放了，說村民遊行就是亂了，實在不堪。怎麼是亂了呢？《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集會的權利嘛！

至於有人說北朝鮮離開了「他們」不能過日子，更是笑話。「金三胖」死了，地球照樣轉，朝鮮的百姓才有望過上不再挨餓受凍的日子。

倘若施行立憲民主，而真的發生社會動蕩，恐怕不是因為「立憲民主」，而是此前的體制所積攢的社會政治矛盾，在此種體制籠罩下暫且壓抑着，待其崩解，一下子顯露、爆

發了。當年蘇聯崩解，不是因為民主登場，恰恰是因為「蘇聯」作為一種壓迫體制，至此早已功力耗盡，了無合法性，只好一散了之。就此而言，則現行體制以漸進和平的方式消解顛覆性的社會政治矛盾，而為立憲民主開道，恰是不當推辭的應有之責。

六、開放三大市場與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

資先生以「談出來的國家」為期，讓我想到中國今天需要開放三大市場，儘快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

各位知道，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五年，三十五年裏，以洋務運動為標誌，蔚為中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一九〇二年清末變法，繼之以北洋新政，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整整十年的自由經濟黃金時期，同樣是三十五年，是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到現在，又一個三十五年，是中國的第三次改革開放。三次改革開放，其主流政治意識和政治意志，不外乎是「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

其中，三次改革開放都指向市場經濟，這是第一個「市場」，需要開放和建立的，中國到今天為止尚未最終完成，有待於接續努力以收束之。與此同時，中國需要形成自己的軟勢力，開發民智，讓民族的智慧和德性在陽光的照耀下茁壯成長，為此需要形成「思想市場」。沒有思想市場，中國無法形成自家的知識力量、道德勇氣和精神領域的剛健與博大，溫婉與細膩，則中國只能說是一個經濟大國，而精神小國也。今天，恰恰缺乏言論自由與自由思想，所以，開放思想的市場，時不我待。緊接而來的是要開放「政治市場」，以政治多元化，讓全體國民作為政治的博弈者，以政治上的組織化生存，憑藉自己的組織性力量，參與政治博弈，在博弈中決定誰享有政權，而以「授受以公」的法制程序，為政權的永久正當性奠定民主基礎。可能，這是一百七十四年來的中國改革開放最終所要臻達的一種政治成熟之境，也是促使中國民族臻達政治民族之境的必修課業。

由是觀之，儘快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是當務之急，可能也是從資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到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到今天二十多歲的讀書人，所共同衷心希望之所在也。一九四九年時，很多人歡欣於這下「中國問題」全解決了。後來胡風先生獻詩，第一句就是「時間開始了！」梁漱溟先生冷眼傍觀，慨然而揪然：問題根本沒解決，還不到高興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政府垮台了，換了一個新政府，但政治體制沒有解決，中國民族在

政治上依然沒有上軌道——這是一九四九年梁先生的原話，中國政治不上軌道，則萬事無望。

有人說中國三次改革開放，三十五年是一個很神奇的周期，感喟數字之神。說實話，你所說的神秘的數字，我從來不相信，六十年一甲子或者正好是三十五年都是巧合。我說要儘快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意味着什麼呢？我想說的是，在我個人觀察，第三次改革開放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其實在二〇〇八年奧運會之後已然停頓，或者，已然多所停頓。姑且不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鄧公南巡之際這三年的停頓，就拿二〇〇八年後的停頓來說，公權力那種盲目自信、自我膨脹，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所造成的「三個自信」等，其實等於將改革開放之門封閉了。中國現在未富先驕，因為原始資本積累已經完成，過去曾經的改革推手現在都成了既得利益者，已然不想有任何變革了。畢竟，此時此刻，無論是市場經濟的紅利還是權力的租金，已然盡收「吾彀中」，所以，自然無改革動力或者壓力了。因此，從二〇〇八年到現在，五年之間，改革其實中止了。很多領域還存在着倒退現象。比如言論自由，我認為就出現了倒退；司法改革不僅停頓，而且一度於王勝俊出長最高法院時期「走邪路」。而最近這一波打壓表達自由不過是潛伏經久、一時發作而已、表象的背後反映的是公共權力對於整個市場、整個思想壟斷的體制衝動又發

作了，如此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是否會出現幾十萬人自願不吃飯，我不知道。不過，我有這樣的想法，如果對方是一個有德性的政體，以摧殘自己的方式自願不吃飯而達成訴求才有可能；如果對方說你是草民，是一堆數字而已，視如草芥，你餓死了他會心疼嗎？當年北洋士兵開槍殺死了學生，段祺瑞自此終生吃素，現在的官員能做到嗎？所以，短時間內企求轉型速成自無可能，我也不希望出現這種速成畢業生，通常，這樣培養的學生質量無保證，反而和平漸進、有效推進是最好的方式。問題在於不推、不願意改，要怎麼辦？這才是重大問題。

我聽資先生的講座以後，略作評議，與資先生、千帆兄一樣，衷心希望經由民主轉型，此方水土蔚為全體國民分享的家國天下，一個愜意而宜居的家園。何處樓台，誰家風月？卻原來，這天下是億萬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這是我對資先生的講座透露的心靈世界所做的解讀，也許觸及了資先生的心思，而道出大家共同的焦慮與憧憬，則言雖有盡而意實無窮，尚饗，謝謝！

註釋

* 本文為2013年10月15日作者對資中筠先生在第二十期「公民憲政講堂」演講的初淺點評。

第十三章

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

一、文革陰霾，忐忑不安

過去一年，一個最為嚴重的現象是，有關「文革」或者「文革式的社會政治狀態」是否死灰復燃捲土重來這一疑慮在不知不覺間有跡無形，如霧霾襲來，慢慢沉重地壓在億萬人心頭。如果說市民階級依舊沉浸在反腐的老炮兒式復仇快感中，那麼，政商學三界，尤其是知識界，一葉知秋，對此趨勢之憂慮愈深，忐忑不安，實為二十多年來所未之有也。

一方面，我們看到機關發文，各項決議重申改革開放、民主法治。其聲調之高，蔚為主旋律。另一方面，伴隨着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股災連連，以及最高權力配置上的「相權衰落」，高度集權似乎再度變成現實。「文革」式用語及其內涵的蘊意，所謂「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一類套話，居然再度成為官媒堂皇大詞，令人驚駭。換言之，黨國一體、黨政一體、軍政一體、經政一體乃至於君師一體的集權機制，在逐步推進民主法治的承諾遠未兌現之際，反益強化，且借由強化國家治理能力之名，為前者張本，這便逸出了「改革開放」的固有含義了。如果說由此開導出一個總統制的憲法慣例，並進而經由立憲程序坐實總統制，也未嘗不可，但因民主尚未登場，而操作方式濡有新權威主義濃墨重

彩，遂不免令人浮想聯翩大轉折之際，可能，某種新權威主義是必須的，但其邊際效應究竟如何，總是叫人七上八下。

一方面，憲法日、憲法宣誓等新制出台，強調《憲法》之不可侵犯這一官方宣喻言猶在耳。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的口子愈收愈緊，鉗口日甚。我是個教書匠，用心思考，靠嘴吃飯，這一年多裏，深感意識形態緊箍咒愈念愈緊，對師生的精神管束，尤其是對青年教師的收編，愈發嚴重，正在侵蝕三十年裏好不容易辛勤作育、並可能蓄勢待發的中國文明的思想創發勢頭。畢竟，心靈促狹，難望心思浩瀚。「青椒」們憤懣而無奈，普遍功利卻又十分懦弱。

「文革」是否重回人間？也許，五六年前，甚或兩三年前，這不會成為一個問題。這樣提問，大家都會搖頭。可是在重申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今天，鬼使神差，這一問題卻陡然降臨，再一次嚴峻地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三中全會以還歷經三十七年改革開放，國力大增，國民生計極大改善。社會空間拓展，倘若經此轉折，無意中滑落至一九三六年的德國和完成工業化後「二戰」前的蘇聯那種局面的話，則百年改革轉型跌宕，情何以堪，命何以託！

為此，今天需要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而提出下列五點，以為誠勉。

二、五點重申，以為誠勉

第一，今天必須重申、再次重申：這個叫做「中國」的家國天下，是十四億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而非一黨一派、一家一姓的私產，更非憑藉強力攫取、代代承續的所謂江山。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早已是不合時宜的王朝政治心理。此前為立基於改制之政治，此刻為有違改制之反政治。故而，中國之為億萬國民所分享共有，意味着排除了將國家當作權力的殖民地，而以征服者身份凌駕於國家之上，將人民當作擄贖的人質這一極權政治的思路。增強國家治理能力，健全國家治理體系，這一偉大的現代理念，不能無意中變成嚴防社會成長、打擊商人階層、限制思想自由這一商鞅式法家的刻薄寡恩。其為中國文化偏鋒，置身諸強爭霸時代，有利君主專權，一時間，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絕非常態政治下的長治久安之策。令人遺憾的是，某種商鞅式理念似乎正在侵蝕歷經百年方始積攢下來的共和理念，人民主權理想遲遲未能落地制度化，正與其相表裏。也就因此，包括後面將要敘及的反腐，才會予人以「王爺的歸王爺，奴才的給奴才」的印象。瀟瀟雨，海山風，「天涯樂事王孫貴」，還怎麼玩！

在現代意義上，所謂政治，旨在建構主權、區分敵我、釐清公私、進行決斷、提供和平，其間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共和國是全體國民分享的公共空間為基點，而以立憲民主支撐，建構起一個全體國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大框架。因而，共和國之內，只有違法犯罪者，而無敵人，遂為題中應有之意，也是立憲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將敵人常態化，而建構一個阿倫特所謂的「客觀的敵人」，此種理路，說到底，還是一種極權政治心理，正與此背道而馳。——公然將大學教授們作為防範對象，標立其為異己分子，輒言「教育」、「懲戒」，除了「金三胖」，還有哪個國家這麼做？

第二，國民的自由、安寧和富裕，優位於國家的強大與威勢。國家建構和治理，圖個什麼，不是一將成名萬骨枯式的光榮政治，也不是偉大君主的江山浩瀚，而是國民的自由、安寧與富裕。至於國家的強大與威勢，乃順水之舟，水到渠成，倒非國策懸鵠。我們當然明白，處此自助體世界，就中國這一初始條件而言，沒有強大國力，禦敵防寇，國民的自由、安寧和財富難保。然而，我們更知道，若無每一國民的自由、安寧和富裕，要它強大國力與光榮政治做什麼。

由此，必須指出的是，雖經三十七年改革開放，經濟規模擴展，國力大增，但綜合來看，中國依然是一個窮國，一個尚處大轉型收束時段，還沒最終走出轉型的「歷史三峽」的窮國，屬典型的「脆弱繁榮」，不可因為剛剛手上有些餘錢，就透支國力。

實際上，最近幾年間，不知不覺，一防再防，中國還是被拖入了一場軍備競賽。而且，整個東亞，均深陷此中。同時，自一年前反西方價值觀開始，彷彿同時陷入了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冷戰。就前者而言，關乎善用三十七年積攢的民脂民膏，防範嚴重透支國力，而非打造偉大君主的大國夢幻。一夫強，萬夫弱，打斷的是共和國的脊梁，絕對不是好事。看看俾斯麥的德意志和普京的俄羅斯，一目了然。就後者言，其實主要源於西方偏見，是它們挑起來的，但要是被動接招，並開出了所謂反西方價值觀這類誤診處方，而於敵我觀念支配下導致內政主導方向上的錯位，則更加得不償失。

正是基此情勢，過去一年經濟下滑，特別是民營資本人人自危，不僅源自二〇〇八年以來整個國際金融形勢下滑大勢，同時反映了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導向致使大家心頭困惑，信心指數下滑，以至於人心慌慌，市場惶惶。

有見及此，需要重申政治的審慎德性，以及「審慎政治」這一為政常識常道，拒絕締造偉大強國君主夢這一類政治羅曼蒂克，而將政治回歸為一國之內，為了每個國民的自由、安寧、富裕和幸福這一庸常軌道上來，將「脆弱繁榮」修煉為「穩固繁榮」的常態。

第三，內政優於外交。有人說，當今世界，美國是一個「內政決定外交」的國家，俄羅斯則為「外交牽制內政」。相較而言，中國屬哪種形態呢？總體以思，中國的大轉型尚

未完成，有待臨門一腳，則「內政優於外交」，不言自明。終究而言，但凡一方水土，概為主權國家，則內政優先，自不待言。畢竟，刻下中國，有六千萬左右的殘障國民，上億人口尚未脫貧，兩億五千萬農民工兄弟輾轉城鄉，還有成百數千萬失學兒童留守兒童。就國之重器的高等學府來看，也沒幾所世界級的，多數很爛。尤其是，在最終解決「中國問題」意義上，若以「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四大義項提綱挈領，則三、四兩項仍然人在途中。值此大背景下，舉凡政道治道，一切措置，總須「攘外必先安內」，恆以內政為優，而內外恰予平衡。縱然外交，以及全球政治，也是為了造福內政，不離不棄生民福祉與邦國安危。畢竟，「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最近兩年，國民睹物思情，感覺似乎外交優於內政。果若如是，則不免方向有誤。此間可能牽涉到民族國家思維、帝國思維與全球體系思維的錯綜關係。一百多年來，吾國所要完成的一大轉型，是將帝國思維轉換為民族國家思維。所謂民族國家思維，實際上講的是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在「文明立國—民族國家」與「自由立國—民主國家」的框架內，締造一個富強、民主與文明的現代中國，一個全球體系中的中華家國天下。在此進程之中，是內政，還是內政，恆居優先地位。進入全球化時代，作為主權自助體的民族國

家思維需要上升為全球體系思維，此於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尤其重要。可是，全球體系思維不是帝國思維。倘若讀書有限，誤將毛式羅曼蒂克普世主義當成了全球體系思維，而其實是帝國思維，則得不償失。以此觀之，當下帝國思維瀰漫中國。草根民粹，尤其是邊緣落魄掉隊群體，既有年長亦有年少，整天嚷嚷打這打那，「炮轟」「踏平」，令人憂慮。

也就因此，肯認內政優於外交，意味着海外援助，不管是非洲六百億還是哪裏五百億，但凡用錢，總得有個程序，好歹讓掌控國庫度支的一國最高權力機關面子上過得去，也讓億萬交稅納糧的升斗小民心裏好受點。換言之，在此領域啟動人大的預算和決算機制，乃至追責機制，便是題中應有之意。我們不是不知道，大國成長到一定體量，輾轉騰挪之際，客觀上需要大格局大思維大體系，需要拓展自家的戰略縱深。就此而言，一帶一路，海陸並進，堪當大手筆。然而，持盈保泰，量力而行，總是王道。否則，帝國未至，而帝國負擔先來，對於中國這一尚處大轉型航程之中的泱泱巨眾國度而言，豈為福哉？

第四，反腐必須導出制度遺產，始有意義。這一波反腐，手段霹靂，依恃權力政治和權勢國家，做他人之不敢做，行前所未行。兩三年裏，全民狂歡。可是，目前看來，其不脫例行之吏治整頓，殺一殺歪風，收拾收拾惡吏。因此，其收取合法性政治紅利時段已

過，不但說省部級高官，縱便揪出個常委級大蠹，大家也不再驚訝，更不可能於歡欣鼓舞中領首承領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就是說，以反腐標領政治統治合法性的效用不再，大家更希望看到在民主法治思路引領下，將防治腐敗的制度建設提上議事日程，導入常態化的法治機制。畢竟，這一波反腐，針對的是過往幾十年積攢下來而遍於國中的權力腐敗、全民腐敗，而以非常人物依恃非常手段所推展之非常進程，若無相應扎實制度遺產，時過境遷，必定人亡政息。不說別的，就說公車改革，錢已經花出去了，但變相公車私用的地方性創造，花樣翻新，早已登場，即為一例。因此，引導其成為常態之下，基於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的民主法治建設，不僅考驗着統治體系的政治誠意，我相信，同樣在鞭撻着治理體系的政治智慧。

在此，事實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為民主法治國家經久使用所證明的，該採用的就當採用，到時候了。例如，暫且不說為何不兌現激活《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發揮它們在信息披露和權力制衡中的效用以預防權力腐敗，單從略小處來看，這麼反，那麼反，為何不啟動官員財產陽光法案？一方面，徵收公民個人所得稅雷厲風行，手機實名制關涉數億國民，卻也行之無礙，為何偏偏一到陽光法案就以這個那個，搪塞一陣算一陣。什麼技術手段跟不上啦，全國聯網做不到啦，簡直把億萬國民當白痴。果真有

誠意，深切著名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取信於民，全國做不到，那就從七個人做起唄。說白了，你家裏有多少錢，動產不動產，票據證券，放在瑞銀還是藏在地窖，晾曬出來吧，讓億萬國民瞧瞧。敢嗎，還是不敢；做，還是不做！這不是一個哈姆萊特式的追問，而是一個關於政治德性的常識測驗。恰恰在此，裝聾作啞，支支吾吾，拿億萬國民的智商和情商開涮，使得一切關於政治合法性的宣喻瞬間等於零，暴露的卻是權力的傲慢、市儈與苟且。你手上要是把這事辦成，你就名垂青史，否則，不過一介能臣幹吏而已！能臣難求，幹吏難得，但在建政立制的立法者面前，直若雲泥。

說到底，置此情形下，如今的反腐，以及為了解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採行的重新集權進程，包括所成立的各種領導小組，以及巡視組措置，某種意義上，的確是一個去制度化、解制度化進程，但也同時提供了重新制度化的契機。建設官員財產陽光制度，就是一個「抓手」，何樂而不為？今天發文件，明天發文件，這一年黨政發文最多，若無制度落實，也不過依舊是「一級一級往下念」，反過來，「鄉糊縣，縣糊省，一直糊到國務院」，不了了之。換言之，不在民主法治這一常態、常規的現代國家治理方向上用力，發再多的文件也沒用。

由此，引出一個連帶話題，涉及現代立國的根本理念，就是反腐旨在建設一個「道德

中國」和「清潔社會」，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但是，問題在於，如果駸駸乎道德潔癖，並用之於全民，包括食色性也的升斗市民，而實際效果是消滅了政治和權力結構之外的其他一切社會自我組織形式，一切私性領域的市民生活方式，則同樣是一種商鞅式理路，於良善人生和正派社會而言，適得其反。億萬國民，芸芸眾生，七情六欲，總得要消費，要happy，還要參與，無法清心寡欲，但也折騰不到哪裏去。即便像無煙工業，又何必趕盡殺絕。兩億五千萬青壯年農民工漂泊於大中城鎮，討生計，要活路，好歹給他們一個宣泄人性的機會吧。否則，基於道德潔癖的清潔運動，陳義過高，衝擊之下，既不切實際，結果反而可能造成普遍的道德偽善，最不堪而必然的是，豢養出更為高級的腐化形式。畢竟，愈是公眾人物，愈是大權在手之士，其之為人做事的道德水準應當愈高。而一般小民，善惡參半，優點和毛病集於一身，在吃喝拉撒裏打滾，沉湎於市民私性生活，以如今珠三角的市民生計為典型，放他們一馬得啦。這樣說，不是為人性惡伸言，更非為貪腐找尋人性根據。毋寧，作為有限理性存在，我們就是這麼個貨色，只能為我們自身深感無奈而悲憫罷了。要是指望並要求人人成賢成聖，個個鬥私批修，這日子沒法過。事實早已證明，修造通往全民聖賢和人間天堂階梯的努力，不知不覺間，同時就是在構築走向地獄的隧道。

第五，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無法迴避，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打發的。此為今日中

國最為敏感話題，也是一百七十六年近代大轉型最後所要解決的問題。轉型時段未完，政治統治正當性懸置，遂成一切內在緊張的源頭。內政外交，敵我公私，焦點在此。此亦非他，就是權力的來源問題。換言之，憑什麼你來統治？為什麼你掌權？過去一種講法是，領導人民打江山，犧牲了兩千萬人頭換來的。各位，這叫叢林法則，如前所述，例屬前現代政治，所以現在不講了。叢林法則將人世打回自然狀態，赤裸裸的。將叢林規則尊崇為倫理原則，表明的恰恰是獸性，而非人性及其光明砥礪。

據說，最新的講法叫「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可問題在於，哪個人民？什麼時候的人民？是當年我爺爺的選擇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現在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又有這麼多人民，換了一茬又一茬，能不能再選擇一回？老中國的講法是一「君權神授」，脫離了歷史語境的「人民的選擇」，以及政治神學的「歷史的選擇」，均排除了程序合法性維度，沒有現實法權的程序支撐，而不過是它的變種，聽起來響亮，其實弱不禁風。

在此情形下，以這一套陳舊的意識形態話語為憑，搪塞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一立國之本，迴避這一根本是非，這肯定不行。所謂政治統治的正當性，籠統言之，涉及三重合法性，此即績效、意識形態和程序，缺一不可。今日情形，績效合法性，甚為昭彰，而意識

形態與程序合法性，則有待開拓。畢竟，政治統治旨在實現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以「同意和承認」、「命令與服從」為樞機。總靠績效來維持，是維持不住的，不僅不可能永遠保持績效。績效總有令人不滿的時候，還在於人心不足，吃肉罵娘，一旦對於績效習以為常，就不再看重了。何況，不可能總是高效發展，永遠快速致富。因此，便需要後面兩項合法性來補充，來轉圜，特別是需要啟動程序合法性。縱便績效有問題，單憑程序，也還能維持。就是說，將十四億人民變成選民，讓選民進場，據選票解決「權力從何而來」這一根本是非，則鈔票和選票雙軌齊下，合法矣，正當矣。換言之，以「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彰顯和印證「政權的永久正當性」。現代政治說來崇高，其實還不就是這點小九九。

漢儒班彪《王命論》喟言，「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鯁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¹ 其間，德行昭彰、業績顯豁、神明祝福與澤佈生民，概括的也就是上述三要素，可謂道盡樞機。在現代法政哲學意義上，歸總而言，不外就是三句話二十四字：「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授受以公，臨治以法」。

否則，正當性云乎哉。

是啊，所謂「人在做，天在看」，這個「天」絕對不是地上俗物，而是指價值的超越

性，一種普遍的天道自然，永恆之法。在此刻語境下，上帝已死，「人民」不期然間變成了地上的神聖。人民是一個集合體，無法言聲，只能換身為市民、族民、國民和公民，進而，特別是公民進入政治，將自己化身為一個個具體的「選民」，這才有所謂的人民，也才有所謂的程序合法性。否則，大而無形，有等於沒有，無所託付，則情形堪憂。

此刻中國，一方面對知識界能壓就壓，也壓住了「大師王林」這類三教九流。另一方面，福山這類洋大師，卻在中國流行，一言既出，引為經典，其實南轅北轍，扯談。其情其形，與道士和尚進宮差不多，實在不是個事。

有感於文革會否捲土重來，疑慮復擔憂，遂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而有上述五點陳述，以為新年期許，則生死有命，禍福在天，知罪由人矣。

註釋

* 本文為2016年1月8日作者在天則所「新年期許」的發言整理稿。

1 班彪：《王命論》。

第十四章

阻止中國陷入「全面內戰」

這一年來，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死灰復燃，愈發猖獗。這邊廂，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挾帶着政治失意與社會怨憤，墮突乎南北；那邊廂，高校中早已退場沉寂的文革餘孽，乘勢冒頭，作跳樑小丑狀，叫囂乎東西。不僅喊打喊殺，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層面，四面出擊，而且，頗有掀起某種「運動」、經由首先整肅知識界與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會狀況，而全面否定「改革開放」的衝動與勢能。其言其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一定意義上的社會恐慌，並導致了一種將中國拖進「全面內戰」狀態的可能性。經濟下滑、資金外逃、官場懈怠、底層乏力、精英移民、知識界人人自危、新聞出版行業不知所措，這些就是不安與恐慌的晴雨表。因此，阻遏這一態勢，拆解這一可能性，防止中國社會政治狀態的持續惡化與全面倒退，蔚為當務之急。

此處所說的「全面內戰」，非指武裝交火，而是說法政哲學意義上，以敵我關係歸類與規訓國民，將鬥爭哲學和「你死我活」適用於國家政治，特別是公然指向知識界、律師、新聞出版從業者和民營資本，從而導致全體公民政治上的非和平共處狀態。由此，造成一種「人自為戰」陣勢中基於敵意的緊張、防範與恐懼的政治狀態，乃至於殺伐慾望，而非公民友愛與團結，在尤其表現為言論大幅收窄甚或噤聲的狀態中，結果是大家一同失去安全感，喪失對於政治前景的任何確定性預期，普遍恐懼遂籠罩人心。嚴重的官民對立和對於公共權力的徹底不信任、社會撕裂與輿論極化，不過為其表象。

其端倪，其理路，總括而言，大約表現在下述五個方面。

第一，現有體制在「維穩體制」基礎之上，正在一步步地，疊加上「戰備體制」，而形成「維穩」向「戰備」演進的體制形態。本來，百多年來的中國，歷經戰爭、革命與各種酷烈政治運動，長久罹陷於一種異常政治狀態，生死輪迴，生民塗炭。只是晚近三十來年間，放棄革命、戰爭與運動思路，多少解構內政上的敵我界限，以和平建設與改革開放為重心，進而倡說和諧，着意營造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意象，這才逐步有望迎來一個常態政治狀態，中國這也才邁進或者正在進入常態政治時代。托此之庇，國家與個人，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口袋裏才剛剛有了點兒錢，一般國民溫飽不愁，科教事業逐步復蘇與發展，慢慢過上了好日子。

最近幾年，隨着西方向右，中國進一步向左，不僅周邊關係吃緊，大國博弈緊繃，更主要的是，國家政治中的敵我思維重新上陣，導致原來的「維穩體制」疊加上了「戰備體制」。就是說，此處之「戰備」，不僅旨在迎應國家間的政治，防範外敵入侵，隨時準備打仗——畢竟，當今世界體系依舊是一種自助體系，浩瀚如中國這樣的文明復興與大國

崛起，當然意味着世界體系重構與全球秩序的重組，從而，必然引發有關國家的醋意與敵意。雖然中國不想惹事，但無需怕事，必需有所回應。不寧唯是，更主要的是，似乎指向內政，旨在找出、標定並懲罰「敵對勢力」，將不同理念、價值與意見的表達，乃至於一般純粹基於物質利益訴求的公民維權行動，悉數當作敵對勢力與敵對行動，時刻防範，隨時準備「狠狠打擊」。這導致政治形態一時間重新面臨不確定性，令一般大眾心理感受不安，擔憂「常態政治」未曾完全落地，「異常政治」又回來了，遂順理成章。

就是說，大家擔心是不是又要搞階級鬥爭，搞鬥批改，搞運動，整人。甚至乎，順此戰備體制思路往下走，所謂「先軍政治」，也在中國出現了苗頭。由此，東亞的軍備競賽，遂成事實。實際上，國際形勢緊繃與內政吃緊，從來就是互相強化，而終究難免彼此惡化。

有鑒於此，我們警惕中國滑向此種戰備體制，防止整個國策為此戰備體制所裹挾，進而，突破維穩體制，重啟全面改革開放，在一兩代人的時段內，逐步和平過渡，完成中國這一波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這既是歷史邏輯，也是政治邏輯，因而，是當下此際，吾華夏民族億萬生靈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諧理念」逐步被「鬥爭哲學」所取代。「全面內戰」的先兆，便是倡導了十幾年的和諧理念不再，而為鬥爭哲學所取代。鬥爭哲學崇尚鬥、鬥、鬥，在不過一代人之

前剛剛擺脫「文革」之禍的我們看來，其之非為正道，令人不寒而慄。前幾年大家反感以「和諧」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維持會長，有時候亦且多所調侃。但是，與鬥爭哲學相比，至少，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和諧理念雖說意在迴避矛盾，延緩矛盾爆發的窗口期，進而希望在拖字中遮蔽化解矛盾，但既以營建全體國民和樂融融的政治意象為旨歸，則其包涵了指向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體制並非本意如此，而是照此以往，可能具有此種趨向。故而，雖然其派生的維穩體制叫人煩心，但和諧理念本身還算讓人放心。扭轉此種平庸不作為局面，而銳意進取，的的確確，是刻下改制自我修復而建設常態政治之途徑，也是主動順應近代中國歷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強毅力行。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頒行後，特別是經由反腐整頓吏治，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但是，其軌轍，其進路，不是重啟鬥爭哲學，而是不外執政黨十八屆四中、五中全會所接續倡說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建設法治國家。再說一句，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而非突轉為鬥爭哲學，方為進取之正途。

朋友，我們不是鄉願，不是不明白，對於政制腐朽和官場腐敗，對於國家間政治的競爭性，特別是對於並非子虛烏有的外敵覬覦，需要起而應對，必須有所作為，也理解一開始啟用霹靂手段的必要性。然而，此與內政意義上的鬥爭哲學是兩碼事，更非等於鬥爭哲

學所刻意釋放的恐怖意味，而是在國家政治維度，必需導向民主法治軌道，以民主法治建設解決政制腐敗，慢慢形成中國的優良政體，進而，以「一國良制」承載完成大中華全境之民族國家建構。當下中國，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捨卻民主政治建設，既無法說明權力來源，從而沒法落實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也無法提供政治正義與憲法正義，從而，難以確立真正的法治，連真實的法制也難實行，而且，也難以突破大中華民族國家整合的困境。此為現狀與現實，無法掩飾，而直言陳述，還是盼望避免「全面內戰」狀態蔓延，趕緊結束愈益嚴重、官民皆有的不安與恐慌狀態，則吾人百姓安居樂業也。

實際上，就大中華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這幾年台港情形惡化，在已然回歸之際與營造可能統一之時，苦心經營之下，不僅沒有強化其向心力，反而導致其離心力愈重，正說明基於敵我劃分與鬥爭哲學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現了必須同時反對港獨、台獨的問題，實在匪夷所思。同時，無論是調適與東瀛和南海諸國的關係，還是兩年來的中美互動，但凡關涉國家間政治，而與周邊國家關係吃緊，需要仰仗的是以實力為後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個鬥字所能解決的。如果說此於國家間政治得解，那麼，當此鬥爭哲學徑直引入共和國之國家政治層面，就更加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或者惡化所能解釋。毋寧，實為威權體制乏力之際，驀然回首，極權政治思維的復辟。而其先導與表象，不是別的，恰

恰正為所謂文革式思維的回歸，由此，造成此刻這般令人窒息而惶悚的「全面內戰」式政治生態。朋友，大學教授表達一點與所在基層單位領導的不同看法，就被跳將出來的文革餘孽視為「反黨」，你說這不是文革式思維，又是什麼？

比如，前不久教育部長發文，一棍子打下來，將高校這一斯文發育之地定義為「陣地」，將全體高校教師劃歸敵對勢力範圍，令人齒寒。論其源流，正不外基於此種敵對思維與鬥爭哲學，而有此極不負責、最為卑劣無耻之言。其言其行，不僅在高校教師中無限樹立敵對面，給當下的社會緊張狀態添油加醋，而且，從根本理念層面上違背了政治正義，實在不配擔當總縮大國教育之首席長官也。各位，官員為了上位與自保，紛紛以出格言論和寧左勿右現身佔位，給社會大眾傳遞的是文革式社會政治信息，其之極端不負責任與無耻之尤，影響最為惡劣，危害最為嚴重，怎麼就不見高層警示撻伐呢？

上述現象，考鏡源流，東亞不期然間之進入軍備競爭，歐美右轉可能引發新一輪冷戰，均為誘發鬥爭哲學的外因，並互為因果。而一旦陷入軍備競爭與冷戰，對於中國這一尚處轉型進程之中的國族來說，其所追求的現代體制與國家建構尚未完全成型落地，則「現代中國」的涵養進程有可能因此中斷，非為福也。中國近代史上，此間教訓深重。一八九四年、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兩度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九四九年後，深濡

斯拉夫式蠻力極權政治色彩的猶太摩西——日耳曼式鬥爭哲學，參和着刻薄寡恩的法家思緒，風火相助，共同君臨中國，再度打斷現代中國的成長進程，直到一九七八年執政黨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中國歷史方始重歸改革開放軌道，以追求富強、民主和文明為鵠的。有鑒於此，今天中國切忌重蹈一戰前德國式、二戰前日本式與二戰後蘇俄式軍備競賽和冷戰覆轍；相反，仍需「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否則，失卻這一「窗口期」，現代化進程就此打斷，而下一次機會何時才有，誰知道。

第三，「公民團結」理想逐漸被「敵我關係」思路取代。和諧理念的致思進路是公民團結，並希望達成國民友愛與公民團結的結果。而敵我關係意識旨在區分敵我，強調「自家」與「外人」，意味着將國民分類為敵我兩方，而非共和國的平等一體的分享者。「趙家人」一語流行，正說明整個社會對此普遍不滿，也不屑，並以此修辭編織導火索。本來，「共和國」這一理念意味着全體國民均為國家的所有者，當然的主權者，縱有利益之爭與價值之別，何有敵我之分。而追根究源，之所以倒退回如此陳舊的非共和國模式意識形態，或者說，公然重祭前此十來年已然多所隱晦與消解的敵人論專政論魂靈，就在於當下政體缺乏國家哲學，面對轉型關鍵時刻之重重矛盾，無理論與思想利器可用，卻又因為利益所在，刻意拒斥包括古典中國文教傳統積攢下來的普世文明，不得已，只好重回最為熟悉的

敵人論。與此同時，大國博弈進程中的多邊互動所造成的步步緊逼態勢，因而導致意識形態的冷戰，實際上早已開打。其實，此間苗頭，早現於「五不搞」與「七不講」，而於二〇一五年初的反對普世價值思潮中喧囂登場，到如今，再度公開表現對於讀書人和新興社會階層的刻意防備、戒懼和排斥，表明了一種摧殘體制內外理想主義的極左思潮有可能重歸主流，則害莫大焉。正是在此情形下，不僅是社會上，而且，高校中的文革餘孽及其思維方式，亦已然蠢蠢欲動，甚至開始了針對特定教師的政治攻擊。因而，重提鬥爭哲學與強調敵我關係，實為一體之兩面，正在將中國拖入「全面內戰」狀態。

第四，共和模式淡化，黨國一體形態更趨強化。實際上，是黨國一體、黨政一體、軍政一體和經政一體，甚至有君師一體的苗頭。本來，改革開放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其本義，其進路，就是要在維護執政黨領導地位的同時，破解黨國一體與黨政一體，借由黨政分開而淡化黨國一體。最終，在中國近代歷史大轉型的意義上，實現還權於民，建設中華文明的立憲民主政治。胡趙改革與胡溫新政初期，基本上循此思路前行，使得國家建構的共和形態，彷彿蔚為政治大方向。可惜這幾年，雖然講得很好聽，實際上黨國一體的趨勢有增無減，上述五位一體的體制愈益突顯強化。而一旦黨國一體形成窒息性高壓態勢，徹底排斥和壓抑社會成長和民間發育，實際上等於以黨國方式將共和作廢，向全民宣戰，而

這與改革開放的根本思路和基本價值背道而馳，正在將中國拖入「全面內戰」的境地。正是在此情形下，才出現了諸如「央視姓黨，請您放心」這類錯位而肉麻的諛詞，而產權改革、地產確權遲遲難以到位，一部物權法所能確立的不過是半拉子物權，同樣原由在此。

凡此五種一體化，再往下走，伴隨着信息封鎖和輿論愈益鉗制，可能會導致中國的「蘇聯化」。就是說，刻下的後極權主義全能型威權政制，向着「史太林—毛澤東式」的左翼極權政制復歸。若果如此，列位同胞，可就害莫大焉。於國家間政治言，對中國是災難；在國家政治看，則是億萬人的無邊苦難。因此，阻止中國陷入「全面內戰」，意味着此刻必須「阻止中國的蘇聯化」，千萬不能讓「史太林—毛澤東式」的邪惡左翼極權政制再次戕害吾國吾民。

第五，維權政治消隱，暴民政治登場。二〇〇三年開始的「胡溫新政」，媒介以所謂「民權元年」嘉喻，略顯誇張，但卻本諸真誠善意，並且滿含期許。雖說虎頭蛇尾，但自此的確開啟了具有現代啟蒙政治意義上的民間自發維權活動，並有諸多權力與權利良性互動的範例，這些也是真實的。此後「奧運」在即，志在維穩，扛不住了，趕緊從舊兵器庫裏找傢伙，這一良性互動進程逐漸緩滯，並終究停滯，權力獨大一面倒格局遂又強勢回歸，民間以「權力向權利的反撲」諷喻，無可奈何。與「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相反，最近兩三年來，尤其是最近一年來，不料想，維權政治停滯後，暴民政治卻登場了，主要表現為時不時上演的草根毛左式暴力化傾向。

最近發生在濟南的草根毛左對大學教授的街頭圍攻與「大批判」，特別是它的暴力化傾向，是背後組織化運作的結果，並獲得了警方的變相容忍和體制內的快速響應。不是別的，正是後者，讓人不寒而慄，懷疑是不是又回到了「反右」與「文革」爆發的前夕。而暴民政治上演，不僅表明社會萎縮，宣泄出口受阻，以至於變態表達，而且，說明中華民族的現代啟蒙依舊是一個未竟的事業，對於現代性的野蠻性之中國式發作，那一段至為酷烈的歷史，缺乏系統深刻的清算反思，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朋友，積小惡而為大惡，匯點滴以成潮流，所有的政治運動，甚至戰爭，不都是這麼慢慢折騰，終於鬧大，而終究不可收拾的嗎！因此，街頭圍攻與大批判登場，及其暴民政治化，表明以治安對付政治、用政制反制政治的政體格局下，社會發育受阻，健全的社會理性建設與商談性對話機制闕如，則暴民政治疊加民粹勢力乘隙而入，社會生態惡化，正為「全面內戰」的不祥之兆，需要趕緊剎車，以防不測也。

再說一句，對此草根毛左暴民政治，必須趕緊剎車。否則，作為轉移與寄寓特定政治目的和發泄社會憤怒的暴力形式，必將蔓延開來，而不可收拾矣！

二

綜上五點，導致了下述五大後果，在在印證了有關「全面內戰」這一憂懼。

第一，隨着經濟下滑，資本外逃，深層的經濟問題透露了企業信心下降，而其背後，則是對於既有法制的不信任。雖然有「私產入憲」，《物權法》亦且赫然在世，前不久高層還以權威機構名義下發保護私有產權的通知，但卻沒能喚回信心，則經濟信心下滑的背後，是對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而法制之所以沒有獲得應有的公信力和權威性，是因為法制背後的政治體制，其政治道義信譽，並沒有建立起來，未能獲得確信，因此折射的是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及其道義信仰的闕如，造成社會大眾特別是有產階級對其信義不足的全面危機。換言之，對於既有政體是否能夠兌現保護合法產權這一政治承諾，並訴諸強固法制與程序公正，實在沒什麼信心。此刻極左思潮和極左理念推波助瀾掀動的「全面內戰」態勢，特別是高層權力機構的言行不一與地方公權機構的曖昧態度，無疑加劇了這一疑懼與恐慌。

無論是在共和國與公民理性立論，還是在民族國家與國家理性立場，抑或從消費主義和市民理性出發，再怎麼折騰，也不能把經濟搞垮，讓大家沒錢花，生活質量往下走嘛。

刻下政體雖說並無正當性，但憑藉經濟發展的績效政治，大體上的社會治安，好歹贏得合法性認同。但是，若果又要過緊日子，上頓不接下頓，甚至連地主家也沒餘糧，則連這點兒合法性也會迅速喪失殆盡。更不用說，山雨欲來之際，在一個政權的永久正當性無着的國度，是不可能以政府下台這種「政府的周期合法性」更迭來化解正當性危機的。

第二，官僚階層普遍不作為，文官集團軟抵抗，底層創造力與民間活力正在逐步喪失。各位知道，中國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依恃高層推導與底層創造力之兩相配合。民間的活力，包括民營資本的創造性增長，加上官僚集團，尤其是地方官僚集團的利益驅動與政績推導，特別是多所緩和、寬和的政治氛圍，官家不再着意傷民，少擾民，給社會鬆綁，凡此聚合發力，造就了三十年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但是，此時此刻，伴隨着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不僅民間活力正在喪失，底層創造力墮矣，而且，官僚集團的不作為導致改革空轉，甚至借改革的名義而行反改革之實，或者，徒有名頭的假改革反倒大行其道，正在使改革所積累的政治信義，以及由此培養的全民信念，逐漸流失。由此，為了應付而無事忙的所謂改革，沒事找事，比如刻下的司法改革與某些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其這一場鬧劇便為一例。

第三，最近一兩年來，面對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的日益坐大與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的

回歸勢頭，已經造成全民人心惶惶。尤其是知識階層，社會精英團體，包括權力精英、資本精英與知識精英，普遍感到不安和憂懼。此種情形如果再進一步加劇，可能摧毀這個社會最具活力也最具中道理性的建設性力量。同時，也就是一種大轉型關鍵時段、各種矛盾爆發之際可得依恃的緩衝力量。其於社會撕裂之際，實際上令社會自主性——如果還有一定自主性的話——遭受重創，社會發育停滯，削弱的是中國社會最具創造力的部分。

我實在不明白，中國的讀書人老老實實，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情，任勞任怨，起早摸黑。為何在極左勢力眼中，動不動就被視為敵對勢力呢？

第四，晚近十年，制度固化，舊體制復歸。這一苗頭起自奧運會、世博會，只是這幾年舊體制復歸的步伐在高亢改革聲中反而有所加速。由此造成的結果是，過去幾十年來以與國際接軌為名、而行制度和解之實所積累的制度成果，有可能在強調制度競爭，而實際上是僵化制度、固化制度和舊體制抗拒改革開放，抗衡建設優良政體的政治努力的趨勢下，逐漸流失。此種態勢和心路，逐漸蔓延，甚至造就出了一批理論上振振有辭、其實不知痛癢的「青年左派」，以及賣身投靠而翻轉於隱蔽戰線的特殊職業者，如高校中月月拿錢的「特殊學生」，所謂「輿情監督員」也，與中老年猙獰毛左一唱一和，實在令人擔憂。

第五，帝國情結與戰略透支。最近幾年，曾經的帝國，包括奧斯曼故地、波斯舊址和

沙俄家鄉，眼看美帝日趨疲憊而倦勤，歐洲的內向和收縮，其潛在帝國傾向和帝國情結發作，或明或暗，都顯露出重振帝國的野心勃勃，而蠢蠢欲動，強化了這個本已動蕩的世界愈發嚴重的不確定性。從表面看是內外交困之際地緣戰略的新情況，底下實為帝國情結作祟使然。舊舞台、老唱本、新演員。置此情形下，在一些境外觀察者看來，似乎隨着中國復興勢頭洶湧，中華帝國亦呈王者歸來之勢。為此，中國恰恰需要避免此一險境與陷阱，而以內政優先，在解決好內政問題之際，再圖施展也。沒有優良內政與經濟的持續增長墊底，在國家間政治上也不會有吸引力與發言權，復興與崛起云乎哉。

畢竟，吾中華全境，尚有數千萬同胞未脫貧困，幾千萬留守兒童失學失養，數千萬殘障人士需要扶助，以億萬計的同胞面臨養老問題，更不用說時間因為貧病交加而一家自殺的慘劇。則全體國民多少年苦下來，累下來，就攢了這麼點兒的家當，怎好為了滿足千古一帝的偉大夢想，便拿到世界各地揮霍充冤大頭呢！

三

上述五點表現和五點後果，至少披露了下列三個問題。

第一，現有政體及其高層缺乏歷史感與歷史理念，對於具有道義感召力的歷史願景未能以政治佈局作出應有的回應。一部中國近代歷史，整整一百七十八年，是秦漢大變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也是十七世紀初起始於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現代文明秩序鋪展開來以還，在東方的一次最為偉大的呈現，而正在引領出一個太平洋文明時代。這是世界歷史大趨勢，沒人能夠抗拒。因此，無論是清末擬定的九年預備立憲，還是民國政制設想的「軍政、訓政與憲政」三步走方案，都有一定的歷史觀，而表諸「路線圖」與「時間表」。後來共產黨鬧革命，追求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高級階段之分，其對錯另當別論，卻都表明具有一定的歷史感與歷史觀，體現了一種基於歷史自覺的政治自覺。然而，此時此刻，我們除了看到「兩個一百年」這種技術性表述外，就看不到歷史觀，未曾觸發歷史感。各位，除非是完成現代轉型、歷史已然終結的國族，只需孜孜於具體公共政策層面，否則，歷史觀、歷史感與歷史願景的闕如，是政治之大病，也是國族心智羸弱之敗象。其表明前景不明之際，既無心也無力，則市儈政治與平

庸政治借助權力政治統轄社會，必至極權登場，而白茫茫大地也。也正因為此，上述後果和「全面內戰」態勢，遂應運而生。

第二，當下中國缺乏國家哲學，缺乏對於國家理性的拷問、提煉與政治表達，也缺乏健全啟蒙了的公民理性來制約和導引國家理性。執政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治理體系，可謂順應時勢與人心。但現實情形卻是，由於意識形態再度逐漸收攏，底層創造力受壓，僵化體制反而復歸，其表現為上述文革式思維與行為方式再度登場，內裏則是因為當下中國缺乏國家哲學和對於國家理性的深層次理論拷問和思想提煉，精神貧血困乏，有以然哉，所以然哉。就此而言，中國文明的法政哲學、歷史沉思與倫理追問，正需卧薪嘗膽，以在境性成熟思考，支撐起大轉型所需之心智與心性，而不當再祭敵我矛盾與鬥爭哲學大旗，摧殘正在發育涵養，而有望蓄勢待發的漢語思想，打壓天下讀書人的自由思考也。

第三，值此歷史關鍵時刻，當下政體缺乏道義動機與基於現代中國歷史意識的政治擔當。此一道義動機和政治擔當非他，就是以中華文明的復興為己任，以全體十四億中國人的福祉為福祉，而非以一黨一派利益為歸屬。而十四萬萬中國人民的最大福祉，不外是在依歸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意義上，追求富強、民主與文明，在此刻往下的一兩代人時段內，最終完成這一波歷史大轉型，而締造一個「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現代中國。而恰

恰是在這一點上，由於歷史觀闕如，導致道義動機萎靡，故而，未能強毅力行，肩負起這一歷史擔當、道義擔當和政治擔當，則行百里者半九十矣。

四

幾年前，大家焦慮的是改革往哪兒改，怎麼改，怎麼改得這麼慢。畢竟，自一八六〇年開啟洋務運動以來，「改革開放」及其所確立的基本路向、理念和願景，是中國現代政治的主流歷史意識，也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雖幾經反覆，迭遭波折，卻不絕如縷，終究彙聚成長河大波，洶湧澎湃。但是，僅僅過了兩三年，在一片歡呼聲中，歷經一百多年的奮鬥，尤其是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沒料想，今天我們的擔憂變成了一「怎麼在倒退、為什麼會倒退、不知道還會退到哪一步？」這樣的恐慌和憂懼。

這是為什麼？

當然，大體兒上來說，它源於世事與時勢，而輾轉為今天的形勢。而今天的形勢，凡此不進則退與普遍擔憂，正如執政黨的判斷，實際上表明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到了

一個關鍵時刻，各種矛盾匯聚，卻又未能正面迎應，有以然哉。也就是說，超逾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長程大轉型，一個秦漢以來最為浩瀚而劇烈的大轉型，到了最後的收尾階段，一個即將水落石出的收束時刻。因此，各種矛盾積聚其實早已提示出了核心所在，而必得有所取捨，遂有「決戰時刻」一說，乃順理成章。細言之，「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與重締意義秩序」的四大義項與意向，歷史進程正走到了「提煉優良政體」這一關鍵時刻，亟需以啟動民主政治來正面迎應，而非虛與委蛇，甚或逆潮流而動。因而，同樣不言自明的是，其之特別需要道義擔當和政治決斷，既在應對眼前困境，更在導向最終走出「歷史三峽」這一歷史大勢，更且順理成章。

就世界體系與全球秩序而言，戰後維持了七十年的雅爾塔體系搖搖欲墜，因此，世界向何處去，同樣面臨拷問。大國小國，都不安。大國負擔重，轉型中的大國身心有待發育健全，卻又無法推脫大國負擔，彷彿更且不安。從內政來看，離心力進一步強化，「全面內戰」狀態初現端倪，加劇了這一不安。凡此表明，的確確，所謂的「改革開放」，換言之，中國的大轉型，到了緊要的關頭，也是最後的收束殺青關頭。

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需要啟動「新南巡」，以擊退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化解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與「全面內戰」之憂。

一九九二年春，鄧公衰年力撐，浩然南巡，將中國從一九八九年後的三年徘徊倒退期中扭轉過來，重新踏上改革開放征程。從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的執政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到此後的四中、五中全會，於現代立國理政諸端，無論是理念還是具體指向，多所建樹。然而，如前所述，問題在於落實。如何經由制度實踐，才不至於不僅不見落實，反而只見倒退，這才是問題所在。眼面前橫亙在國人心頭的倒退之憂，恰恰說明時勢危急，確乎到了需要啟動新南巡的時候了。

說「新南巡」，不是說要某個人站出來，往南踴躍，而是指需要發動這一意念，表達這樣的政治擔當、道義擔當和歷史擔當，以政制的動員力兌現政治，從而扭轉改革頹勢。有人以「正在下一盤大棋」為譬，吾不知真假，難以置喙。但是，若果真是一盤大棋，無論棋手何人，則什麼棋都比不上富強、民主與文明維度中的「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個如來佛手掌大。棋手需要奮起擊退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啟動「第四波改革開放」，以最終完成中國近代這一波大轉型。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而當務之急，是要摒棄內政意義上的敵我理念與鬥爭哲學，以改革開放的實際舉措，消除關於中國可能會陷入「全面內戰」這一普遍憂懼。

整整一年前，筆者發表〈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一文，為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的悄然回歸而預為警愴。不料，一年來的情勢發展，恰恰不幸而言中，實在是意料之中而情理之外。此時此刻，撰寫本文，愈發忐忑，為「全面內戰」憂心忡忡，則但願所言落空，至少，經濟不至於繼續下滑，而官民兩造幸甚，蒼生有福。在下一介良民，教書匠，不想惹事，安穩吃飯睡覺也！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修訂，時霧霾鎖城，窗外雪花紛飛

註釋

* 2017年1月10日，天則「新年期許」發言。

第十五章

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

初冬的夜晚，又是周末，來了這麼多人，可見惺惺相惜。此來滬上，從北京一路南下，窗外朦朧，景物依稀。這不，華北大地與長三角一線，半個中國，都籠罩在低垂霧靄之中，密不透氣。此情此景，彷彿訴說着冬景三分，一絲細雨纏綿，一絲陰沉壓抑，還有一絲翹首天清氣朗的殷切期盼。是啊，縱便滿紙焦墨，潑灑熏染，卻有留白，頓時一線生機。

故爾，此時此刻，不管霧鎖雲重，「吾心樂處，不要他人，共同稱善」，以《重思國家》為題，坐而論道，自有一番心情。

一、責任概念讓生命獲得了尊嚴

最近兩三年來，不安全感、不確定感、對於未來的忐忑，不僅沒有隨着機關正式文件之連篇累牘而稍有鬆懈，反倒有所加劇。此情此景，委實弔詭，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旁觀者，恐怕均感意外。置身當下，忐忑表明我們之所以對於身家性命止不住地掛念，實在是因為外在的初始條件製造出了這份懸念，從而催逼着我們孜孜於生命必得免於恐懼這份意

念。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源遠流長的文明格局和錯綜宏闊的政治結構當中，其之鋪天蓋地無所逃脫，讓我們每個人一生下來就無可選擇地裹脅其中，而構成了先於我們存在的初始條件，也是我們每天不得不面對的基本生活狀況。經此扭結，我們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体，也是構成它但卻因為極其微末而隨時可能遭受滅頂之災的分子化結構，甚至，一種阿倫特意義上的「無根的飄泊者」。

朋友，這個宏闊的政治結構不是別的，這個共同体不是別的，就是國家。——是的，它的名字叫國家。

具體而言，對我們來說，這個國家不是別的，就是此時此地的「中國」，我們起居離、歌哭於茲的家園。千年的老宅，萬年的家園，「一觴一詠，遣人驚」。因此，中國為何？中國如何？中國奈何？它的一呼一吸牽連着千家萬戶的柴米油鹽，它的安危治亂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存亡生死。置此邦國，既無所逃避，不能割捨，也無以超脫，或者，將頭埋在沙裏，以犬儒姿態自欺欺人，那麼，關心這個國家，反思中國在此浩瀚轉型時刻的來龍去脈，思考中國已然、應然和可能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宿命而必然的，就成為我們每一個羈縻於此的國民和公民均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追問，也必須有所思考，總得交出一份答卷。否則，沒法活，想活也活不好。

今天介紹的這本書，就是源於這一問題意識，若有所思，終有所思，「借問堤上柳，月到愁邊白」。十二位作者，都是一九六二年生人。時輪不息，一轉眼到了二〇一二年，他們年已半百。劍濤教授提議，我們不僅應當有所思考，而且必須多所發聲，肩負起應盡的責任。該盡的責任必須擔當，就像四時歲序之更替，如同生命之必有其尊嚴；亦正因為生命內在獲享尊嚴，才有了責任的概念。而責任概念，正是責任概念讓生命獲得了尊嚴。由此，遂有二〇一二年冬天在北大的第一次聚會研討，刊行了第一冊文集《重思胡適》。第二年在清華大學法學院，以國家為題聚議，成果是擺在大家面前的這冊《重思國家》。第三次聚會在南京大學召開，主題是社會。明天在交大，以文化為主題，致力於重思文化的基礎意義。明年的討論地點將在中山大學，初定以「重思世界」為題。主題有變化，心思則如一，總是縈縈念念於此時此地的灑掃應對，不脫刻下時代的苦慮焦思，翻騰於神事與人事，圍繞着影響並決定了我們芸芸身心的時代主題，並為此主題濡染上罹陷此一時代之中的鮮明個體特徵。

說到這本書，《重思國家》，係由十篇論文組成，以國家為題，卑之無甚高論。總體以思，大約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部分是在建構論、生存論和發展的歷史脈絡意義上，梳理近代國家的一般學理和基本的知識脈絡。第二部分着力於反思近代中國的立國建政過程，

尤其是其間所涉及到的主權與政權、城邦與政治、人民和國家、文明與生存以及中國與世界等內容，反思在此新舊文化交替、古今社會嬗變的大轉折時代，究竟這樣一個法律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在何種意義上得為一種命運共同體；反之亦然。諸公於此沉潛反省，角度不同，進路有異，卻心路相通，志願如一。第三部分主要以代表性的思想個案，包括傅斯年先生關於國家的思考和後學衡時期的國家觀念，以及國家在儒學和自由主義兩脈線索中的位置，從此入手，重溫先賢的思考，而反思當下的國家現狀，從而找出改進的機緣，探索應有的出路。

總之，本書圍繞着國家這一既定的政法結構、這一文明與政治的集合體，特別是一「現代中國」的已然與應然、理想與現實，觀察思考，再三致意，算是人到中年的這一批學人，積此前三十年所學，做一小結，向時代交卷。

本書封底正中和封套書脊處印有一行小字，兩句話，摘自本書「序言」，也為在下經年申說，反覆致意。此即「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責編岑紅女士以此壓軸，概得全書主旨所在，眼力犀利。為什麼這樣說呢？蓋因現代立國，千頭萬緒，而綱舉目張，精髓不過如此也。就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現代中國」的建構進程而言，一方面現代國家起自民族國家構想，從朝代國家蛻變而來，朝向政治國族目標疾馳奔去，因而，民族本位與以

民族主義立國，天經地義，是離不開的話題。也就因此，「民族國家—文明立國」，獨立蒼茫，可堪依恃。否則，連個立身之地都沒有，自己姓什麼也不知道，遑論其他。另一方面，也正因為現代立國指向政治國族目標，孜孜於政治成熟，使得國家不僅是基於族群共同體而來的民族共同體，而且，是億萬公民分享的公共家園，一種立基於立憲民主建制之上的公共空間和公共建置，一個法律共同體，而非一家一姓一黨一派的私宅。我重申一句，國家是全體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所謂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私宅，亦非一黨一派的政治殖民地。在此，公民之為一種政治存在，以獨立個體「天生德於予」，也就是天然享有道德主體性和道德主權為屏，挺立於天地之間，以自由為最高價值。之所以讓渡部分自由以組成合意的共同體，為的是形成捍衛自由的普遍相互性格局，在危乎殆哉的制衡性存在中確保自由，而首先是基於法權的個體政治自由，從而庶幾乎營造愜意可欲的人生。至此，它要求國家不僅是一種民族主義組織，而且需要以自由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建構自己的政治理性，以護持自由以及基於自由而追求作為愜意人生之題中應有之意的平等，以此表達政治誠意和德性，而恰成一共和局面。如此這般，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的精神脈絡，突顯了一個文明共同體汲汲於建構政治共同體的心智和心志，實在才是所謂長治久安，也就是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根本。而提供和平，並非只是治安意義

上的秩序。畢竟，那構成了政治及其地上肉身的國家的最高良知良能。職是之故，與「民族國家—文明立國」相對應的，便是「民主國家—自由立國」。兩維挺立，邦國安固，國泰民安。

概其要旨，不是別的，正是「以文明立國」來建設民族共同體，「以自由立國」來建設政治共同體，兩相集合，才能形成既有集體尊嚴和基本公共產品，又能護持個人自由與捍衛愜意人生的現代國族格局。因而，「中國」與「現代中國」不是別的，而是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人民與城邦的共同體。吾儕之責，其責在此。

換一個角度來看，通常所謂「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可概其旨。是啊，造就愜意的華夏家園，雖說千頭萬緒，但論其大綱，正不外乎此。此為我對本書主旨，略予總結，聊供分享，並期討論。

二、主權的義項與意象

「文化」一詞，其實循名責實，刻下機關文牘所言「文化」，與我們一般教書匠讀書人心中的「文化」，彷彿並非同一概念，或者，不完全是一個概念。論內涵，論外延，「文

化」一詞歧異紛繁，各有體認，各有表述，不足為奇。但縱便如此，若無任何通約，就不正常了。

概言之，所謂「文化」是指文明共同體基於數千年的傳承，在有關人之為人的義理結構、日用倫常方面，所表達並循隨的一套意義符號系統，見諸生活方式，見諸器具、制度與義理，而以其文明意義為樞機。天地之間，生民嗷嗷，其生死靈肉、其此岸彼岸、其禍福出處、其義利趨避，凡此文明意義，源自生聚作息，演成傳統，展現為知識、理論、學說、思想乃至信仰的分層次指示，而積久成習，落諸習俗、禮儀、道德、法律和宗教的規範性。

與之相對，機關文牘所講「文化」更多偏重於意識形態作業，一個能夠為國家權力裹脅運用而如臂使指的歷史形態學與政治意識形態教義學，外加一套循規蹈矩的社會行為指令，總叫人感到鉗口與聽話的意思。若說萬民溫順，正常年景裏平和有序，吃苦耐勞，謙恭有禮，多賴其訓育。若說人性壅蔽，靈氣窒礙，致使年景稍異，輒眾口驕驍，其勢囂囂，亦為其造孽也。所以，其之縷紕「文化軟實力」、「文化工程」和「文化產業」，就不能不圍繞政制合法性建構和國家主義展開，而非圍繞着文明自覺與人性啟蒙用功。當然，

即便如此，兩種文化概念之間依然多所交集，也無妨溝通對話。至少，單就所謂「文化軟實力」概念而言，便有許多值得溝通也可能溝通、需要對話也應當對話之處。

置此情形下，牽連於刻下討論的「國家」這一主題，下述要素是繞不開的。比如，劍濤說國家意味着人口、土地和政府或者規範之三位一體。此即所謂「諸侯三寶」，並未過時，依然不妨作為一個分析的大框架。問題在於，什麼規範？怎樣來規範？規範什麼、規範誰？換言之，是什麼內在機理把土地、人民和政府連為一體。連為一體不僅是指自然的千年生息過程，其為文明，自有張力，而且必有政治法律結構橫跨其間，方始能夠將它們凝聚起來而構成共同體，從而，為此文明增添文化內涵。在此，尤為突出的一項，也是所謂政治法律結構的核心，就是主權。問題在於，主權意味着什麼，主權的統一性與主權的各個義項之分解，構成了何種政治法權關係；假若法權義理上以籠統的主權照應，比方今天俗常意義上一講主權就只講國家主權，而使主權在某種意義上彷彿更具壓迫的意味，那麼，此非惟主權論者也不願看到，也是對於主權義項的閹割。職是之故，反轉過來，對於主權進行更為細緻的解析，實在是迫切的學理作業，也是現實生活的需要。

有見及此，從漢語「主權」一詞入手，以一兩百年來中國近代的建國歷史為鑒，對主權進行細緻分梳，於具體義項的解析中提煉出主權的統括的政治意象，堪為一條進路。在

下嘗以道德主權、人民主權、國家主權和歷史文化主權，凡此四項，條分縷析，展示出國家學意義上主權多層級結構的複雜性，在這裏簡略說來，與各位分享。

先說人民主權與國家主權。在今天的語境下，歷經磨礪，國家主權不言而喻，也是將國家這個龐然大物矗立起來的擎天支柱，綱舉目張。但是，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人民」的頭上非得罩上一個這個叫做國家的共同體不可，我們為它交糧納稅，當兵打仗，理據何在，圖個什麼。這便牽扯到結構功能意義上的國家的現代意義，特別需要交代清楚國家主權的來源。換言之，國家是地上物，國家主權是中間項，本身並非終極理性。在國家主權之後與之上，一定存在着一個比國家主權位階更高而且蘊藏更為深厚的主體，一種政治結構與道德存在。以此為憑，國家方始立得住，立得起來。上帝還沒死的時候，天還管用之際，說上帝是萬源之源，諸動之動，惟天為高；在今天這一世俗政治結構中，上帝卻沒了位置，天地物理化了，君權神授便講不通了，則正當性與合法性的陳述只得訴諸這個叫做「人民」的世俗本體，一個偽裝成俗世存在的神聖存在，一個行走於地上但卻扮演着神聖任務的當下存在。由此，人民主權窮竭了權力位階的上限，才是權力之源，也是國家主權的更為高遠、更為深厚、也更具理論解釋力和道義感召性的主權者。其他一切，包括黨派團體、立法機關、國家本身以及它們的領頭人物，都是地上物，不是天，不是神，而是聽命

了人民主權，為她打工，早已喪失了代神傳旨、替天行道的任何理據。

繼說道德主權與歷史文化主權。這裏的問題意識是，俗世的人民主權為什麼窮竭了權力位階的上限，或者，為何它享有至上主權位格？我們這群芸芸眾生，集合起來，叫做人民，在日常世俗生活中，表現為一個個肉身凡胎，居然是至高無上的人民主權的聯合掌有者，所據何來，指向哪裏？原來，「天生德於予」，不論紛紜個體還是森然集合體，其之天然獲秉有限理性和道德判斷力，是人之為人的本根所在。辨別善惡、進行決斷的道德能力，特別是辨別善惡、進行決斷的責任，賦予個體與集合體以道德主體性，從而，使得他們獲秉道德主權。這也是一種道德尊嚴，為人民主權之所以成立提供了心智和心性基礎。換言之，人民主權之能證立的道德基礎，在於立基於責任概念的道德主體性，在於淵源於這一道德主體性的道德主權，在於表達這一道德主權的道德尊嚴。若無此間因果關係，丁一卯二，環環相扣，則一切現代設置必將轟然坍塌。「此地居然形勝，似曾小小興亡」，則形勝在此，而興亡繫此也！

進而言之，人之作為文明的載體，人民之為一種文明的天然擁有者和實踐者這一實踐歷史本身，即已證明在「以政治立國」及其最高境界的「以自由立國」之外，尚有一個文明立國的問題，因而，決定了人民主權的擁有者及其安居邦國同時具有歷史文化主權。換

言之，歷史文化卓然一格，特立獨行，無論國家主權還是人民主權，均無法消隱歷史進程的意義世界與意義世界的歷史進程。相反，可能均為其所決定，是它的外顯形式而已。實際上，它們不過是歷史進程的意義世界的體現，也是意義世界歷史進程的結果。至少，任何政治權力若非披上一層文明衣鉢來表彰道統，是斷然沒有合法性的。此為一切成熟政治所熟稔的，也是古往今來卓然政統之享有凜然正統的支撐性要素。因此，這個叫做文化、文明的東西，不能為任何強力所剝奪，而展現為獨具一格的「歷史文化主權」。就現代形制而言，它可能落諸一國治域，也可能跨國展現，更可能蔓延為洲際現象，但卻為起居其中而以此憑依的人民所分享，從而構成人民與文明的同一，邦國與政治的統一，則一般無二。就此而言，在國家政治法權界限之外，尚有文明板塊的清晰分際，彰顯的正為此歷史文化主權之傳承賡續，傲然不屈。

至此，現代立國，以道德主權奠基，而展現為實踐主體性的人民主權，再一路輾轉，顯現為經此授權而獲秉的地上的國家主權，並為歷史文化主權所祝福（也可能為其所詛咒）。四權合一，扭結成體，恰為此刻論題中完整意義上的主權。由此，國家得以立基並獲得了支撐，進而才可能拓展出家國天下的世界公民共和主義。

三、人民的還原論

縱便如此，反思現代國家與國家建構，牽扯分疏出道德主權、人民主權、國家主權和歷史文化主權，事情至此並沒結束。因為，這個叫做人民的東西究竟有何神通，竟至於將上帝趕出了國家，僅以道德主體性為憑。這尚嫌不足，有待更為細緻的分疏。朋友，正是在此，它聯翩帶出了「人民」的還原論敘事。如同對於主權的分析敘事，此處關於「人民」的還原論，為的還是解構國家的無上神聖性，使國家這個巨靈不至成為壓迫者，特別是力避接受國家主權委託而執掌治權的政府，使之不至於太過霸道，恪守其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角色，進而為國民謀福祉，「為人民服務」——此即曾任中共總書記的耀邦先生所言，「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¹。晚近以來，特定語境裏，國家及其政府太過強大，以至竟成絕對壓迫者，教訓深重，料想大家均有同感，等於為此梳理提供了時代背景說明。

在此，讓我們從阿倫特說起。這個學期和學生一起，每週一次，讀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九章的標題是〈無階級社會〉。什麼是「無階級社會」呢？通常我們說階級或者階級鬥爭，包括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以及它們的「你死我活」等等，是在社會

分層與利益分趨的意義上來說的。一九七八年以降，執政黨文件宣布階級和階級鬥爭不在了，也是有鑒於此而言。阿倫特未曾根本拋棄這些意義界定，但所指更為寬泛，講的是極權主義打碎一切階級階層，以造成一個均質同質社會，從而迫使其圍繞着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力中心旋轉。以兩次大戰之間的日耳曼一系和已然延綿超逾一個世代的斯拉夫一系為例，在阿倫特看來，以民族取替人民，以群眾消解階層，消滅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虛偽」分際，用「消極團結」造成國民的非組織化生存，最後用暴民與精英的臨時聯盟，將一切能夠當作自我標誌化、作為認同紐帶而相互區際的社會關係徹底打碎，從而，造成了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恐怖的平面體，是這一權力形態的樞機所在。至此，納粹組織取替了政府與國家，不僅消滅公民社會，而且，既反左，也反右，打碎官僚體系，打掉「團團夥夥」，迫其功能喪失，社會均質化，整個結構消解，國民的生存政治感消弭於億萬分散的孤獨者與一個最高權威的聯繫之中。如此才能找到歸屬感，或者，根本就消弭歸屬感，而將一個為民族或者人民的概念所劫持的群眾，變成了本質上的人間的無家可歸者，一種無根的分化存在，一群孤獨的飄泊者。

走到這一步，一個沒有具體分層和階級的社會中，不僅公民沒了，人民也沒了，國家變成極權體制所征服的殖民地與坐享的戰利品。

為此，既然人民是至高無上的人民主權的聯合掌有者，那麼，對於人民概念的分解還原敘事，不僅在於防範對於人民概念的濫用，而且在於以當下生靈肉身的具體化生存境遇來驗證兌現人民位格。這一還原分梳，緊扣個體的生存形態，逐級遞升，而以「生民」、「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以及他們的能動實踐身份「選民」，分別定位，遞次標識，從而，將高高在上卻虛擬的集合體的政治權力，具體坐實於顛撲不破的個體位格及其行動權能。別講大而化之的人民這個人民那個，咱就事論事，看看生民、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特別是選民，都有哪些個兒權利義務，而具體審核——坐實。

起自「生民」，其之天生地受，生生不息，恰為天地造設的道德主體。首先是一個自然存在和自然權利主體，而且，「天生德於予」，她與他是有限理性與道德心性的藏身之所，更是責任這一高貴人性的擔當實踐者。生民落地，無以選擇地成為某個特定種族、民族或者族群的一分子，以此自我認同和相互標定，是為族民。無論生民族民，生存和發展便是硬道理，每天總要吃喝拉撒。在世俗的肉欲浮沉中，為了甜蜜美好的生活而打拼，為一家老小的生計而奔波，例屬天經地義。因此，我們是徹底的市民社會的市民。任何體制，均不能否認我這樣的權利，不能否認這樣的生態。與此同時，因着我們是群居動物，因而，一己的生存難免關涉公共事務。公共事務必定輻射影響私人生活，因而，人人都有

關心公共事務的公共心腸。為此，建設公共空間，達成公共理性，以處理公共事務，是生存和發展的必需，決定了我們不得不擔負起一個更為重要的身份以及基於這一身份的更為沉重的責任。它不是別的，就是公民。因為公民這一法律身份和政治人格，我們得以擺脫生民這一自然狀態和群眾—老百姓這一前政治狀態，成為一個自覺的公共存在，一種政治存在。也就因此，這個社會不僅是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和市民社會，而且更要進入政治社會這一境界。與此同時，各位，我們還有一個普世身份，這個身份是這個時代任何人所逃脫不了的，那就是國民。至此，從生民、族民、市民、國民到公民，我們已然具有五重身份。至於秉具最為優良的道德境界和政治自覺的公民，是文明共同體、政治共同體中的卓異之輩，在一個歷史比喻與政治神學的意義上，不妨叫做天民。

但是，無論生民、族民、市民、國民還是公民，若只有純粹的語義鋪陳與義理演繹，卻不能落實為行動權能和實踐指向，則此毫無意義。就是說，沒有基於法權程序的行動權能，就無法將自己從道德主體變成實踐主體。在構成現代國家的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總綱領之下，有一個方法，其代價最小，實踐中最為理性和平，就是賦予公民以選民身份——是的，以「選民」這一行動者身份歸束上述五民，一切論述才有終極意義，也才能獲得終極意義。

看官，選民之為選民，是因為手上有選票，因而，方始獲得了力量。否則，我們這些平常日子裏為柴米油鹽而上班做工的芸芸眾生，一種非政治的存在，面對組織化的國家，真的只是俎上死物，任人宰割了。非他，每隔幾年，有個將作為市民和國民的自己兌換成選民的公共儀式，這些叫做國民的男男女女，才可能一變而為公民；這些叫做公民的國民，才可能為國家所尊重。首先具象的是為政治權力和競逐政治權力的政治勢力所不敢小瞧。要不然，平時我沒轍，可這個節骨眼上，「老子不投你票！」看你老小子怎麼着！「乖隆的東」，走到這一步，文明用了五千年。

所謂統治的合法性，這個那個的，歷史現實的，別扯，都沒用，就看這選票一張也！

四、轉型期的三大定律

臨了再說一點，也是一個極易招致爭議的判斷，就是中國這一波的大轉型，已然到了最後的收束時段了，所謂「國族天命」與「臨門一腳」也。為什麼這樣說呢？蓋因這一波大轉型，源自「中國問題」，終究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歸屬。說到「中國問題」，意指現

代早期地中海文明以還，晚近四百年裏世界人類大轉型的宏闊背景下，與「英國問題」、「法國問題」、「美國問題」、「俄國問題」、「德國問題」、「西班牙問題」以及「伊斯蘭阿拉伯問題」相提並論之一大轉型案例。這三四百年，論內涵、論規模、論影響，以此八大案例最具典範意義。僅就「中國問題」而言，以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為旨歸，追求富強、民主與文明。綜其核心義項，可以歸納為「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凡此四項，尤其必以提煉優良政體為收束，而為政治立國提供終局性安排。恰恰在此，端倪已現，曙光在前，卻依然人在中途。

由兩件小事，可窺一斑。一是聽說最近有位貴胄孫輩歸國讀博。安琪兒從小就讀英倫公學，現在回歸辟雍攻博，立志要做學問，不想做看守老宅的活兒。二是聽說一些民營資本家揪心得很，兒女花錢快活，卻不樂意承繼產業。不是不願承繼錢財，而是不願承擔打理家業這份重擔。這才第二代，就現維繫之虞，可見掘金難，護金同樣不易。有位老闆的獨女熱愛藝術，也有飽滿藝術細胞，考上了羅得島藝術學院，不簡單，結果父母為億萬家財着想，居然逼令孩子退學，改上MBA，導致嬌娃抑鬱了。

這便牽扯到前現代政治或者非現代政治上的三個定律。一是「權威代繼遞減律」。權威自創業一代以降，是逐代遞減的。事情明擺着：少主，你沒打過仗，更無赫赫戰功，總

不能讓人像當年伺候老爺子那樣供着你吧。第二是「爭取合法性代際加碼律」。後代雖是藍色血液，但要把眼下的事情做好，或者，做得更好，才能維持得住，否則，總有覬覦之人。不像老輩，資歷和基業在那擺着，汗水和着鮮血早已凝結成腳下的大廈地基。其本身就是合法，撼它不動。為此，第二代開始，要麼謹慎守成，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麼難免大幹快上，趕緊花銀子，有時急了，就會使出昏招。第三是「富不過三代律」。就是說，雖說「政治如春藥」，叫人興奮，讓人上癮，但總有乏味的時候，更難免疲軟的最終結局。因而，第三代可能也不願「做看守老宅的活兒」，同樣史不乏例。再者，老爺子創業，不易，因而格外愛惜家產，甚至捨不得吃，捨不得喝。第二代守業有責，少東家，既躊躇滿志，也可能同時為守家護業而戰戰兢兢。誰要是痴心分享，則「王爺歸王爺，奴才歸奴才」，治你沒商量。至於第三代，權勢財富對他們是初始條件，如同天空與空氣，視之以為當然，可能也就不若先人般珍惜，三心兩意，終而，踢裏哇唧，富不過三代。

這次第，「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讓人看花了眼嘛！

說到中國的現代轉型，黃仁宇先生好像曾經講過，其一線機緣並非遲至晚清，也不在晚明，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早在王安石變法即已意欲奮取現代財政稅收金融體制的突破，而終究未能突破。如若成功突圍，則這個叫做資本主義的一套現代數目字管理體制，就起

源中國，而非近代歐洲了。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中國文明「造極於趙宋」，可能，自文明論立言，中國文明在宋後便無突破性進展。晚明出現了諸如黃宗羲這樣的思想家，其公天下論述與契約論權力政治敘事，頗具現代因素，甚至據說不遜於法國啟蒙思想家，但總體以思，宋代以降，中國文明無突破，是明擺着的事。逮至有清，雖說前期事功彪炳，但例屬中國王朝政制的自我修復，周期性盛衰交替的輪回，加上愈益固囿內陸，整個兩三百年間，小學錙積銖累，而文明並無突破性進展，甚至有所遲滯，同為事實。

換言之，從中古向現代的這一次突破，這一關沒過，別人卻走在前頭了，「中西之別」轉成了「古今之異」，再蛻變為「新舊優劣」之差，只有俟諸清末民初大變局。至於說滿清入主中原後「中國文明」還在不在，則又另當別論。匡山之後云云，這一種喟嘆並非認識論描述。當然，你可以說不能以種族觀念取代文明觀念。不管怎麼講，王朝的這種自我修復，經過清代前三朝後是沒有任何文明論意義上的進步的，這總不能否認。晚清開始的突破，不是中國文明自身發展的直接邏輯結果，而是外來文明打破自我修復的循環，促使你窮則思變的契機。而變則通，通需久，一晃，已然超愈一個半世紀了。

就此番一百多年的大變局而言，共有「三波改革開放」，厥功至偉，串聯起現代中國歷史。具體而言，庚申之變，刺激尤劇，致使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四年，三十五年，終以

維新自強剛毅力行，啟動第一次改革開放。一九〇二年清末變法至一九三七抗戰軍興為止，這三十五年是大開大合、改天換地的第二次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是第三次改革開放。此時此刻，是第四次改革開放起步之際，還是類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那個時段，可能見仁見智。然而，如果此時算是已然啟動了第四次改革開放，則未來三四十年，再幹兩代人，這波大轉型，從農耕社會的倫理文明向工商經濟的法律文明轉型，差不多就「收工」了。此為近現代中國大歷史，不可不察。

在此，如在「中國問題」的四大核心義項這一語境立論，則「發展經濟社會」一項頗有成效，「建構民族國家」亦算成功，有待最後收場，畢竟，尚有港台、邊疆問題，而這同時也關涉政體，並非只是國家建構問題。唯獨「提煉優良政體」，難上加難，考驗着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還要繼續努力，好像已然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了。至於意義秩序，不是三五天，也不是一兩代人的事，還要再幹幾代人才行。總體來看，未來三四十年，一兩代人的工夫，這波大轉型必將塵埃落定。朋友，大歷史就在眼前，所謂樂觀者，不過如此；所謂審慎者，同樣不過如此；所謂悲觀者，也只能如此。唯有小步子往前邁，走個不停，一路走到頭也！

政治是權力的遊戲，則說到優良政體，不免觸及三個詞匯，此即「民主」、「憲政」與「法制」。政體分別從三個向度，圍繞着權力打轉，載述了現代國家的法政樞機。具體而言，民主解決權力的來源，憲政提供權力配置方案，而法治則負責保障和監督權力的運作。結合上述主權論述與人民敘事，則民主解決的是「權為民所賦」這一根本正當性，也就是億萬國民換身選民，而手上捏着個紙片這一關。這一關一天不過，就一天不得安生，大家都不得安生；這一關過了，讓國民拿着選票作為選民說話，則鈔票和選票雙軌治理下，塵埃落定。雖說塵世熙攘，賢愚齊至，泥沙俱下，但良莠有分，各自歇息吧，還維個什麼穩呢！

註釋

* 本文為2015年11月13日作者在上海長寧圖書館的《重思國家》新書發佈會暨讀書沙龍上的發言，據現場記錄稿整理。

1 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頁845。

輯三 政制進程

第十六章

自由主義如何在中國落地

漢晉之際，中國文明迎應佛學義理，直至隋唐而未幾。歷經數百年，終究吸收轉化，由此而有宋學，為華夏文明更添一層次，再開一境界。晚近以還，如何實現自由主義與儒家仁學義理的內在溝通，早已隨着西學東漸而逐漸展開，迄而至今，同樣人在途中。此不惟佔據中土學人心思，亦為不少漢學研究者的作業，蔚為一種思想史和比較文化研究。舉凡儒學民主、儒家憲政、儒學社群主義、人道主義和儒學義理的銜接等項命題，為此揭示着多元的可能性。如此這般，放眼大中華，自由主義已然局部肉身化，於建政立制中落地生根。最後的結局將會是何種人文格局，未來的歷史自有交待，但眼下卻需預為言聲，既在明示來路，更在尋覓去路。這也是這場「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對話的背景因素。

一、中國的復興是中國文明和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

今日中國文明隨着經濟增長，漸現復興勢頭，意味着中國文明與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一方面，中國的復興是中國文明返本開新、自我發展的自然結果，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它是百多年來吸納包括自由主義在內的各種西學元素後的綜合生發過程，有以然哉。

兩頭結合，截取融通，方始有大中華文明圈的整體崛起。

此話怎講？請容從頭說來。

在下於法學院教書，靠販售法理吃飯，一晃三十年。聽說，曾幾何時，一些學生調侃本院教授說其中也有幾位法盲，幸居其列，恍兮惚兮。學生自有學生的眼光，畢竟年歲小。不過，此事真假不論，但它說明我們法學院的學生也好，教師也罷，其心智和心性之不甘也不能僅只囿限於規則和規範這一淺顯層面，而另需超越性支撐，這則是不言自明的。小而言之，則知識論意義上法學和法學家之需獲得「文史哲」知識背景的滋養，更是題中應有之義。故而，有此超出法律層面細加論說的必要與可能。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說，倘若一個經濟學家不同時也是一名數學家，尤其不同時是一名歷史學家，則不能勝任自己的專業。話音猶在，滋味深濃，雖指向不同個案，但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自由主義有所需應對的社會政治倫理層面，以及這一層面之外和之上，尚有「苦難」和「對於生命的畏懼及其困境」等諸般問題。的的確確，其為日常經驗，也是學思和理論指向的對象，更是生命對於存在之永恆焦慮的本身。我想一己生命的困頓和社會大眾的苦難，是促使一切理論一切思想啟動思旅、逼迫古往今來一切有心腸的人不免痛定思痛的一

個直接原因。文化的承擔力就表現為正面直視苦難的勇氣和張力，而為現世生活立境界，為當下人心示路向，為踟躕不前的現實開新局。就拿今晚的話題「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特別是與中國文明中的核心部分儒家文明的關係而言，雖說例屬百年來理論上的老話題，卻是中國文明的新課題，並牽扯到我等華夏中人的「困境」和「苦難」。這實在無法躲避，必得要去討個說法。

非有個說法，就沒個活法，而民族生活無由立法。

其間一線脈絡是，自從晚近中西交通以來，東西衝突頻密，自由主義及其所表徵的政體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正當性，所以，如何讓它在中國生根，遂成問題，一個躲也躲不掉的大問題。換言之，自由主義及其一套政制設置對於中國文明來說是不是可欲的？如果是可欲的話，那麼，如何落地生根成長，漸成中國文明中的有機組織部分？特別是其政治制度如何逐漸於中華大地肉身化，並且融會為中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之灑掃應對、言談舉止？凡此種種，早已構成一個百年問題，大家一直在追問，也一直尚未能夠獲得圓滿解決。個人的感覺是，其實這一問題已有局部的答案，不用悽惶，更不用悲觀。因為放眼大中華地區，民主在臺灣獲得了初步的勝利，較諸泰國式民主更加優越的展現，而法律之治至少作為一種國家理性和社會治理術，在整個大中華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現。尤其是在香港

地區，歷經港英當局的培植和全體居民的努力，使得其為「中國先法治起來的地區」，更不待言。晚近三十五年來的中國，一方面轟隆隆「改革開放」，包括「建設法治」，「建設法治國家」。另一方面，有法不依卻成為一個普遍、廣泛和長時段存在的大眾現象，文野不免，朝野不避，實在觸目驚心。然而，即便如此，放在一個半世紀的轉型歷史中，較諸往昔，平心而論，今天的中國，法律之治作為政統的有機組織部分，其正當性，其可欲性，其制度性落實，乃至於其生活實踐性之體現，對於朝野兩方，均早已不言而喻，也都有一定進展。不管內心怎麼想，實際上怎麼做，至少，明面上都異口同聲說好，而唯唯諾諾，無法公開違忤了。而這就是進步，來之不易的進步也！

在此，我一個問題，不無討論的意義，那就是自由主義是否能夠直面中國文明的苦難，包括如何回應諸如「落後就要挨打」與「一八四〇情結」等民族主義的命題和隱痛，怎樣解釋西方列強對於現代中國的成長的複雜心態等國家間政治問題。即便自由主義無法面對具體苦難，但也必須對苦難問題在一般意義上多所回應，在人生哲學和生命政治意義上給予理論性闡釋，才可能於內在骨血上回應文明關切，而貼應中國文明的憂患心弦，最終融會於中國文明。至少，自由主義必得回答其一整套政治價值理論背後的德性倫理與文明的內涵問題。此時此刻，中國人無論在整體制度安排上，還是在個案的解決上，彷彿都

有不同的看法，使得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理論討論中，而且，發生在每一實際個案上。就我較為熟悉的法律專業領域而論，近世中國的每一項立法，乃至於每一個關鍵條文，似乎都牽扯到不同價值理念的衝突，「古今中西」一齊登場，動輒劈哩啪啦一場混戰，使得中國的立法過程實際上是各種源起於西方的現代價值理念和理論思想的「東方戰場」也。清末「妓女是否具有選舉權」固為一例；近年反壟斷立法中大型國企可堪控訴問題，同為一例。¹

我個人讀史，曾經遇到過一個案例，有助於反思自由主義的德性倫理問題。當時啞然，復讀揪然，事後泫然，再思默然，切切以為大值得探討。它不是別的，就是「哈耶克的婚事」。各位知道，海耶克是自由主義思想大師，也是冷戰思想家，其「婚事」頗耐人尋味。海翁早年愛戀的情人，年齡相仿，彷彿青梅竹馬。後來他到美國讀書留學一年，正好趕上「一戰」，兩人失聯。少女久等無果，無奈之下，另結姻緣。海翁回國後心灰意冷，也擇偶婚配。一晃三十來年過去，再度重逢之際，少年戀人白頭翁，得知其間陰差陽錯，後悔不迭。正好她的原配去世，遂決意圓夢，斷然與已經給他生育了三個子女的妻子離異，再與自己的少年戀人喜結良緣。

各位如何看待這件事情？是否聽後怦然心動？倘若讀史至此，只以「生活瑣事」一帶

而過，「無損於他的偉大光輝」，而不曾沉吟良久，可就沒心沒肺了。須知，此類「生活瑣事」，其於海翁，以及多數男女，不，不是多數男女，而是幾乎所有男女，恐非小事一椿也，而是胸頭撞鹿，心頭流血，傷筋動骨呢！否則，豈非婚姻不是事也，豈非海老不是人也。上引熊彼特，一生梅開三度，亦非等閒之輩，可能也有值得尋思之處多多，而折射其人生理念、社會生態與時代的價值哲學。在下曾作一文，未刊，題目就叫〈海耶克的婚事〉，與此前發表的〈海耶克的英文〉對應，旨在追索海老的心路歷程。當年海耶克訪問台灣，「粉絲」殷海光求見，結果海老不見，反而去見獨裁者蔣中正，這讓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殷先生們失望而困惱，其鬱鬱乎可想而知。對此在下也想作文，以「自由主義者的苦悶」為題，惜乎資料不足，未能殺青。此為籌謀中的「海翁三論」，駸駸然，十年將逝，迄今只完成一論矣！

話題收回來，對於海老的婚事，如果站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徑言「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作為一個「天生德於予」的德性主體，於生命實踐中本着追求真愛的立場，我有權選擇我生命中的另一半，云云，這是一回事，自是一種答案。然而，如另開視角，從某種傳統儒家倫理而言——但願不是鄉愿——一個女人跟了你將近三十年，為你生了三個孩子，朝朝暮暮，沒有愛情也有恩情，沒有恩情也有人情，海老，你此時此刻絕然將她

捨棄，則德性何在？下得了手嗎？這又是一回事，別為一種答案也。實際上，海老在芝加哥大學退休以後，頗感潦倒，回到自己的祖國，在薩爾茨堡大學找了個教職，在他感受等於是是一所閉塞的鄉村學舍混飯等死。恰在此時，天上掉下個諾貝爾獎餡餅，這才柳暗花明，陰霾籠罩的人生天空豁然開朗，晚境榮華矣——人生際遇，明暗之間，有時不過是一步之差，可就有天地之別，夫復何言。「好女兒，淨心，穩步走，愛護這一線微光，決定你來生的歸趨」，此時此刻，只能訴諸詩詠呀！

話題收回來。各位想一想，在中國人的價值立場，在我們某種傳統的儒家價值觀看來，這是一個功成名就者對於糟糠之妻的拋棄呀，了不得喲！然而，從自由主義理路回應，這樣的指責能不能成立？他會不會接受這樣的指責？則又當別論。我想，他是不會接受的，所以他才會心懷感激，卻問心無愧，安然而坦然，釋然又怡然。至於前面伸言「某種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實在是因為我理不清，剪不斷，有待各位新儒家指教一二者也。

在此，我是這樣理解的。拋開海翁的婚事，但言一個「痛」字。可能，某一生命個體的困頓，必然牽扯到對方的苦痛，因而也就是社會的痛。既是社會之痛，痛痛相關，只能在關係的扭結中求轉化，求紓解，或者，竟是無解，而痛到底，痛死為止。不管是一畫樓無處，着東風」，還是「中間白鶴，駕東風」，抑或「小梅搖落，不禁風」，朋友，都是一

個痛字啊！恰恰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立基於個體原子論的自由主義遭遇到了當代危機。蓋因將德性屏蔽，於倫理層面便無法招架此番痛痛相關之問，而頓失深厚，面對苦難這一大是大非之時只好無言，徑以「個人私事」打發了事。實際上，自由主義的當代危機不僅展現在歐洲文明於晚近幾十年間遭遇到的文明勁道的衰頹問題上，而且，它說明自由主義一旦肉身化，已然成為既定政治制度安排之後，便為道統，自我腐蝕的趨勢遂明滋暗長，其日趨僵化的心路歷程也就啟航了，從而將自家生命力打入冷宮。好比當年科學反對宗教，蔚為一種新興力量，開放而質樸，剛健復誠實，具有感天動地、撼天動地的生命力。倏忽間三四百年過去，經歷歷劫，科學將宗教打入了冷宮，自家成了正統。在當今人類的知識世界中，科學早成霸主，唯我獨尊。各位，實際上科學在今天成了一個獨斷論的話語體系，影響所至，使得剛才主持的同學介紹說有的學生儻論，但凡「不用計量和定量研究的理論」，換言之，「沒有數字圖表」的，均不值一聽，豈非笑話，何其悲乎！此與「不用英語教學和寫作的大學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學」的論調，所指有別，而理路如出一轍，蓋均不明所以然也！

對於自由主義的當代危機，暫且擱下，我想講一個在此論域中涉關現代中國的觀點。今年（二〇一四年）八月底到九月初，國際朝聖山學會在香港召開年會，最後一天的主題

是「中國的成長與自由主義的未來」，我正在準備講稿。當時我想說的一個觀點是，如果回看海峽兩岸四地百多年來的生聚教訓，尤其是中國大陸晚近的成長，它恰恰證明了一種「雙重勝利」，即中國的成長和東亞文明的復興是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合奏共鳴的雙重勝利。

一個典型的明面上的理據是，百多年來，中國的儒家文明展現了一種接納異域文明的寬闊心胸和消納能力，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經過五代人的吸納、消化與融會，已然有選擇性地在中國文化中間扎根了。各位，今天我們講人格平等，今天我們講自由意志，今天我們講秉持德性倫理而不違背規範倫理去追求「我的」自由和幸福，今天我們講在自由與平等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我享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自主選擇超越性向度的自由——凡此種種，都是些什麼立場、價值和理路？朋友，這不僅是儒家所講的「收拾精神，自做主宰」這一德性倫理觀，同時也是自由主義的個體價值觀。它們於不期然間落地生根，彷彿已然完美地融合於當代中國公民的身心，見諸他們日常的灑掃應對，習焉不察。這難道不是自由主義的勝利，同時也是儒家義理和中國文明的雙重勝利嗎？諸如此類，我相信，大家各自去體認和揭示，必定還有很多。

二、中國公民需要政治發言權

任鋒博士指出，儒家難道僅僅是基於農耕文明，由漢族發展起來的狹義上的意識形態嗎？毋寧，儒家提供了一個比較能夠適應不同經濟社會形態，以及混融、整合和凝聚多族群信仰的公共框架。即便是在此刻的世界，儒家倫理恐亦不止於生命倫理和生活哲學，而有其政治哲學的建構意義。任鋒博士並提議在下於現代國家理性，特別是「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視角，對此作一「深思熟慮」的「深刻」解析。

是的，凡此心事，總是心思，縈回腦際，卻難說「深思熟慮」，更談不上「深刻」。身處這一波轉型時代，一個兩百年大轉型的收尾階段，所有的看法和認識可能都是臨時的、階段性的，也是局部的和相對個體化的。此為宿命，唯有不世出的超一流思想家，橫空出世，挾山超海，庶幾乎得能幸免。可惜，今晚，他或者她都不在場。正所謂「天涯行客，惆悵如絲，關山望斷，一將成名萬骨枯」也！

我有一個觀感，也許有助於分析。什麼觀感呢？但凡樞紐文明，不論春秋戰國和秦漢之際的古典中國文明，還是地中海亞平寧半島愛琴海養育的古典希臘羅馬文化，均可以看出，這些大型文明都建構起自家一系列兼具普遍性的系統學說和整套理論，關乎天人、

生死、神俗、靈肉、禍福、義利、知行和動靜，徊惶於此岸和彼岸，糾結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諸端紛繁，而理一象殊。而且，的的確確，大開大合，席天幕地，都各具普世性格。放眼望去，近代東西大分流與大匯合之前，實際上是這些秉具普世性格的價值和思想在引領着人類生活，道不同卻並行不悖，利有異而各取所需。只是在近代，大分流和大合流之後，各自宣稱具有普世性的理論，包括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包括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所謂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乃有碰撞，而遽然冒出個誰才具有普世性價值，或者，誰才更具普世性格這一問題。當然，並非說此前一家親，和氣團團。否則，等於無視耶回兩教的千年廝殺，也看不到韓愈排佛式的思想競爭。實際上，一部思想史，多少紛爭和囂嚷，不盡眼淚和鮮血，源此而來，不知所云，徒令後人復哀後人，道出的原是圍繞着意義打轉，人類心靈的萬般糾結矣！

正是在此，我倒是覺得，愈是孜孜於宣稱唯我獨尊，拼命嚷嚷着只有酒家才秉具普世價值，就愈發顯露出其勁道衰頹，性命危淺，而將內裏的尖刻與促狹暴露無遺，適足以證偽其普世性。這不，舉世滔滔，但凡一種文明處於發展的高峰時段，其哲思，其學理，其價值指向，都會虛懷若谷，以廣納百川來開源分流，於眾生普度中登峰造極，恰恰表達了自己的普世性格。它再次提醒當下的中國文明及其心智大腦，當今中國，作為既是此刻邁

步的初始條件，又是已有的歷史進程的結果，更是一切思想和實踐的背景因素，這一波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還沒完成，中國文明的此番大轉型尚未臻達普天歡慶大功告成的節點。換言之，「中國文明的復興」還只是人在途中，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因而，今天中國仍然需要全方位接納優秀異質文明，採擷「古典樞紐時代」和「現代樞紐時代」以來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非他，蓋因政治智慧專責建國立政，攸關億萬黎庶的生息痛癢，蔚為人世最高智慧，因而，最為要命。而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不外乎就是一個政治建國的艱難歷程，體現為一種「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體也。

細而言之，刻下中國不僅面臨着如何在「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和「一九七八」的基礎上重構「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問題，而且，還面臨着在此「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譜系下，億萬中國人，你我這樣的具象個體，如何面對生死禍福靈肉等一系列生命困境與生存困難的問題。不寧唯是，我們還面臨着經濟成長、人口增長如何與環境保護、世界性資源配置兩相協調的問題，環境短板與可持續發展所牽扯到的國家間政治難題，以及中國身處東亞這一特定環境，西邊有一個強大而深具擴張性的斯拉夫文明惡鄰，東邊蹲伏着一個百多年來一直與中國為敵的宿敵這一窘境。就東邊的鄰國而言，其綜合國

力早已發展到極致，無法再攀新高，難免盛極而衰了。而盛及而衰之際，心喬意怯，必有狗急跳牆的可能性，可堪虞矣。就此而言，綿延兩三百年的中國西北邊陲和東海邊防危機並沒過去。

如此縷紱細說，是想告訴大家，今天中國面對這樣一些問題，是綜合性的問題。綜合性的問題意味着需要採取綜合性的手段，沒有哪一種主義可以宣稱，或者實際上可以單打獨鬥就救得了中國。極個別新儒家人物說「只有儒家（學）才能救中國」，不啻痴人說夢，而且如果只有儒家儒學才能救中國，中國為何需要浩瀚跋涉的一百七十多年的救亡圖存運動，而至今而未止？自由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是人間的普世大道，但我們同樣要問，為何今天像「胡適之的婚事」和「海耶克的婚事」之兩相比觀，仍然令人心頭漣漪起伏，而為胡先生灑一掬清淚。那邊廂，假如民族主義蔚為主旋律，眼睜睜放任其一路向下走到民粹末流，等於是對民族最大的不負責任。好比容忍一種共產清教主義在中國繼續肆虐，那是對中國文明最大的傷害。我們需要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民族主義，我們同樣需要共和主義，我們還需要在中國文明的復興的脈絡中，尤其促進包括儒釋道三教在內的一切文明因素的共同復興。非他，只因為中國的問題是全方位的，才需要全方位整體性的思想方案和多元資源。

置此情形下，我為什麼說中國的成長和中國文明的復興意味着中國文化與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呢？就在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其實動用了包括儒家文明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內的所有資源，風從虎，雲從龍，共同達成了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其間糾結扞格、牽連互動，攪成一鍋粥，造成一個鼎沸的近代中國，終於推導出此刻有望最後成形的「現代中國」。現代中國意味着「民族國家—文化立國」與「民主國家—政治立國」的統一，而「政治立國」的極致是「以自由立國」。其所牽動的文明轉型及其浩瀚規模，沒有任何歷史成規可得模仿。就此而言，從迎應「中國問題」，動心忍性，到「現代中國」的誕生，以一持萬。朋友，這是漫長的十九世紀、短暫的二十世紀和此刻的二十一世紀裏，一兩百年間，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也。

正是置身這一語境，才需對一些習常不察、似是而非的事情和話語，慎予省思，時加恍惕。比如，秋風教授講了一句話，可為一例。他說刻下中國人對於祖先的信仰和膜拜，比對自家的自由看得更重。此處不僅關涉啟示與理性，而且，涉及到信仰和啟蒙。可能，對於我們父兄一輩，此事完全不在話下。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此事也還多少能夠成立。但是，對於今天二十來歲的這一撥而言，說他們對於祖先的信仰竟然比自家的自由還重要，予不信也，予不信也。相反，他們對你的說法肯定嗤之以鼻。不說祖先，連我們這一輩人

作為父親，在家庭生活中也早無所謂的權威了，甚至，都抬不起頭來，還祖先呢！丁克家庭，父親混個「三把手」，就不錯了。或許，換一個角度，秋風教授的話也沒錯，那就是說，他以先知和教主的口吻在宣諭某種信仰，抑或，他申說的是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任何一個特立獨行的個體，都無法捨棄身家背景，好比今天一般報刊用語所謂的「文明創新」，不能沒有歷史資源來支撐。倘若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立論，則其意自明，人心所向。也就因此，歷史主義同樣是一種普世主義，正如歷史主義本身即意味着一種特殊主義。歷史主義之為一種普世主義，與它在價值資源和文化背景上為某種特定文明之提供支撐，恰成互補態勢，就看運用之妙了。爭奪歷史，本質是在爭奪時間，而掌握了時間，就意味着掌握了世界，或者，在着意安排一種世界。「一種」者，「自家」之謂也。比如，此刻是「二〇一四年」，而非孔誕「二五六年」，使得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也！也就因此，古有所謂「羅馬治下的和平」，今有所謂「美國霸權秩序下的世界」。

轉回世俗層面來。有一位作者，英文名字 Eric Li，中文名字李世默。君乃同胞，但在下寡陋，不知他居美經商還是在中國執業。據說，他在美利堅為多家大型國企當買辦，富家翁也。網上時常見到他的文章，文筆頗為流暢，一些觀點也頗有見識，看得出來，走過不少地方。前不久美國召開「百人會」，李君有一個對談。在對談的最後一段，對方嘉

賓問他，當今中國，難道中國人就沒有政治自由的要求嗎？難道中國人不需要自由，不想行使投票權嗎？下面這段話，各位請看「觀察者網」所載對談，我要撒一句謊，大家從此「鄙視我」。是的，李世默先生是這樣回答的：「認為中國民眾正期待政治權利，這是自欺欺人的偽命題……認為民眾一旦獲得了冰箱、汽車，接着就自然會要求選票，這種想法十分荒唐，在歷史和政治中毫無根據」。各位，此時此刻，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難道你們和我們，「我們中國人」，不想擁有作為共和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嗎？我們不想作為國民和公民，一人一票，每隔幾年，行使一次挑選治理者的權利嗎？不是在他們走上大會堂高台時我們只有拍掌的份，而是我們衷心希望他們走出來給「主人」打拱作揖——「兄弟投我一票吧！」——從而決定誰能走上那個高台。再重申一句，這難道不是刻下中國人的心聲嗎？若非如此，為何形勢緊繃，不僅「內緊外鬆」，而且，「內緊外也緊」了呢？李君此言，不知可敢對着自家同胞當面說？

凡此種種，說明了一個問題，即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已然在中國生根開花，轉化、涵化、泛化為一般大眾的心智，蔚為中國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至於如何將它們恰予政制肉身化，結成政治正果，可能還有一段路，也可能比較漫長。一兩代人之內，說不定十年、二十年，總有結果。天下事偶然因素多得很，說不定明天在下出門天上來掉下來個郵包，

一個億的銀子砸在我頭上，也沒準呢，萬一呢，哈……但是，沒準歸沒準，睜着眼睛說瞎話，指謂中國人從來「不想」，就如同說潘金蓮從來就「不要」，可就不靠譜了。這是對於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億萬同胞政治心性的蔑視和詆毀，實實在在，簡直不把我們當人！

三、倫理綱常與家國天下情懷

把話題再往世俗層面拉近一步。有活動在模擬法庭舉行，前排座位預留給「眾籌嘉賓」，雖說並未坐滿，卻不讓其他人就座，是否違背了公正原則？

對此，新儒家彷彿倏然遇到了難題，自由主義者也不發聲，結果只好讓我們啃習法律的出頭說話，也對。

從何說起呢？這麼說吧，比如，晚近以來，大家尋索中國文明的優越性，抉發中國文明的優質品格，就見仁見智，知山樂水。有人說「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有人拈出中華文明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也有人以「天下為公」作結。我個人省思，不是從文化價值比較或者「本質上」的還原論入手，而是從文明論這一中間層次立論，有一點心得。

就是說，在天地大化這一總體背景下，下列五項，或可作為「優點」或者「特質」，而引申到今天關於「專座」的問題上來。這五項是，第一「經史義理」，此為大經大法，形上本體，奠定整個文明的根砥；第二「詩禮文教」，於一般人心和人生，鋪展開一個基本的底子；第三「倫理綱常」，已然將前面兩項提撕到人倫層面，貫通人心和制度；第四「王道政治」的理想，正式進入政制和政治肉身；第五「家國天下」的情懷、氣度與格局，於大開大合中放開去，收攏來，落實於至微，而見諸至大，將人間全體牽連一體，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情中伸展上述四項內涵。

綜此五端，可得概言中國文明？當然這是抉其大端，一隅之見。其間牽扯到此刻論題的就是所謂「倫理綱常」與「家國天下」兩端，而它們無一不與自由主義命題暗通款曲因為自由主義陳言每一個體均具平等人格。我基於自家德性主體之秉懿秉義，依恃自由，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天經地義。同時，自由主義從來不否定個人立定位置，同樣秉持德性和實踐理性，盡本份、盡義務、盡責任、盡擔當，證明了「自由偏是重負」這句老話，也對應了「天助自助」的教義。經此輾轉，不僅體現並兌現了「我的」德性，證真了「我的」德性主體位格，同時，將此德性主體具體化、下落至生活層面，而化身為當下存在的具體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兌換成一套權利義務話語，真確實現了自德性向法權的過渡。

上文揭示「以自由立國」，就在於完成這一自德性向法權的過渡。

因此，若問為何要盡這樣的本份，為何必須擔承起這樣的擔當，為何要於盡本分、肩擔當中含詠德性、涵養人格、彰顯主體位格、光大個體的實踐理性，答案就在於每一個體在價值論上的平等決不排斥其為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在具體社會事務和生活情境中的特殊位格。比方說，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就是享有某些特權，而為履行總統職責之必須需；議員在議會辯論期間得享有免於因言論而被追責的豁免權，蓋因此為保障議員於開會期間行使代議職責暢所欲言所必須；少數民族在生育、升學等諸多方面，專享寬待，為主體民族漢族所未有，旨在彌補和提升前者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生存競爭能力，求一個平等。同理，今天設立專座，預留給眾籌嘉賓，同樣無可非議。為什麼？因為眾籌嘉賓作為國民、市民和公民，今晚此來，是要盡他們的一份責任，盡他們的一分擔當，而蔚為「嘉賓」，而且是淘腰包的「嘉賓」。為了方便他們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和擔當，預留專座，當其時也，有什麼大不了的？好比今晚我要講話，在台上給我一個坐位，情同理同。否則，平均主義的邏輯外表下演繹的其實是某種民粹式思維，要不得。

與此同時，活動組織者籌組這一活動時有無事先精確統計過究竟將有多少「眾籌嘉賓」到場？倘若前排共有二十五個座位，而眾籌嘉賓不過五位，「騰訊」網的工作人員五位，總

計十位，那麼，另外的十五個坐位難道不能開放給其他聽眾？當然可以。閣下，你作為聽眾，眾生平等，你發現有空位想坐過來，發現「眾籌嘉賓」並不足以佔據所有座位，此時此刻，你應當發揮自家的主體能動性，自己坐過來就是了。有人攔着你嗎？幹嗎非坐地板上呢？學府的風氣相對隨便，似乎無需如此拘泥。這時你還坐在地上，說明閣下雖為自家之「座位」權利未能充分兌現而耿耿，卻未曾訴諸行動去爭取，換言之，未能將對於幸福和自由的憧憬落諸實踐理性也。與其耿耿，何如嗤嗤？據義履方，無所懼也！個人主義的自我意識和自由主義的德性位格尚不夠堅挺，幾許畏葸，一絲哀怨，說明你也有責任。自由總是要自己去爭取的，而非事後抱怨所能奏效，更非哀哀怨怨地哭求競恪其功者也！

這一提問，不意間折射出「德位之爭」，反映了個體本位與基此而來的積極安排的自由主義與儒家倫理之交匯，可謂能盡取譬，活學活用。如此提問有含量，有眼光，有曲直，有嚼頭。

四、西北邊防、東海邊防與民主和平論

前面說過，一些的事情和話語，習常不察，似是而非，卻需慎予省思，時加怵惕。這裏還有一個例子。秋風教授喟言，「中國人的開明程度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國培養的企業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朋友，如果說「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中國是培養出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企業家的國家之一」——是的，「之一」——那我覺得這話聽起來是更順耳一點，然而說中國是世界上最開化的，中國文化是最開明的，超過了一切其他民族，這份自愛獨大叫人聯想到刻下的美利堅、當年的日耳曼，不免有點那個……。

提到中國的西北邊陲和東海邊防問題，確實黑雲壓城，迫在眉睫，而需深長思量。此事並非新近才有，如前所述，這是晚近中國的心腹之患，三兩百年來一直存在。大家知道，一兩百年來，中國人一直處在國家危亡、文明興衰的焦灼之中，蓋因吾國西南以高原為屏，而瀕東海，歷來是東方的大國。在生息起居的漫長歷史中，一八四〇年之前，從來不曾遭遇過如此挫折——蒙元與滿清，在中國的文明譜系中，終究並非外人。十六世紀地中海文明興起，資本主義登場，這一波現代西方文明，丁一卯二，迄至工業時代，將人性的貪婪放開到極限，可謂武裝到牙齒。驚濤拍岸，叫這個老大帝國陡然間面臨生死存亡。

一時間，不僅是文明的興衰，也是種族的存亡。

東洋也好，西洋也罷，論中國的危亡，近代以來，一直以西北的白俄和亡我之心不死的日寇為心腹之患。西洋列強打上門來，無論是索開通商口岸，還是設立租界強加不平等條約，其強盜行徑，其侵略性格，均表現為對於財富的攫取，貪婪至極，正應合了工商時代的歐人心性。英國人在中國做了四十多年的海關總長，署理海關，有章有條，實際效果是控制了中國海關，而且是壟斷性控制，為英國的貿易謀利。總體而言，西洋初次打到中國來是一八四〇年，有能力佔領中國已然是十九世紀末期的事情了。但恰恰是在彼時彼刻，西方這一波民族國家浪潮已經接近尾聲，換言之，它的戰國時代即將結束。戰國時代意味着擴張，對於財富、領土和人口的攫取，而此時此刻，恰恰這種擴張到了尾聲，則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雖有經濟利益和政治主權的野心，卻似乎並無領土野心了。或者，面對廣袤國土和浩瀚人口，特別是他們世世代代積蘊的那個堅韌文明，明知是無法照老方子佔領的了，遂知趣退而求其次。與此相反，發端於九世紀前後基輔的羅斯國家，自打問世，一直到現在，其擴張本性了無縮減，終於弄成了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斯拉夫文明渾厚，近代以蠻力政治著稱於世。換個角度看，斯拉夫文明小處見拙，而大處聰明，同時以背信棄義見長。

晚近百年來的世界交往史上，論背信棄義之頻繁和惡劣，實在非俄羅斯莫屬。（姚中秋插話：「之一？」）不，不是「之一」，就是它。君不見，曾幾何時，它一方面與波蘭簽訂和約，也和德國簽訂條約，另一方面卻悍然出兵，欺侮小國，玩弄大國，翻雲覆雨，殘暴野蠻。講到俄羅斯這個民族，它的領土擴張衝動至今尚未完全消泯，所謂「戰國衝動」依然。這在我看來，我想未必是偏見，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於帝國擴張而言當屬一記致命打擊，證實了帝國愈是擴張則控制力邊際效應遞減這一新道理、老套路。從地緣政治戰略來看，可否這樣講，中國的周邊多為小國，可能有肘腋之患，卻無心腹之憂，印度雖為大國，晚近民族主義亦且高漲，但此東方民族，一般來說，例屬食草文化，其侵略性沒有食肉動物那般厲害。而且，幸有喜馬拉雅之隔，雖為藏南而齟齬，但至少暫時於我國危害不大，統籌之下，大體上多半相安無事。那邊廂，西方列強早已不再是說一不二的列強，長久和平下的富足生活，事事仰仗老美成性，似乎早已將曾經的拓展鬥志消磨殆盡，也似乎無此必要。唯獨俄羅斯，新仇舊恨，至少佔領吾國一百四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外蒙古也是在它的策劃下，經由所謂「獨立公投」，而幡然立國的。現在的庫頁島是它的，原來是誰的？我大清的呀。曾經有一個地方叫海參崴，現在叫什麼？居然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們跟日本人爭的時候，從來不說「尖閣群島」，一直說釣魚島。但是，最近兩年我們從

來不說海參崴，反過來說「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是什麼話？日本人對西方列強也是讓步，對東方強硬，我們對白俄讓步，對恰恰有文化上血肉相連親情的日本卻強硬以對，實非遠交近攻所能解釋的，不說起倒也罷了，說起來不免讓人齒冷。

當下的日本，以國土、人口和發展程度及其內在的文明功力而言，基本上到八十年代末期，已經發揮到極致了。換言之，這個國家現在已經達到了它的文明的最高峰，勁道不再，不可能再攀新高了。「發展的極限」，於其綜合國力而言，正為恰切。如果它能維持現狀的話，就算是奇蹟。在我觀察，它肯定是要衰落的。人口老化，經濟結構長期滯後，資源受限，與周邊不睦，各種原因，使得這個國家盛極而衰，肯定是要慢慢走向衰落的。但是，這個過程是三十年還是五十年，抑或八十年，我們無法精準算計。置此情形下，日本不僅和中國有舊仇新恨，而且以亞洲最文明開化的國家自居。你也不得不承認在亞洲，雖然中國是第一個共和國，但日本才是第一個真正登上現代世界歷史舞台的亞洲國家。當年日本人明明侵略東南亞和中國，卻說是把東南亞和中國從西洋文明白俄文明的武裝佔領下解放出來。這是侵略說辭，卻是它的自豪所在。雖然我們覺得它在胡扯，但它為何會有這種自豪感呢？這為何敢睜眼說瞎話呢？就因為日本在亞洲率先蛻身進階為現代國家，實現了文明轉型嘛，實實在在，也有驕傲的資本。

對於中國的崛起，日本不僅不適應，不僅「羨慕嫉妒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牽扯到誰在地緣政治中扮演龍頭老大的角色安排問題。這齣戲，已經上演一百來年了，似乎到了尾聲，則焦灼日甚，劇情愈是緊張。正是在此，日本不會甘居人下，所以才於焦灼之下，既陞不安，借力打力，隔山打牛，指東打西，一頓亂打。是啊，小小釣魚島牽扯着世界格局，千萬不要小瞧它了。可也正是因为是「小小釣魚島」，為其所牽制，說明中日兩國都沒什麼格局。

你說「民主和平論」，我的兄弟，「你太天真了」。當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國家和什麼國家殊死廝殺？民主國家的內戰嘛。我們說過去歐洲有什麼「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等等。其實，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三十年裏，是不折不扣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就是說，不是兩次世界大戰，而是一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大戰打了三十年，間歇的十多年不過是中場休息，把身體養好了，軍備足了，凶器磨利了，再上場拼殺。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一個納粹政體的話，則第一次世界大戰純粹是民主國家的內戰。當其時，德意志普魯士是一種貴族自由民主制，它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和盎格魯—薩克遜的君主立憲議會民主，同屬民主制國家，是民主制國家在歐洲和世界範圍內，誰能夠拔得頭籌爭得歐洲霸權之爭。這是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只得亮肌肉，甩盒

子炮，說明人性其實距離野蠻並不遠，理性與人道的防波堤脆弱得很。由此牽扯到美國的參與，將中國也拉扯進去，把世界攪成一鍋粥。當年，十四萬中國勞工服役於歐洲戰場，受盡苦難。因此，「民主和平論」多半靠不住。政治的本質在於區分敵我，敵我劃線的基準就是國家利益，面對國家利益，民主也沒轍。

不過，話說回頭，因為基本價值理念和政制設置類同，的的確確，較諸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則民主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大概小得多。遍觀今日寰球大勢，對此視而不見，似亦非智。即便如此，「民主和平論」以自由主義共同價值理念為和平構建屏障，卻擋不住國家利益的浩浩洪流，也是明擺着的事。置此國家自助體系時代，國家利益至上才是真相，才是硬道理。要不然，如何解釋中越兩國的齟齬流血而不止。前不久，連歐盟都被美國的助理國務卿紐蘭罵為「shit」，這才叫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才是立國之本。在下倡言「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旨在解決政治統治及其理念價值資源問題，總以為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通通收納進來，揉為一體，有機運用，於互相牽制中求得平衡，這個國家才可望達臻成熟健全而剛健博大之境，才會蔚為偉大文明。

至於是「第一」還是「之一」，看天意，看人力，看機運，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往前邁，不回頭。十來年前，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經喟言，過

去五十年中，美國及其共謀的偽對手蘇聯掌控着世界體系，但今後的人類將會身處真正的多極世界，可能，一種從既有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一世界體系，向着某種還不明朗、尚無定義的新型體系過渡之中。在此進程中，「東亞將是這個過程的核心部分，但它不會是單槍匹馬。」

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的核心部分，都是兩個沒法搬家走人的鄰居。如何相處，怎樣過日子，走着瞧吧！如此一來，自由主義還是東亞共同體。其實，核心還是個利益也！

註釋

* 本文為作者在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晚，清華大學法學院明理樓，就「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與許紀霖、秋風的對談，主持人任鋒。據現場記錄稿整理。原刊於《學海》2014年第6期，頁114-121。

1 六月下旬，筆者整理這份記錄稿時，恰好網絡上刊佈了一則「西安大媽」抵制「性博會」的演講視頻，雖說例屬草根式的荒唐錯亂，卻同樣折射出本文主題所關涉到的問題在當下中國一般民眾心理上的激發效應，堪為樣本。

第十七章

中國需要趕緊邁向「訓政中期」

——謹以此文紀念「辛亥」百年

三年前，筆者撰有〈中國步入訓政初期〉一文（收見拙著《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從平庸政治、規則政治、民意政治、維權政治和日常政治以及政治決斷等方面，大致描摹了彼時中國的政治情狀以及相關社會世相，提供了一個有關最近將來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的基本線索。兩年多來，總體趨向未變，而情形續有發展，遠鄉近鄰風雲變換，迫使我們需要對此轉型趨勢更予深度思考。尤其考慮到今日北非、中東以及東亞的局勢，特別是新加坡政治的最近發展和周邊國家抱團深度介入中國崛起的態勢，可以看出，一條自摩洛哥至巴基斯坦的長弧形政治地帶之逐漸成形，並早晚延展至東亞之勢，要求中國政制對此做出有效的政治回應，以「國家政治」迎應「國家間政治」，將「國家間政治」化轉為推動「國家政治」良性發展的契機。在此，在內政一體化意義上，筆者深感建構中華文明的現代政治秩序之時不我待，呼籲啟動「以政治接應政治」的進程，趕緊從「訓政初期」邁向「訓政中期」。

一、需要「訓政中期」這座橋

總體而言，當下中國依然位處「訓政初期」，突出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壓力，對於政治合法性的持續焦慮，特別是民間「維權」的風起雲湧，使得上層進行有限度的政制調整，同時並又止步於此，而基本上沒有予以真實有效的政治接應，遲遲難見真正的政治決斷。表面觀之，其優點在於漸進緩行，只需局部行政應對和政治微調即可維持既有格局；而實質來看，則深層體制性矛盾基本不曾觸及，一旦爆發，危機愈大。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當下中國，「人民」一方參與政治的渴望日益強烈，另一方「政制」對此就是不鬆手，由此導致死結，形成政治緊張，政權的正當性危機由此生焉。朝野上下，雖然內心深處對於民主政治早晚登場的趨勢並非全然懵懂，但是他們那種對於權力的絕對壟斷的列寧主義式姿態，卻絲毫未見減弱，以致於十年來政制續有改良，政治卻不進反退。此早為世詬病，不滿和焦躁日積月累。因而，凡此足以當下一「維穩」，不能稱善於長治久安，同樣為朝野所心知肚明。畢竟，晚近百多年，「中國問題」至少包含四項內容，即「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其中，將中華民族建設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提煉中國文明的「優良政體」這一目標指向的是現代政治文明，也只有臻達現代政

治文明之境，使得中國社會進入政治社會之境，才能擺脫政府時刻「維穩」之窘，確立政權的永久正當性與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換言之，舉凡表徵現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法治、憲政、共和與自由、人權諸項的建制化進程，政治自由主義的政體落實依然是通達愜意人世和良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常所謂的「長治久安」的善治公器。所謂現代政治文明及立基於此的政治秩序，基本項目不止於此，卻不可或缺於此，這也是人所周知的。而不論其為道為器抑或為路為徑，中國均繞不過去，也無法迴避，這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否則便會使得一直並未獲得真正妥帖安置的政治正當性即刻陷入危機。着意迴避，遷延既久，反禍其身，正勘虞矣！迎拒之間，真正構成了中國百年轉型的一大「險境」呢！

自「訓政初期」進步於「訓政中期」，是跨越險境、通達理想之境的橋梁。「訓政」若分初、中、晚三期的話，則「訓政中期」既在深化初期之效，更在引向晚期之果。「訓政晚期」意味着憲政即將到來，也可以看作是憲政的預備時段和演習過程，其與憲政初期的差別不會太大，甚至兩相重疊（例如「解嚴」之後至第一次「大選」十多年間的台島情形）。因此，憲政關鍵是要坐實「訓政中期」的諸項特徵，強化這一進程，以引導出後續結果。細觀當下，可以看出，「訓政中期」的核心特徵在於自下而上的「維權政治」所造成的維穩壓力繼續影響日常政制，但政制本身相對秉持較為開放的心胸，通過政制措置將政治網開

一面，在積極回應民意壓力中尋求政治正當性，甚至為此引入競爭性政治因素，而於積極改良政制中以建設政治為鵠的。實際上，自「訓政初期」的民意政治和維權政治向前再跨一步，而至少是在所謂「黨內民主」的意義上，有限引入現代政治的開放競爭性一項，即達「訓政中期」之效。不是別的，正是對於現代政治的開放競爭性的承認，乃至於有限度地引入，構成了訓政中期的重要特徵，也是化解政治正當性危機的最小代價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自社會來看，「訓政中期」意味着無論是零星分散的民間壓力，還是組織性力量的發育增長，均達一定程度，官方雖仍側視，但不再視為異類，更不以敵我歸類和打壓，反而至少於理念上在「朝—野」的框架下兩相審視，於「人民和代議」、「授權與執政」的流程中各守分寸，既彼此尊重對方的合法性，又標榜自家合法性更加接近正當性。最近中共上海大員對於獨立競選人的表態，可為此種轉型的一次試探性亮相，值得肯定。

進而言之，在此階段，「政權」和「政府」的區別獲得了更為清晰的界定。就是說，政權代表道統，表徵權威，構成政體，是內政意義上人民主權之於政治正當性的表述；政府代表政統，掌握權力，形成政制，經由開放競爭機制獲得人民主權的授權而執掌政權，表述政制的合法性。政權意味着正當性，正像政府需要合法性，而合法性來源於正當性。置身現代政治，這一正當性無法以「打江山」的歷史還原主義來締造道統的不證自明，也

不是成王敗寇的政治歷史意識形態，也不是以全民政黨和全民國家為名進行的俯就式的自我標榜。倒是其道統在於不斷的、周期性的授權與執政的儀式化確認過程。不是「人民」在某個歷史時刻的一次性總體授權，而是「人民」定期登場，以競爭性和開放性的法權程序遴選執政者來完成正當性的確認。就算是在「立國時刻」或者「立憲時刻」曾經有過一次性授權，但是此種授權也需要藉諸周期性和儀式性的授權程序的不斷重複來確證。換言之，在一次性總體授權獲取正當性之後，其正當性需要經由周期性、儀式化的合法性表徵程序來確認，而且這是一個不斷的確證過程。否則，即無正當性，也無合法性。前文說以現代政治文明擺脫政府時刻「維穩」之窘，確立「政權的永久正當性」與「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立意在此，由此而來。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也就是現任中共總書記所說的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並非一勞永逸，相反，卻需不斷證明之意旨所在。一旦經此周期性確證過程，「人民」便暫時退場，「國民」和「公民」上場，政治秩序意義上的基本格局回復至「國民與國家」、「公民與政府」的互動，而非「人民與敵人」意義上的對決。此時此刻，顛覆政權可能構成犯罪，但反政府本身並非為罪。政府不僅可以反，而且，必要時「國民」與「人民」得推翻之。這同樣是基於正當性的合法性展延，也是永久的正當性呼喚合法性以挺身而出的方式來衛道、立制和宣教。這也正是為了將政治緊張導約入理性渠道，

和平釋放，才產生了對於政府這一政權的具體受託者的制約和反抗的必要性。這就是民主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最為核心的旨趣。由此，當然不存在旨在保政權、衛權威的「維穩」，有的至多是保政府、求權力的競爭，而且，必定是一種開放性競爭。政權和權威早已存在，就放在那裏，供着呢！你有本事，經由周期性、儀式化的法權程序將政府拿下，獲取了權力，則受託幹一個周期，乃至於幾個周期，都有可能，也有合法性，而蔚為「天命之所繫」。也就因此，反過來說，以反政府的名義來迫害知識界，限制言論自由，阻撓公民的橫向聯合行動和組織化生存，恰恰是一種典型的反啟蒙、逆現代性的倒行逆施，也是非政治、反政治的蠢招愚數，更是明白授人以柄的前現代反民主陋行。這不僅表明權力在反對權威，也是政府對於政權的背叛，更是合法性自身逆轉之抗拒正當性。對此蔚為通識，而為朝野所共守，特別是官方不好意思公開否認，並多少踐行於行政，落實在法權，就表明政制進入訓政中期，政治庶幾乎登場矣。

經由晚近百年奮鬥，特別是最近三十多年的舉國努力，國民普遍受惠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國家間政治意義上的集體尊嚴更且前所未有，連帶而來的是中國公民身份的「護照人權匯率」水漲船高。然而，為何普遍的失落感成為時代的特徵，隨此而來出現了持續的政治緊張和社會分裂現象，而且，事到如今，似乎到了一見分曉的「決戰」時刻呢？朋

友，這就不能不回到剛才提及的「中國問題」的四個方面或者四個層次了。蓋「經濟—社會」發展初具雛形，總體規模意義上已成世界老二，民族國家建構大體完成，有待最後收尾，唯獨優良政體的提煉和鋪展，國民多所不滿，而隨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一度有所忽視的意義秩序的問題，再度降臨心頭。由此交集，使得當下中國民眾對於「尊嚴—政治」和「政治參與」格外敏感、特別關注、心嚮往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換言之，它決定了此刻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開放政治，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要求。這就是政治，天大的政治，也是政制兌現自家合法性之最為急迫而無法迴避的政治考試，蔚為政治正當性的樞機。毋庸諱言，當今中國，較諸各項經濟赤字，「尊嚴赤字」和「政治參與赤字」更為嚴重，也更具危險性，而且愈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們對此愈發敏感和在意，也特別容易導致矛盾和心結，而使得已然取得的各項經濟、社會成果極易流失。這不僅不能彰顯其應有的政治效果，反倒突顯了政治的不能跟進和政制之缺乏誠意。無「經濟—社會」發展，合法性不彰；「經濟—社會」發展之後，民眾尊嚴政治突顯、政治參與感萌發，於此無所接應，結果不僅造成政制的合法性不足，而且甚至影響到政體的正當性了。大家不是埋怨缺衣少食，也不是無視「經濟—社會」進步，更非對於國族認同出現了迷茫，而是深感在此體制下依然沒有發言權，亟需發聲和出氣裝置。所謂尊嚴不僅

在於倉稟實衣食足，而且在於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進入政治進程，由此進而可能為平等締造政治法權基礎。事實上，已有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水平之後，倘若不能跟進對於政治參與的滿足，提高生命尊嚴感，同樣危乎殆哉。歐洲的一八四八革命、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台島的歷史、刻下中東北非的情形，對此都已接續作證，言之再再。由此，既有政制對於「尊嚴政治」和「政治參與」進行有效的政治回應，應當成為「訓政中期」的又一核心特徵，也是緩釋政治和社會緊張，平穩過渡到憲政佳境的必修科目，需要政府和整個國族同堂進修，一同升級。

二、搭建「訓政中期」這座橋

為此，需要審時度勢，順時應勢，調動政制權能和政治智慧，依恃社會的自我發育，逐步啟動下述政治進程。凡此進程，不是基於某種宏大理論的政治設計，而是主要針對的是民間開放政治的訴求，基於《憲法》規劃的既有憲制，將已有的憲法條款坐實為日常行

政和法權實踐，使憲法的政治承諾兌現為政府施政和公民憲法政治層面的願景而已。換言之，它是一種在肯認既有政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和平有序、節制漸進的民主化進路，希望以最小代價贏得中華民族「提煉優良政體」一役的完勝。化解前文所說的死結，開創新局，非此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之路不可。置身中國文化語境，不妨說憲政民主就是王道政治，一種現代外王之道，而這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當性。

首先，釋放政治善意，實現政治和解。晚近十年，民生成為政制聚焦所在，也是文宣的重點。尤其是最近兩年，政績考核引入民生指數，蔚為官民通識，尤其是民間問責政制、考問政治合法性的不證自明的指標，對於各級行政，尤其中央行政似乎造成一定壓力。這既是基於權貴橫行通吃招致普遍民怨，危及體制安全，因而有所因應，也是執政理念轉變的結果。不僅形諸應急性行政（如年終總動員式的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而且落實為制度性關注，如免除「農業稅」，普惠式的農民養老金制度，以及通過修法程序有限度、象徵性地提高個稅起徵點等等。制度性關注民生、重新切割「蛋糕」，表明政體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善意，摸清了「民生就是政治」這一脈絡，而非為發展而發展，卻依然屬「以民生接應政治」，表現為以「行政打理政治」，而非「以政治接應政治」。民生當然就是政治，可政治並非只是民生，更非等同於民生；民生和政治均須借助行政來打理，後者

卻不當全盤包辦代替。「民生」之外，眾所周知，尚有「民權」之「民主」和「民族」，非民生因應所能統括，更非民生一項所能打發。行政之責，在於落實政治，而非代替政治，更非取消政治。實際上，在諸多看來屬民生問題的背後，牽扯到的實際是「民權」之「民主」，乃至於「民族」，內涵「尊嚴」和「參與」的需要。而且，民生改善之後必然引導向「民權」之「民主」，時候早晚，端看具體國情，行政於此必須多所接應，否則要政府行政幹什麼，又或，行政靠什麼來張本。就刻下中國而言，似乎正好走到了這一步。對此了無自覺，硬挺死撐，不鬆口，必致緊張。相反，若能立刻在特定層次和範圍內允許民主實踐，舉行有限範圍的真實的選舉，擴大民權範圍，特別是表達自由，方能緩解緊張，鞏固民生成果。哪怕是前述中共上海大員的口惠，釋放了一定的善意，不就贏得了掌聲一片嗎！在此，作為民主的先導，「黨內民主」先行，自最高層推展開來，可為表達誠意的最佳示範，為政制計，也是最為穩妥的招數。

同時，接納普世價值，並且予以中國文明場域中的在境性闡釋與體制性弘揚，同樣是一種政治誠意的表示。刻下中國，對於究否存在普世價值，存在不同看法，本為常態。但是，以一種意識形態力排普世價值，根本否認舉世咸認、而為一切人類所共奉的基本價值的存在，實為不智，亦且不善。畢竟，自由、仁愛、平等、尊嚴和寬容諸項，均為人人得

求而人人應得之仁心善意，也是一切欲求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政體和政制之政道與治道，何得以「偽善」和「荒謬」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呢？更不能將其歸結奉送於「西方」所專有。若說偽善，則人家於「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之間兩相分際，區別對待，一面看固為雙重標準和偽善，另一面看，則蔚為政治成熟，一種現代國家理性而已。就自現實主義立場而言，那正需我國族體而習之呢！次而言之，代議制民主、競爭性選舉、司法獨立的法制和多黨政治、公民社會，雖非政體極致，亦非社會仙境，卻是較佳選擇，早已行之有效，也為億萬人心所向。偏偏你對着幹，甚至於信口雌黃地大加撻伐，將一種解讀強加、凌駕於億萬國人，於執政和政治而言，均為不智之至，也是毫無政治誠意的表現。若謂任何所謂「普世價值」均須落根特定國度和文明，藉由體制化而獲得自家的肉身，方始具備良知良能，並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彰顯其普世性，則無人可稱疑義。前文所謂對於普世價值「予以中國文明場域中的在境性闡釋與體制性弘揚」，意即在此，而已致意再三、多所轉圜矣！相反，若能於此用功，形諸口而踐於行，如同至少在口頭上接納了聯合國的三大公民人權公約一般，則身段軟，誠意可嘉，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並保持期待。

有見及此，允許異見的公開存在，是衡量是否具有政治誠意和行政善意，願否實現政治和解的重要標誌，允為邁進「訓政中期」的門檻。所謂「公開存在」，意味着不啻聚

談於飯桌，或共鳴於街巷，還需形諸報刊，見諸網絡，表諸論壇，明辨於明堂辟雍，才能叫做「公開存在」。不能說一下子暢所欲言，乃至於相激於代議之所、大會之堂，但至少先做到不刪不屏，方能彰顯誠意。讓外網聯通，擴大人民的視野，特別是為青年一代生活於一個意見多元的政治、文化生態之中營造條件，只會增加國民的辨識能力，強化他們對於改制的好感與凝聚力，本非不可思議。在此，使申辦報刊的憲法規定和法制保障真實到位，行政配套跟上，不卡不壓，改變鉗口的一貫體制。這更是表明不反對乃至於促成「公開存在」的制度誠意的簡明措置。刻下中國早已異見多元，紅花黃花，在朝在野，各美其美，卻多限於自說自話，或者見諸有限範圍，並無體制性保障。更有書報檢查橫行，隨時施放令箭，讓言論自由的憲法條款頓時失效。置此情形下，自開放報禁、放寬言路、落實憲法言論自由的規定起步，跨入「訓政中期」，可謂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知其然而後給力於所以然矣。如同對於社會團體的管理須從改變社團登記的報批制為備案制起步，允許異見公開表達，需自開放報刊刊號或者取消刊號專制開始。朋友，你怕什麼呢？

與此同時，平反「六·四」，釋放異見人士，是最為有效而具標誌性的政治誠意表達。當年鄧公復出，以平反「四·五」和為五十多萬「右派」摘帽先聲奪人，一時間人心慰藉，萬民景從，神州振奮。今天情形略同，「六·四」懸案早為政治決斷預留空間，只

待乾坤隻手、大智大勇。一朝論定，則開啟「訓政中期」大門，也就是朝向憲政民主又進一步，則正當性不待人謀而自定。另一方面，中國囚禁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界輿論提供話把子，更讓仇華勢力得分，等於自拆牆基，處處被動挨批，顏面掃地，致使多少建立國家形象的努力付諸東流。與其以舉國體制對付一人而為世界見笑，不若放人了事，先釋善意，兩相和解，然後再求「團結合作、肝膽相照」，進至於「互利共贏」。畢竟，在國族富強和人民福祉面前，雙方均居下位，而意見多所交集，本沒有談不攏的道理嘛！民主法治，不是什麼神聖，不過是致力於「國族富強和人民福祉」的活法和說法罷了。如今陷入僵局，一方握威權，實際具主動地位，另一方秉持道義優勢，獲輿論同情。雖說各有其利，但仍需佔據主動地位的一方大肚能容，先邁出一步，以破解僵局，引領政治進入「訓政中期」。如此這般，於己於人，何其善哉！

其次，兌現政治承諾，以政治接應政治。近代立國，自「一九一一」和「一九四九」，均以民族富強願景和政治民主承諾奠立自己的合法性，再輔以文化復興和個性解放等項目，不期然間均為一種因應整體性潰敗的通盤致思理路，也是一種整體性方案。它們蔚為旗幟，招納了億萬信眾，萬眾一心，所向披靡，說明「願景」與「理想」在政治動員中的重要性，更擠逼出兌現願景和踐履理想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其間，無論立憲還是打仗，所

聲稱而開出的支票，或落筆於「自由」，或鍾情在「解放」，自由則「民主法治」，解放則「翻身做主」，基本項目均不外民族、民生和民權諸端。對此，大家看現行《憲法》的序言和自「臨時約法」以來的各種憲法文本，就會一目了然。就今日中國而言，社會穩定、生活安寧、「小康」、「現代化」和GDP，均一體籠統於公共產品和歷史願景，關於民主、法治、自由和憲政的諸項承諾，才事關政治，而為政體的正當性之所在。不管兌現程度和實際水準如何，它們作為政權的正當性標誌，是政府理當孜孜以求、盡力兌現的指標，否則事涉虛偽，國基不穩。如前所述，當下現實中的諸多社會紊亂和政治緊張，源於國民的「尊嚴赤字」和公民的「政治參與赤字」，僅以民生接應似乎一時間有些效應，但終究文不對題，三岔口。恰當而實際的做法是以「政治接應政治」，就是說開放政治市場，為公民的政治參與提供真實場景和有效渠道，化赤字為盈餘，而且是經常性帳面盈餘。

在此，「兌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亦須為一種和平節制的進程，起步卻不得拖延，否則矛盾激化，反而被動，不好收拾，也不是什麼大道理。所謂「進入政治場域」不是指公務員考試（那是官僚科層制度的常規行政管理，充其量屬所謂的「以行政吸納政治」，短時間有效，但效用有限）¹ 而是指為「人民」兌現政治身份，為「國民」和「公民」實現自我認同，打開政治大門。就是說，兌現「人民」這一身份，不是「為人民服務」意義

上的，也不是「官—民」結構中「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式的俯就恩賜，而是讓全體國民於定期的授權活動中感知立國基礎和立憲時刻，使權力在溫習政體的正當性來源中多所恍惕，從而各守其位，相互提醒，彼此砥礪。這一定期授權儀式不是別的，就是大選，也是現代民主的集中展現，一種世俗化和市場化的政治經營方式。中國此刻需要真實的選舉，一如需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良性發展，不可偏廢。這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又需要即刻起步，不可拖延。與此同時，必須坐實《憲法》規定，滿足「國民」和「公民」的個體性身份認同需求。個人除開作為「人民」，在匿名或者無名狀態下，以「一人一票，同票同價」為憑參與上述定期性權力授受儀式這一政治嘉年華外，還有個體性政治參與需求，如組織政治抗爭、挺身參選、介入個案性政治活動等等。在此，無論動手還是動口，他或者她不是人民，或者，不再是人民，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某某，即具體、特定、有名有姓的國民和公民，張三、李四，或者王二麻子。經由競爭性政治，特別是公開、差額、競爭性的選舉，讓他或者她上場演一把，感知作為一介國民和公民的身份法權，玩一玩政治，那才叫充滿「主人翁意識」，也就是「當家作主」！其最大的好處是政權由此儀式踐行了自家建國之際和立憲時刻的政治承諾而獲得了正當性，政府從此不再需要「維穩」了，轉而操行日常治安和行政，數千億元的「維穩」開支也得以節約下來轉用於民生和國防。一句話，是到了兌現政治承諾的時候了，人民等不及了，好像也不願意再等了。

說到他或者她的粉墨登場，則行頭不能少，一千人馬鑼鼓襄助更是必須。由此，要求兌現《憲法》規定的公民結社自由，容忍公民社會的發育。如前所述，如今造成政治和社會緊張的主要根由在於大家感到對於政治毫無發言權，沒法進入政治議程，無處表達政治意見，而人生來就是政治動物，本性在此，不得不然。當下埃及、北非和中東各地的亂源之一，似乎亦且在此。新加坡初露端倪的競爭性、逆家父式政制的政治潮湧，以較具公平的選舉泄洪，用監國公的個人退位來滅火，為此提供了反例。畢竟，光是年年人大代表式的「獻計獻策」，無法滿足「人民」的政治參與要求。兌現政治承諾意味着滿足包括組黨在內的公民結社自由，這是憲法明文規定的政治承諾。近幾年來，官多少容忍了時不時零星冒出來的「獨立候選人」，說明政制有進步，政治也有一點誠意。可以將此誠意發揚光大，以此為契機，而逐漸造成一種民主氣象，延展至放寬社團登記，培育公民的組織化生存，乃至於政治組織化生存，正為千夫之所盼，而為萬目之所視矣！

在此，筆者意欲重申，晚近中國順時應勢，自朝代國家遞次轉型為民族國家，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形制也逐步兼具「政治共同體」的品格。尤其最近十多年來，國民的國家意識與公民的政治意識輻輳於政體建設，於內顯政治訴求和外彰國族利益的互動進程中，將此政治共同體的品性愈發彰顯出來，頗有氣象。政治共同體意味着中華

民族是一個公民的大群，人民於此個別化為具體、特定、各秉利益訴求的公民，而以試驗、提煉、演繹有德有效的政治生活方式來展現這個民族的自我組織能力，來表徵他們建設良善的團體生活的生存智慧。換言之，借用「政治社會」這一術語，則此種政治共同體的善境是政治社會，也就是一種具有成熟的政治智慧的國族體制和政制形態。置此國族生活和政制形態下，政治之制度化與制度化的政治形態，其所提供的社會動員能力與容納由此激發的參與熱情的多維管道和複雜機制，特別是容涵凡此種種造成的體制性緊張的政治消解能力，構成了此種政治秩序發展的動力和基本特徵，也是藉由優良政體所表徵的民族國家政治成熟的標誌。它的對立面是市儈式的政治勢利和鼠目寸光的小市民性質的政治短視，以及當斷不斷的政制無能和政治溫吞。此時此刻，國家不只是一種含括公與私、經濟與政治、國民與權威的容器，而且，國家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存在。也就因此，對內而言，政治社會在強調經濟與政治分際、市民生活與政治權威各守邊界、奉守寬容和多元文化，以及法權安排的中立性，同時拒絕市儈式的政治短視和普遍的政治冷漠，鄙視一味沉湎於私性生活的市民階級的庸俗和放逐對於政治、法律的自然法追問的墮落。對外而言，它意味着對於國族利益邊界保持清醒的警覺，同時又懷持普世情操和大同理想，持守「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政治自助體底線倫理和天下情懷的統一。在此，若問如何建設政治社

會？怎樣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共同體？那麼，答案依然不外是從兌現《憲法》的政治承諾，展現政治誠意起步。

再次，制訂「時間表」和「行動圖」。前文曾經說過，「人民等不及了」，實為此刻中國政治情勢之一斑。特別是年輕一輩，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置此全球化多元時代，兩相比較，更是不願自己的生命「被荒廢」，因而具有更為強烈的參與意識和自我實現衝動。僅僅停留於書面承諾，卻遲遲不見行動，一如雖然早有《憲法》規定，卻難以坐實，不願坐實，懶得坐實。這從而。反顯偽善，從根子上損害《憲法》尊嚴和政治權威（如果還有權威的話），其行為其結果，實實在在，均為自掘牆基，匪夷所思。而根子則在死死抱着列寧式權力壟斷的理念不放，維護一家私利，太與時代脫節了。這是「愛新覺羅氏」曾經的糾結與悲劇所在，只不過其「一家」兼具「一族」背景而已。因而，尤其讓人不能容忍的是，十來年間，雖然政制有所改善，但政治反倒退步，使得全體國民關於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的美好願景幾近破滅，其於民族政治理想和公民個人的政治情懷而言，均為災難性打擊。

當年清末變法更張，冀望挽狂瀾於既倒，雖有關於「預備立憲」和「正式立憲」段落的表態，卻於劃定「時間表」和「行動圖」一事上含糊其詞，希圖蒙混過關，名為保大清

延祚，實圖愛新覺羅一家之利，而時代大潮激盪洶湧，終於等不及。國民政府甫定，聲稱落實革命理想，循依「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步走，至少一開始好歹予人民以盼頭，其後不進反退，痛失「江山」，卻又順應時勢，幾經跌宕，將「萬年國會」終結於民主化，可為善終。今日中國雖然「民主」「法治」大詞天天講，卻始終無實質性行動，更無一個完整、具體和實在的「時間表」與「路線圖」，讓大家看不到希望，摸不着頭腦，民眾的不滿早已日積月累，戳脊樑骨了。其情其勢，於政治和政制而言，均可謂危乎殆哉。

有見及此，如果真有政治誠意，以中華民族利益和全體人民福祉為重，那麼，趕緊拿出「時間表」和「行動圖」來，以凝聚共識，鼓舞民心，重啟「改革開放」。而這就是在權力而鬥爭，也就是政治的至上之善。當然，究竟未來的歷史會否沿着「時間表」和「路線圖」來展開，此間的政治意志能否將自家現實化，是它們本身所無法做主的，相信一般人對此都有思想準備，也都能理解。但是，有一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總比沒有好；早日公示這一「時間表」和「路線圖」比晚公示好；其具體步驟和內容愈詳實愈認真，具有可操作性，比囫圇吞棗、含混其辭要好；在基於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必定比閉門造車、一廂情願的更具凝聚力，也更具實現的可能性。總之，以頒詔天下「時間表」和「路線圖」為標誌，而啟動「訓政中期」，正其時也！

最後，開放政治市場，容忍並培育「對話者」。東、西「先民主起來」的國族和社會共同體的經歷表明，民主政治伴隨着世俗化平庸世道一同降生，同時來臨的還有市場經濟和法國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因此，民主政治天生意味着它是一種政治力量的多元博弈場所，同樣循隨理性人的市場規律。換言之，民主政治意味着權力向社會開放，以強化社會利益集團的組織化程度來形成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進而為現代政黨政治敷設社會基礎，將正義的分配推衍為全民的權利和責任，促使民族國家由經濟民族向政治民族邁進。也就是說，民主政治必定是代議政治，代議人的身後必須有集團利益與集團意志，而不是個人利益和個人意志，才能形成真正的代議機制。以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理性抗衡作為馴化權力的內在機制，事實證明，既較「權貴通吃」、資本和權力專制為善，亦較「一盤散沙」、社會組織性羸弱為強。其間的樞機，就在於「大致平衡」。利益集團訴諸一定的政治組織形式進行利益博弈，構成權力開放的基本通道。而一切依循法制化渠道進行，即所謂「理性」抗衡。所謂政治市場，不外乎就是這般情景。

在此，如果我們承認實行立法的公開與民主，促進社會的自我成長，推動社會利益的組織化程度及其代議水準，實為從源頭做起的根本之策，也是使中國國族逐步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的積極步驟，那麼，在此政治市場化進程中容忍並培育「對話者」，當為

政府責任，也是一種政治德性。公民的組織化生存是民主政治的要旨，較諸一盤散沙式的國民存在形態，其實更具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現實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一旦「群體性事件」爆發，有關方面出面調停，要找個「對話的」都沒有。而權力面對萬千分散個體，雖說可得一家獨大之利，卻恰恰難免「動亂」之患。相反，倘若對於政權有信心，那麼，出一些「國王的忠誠的反對者」，不過等於是在另一方面同心協力為國作戰，何憂之有呢！因此，逐步開放政治市場，自零星舉措，如容忍所謂的「獨立候選人」、坐實社團登記的憲法規定、包容各種NGO和NPO組織做起，進至承認公民組黨的合法性，既是訓政中期的任務，更是迎接「對決時刻」、引向中華民族憲政時代的必須。由此，社會的自我演進固然是根本，但是，有所作為的「政治決斷」亦須登場。

三、對決、政治決斷與節制的民主

眼下中國倡說和諧，卻社會持續緊張，政治形勢緊繃。所謂的「內緊外鬆」，甚至於「內緊外也緊」，不過是深層問題的對策表象。除開說明前述有關「政權與政府」、「權

威與權力」的陰陽離合之外，還展現了一種將見「分曉」時刻的焦灼狀態和焦慮心態。全體國民對於未來發展既滿懷信心，抱持從未有過的自豪與希望，又悵然無措，不知未來中國究往何處而去。普通民眾既是乘客又是槳手，無所選擇，只得隨其沉浮，一些權貴階層人士則將財富和戶口悉數轉至歐美大船，隨時準備這邊棄舟，先保平安，觀望而後再圖發展。即便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一定意義上，凡此情形不是對於既往「改革開放」的否定。相反，它們恰恰表明，正是經由三十年持續有效的「改革開放」，真的開放了，而「對決」的時刻也到了！

所謂「對決」，是指中華民族自「一八四〇」以還，一百多年的轉型至此，已然到了即將水落石出之際。放開眼界，這不僅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善果，更是近代一百多年間，積洋務維新、清末變法和民國新政以及晚近三十年「改革開放」之功，在今日之集大成，於此刻之總爆發，有以然哉，期以然哉！因而，若說總體形勢，非此莫屬；要論大是大非，概乎於斯。朋友，所謂「水落石出」，所謂「對決」，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東亞諸國和台島經歷來看，不外乎就是民主政治要登場了而已，也就是本文最後所要伸言的使得中國「政治上有辦法」的法子來了而已，有什麼可怕的呢！就是說，此種對決不是「一九四九式」的，因為那是近代中國兩種現代性方案之間的火拼。毋寧，它是「一九一一式」的，

或者，是對「一九一一」理想的最終坐實、接應與回歸。正是在此，需要推動歷史車輪一把，主動促成「對決」，於提煉優良政體的歷史實踐中譜寫歷史新章。

正是在此，雖然誰都清楚這一總體趨勢，卻誰都不願意負起這一歷史責任，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怪現象：精英階層似乎志得意滿，躊躇滿志，甚至倨傲嬌縱、蠻不講理，實則政治上普遍意志衰頹，心志馳靡，無所作為，溫吞無力，表現為日常行政就是以「維穩」為綱，能拖一天算一天，盤算着將問題留給下一任，得過且過，而聽任歷史時機白白流失。此種情形，既表明筆者於〈中國步入訓政初期〉一文中所說的「平庸政治」確乎已然登場，還說明歷史走到了節骨眼上，責任重大，非平庸之輩所能擔承。遍觀華夏，此時此刻，通常所謂的行政幹才內瓢裏都不過一介畏葸之徒，干祿之輩，膽大而無血性，貪婪卻不敢承當，言之鑿鑿實則毫無歷史視野。因此，初始嚷嚷，繼則了了，終究無所作為。畢竟，對於執政超逾一個甲子的巨型政黨而言，倘若「對決」之際喪失執政地位，百年老店關張歇業，可是誰也不敢、不願、不能承擔的罪責。有此政制擔憂而無此政治信心，加上缺乏「擔當」這一至關重要的政治德行和歷史遠見，遂使眼下中國出現了滑入「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時代」之險情，一個沉悶壓抑、停滯不前、鐵桶一塊的國族時段，怎不叫人心焦！

朋友，中國的未來比任何時候都緊緊繫於此刻的抉擇，此刻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當斷則斷。時代呼喚着自己的英雄盡早躍身舞台，這是訓政中期必現的景觀。雖說眼下確乎屬「日常政治」時段，一個世俗化的庸常時代，而民主政治在可見未來的登場不過明示日常政治正式降臨而已，但就鴉片戰爭以還，可能遲至本世紀中葉的「歷史三峽」而言，卻又尚屬峽中，仍然位處「非常政治」時段。交替之際，最難將息，可不是難為人嗎！也就因此，眼下全世界都在看中國下一步怎麼走，一如全體中國人更是對此之憂心忡忡，望眼欲穿。換言之，崛起中的大國，無論是在改制還是對外政策方面，其中主要是在政體的最終形制方面，在他們的眼中尚屬一個並未最後定型的國族。巨量的體形，十三萬萬同胞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陣勢，如何出招，怎樣收勢，均為攸關全球的大事，都是影響人類的壯舉，牽動全球關注，自在情理之中。正是在此，也正是為此，一句話歸總，此時此刻，中國民族需要「政治決斷」。「急今為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² 康梁當年的疾呼，今日聽來，言猶在耳，而似乎同樣急迫呢！

筆者不避嫌疑，再次呼喚「政治決斷」，就在於面對困局，有一項任務不可迴避、也迴避不了的是便是如何打破僵局，化解前述「死結」，推轉歷史巨輪繼續向前。是的，以極大的道德勇氣實現民族政治決斷，蔚為主權者意志的偉大展現。在此，人民必須登場，但依據下述筆者心目中的「節制的民主」的設想，其登場方式卻為一種法權程序。換言之，政制所做的每一政治決斷，不僅仰賴個人的德性和膽識，超凡的行政才華，而且，同時需要將其導入民主渠道，以立法主權落實人民主權，將政治決斷形諸立法程序，形成「政治的立法」與「市民的立法」交替為用、彼此呼應的格局。在此，憲法作為公民理想與民族理想的合一載體，是承認並暫時解決政治僵局的唯一法律——政治形式，既可能是這一僵局的終結形式，也可能是加劇僵局的起點，從而是將法律轉變為政治、將政治換形為法律，以非暴力方式實現歷史進步的自由民主的自我武裝。最終而言，這是作為民族自由的決斷，「修憲」之奧義，全部在此，端看「決斷」的立法主權是否到位。有關於此，筆者倡言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認為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肯認此時此刻的當機「決斷」對於歷史進程可能起到的打破僵局的沖決功效，同時，另一方面，藉由國家利益的合法性轉向的四項原理，特別是自由原理和集體行動機制，築堤設壩，將「決斷」的滔天洪流疏浚於立法主權的河道之內，從而最終導向憲政正義，實現民主自由的自我武裝，防止決斷

淪為專擅。³ 過往的慘痛教訓早已告訴我們，對於民主社會這一前景的呼喚同樣不能僅僅寄託於「英雄的能力」和「英雄人物」的決定意志。即便如此，主權者授託下的偉大決斷可能表現為以一人之身，推進現實往前騰躍，使歷史接近於這一前景，卻確為實情，亦且為歷史所在佐證。非常之世之非常之情，要求非常之刻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訴諸非常手段，進而有望達成非常之效果。此情此景，誠如曾文正公所說：「不挾破釜沉舟之勢，寧有濟哉！」

由此，與前蘇聯、東歐式的巨變不同，經由上述政治決斷促成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登場方式，可望是和平漸進、理性節制的，其所達成的亦必為、也最好是一種「節制的民主」，或者，就初期而言，一種「低度的民主」。就是說，它在滿足民主政治的基本指標的同時，給予國民以民主歷練的餘地，其中特別包括與權利意識相適應的責任觀念和擔責能力的養成，等等。否則，國家頓成一團亂麻，至少，出現短時間內的失範和無序，亦非毫無可能。為此，應當首先至少努力避免下述四種可能性。第一是「政治清算」。與其孜孜於政治清算，不如全民反思。力避政治清算，方能掃除政治心理障礙，而為民主政治登場開道。如同一定時期的「不爭論」是為了向前看，以爭得時間和國族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排除政治清算同樣是為了憲政民主這一最大國族利益，以如同一定時期「一心一意搞

經濟」的心境和心勁「一心一意搞民主」。時至今日，這一擔憂可能是多餘的，但假若前述「死結」持續不解，那麼，怨憤之下，諸情皆有可能，則此一提醒倒也必要。在此，排除「政治清算」不等於放棄歷史反思。所謂轉型正義告訴我們，與糾纏於「政治清算」不同，歷史反思或者「歷史清算」並不針對具體個人，卻以建立是非分明、公道昭彰的良善社會為鵠的。因此，所謂「清算」歷史不是着力於報復，而是經由辨析過往是非和思想爭論，還原歷史真相，並給予相應的定位，從而為全民族樹立是非觀念和善惡標準。這正是「革命」與「轉型正義」之區別所在。第二是民粹主義政治。台島作為大中華地區的政治特區，中國文明中「先民主起來」的試驗地，其民主化進程的最大教訓是民粹主義不期然間主導了政治進程。包括利用、煽動族群對立來贏得選票，後患無窮。諸如法國「民族陣線」等右翼政黨之利用移民問題問鼎大寶的努力，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均透支「福利」以吸票，對此提供了另一版本。泰國一度出現的亂局，也說明了民粹主義之不可倚。民主政治之下，政客利用民粹主義的衝動勢所難免，猶如初經馴化的野馬總思脫繮。但是，若能則提早防範，並形成全民警覺氛圍，特別是精英階層於此分享防範共識，倡導正派社會和良善生活，則多少可以避免、紓解其危害。第三，黨派對決式的無聊政治。美國式的黨派政治耗費公幣、製造社會分裂，甚至不免於將政黨利益置於國族利益之上，實非民主善本。

反倒是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更適合中國。就政經互動下的所謂「資本主義」立論，在可見的未來，極可能的情形是中國的發展形成了中國式的「拉丁資本主義」，最好的情形是「萊茵蘭資本主義」。⁴ 第四，黑金政治下權貴資本對於民主的操控。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實行民主政治，末了出頭來過問政治的不過是幾個政黨，而任何政黨都是特定利益的產物。既然不存在全民政黨，則政黨政治易受黑金操控，遂成民主政治的一大頑疾。在此，李登輝式的黑金操控、意大利式民主所展現的黑金政治和權貴資本的合而為一的形態，堪為教訓。因此，避免政黨利益為黑金政治所污染，防止權貴資本對於民主的馭控，實在是渴望民主而終究將會擁有民主的國人需要三思而慎行之處，也是「節制的民主」之題中應有之義。

最後，筆者願再伸言，「訓政中期」之必要和無可迴避，愈早啟動愈好，就在於經此過程為「中國問題」找到最終解決辦法。就今日情形而言，辦法在政治，非政治莫屬。實際上，梁漱溟先生對此早曾多次致意，中國的問題在於「政治」，必須政治上軌道，始有解決之道。綜觀梁公前文後意，此處之「政治」，當取廣義，相當於政制與政體之通謂，也就是政道與治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中國文化要義》的「序言」中，作者寫道：「近幾十年來政治上之紛紜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⁵ 新中國之建設，

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此無疑也。今日中國，雖滄海桑田，而梁公所慮猶然，則建設政治、臻達政治成熟，一句話，「政治上要有辦法」，依然為國是當務之急，更是百年轉型的最後一役。隨着南海局勢的升溫，大國博弈的展開，以及對於中國的遏制態勢的愈發激切公開化，內政時刻處於「維穩狀態」對於政體聚精會神應對博弈形成了嚴重掣肘，而使得本來有辦法的事情頓時沒辦法。因此，趕緊邁向「訓政中期」，於政治上有辦法，不僅是推進「國家政治」的必須，也是在「國家間政治」上立於主動的前提。

為政者，可願三思而一振乎？

二〇一一年三至七月於清華荷清苑——京西舊河道傍

* 本文原刊於《領導者》2011年8月號。

1 譬如，近時新疆自治區政府宣布「發放」七千公務員名額，懸示社會，各族利益均霑，多少給希望改變身份、躋身政制者多開了一道門縫。但是，現代政府編制並非無底洞，不可能無限度「招考」公務員，因而，供需之間總有矛盾。此刻「發放名額」，會不會引致「欲壑難填」，殊難逆料。面對此情，從長遠計，可能，循沿開放性競爭政治之路，在「立憲共和主義族群政治」格局下建規立制，更具根本意義。有關於此，參詳拙文：〈憲政模式與公民政治願景〉，載《戰略與管理》二零一零第一至二期，頁二十八以下。

2 康有為等：「公車上書」，收見剪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份》（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1。

3 關於個體、國民、公民與國族等等基本法律單元及其關係的基本原理，構成了這刻下中國關於國家利益的合法性轉型的邏輯起點和思想內涵，同時並是對於這一合法性的價值基石的法理申述，說明了現代國家及其法權的組織原則。概而言之，它們表現為四種法律單元、四種基本法權、四種實現機制和四項基本原理。具體來說，首先，以個體作為基本單元的法律建構的問題意識在於個體自由，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為此需要訴諸權利機制，而以自由原理一言以蔽之；其次，以國民作為基本原點的身份政治，要害在於平等，所謂「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預設，訴諸保障基本福利的社會權利，依恃於（合約）交換機制，通括為平等原理；再次，以公民作為普遍主義的法律單位，要求憲法正義提供保障自由的政治參與權利，有賴於集體行動機制、立基於聯合原理；最後，將民族國家當作一個法律共同體，意在揭示國家利益原理實為此種共同體的組織經緯，根據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組織和運作這一法律共同體，而通達於經

由全球契約實現國際主義，抗擊「帝國」霸權，保障國家主權。有關於此，參詳許章潤著：〈論國家利益的合法性轉型〉，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一期，頁50以下。

4 有關「拉丁資本主義」、「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與「萊茵蘭資本主義」的原始論述，參詳 Lei Delsen and Elke de Jong, *The German and Dutch Economies: Who Follows Whom* (Heidelberg; New York: Physica-Verlag, 1998); Michael Albert, *Capitalism VS. Capitalism: How American's Obsession with Individual Achievement and Short-term Profit Has Led to Band of Collapse*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93)。

5 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載《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3卷），頁22-23。

第十八章

以「四民主義」兌現政治正當性

這裏，單挑一條：請坐實「四民主義」。其中，主要談的是「權為民所賦」。

理論上講，民國政制立基於「三民主義」，其之取替王朝義理和帝制道統，為中國政治開一新局。此前為「舊中國、舊社會」，此後為「舊社會、新中國」。社會還是那個社會，但至少「國家」變了，由此而有中國語境下「現代」的登場。此脈理路，幾經輾轉，歷經頓挫，最後終於寶島開花結果，迄兩黨大選輪替，和平交接，有模有樣，可謂「新中國、新社會」。如同香港是大中華「先法治起來」的地區一樣，寶島成為中國「先民主起來」的地區，真正的「特區」。民主法治均已居地生根，開花結果，正說明中國文明具有寬和的包容性與自我更新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幾年前，中共倡言「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曾有海外媒體譽為「新三民主義」。的確，這一套話語鏗鏘有力，音韻協和，涉及權力、利益和情感等重大公共资源，標示着一種權力下傾的和解姿態，釋放出溝通和回應的改制善意。然而，也正因為

這一姿態，反而暴露出了它的恩賜性、施捨式的居高臨下，一種單項度的、非平等互動性的絕對主義格局，而終究未曾回答「權力自何而來？」、「為何你有權力？」以及「你是如何獲取權力的？」等大是大非，事關政治正當性之有無，使得這一話語如同「小康社會」一樣，不過是一種前現代的言說，了無相互承認法權蘊涵的自說自話。實際上，它也是一種似曾相識的革命話語的翻版。過去講「為人民服務」，講「同吃同住同勞動」，講「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過就是這一套。作為政治宣示，本無不可，若就建制而言，則多所縹緲。而現代政治和前現代政治的根本差別，就在於前者在立憲民主的語境中回應了此一重大追問，奠立於「同意」及其授權的「統治」這一法理基礎之上。

說到底，「新三民主義」頂多只能解決政制合法性，一種行政合法性，而無法包辦代替「政權正當性」，或者說「政治正當性」，沒法向政治正義做出交待。在此情形下，直到前不久，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講話中，始添加上「權為民所賦」，算是明確回應了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一根本問題。如果說「新三民主義」意在努力表徵政制合法性，也只能撐持政制合法性，那麼，「權為民所賦」恰可進境於政治正當性。就政治之「現代」一面而言，到此為止，基本的義理大框架算是有了。果真能夠落實，凡此四項，合為「四民主義」，並當奠立政治統治之正當性矣。

總之，「四民主義」庶幾乎算是一個關於政治正當性的完整言說，一種奠立政權正當性的大綱式架構。中國此刻急務，就是坐實「四民主義」，特別是以制度性安排和實踐性操作，將「權為民所賦」形諸公民的政治實踐，真正回應「一切權力屬人民」這一表徵現代政治的根本承諾，而為萬世開太平。

二

我們知道，一百多年來，中國處在一個社會歷史文化轉型的非常時段，所謂「中國革命」的長程歷史之中。在此時段，「救國」和「建國」構成其主旨，要求將政道和治道通盤換過，以應對「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與「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兩大危機。「文明更新」與「政治轉型」，互為表裏，一百多年來，數十萬萬人忙活的就是這兩件事。細而言之，自清末的改制更張，至一九一一年的一「第一共和」和一九四九年的「第二共和」，下迄一九八〇年代逐漸啟動的「改革開放」，其間千頭萬緒，綜理大端，不外乎四項。此即「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其中，

「提煉優良政體」一項旨在重締「政治統治的正當性」，期期於中國政治上軌道，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於「政治上有辦法」，而這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悠悠萬事，重中之重。但是，恰恰在此，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始終如同世紀夢魘，一直未曾獲得徹底解決。帝制王朝以「君權神授」解決這一問題；進入新中國後，「三民主義」、「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式的叢林法則以及模模糊糊的「人心向背」也曾一度解決或者暫時懸置了這一問題。而僅有理論上的宣示，特別是採取「懸置」或者「屏蔽」之策，終究無法代替對於這一問題的實質性解決。時至今日，此一問題早已再度浮現，為世人所熟識而共知，亦為世人所同情而共慮者也。

解決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也就是在中國這一浩瀚的文明時空，重新賦予政治以道統與政統。此間一個插曲是，作為一種暫時屏蔽或者懸置之策，一九七八年後標榜的「改革開放」，作為一種不言而喻的「政制合法性」，標領「發展是硬道理」，確實至少暫時緩解了或者說推遲了對於「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一根本問題的終究性追問。這也是一個以「政制合法性」暫時包辦代替「政治正當性」，而「中興」延祚的典型案例。然而，時至今日，中國出現了「三化」與「三局」，不滿情緒蔓延國中，使得這一問題再度不可避免地進入國人視野，僅僅秉持空洞的「改革開放」來說事已然不夠了。換言之，隨着中國社會

體制的「固化」、政治體制的「僵化」，尤其是最近幾年自上而下基於「維穩」而出現的「反民主化」，口子收緊了，導致中國社會和政治出現了「困局」與「危局」，致使人心思變，希望出現實質性的改革之「變局」。置此情形下，本屬正面的「改革開放」，在一般大眾心目中，似乎成了反諷，早已不敷鋪展政治正當性之用了。因為，君不見，一些地方政府的殃民之策，謀政府一己私利的歪招，瞎折騰，包括發改委和壟斷央企關於油品漲價的種種諉辭，其之出台與說項，不都是打着「改革開放」的旗號嗎！「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這一曾經滿載着國民美好憧憬的旗幟竟然落入今天這般田地，夫復何言。即便如此，大家依然寄情於進一步真正的「改革開放」，因為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在此情況下，「新三民主義」雖然表達了政治和解的姿態，甚至表達了革命平民主義的願景，希望藉此「夯實」合法性與正當性，但卻遠遠不夠。只有加上「權為民所賦」，才算回應了「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一根本追問，將政權的正當性奠立於人民基於同意的授權基礎之上。實際上，往回看去，一部現代政治史，從英國革命，至美、法革命，到俄、中革命，以及今日燎原於北非中東伊斯蘭世界的革命之火，凡此六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衡量一國是否進入現代的標誌，就是其政權的來源問題。換言之，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方式，基於同意和主權者人民的授權，在一種平等互動的相互承認法權關

係之中，賦予政府以治權，才是現代政權和現代政治，可望對此做出根本性回答。否則，拒絕回答政權來源、高高在上施捨式的姿態表明的，不過是一種前現代的威權主義政治罷了，一種家父式的絕對主義。這不是與時俱進，而是逆流。其實，按照現代治道，國家是一個超大型公司，政府只是作為代理人來進行治理；全體人民作為股東，在賦予其權力的同時卻保留着撤換代理人的權利，經由階段性、儀式性和公開化的民主程序，隨時可以收回這一權力，本不是什麼新鮮事情。換言之，「權為民所賦」這一命題同時意味着「人民出場」，必要時人民得撤銷授權，而「撤銷」的權限甚至比賦權更為重要。在此情形下，不管動機目的如何，高層承認「權為民所賦」，有助於朝此思路邁進，進而建設現代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萬一假戲真唱，唱得不錯，必成善果。從「東方紅，太陽升」的大救星，到「人民是天」，演的就是這一齣，一個連環唱本也。

三

可以說，人類現有的政治想像力和制度想像力所能窮盡的優良政體，不外乎就是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個體橫向聯合基礎之上，以「同意和授權」為機軸而構成的統治和被統治

的關係，亦即「立憲民主政體」。由此才有政制意義上的「命令和服從」，也才有社會景象意義上的「政通人和」、「長治久安」以及「天下太平」。此為最佳政體，道盡了「歷史終結」的基本含意。其間精髓，就是「權為民所賦」。

「權為民所賦」這一命題，其「民」為「人民」，其「權」指「政權」，至少意味着下列四項命意，茲述如下。

首先，實現人民身份的法權和政治還原，兌現人民的政治位格。通常所謂的「人民」，作為一個集合概念，甚為空洞。如若不能把「人民」還原為具體而實在的法權和政治身份，便毫無意義。說句不好聽的實話，此時此刻，「人民」不過是理論家書齋的專用名詞，甚或不過是政客嘴上的擋箭牌罷了。在現代立憲民主法政哲學看來，設定為「自由而平等」的個體，我們這些芸芸眾生，首先是血肉之軀，自然的產物，無法免於吃喝拉撒，作為「自然人」和「市民」，秉持自然法權和市民社會的生活法則，首先得謂「市民」。又因為分屬不同的種族、民族和族群，由此而有一「族民」這一身份，以及基此而來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法律的認同，由此認同而來的權利義務訴求。就現代情勢而言，廣袤地球遭人為分割為彼此分立的一個個獨立共同體，其基本政法單元是民族國家，所以我們必定隸屬於某一特定國度，從而決定了一「國民」這一個我們無法擺脫的身份。國民對於國家的法

律忠誠、文化依歸和政治訴求，引導出公民愛國主義，以及附着而來的權利義務，造成了我們的又一身份，即「公民」。字面上來看，公民有種種權利義務，其中最為核心，也最具力量的一種，就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拋開「革命」這一選項不談，所謂「賦權」與撤銷賦權的權利，就得具體真切落實為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才能作數。平時政府治理，奉行「命令與服從」之則，何曾奈何得了它和他們。只有在特定時刻和場合，即「公民」轉化為「選民」之際，權力才會俯身，討好選民，並聽命於選民。因此，公民必得藉諸真實而例行之選舉，才能蛻身而為選民，也才有制衡之殺手鐮，由此獲得首先自保，進而互保之權能。因此，我們這些人，作為「市民」、「族民」、「國民」和「公民」，特別是兌現公民權能的「選民」，集合而為一個政治聯合體「人民」，這樣的「人民」才有點意義，也才不枉當一回「人民」。如此這般，「人民」才不只是「老百姓」、「群眾」或者「人民群眾」這種前政治的存在，而進境為一個政治存在，並獲得一種公共形態，這才有力量。「人民」和「自由而平等的個體」，就這樣互聯曲通，展示着現代政道，為現代治道鋪路。

其次，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組織化生存。我們作為公民，一個個分散的個體，面對建制化的政權，龐大而複雜的政府機構和商業帝國，一幢幢森嚴大樓，「神聖不可侵犯」之門崗衛兵，總體而言，都依然是孤獨無助、軟弱無力的。無論是在威權主義體制之下還是在

立憲民主國度，此種情勢，一般無二。朋友，重申一句，面對體制，個體永遠是弱勢無助的啊！因此，讓市民、族民、國民和公民獲得各自的社會政治空間，充分拓展，生活於自組織化的時空之中，於自由結社中兌現各自的社會、法權和政治身份，進而凝聚各自的經濟、社會、法律和政治力量，是「權為民所賦」必得延展的政治含義。農民工為何慘遭盤剝，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還不是因為農民工一盤散沙，沒有自家的組織嘛！沒有自己的組織，誰能替你說話呢？誰會為你撐腰呢？就如大學教授多半不是所在基層單位黨委書記的對手，原因就在於教員是非組織化生存，而他們卻憑藉嚴密建制，壟斷人財物，直能翻雲覆雨、指鹿為馬，想整你就整你，想怎麼整你就怎麼整你！換言之，農民和農民工可以自我組織農會工會，教員可以自己團結組織教師公會，一如大家看了《建黨大業》後，弄個「黨」這類組織化生存的東西玩玩，靠它來打拼，這樣才算是真的公民，這樣的公民也才真的有力。此時此刻，「我們人民」，這些號稱「自由而平等」的芸芸個體，好傢伙，還真就不負所託，像模像樣地履行「權為民所賦」之賦權職能呢！因此，自另一面言，果真有意兌現「權為民所賦」的話，便請從兌現憲法早已規定的「結社自由」起步。就此而言，廣東省以地方性實踐率先有限度地放開社團登記，算是朝此邁出了一步。中國的事情這麼多，又這麼煩，沒有千千萬萬的各種市民和公民社團來協助打理，自我打理，光靠一

家一派，什麼都抓在手心裏不放，哪裏忙得完，如何理得清。朋友，這是明擺着的事嘛！大家都看得清，就你看不清，只能說你裝糊塗，說到底還是私心太重嘛！

再次，以建制化的程序安排，亦即真實的選舉，直至大選，落實賦權進程。在組織化的生存中，大家由公民化身為選民，每個人手上都捏着一張選票，一人一票，同票同價，經由公開、直接、競爭、差額的選舉方式，直觀地、階段性、儀式性地履行「人民賦權」的過程，從而，群策群力，為這個政權和權力建立正當性基礎。此即一套現代民主政治的具體運作方式，寶島同胞基本玩上路了，挺像樣的，連非洲兄弟都在玩，不少玩得也不錯，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無需多費口舌。

最後，如前所述，「人民」得於必要時刻「出場」，收回授權。收回授權的權利派生自人民「賦權」的權能。實際上，「賦權」本身就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因為「賦權」秉諸公開、公正和競爭原則，賦權予你，就意味着拒權於他；反之亦然。尤有甚者，此次賦權，不等於永遠賦權，幹不好，再將權收回，另予他人。而且，若無撤除授權之權，則終究難言主權在民。因此，「民治」實即「民制」，如張佛泉先生八十年前所言，「以選舉來撤換一個政府其意義可謂比選任一個政府還要重要得多！」¹ 值此情形下，政府按序更迭，不礙事，因為政權在那裏，穩穩當當的。政府倒台，治權易手，恆屬常態，恰恰說明政權不

倒，才能如此流轉不息，讓天下人都操心而放心。只有在歷史轉型時段或者「天怒人怨」之際，才會有「革命」這種極端形式表徵「收回」賦權。這種時段或者時刻，千載一回，大可不用遠憂矣！「歷史終結」，立憲民主政體的優勢就在於此。

諸君，經此過程，奠立於「權為民所賦」基礎之上的政治統治兌現了兩個立憲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也是其賴以實現的基本機制。第一，通過這種機制，將人民主權建制化為國家主權，國家主權在具體化為特定政府的治權之際，並落實為人民的立法主權，實現「主權和政權」、「政權與權力」以及「人民與政府」之間彼此互為犄角、良性互動的政治局面，一種「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格局。第二，兌現了承認政治，體現了尊嚴政治。基於「同意」的雙向承認，以及承認政治所牽扯到的尊嚴政治，構成了現代政治的骨幹；沒有承認、基於承認的同意，又沒有因為我同意授權於你，並且有撤換曾經授予你的權力而來的權利，則尊嚴無從談起，「人民」將成為笑談，一個官府中人日常背後彼此打趣逗樂時的輕薄用語。刻下中國參與熱情高漲，卻無實現的體制化渠道，使得基於公民身份自我認同的尊嚴受挫，導致伴隨「參與赤字」的，是無地彷徨和怒火難抑的「尊嚴赤字」。「參與赤字」表明一種政治危機，可能成為政治革命的引擎；「尊嚴赤字」反政治，逆體面生活與正派社會的公民願景，表明一種社會危機，弄不好點燃社會革命的怒火。而無論是哪種

赤字，都是危殆之事。兩項赤字，客觀存在，僅僅喊「權為民所用」，或者「情為民所繫」沒用。相反，要靠兌現「權為民所賦」來化解，可能，也才可能化解。

當政者一直倡言民主法治，但迄今為止尚未拿出一個「時間表」來。國民的焦躁，一般大眾的不滿，知識界的擔憂，不少淵源於此。當年清末新政許願以九年預備立憲；民國政制則標舉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期，承諾逐期推進。現在的當政者只是籠統說「不懈推進民主法治建設，逐步……」如何如何，太過縹緲，讓人望不到頭，不禁懷疑其政治誠意，而人的耐心總是有限的。因此，我希望今年換屆後的新一屆政府，誠誠懇懇，能夠拿出一個實實在在的「時間表」和「行動圖」，比方說三十年實現立憲民主，頭五年怎麼做，後五年怎麼做，再過五年又怎麼做，二〇二〇年大學不再設立黨組織，二〇二五年省長直選，二〇四〇年舉行全國大選，諸如此類，等因奉此，均載明於「時間表」與「行動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可能也都會擁護。雖說計劃趕不上變化，未來的變數甚多，不可控隨機之情隨時可能發生，但當政者能夠開示願景，標明奮鬥目標，才能凝聚人心，提高士氣，在讓大家看到希望的同時，提高自家的信用等級，這叫做「大家」的全體國民和公民，「我們人民」，才能跟你一起幹。

四

說到這個地方，一起往回看看，各位想必都知道，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極權國家，也出現過極權社會。一般而言，所謂右翼極權體制多為「集權國家、市民社會」（雖然可能是程度不等的有限而非充分發育的市民社會），如拉美的專制國家，一九七五年前的西班牙、希臘，「解嚴」前的寶島，等等。然而，這些國家不存在集權社會，社會享有較高的自我治理，舞照跳，馬照跑，咖啡照喝，小資麻麻。與此不同，左翼極權政制則集「極權國家」和「極權社會」於一身，不僅政治領域絕對不許碰，權力屬一家一姓或者一黨一派，就是社會生活，也管得鐵板一塊，密不透風，連髮型和褲子，都不許越雷池一步。在很長的時間裏，中國集「極權國家—極權社會」二重結構於一身，人人站得筆直。²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這兩方面均有所弱化，多所鬆綁。特別是社會一面，其中又特別是市民社會這一層，放開得更多一些，已非舊說所能框含，真正是進步多多，相信大家自有公論。六、七十年代，美國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寫過一本書，說近代英國是一個「新國家、舊社會」，而一七七六年立國的美利堅，卻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³ 套用此話，我想，今天的中國既是一個新國家，也是一個新社會；同時，既是一個舊國家，又是

一個舊社會。如此模模糊糊，藕斷絲連，其關鍵就在於，它的全體公民尚未獲得組織化的生存，依然是以孤立、無助、分散的個體來面對建制化的政府和政權，所以公民社會一面尚待發育，政治社會更是有待開禁。畢竟，光有市民社會不夠，社會的政治熱情需要有公民社會來容納和承載，更需要優良政體以開放政治來實現社會和政治的良性互動，進而造就成熟的國族心智和政治格局。就此而言，另一方面，雖說「改革開放」多年，但政治領域尚未開放，所以，「權為民所賦」不見落實，政治上依舊是一種威權主義形態，一切弊病由此生焉。所以今天籲請坐實「四民主義」，特別是兌現「權為民所賦」，既在「建設新社會」，更在「建設新國家」。它們合而為一，就是「新中國」，一個十三萬萬人的現代溫馨家園。而起步則是讓每一個個體的手心裏捏一張選票，以切實的體制安排讓全體公民分享祖國政治昌明的大國榮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舉國歡騰，當時胡風詩性大發，高詠「時間開始了」，天真純良與忸怩做作兼備。嗣後迭遭迫害，慘絕人寰，成為新政權下對於讀書人有意識地戮身並戮心的活標本。梁漱溟先生當年作文，核心論題是中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制度變革，不過依然是「朝代更迭」罷了。體制並沒有重大變化，中國的問題依舊，關鍵是政治要上軌道，哪裏要高興過頭呢！一九八七年，梁先生親口說「我

的觀點沒有變」，中國的政治一直沒有上軌道。今天看來，中國最大的軟肋，實為優良政體尚未最後成形，依然表現為「政治上沒有辦法」，政治的確沒有上軌道。梁老先生仁心宅厚，而慧識穿越時空矣。中國到現在為止，沒有能夠站得住腳的、具有正當性的優良政體，則一切經濟成就和「國際地位」，均難掩其弊。直白而言，沒有民主法治這兩項，真是軟肋呢！它甚至影響到了「祖國的統一大業」。這不，台灣動不動放話，小模小樣的，什麼「以自由民主憲政統一中華」，搞得這邊不敢接招，問題就在這裏。

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此消彼長，構成了晚近九十年中國政治的重要一脈。迄而至今，各有消長，可分為「裏子」和「面子」兩方面來談。就「裏子」來看，共產黨可能略佔下風，因為推翻帝制王朝政治，為兩千年來的中國政治開一新局，再接續以台灣作為實驗空間率先實行政黨輪替和民主政治，使「舊中國」步入「現代中國」，實現威權政制向現代政治的轉型，國民黨盡力於前，獲譽在後，為中華文化做表率。就此而言，着眼長遠歷史評價，共產黨可能比國民黨的評價要低。就「面子」來看，則國民黨退守台島，不僅因為專制腐敗，而且由於缺失國家能力，更表明了還是共產黨有辦法，而且此後更是以六十多年的「試錯」和打拼，讓中國成為世界強國，全體國民與有榮焉。就此來看，則共產黨所獲評價一定高於國民黨。即便如此，也不要忘了，這同樣是一個歷史接續中的過

程，這不，就連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人民共和國」繼承的也是「民國」的政治遺產。不過，事情並未到此結束，因為，到目前為止，如果共產黨能夠領導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在中國全境實現政治民主化，則祖國統一大業不待人謀而後成，「現代中國」煌煌，裏子和面子俱全，其歷史評價必定高於對岸，此無疑問矣！

五

隨着美國的中東戰事和「反恐」戰爭告一段落，原來中國領導層所預估的迄止二〇二〇年左右、長近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可能提前結束。這既說明中美國勢的消長以及基此而來的國家理性的自然反映，也是一個朦朧前行、即將來臨的大時代的徵象。而伴隨着全球的經濟惡化和相應的調整，東西、南北之此消彼長，內政的惡化會不會隨之出現？換言之，就外部強勢力量看，它們會否經由矛盾轉移而加大與中國的摩擦？就中國言，外部勢力的擠壓和國際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也許會導致當政者基於種種考量，特別是危機感，而將內政的改革一再延後；或者，以轉移注意力的方式，別出枝節。這種情形不一定

不會發生。倘若發生，如何應對？怎樣化解？它們牽扯到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兩端，平穩調處，「現代中國」順利發育成形，一百七十多年的轉型可望終得善果，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在此情形下，對於外部環境的惡化會不會導致內政惡化這一類問題的應對性思考，我想這是在今明兩年特別加以警惕的。

晚近幾十年，全球範圍內，不分東西，各國政壇均出現了一種普遍的平庸化現象。但見薩爾科齊、貝盧斯科尼者流上下翻飛，競作跳樑小丑，長於演技的奧巴馬與「共青團」式「幹部」之虛矯而淺薄空虛，不見臨危受命式、勇於決斷的真正的政治家登場。莫非世界精神已近午夜，等待着又一次偉大的破曉？的確，重大問題既已解決，剩下來的不過就是看家護院罷了。類如當年美國「新政」之際的政治家和吾土鄧公式「撥亂反正」的領袖型人物，不復見矣，也算正常。包括中共這一屆十年（編按：時為胡溫政府）的領導都是平庸政治的產物，典型的六十年代初期中國工科教育的產品。如筆者此前在〈身份認同、世俗化與世界體系〉一文中所述，其之歷史願景闕如、缺乏立足於此刻而觀照「過去」與「未來」的宏大氣象，普遍喪失社會理想與陽剛浪漫的民族主義，只有當下、此世與「我」，競技狀態萎靡，僅僅以忙碌於一己的謀劃為已足，最多不過圍繞着GDP打轉，持守淺薄的工商主義立國路線，成為一代人的寫照。⁴ 此不獨中國，北美、歐洲和東亞表

現不同，但大都屬此種「維穩」的行政路徑，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拒絕改革和開拓的平庸政治時代。

全世界範圍內，包括歐美這一曾經引領人類近代歷史的火車頭在內，都出現了這種情況，似乎說明了一個問題，即西方「文藝復興」、「思想解放」以還，孕育於歐洲的現代道義精神、責任倫理與思想力量，歷經三、四百年的運轉，好像消耗得差不多了，老大疲憊。⁵ 中國自清末積攢下來的思想資源，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啟動的改革勢能，似乎同樣萎靡不堪，無所作為了。下一步怎麼辦，這是擺在我們全體漢語文明中國知識人士面前需要思考的問題。與此同時，西方社會飽享戰後六十餘年的優勢紅利，造成整個政制以向國民透支「福利」或者「自由」來獲取治權，導致世界範圍內的國民腐化現象，實在令人觸目驚心。當下中國情勢不同，卻見國民的腐化伴隨着官場的腐敗，似乎亦且抬頭；民粹主義猖獗，政治威權在與資本強權穿一條褲子的同時，迎合、討好民粹，共同擠壓常態的公共理性。凡此現象，正需認真對待。如果說歐美式的國民腐化淵源於民主政體老大疲憊因而需要注入新料茲更新的話，那麼，中國式的國民腐化則多來於公民人格不彰、人民未曾發育成形，所以治療方子當在啟動民主進程，給人民以自我政治培育的機會。此處牽扯多端，限於篇幅，無遑深究，另當詳論。

總之，當此之際，中國恰恰不能放鬆內政改革。相反，中國卻需以內政的民主化來迎應國家間政治的大博弈時代，通過建構優良政體實現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完成百年轉型的最後一役。優良政體不限於「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但絕不可缺此選項。在此，時代呼喚「政治決斷」。半新半舊之際，進退維谷之時，一定要有「政治決斷」。真正的政治家不同於憑藉熬年資、聽話而爬上來的行政官員，更不同於虛與委蛇的政客，其分別就在於秉獲大歷史視野，以政治決斷為己任，並且敢於實行政治決斷，將歷史打上自己的鮮明烙印。中國今日需要此種政治家和政治決斷，以突破「布里茲涅夫式」悶局，推轉歷史前行。

的確，如盛洪兄所言，此刻中國，讀書人當以理性和平之心，秉持風雅之態，在「德」與「位」、「理」與「勢」的平等互動中，臧否國事，把脈國是，而寄望於當政者惟勤惟謹，好自為之。不到萬不得已，我相信，沒人會放棄改良主義的漸進路線。小步子慢慢跑，跑個不停，一直跑向目的地，其實優於大哄大起，疾走疾停。就此而言，大家於「穩定」完全能夠達成共識，問題在於穩定不等於死水一潭，波瀾不興。就字面來看，現有的憲法、法律和制度，類如《憲法》第三十五條，不少堪當良法良制，不輸歐美，問題同樣

只在實踐中如何忠實執行，並非必須另起爐灶。可能，坐實「四民主義」，特別是「權為民所賦」，是切近此種理路的一種較為不壞的選項。

既已許願，意思表達清楚了，話也就到此為止了，想讀者諸君同此一慨矣！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三日改定於清華無齋

註釋

* 本文為2012年元月10日作者在天則經濟研究所「新年寄語」論壇發言的整理稿。

1 張佛泉：〈自由與民主的起碼意義〉，收王進文編選：《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350、349。

2 據說，當年以賽亞·柏林（Sir Isaiah Berlin）之所以憎恨納粹法西斯和蘇聯共產主義，就在於這兩種主義均試圖用灌輸的辦法讓人放棄經由自身判斷得來的信仰，尤其防範個體通過自己的思考做出有關信仰還是非信仰的選擇。這不僅是在道德上玩世不恭，而且是對普通人共同的蔑視。事實上，蘇聯共產主義和納粹法西斯一樣，如論者所言，都因為試圖對自己的人民和追隨者洗腦，對自己的敵人加以徹底消滅而犯有上述罪行。而一個否認人類具有道德主權的政體，不可能不是邪惡的。具體細節，參見邁克爾·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著，岳秀坤譯：《柏林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71-272。

3 參詳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4 許章潤著：〈身分認同、世俗化與世界體系〉載《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關於國家建構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第2版），頁89-102。

5 在此，法國當世哲學家羅蘭·巴特的一番陳說堪為樣本。在二零零九年出版的《共產主義假設》中，一方面，巴特坦言，「資本主義和依附於其表面的所謂『民主』，都已經陳舊了，都是老套了，也是目前到處被控訴的對象。還要賣弄這些套路，就是放棄思想，就是放棄根據思想原則而來的行動。」另一方面，他所能檢來作為思想武器、針鋒相對的，同樣不過是「陳舊」的「套路」，「反而是共產主義的假設，不管其代表的是解放抑或平等，都是創新的，而且合法的」。轉引自林深靖的發言，參詳《開放時代》2012年第一期，頁24。並參詳陳永國編：《激進哲學：阿蘭·巴丟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特別是其中的「惡的倫理學」；以及 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anslated by Oliver Feltha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第十九章

開放政治市場，迎接第四波改革開放

第一，中國近代史的主軸是三波「改革開放」，每次「改革開放」大約三十五年。

置身大歷史，放眼長時段，立足遠距離，不難看出，中國一百七十四年的近代史貫穿着三波偉大的「改革開放」運動，它們前赴後繼，波瀾壯闊，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一脈主軸。

第一波「改革開放」，從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五年，整整三十五年。其以洋務運動為旗幟，昭示着一個「古今中西」的時代降臨華夏，中國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化歷程。凡此三十五年，不僅在為中國近代工商文明奠基，而且，並積極了解源自地中海文明的這一波現代秩序的政治、法律和思想，而為後續的繼受和更張預為綢繆。萬事開頭難，這三十五年恰恰就開了個頭。

第二波「改革開放」啟自一九〇二年清末變法，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止，又一個三十五年。在此時段，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制三階段，政體雖殊，理路則一，接續前行，而統貫為一大整體。舉凡民族國家建構、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社會改良、立憲代議體制、現代程序主義法制，以及教育、新聞傳播和思想市場建設，均有所嘗試，均

有所建樹。正如筆者一篇短文曾經寫過的，今天嚷嚷的一切，說東說西，累死累活，論目標，論願景，論理路，當年都曾擘畫過了，全都商量過了，業已嘗試過了，早就夢想過了。¹不妨說，此間三十五年，是一百七十四年的中國近代史的「樞紐時期」，真正是開天闢地、經天緯地、席天幕地，雖戰亂連連，而惟精惟一，蔚為近代中國偉大轉型時代的精彩華章。不說別的，但就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三七年華夏兩度陷都，不旋踵一九四五年中國就蔚為世界五強，則其間轉折，大起大落，可見一斑矣！

一九七八年底至今，又一個三十五年，中國進行了第三波「改革開放」。此番改革開放，總體而言，並無新意，其實是以回到「一八六〇」，回到「一九〇二」，回到「二八九八」，回到「一九一一」，或者，回到「一九四六」，以「向後倒退向前進」的方式，來求得經濟發展、社會開放和政治進步。換言之，以向中國近代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世界普世文明的低頭與皈依，中國匯入世界歷史潮流，來重新開始中國文明的復興與中國制度主體的建構歷程。迄而至今，也是粲然大觀矣！

有人說，「我們只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就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兩、三百年才走過的歷史」。此話豪邁，卻實在無知。且不說我們是「向後倒退向前進」，就是在一百七十四年來的三波「改革開放」視野中，中國今日的成就，乃是洋務運動、清末變法、民國政體變

革和最近三十五年的艱辛奮鬥，一波又一波，集成接續努力的結果，哪裏只是「三十五年」所能恪盡其功的？吃了十個燒餅方才填飽了肚子，不能由此竟然愚蠢到聲稱不用吃前面九個，只吃最後一個就行了吧！

其實，三波「改革開放」，因應的是「中國問題」。而「中國問題」非他，即面臨西方列強打壓和現代西洋文明所代表的這一波現代文明衝擊，老大中國如何在兩百來年的時段中，完成「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文明轉型任務，以富強、民主和文明為導向，不外乎旨在「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此為轉型中國的四大指歸，也是必須恪盡之四大任務。「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千頭萬緒，要旨不外乎此。其中，尤以「文化中國—民族國家」與「政治中國—民主國家」這一雙元革命堪當主軸，綱舉目張。凡此種種，人在途中，尚有待繼續奮鬥者也！

吳敬璉先生說「新的改革開放即將開始」。不過，在晚輩體認，其跡象，其苗頭，尚無處尋蹤，蓋因第三波「改革開放」已然終止了，而可欲並可能的第四波「改革開放」尚無啟動之現實性也。

二

第二，第三波「改革開放」功力耗盡，已然結束，亟需啟動第四波「改革開放」。

迄而至今，第三波「改革開放」歷時整整三十五年，成就非凡。不思量，自難忘，恍然若夢。單就經濟規模而言，中國混成了世界老二，殊為不易。但是，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盲目自信伴隨着經濟成就蔓延滋長，未能因應整個「中國問題」有待解決、亟需臨門一腳的急迫性。此為歷史觀闕如和淺薄化的結果，也是有待啟蒙的政治理性的產物，更說明一度翻騰勃發的精英集團道義擔當的萎縮與內在義理結構的侏儒化，缺乏立足於此刻而觀照「過去」與「未來」的宏大氣象，普遍喪失社會理想與陽剛浪漫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晚近十來年，主流政治意志頹唐，以一個龐大官僚集團為核心的新興權貴資本，經由三十年市場化原始積累，全面接管中國，「分田分地真忙」。他們自命貴胄，不惟壟斷權錢，而且掌控輿論，甚至眈眈於將真理收入彀中，酌情批發。一旦利益格局固化，一己之私竄然，則變革之志頓失，開放的勢能不再，所謂的「改革開放」實已終結，只剩下些行政舉措和公共政策的零打碎敲，持守淺薄的工商主義立國路線，使得汲汲以求的「發展」濡染上強烈的短視與市儈色彩。甚至於，為了「維穩」，不惜訴諸民粹主義，「花錢買平安」。

君不見，一些號曰「改革開放」的舉措，早已變形，實為鞏固既有利利益格局、維護權貴資本張本，則「改革開放」，夫復何言哉！

自此開始，實在不能耽誤，再用三十年左右，中國有望大致走完這一波已然持續超逾一個半世紀的轉型歷程。戰國秦漢之際，費時七百年，中國文明完成了第一次偉大轉型。一八四〇年以還，至本世紀中葉，兩百來年，中國有可能走過「歷史三峽」，完成又一次偉大轉型。此刻開始的未來的三十年，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代議政體、個人自由、思想市場、生命尊嚴等等，必將提上議事日程，將它們一一坐實，而均時不我待也。其中，尤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蔚為主軸。盡早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最終完成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轉型，一舉解決已然存在一百七十四年的「中國問題」，可為人心所向，時者，勢也！

三

第三，第四波改革開放旨在建設三大「市場」，尤其需要開放「政治市場」，永久性解決政權的正當性。

為此，自此刻開始，未來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解決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坐實政權的正當性，蔚為第四波「改革開放」的核心所在。放眼四顧，已經完成民主憲政轉型的國族，只存在政府危機，並無政權危機。鑒於中國社會的轉型性質，其基本政制情形是，擁有一個「過渡政體」以及「過渡政體之下的臨時憲法」，而以強有力的「黨國體制」統括之。置此體制之下，雖無政府危機——相反，政府強大得很——甚至於伴隨以無能為力的是無所不能——但卻存在着深重而隨時可能爆發的政權危機。因此，「維穩」成為黨國體制下的一致努力，重心所在，可謂順理成章。也正因為對於「政權的正當性危機」保持深刻的警醒，所以「改革開放」遭遇了政治分享這一最大的難題，結果碰不得，改不下去了，遂告終結。

置此情形下，如何賦予政權以正當性，回應「憑什麼你來統治」這一大是大非，這是未來第四波「改革開放」所當完成的歷史任務，也是「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進程所需解決的最大課題。在下體認，其進路和答案仍不外「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與「政權的永久性正當性」二柄，而實現「主權在民、治權在賢」這一現代治理機制。換言之，以周期性的民主選舉這一賦權形式，藉「程序合法性」奠立「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經此表彰，支撐起「政權的永久性正當性」。如果說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合而為一，才有望形成良制和良治，則周期性的民主選舉的賦權形式所奠立的「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得謂

大眾民主，表徵的恰恰是「主權在民」這一「政權的永久性正當性」。而一旦完成賦予形式，則「精英政治」登場，以落實「治權在賢」。倘若治權不賢，換人重來，政府垮台，但政權仍在，何需天天神經質般地「維穩」不懈。也就因此，經由普選民主程序，坐實「權為民所賦」的政治理念，煥發中國文明的政治智慧，應當成為中國「第四波改革開放」的最大選項。

因此，中國需要建設三大「市場」。不僅需要市場經濟，而且需要思想市場，更需要政治市場。「政治市場」容忍多元政治主體的發育和成長，接納它們上場博弈，在平等博弈中獲取「周期性合法性」，以政府的治權承載「政權的永久性正當性」。若無此種競爭機制和賦權形式，則正當性只是一家說了算的事，終究無正當性可言。容忍多元政治主體的發育，意味着容忍公民的組織化生存，放開大家結社聚合的自由，在人的聯合中實現承認政治。承認政治和生命尊嚴，就是中國夢嘛，此於雙方都好，才有望「長治久安」矣！

不是一般的行政幹才，也不是那些八面玲瓏、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團幹，更不是所謂的政客與庸庸碌碌的幹部——這些人都沒什麼指望——而是有德有品、強毅力行的政治家。假若中國此刻真有這樣的政治家並懷持政治理想、政治理念和道德自覺，則此刻開

始的未來中國歷史，實在是展現政治決斷、實現政治理想、成就偉大的中國時刻之可遇而不可求的歷史窗口期也！

四

第四，天則的奮鬥就是中國的奮鬥，天則的事業就是中國的事業。

此時此刻，齊聚一堂，回首往事，瞻望前程，為天則研究所慶生，不免心生感喟。天則的存在，表明體制之外，中國社會尚有一脈清流在焉，雖歷經摧殘，而良知、理性和教養不滅；天則的苦鬥，說明威權體制之下，好人能夠做好事，其所表彰的是中國讀書人在今天這一非常時刻渙然勃發的良知良能；天則的影響，證明了思想的力量，雖默然無聲，卻終必如洪流滔滔，摧枯拉朽。時代造就思想，思想改變時代，進而勢將創造一個新時代；天則的成就，說明多元寬容的社會政治條件，有助於並且有待於思想市場的形成，而思想市場的形成必有助於造就政治市場，中國政治由此可望上軌道。

盛洪兄講到，科斯教授曾經說過，「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轉用此語，在下想說的是，天則的奮鬥就是中國的奮鬥，天則的事業就是中國的事業，而中國的事業就是世界的事業。因此，天則的事業不僅是中國的事業，也就是世界人類共同追求善好事業的中國實踐！因而，伸張學術的思想力量，突顯思想的社會關懷，弘揚學術和思想的人道意義，既為天則意之所在，更且為其義之所寄。

如此這般，待到天則五十周歲時，鬥轉星移，中國的轉型終將水落石出。那時節，我們再度聚首，相見一笑，擊掌而嘯，緬懷前賢，掂量當下，其怡然，其陶然，其欣欣然也！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修訂於故河道傍

註釋

* 本文本為2013年7月26日作者在北京天則所成立二十周年慶典上的講話，原刊於《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慶典（1993-2013）》。

第二十章

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

二〇一一年，我們目睹了許多民生、社會與政治現象，包括物價上漲、廣東村民維權訴諸大規模集體公共行動、動車事故及其調查和處理，以及中美關係和東海、南海局勢，等等。¹ 二〇一一年，我們共同見證了中國思想界的焦慮、社會治理的局部改良、某些領域展現的有限政治善意，等等。同時，二〇一一年，我們看到，政經領域的腐敗依舊觸目驚心，時有大案爆料，官民關係高度緊張，讓大家既見慣不驚，又愁腸百結。

不過，作為知識階層和一般中產階級，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企業金融界人士，大家可能更為關心的還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法權層面的問題，以及它們可能的發展路向。其中，如何啟動政改，培育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並且最終以優良政體宣示和承載國家理性，恐怕才是大家更為關注而焦慮的對象。通常所說的中國改革需要過「兩關」，所謂「市場關」和「民主關」，所指在此，而不限於此。

一、固化、僵化與反民主化

說到這個問題，不可繞開當下中國出現的「三化」現象。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政治領域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而事理之中的事情，實非善端。所謂「三

化」，大家耳聞目睹，可能也多所思考。

一是社會階層「固化」。經過三十多年的資本原始積累，階級分化基本完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分層現象，趨於定制。中產階級成長受阻，實非始料所及。社會流通，特別是下層民眾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渠道與空間，不是進一步寬和了，相反，卻似乎趨於逼窄，由此造成階級和階層的自我代際複製，階級的固化與彼此之間的緊張。既有的社會階層流動機制，包括一度最為有效的「高考改變命運」這一體制，面對倚仗政商權勢組合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早成絕對弱勢。一、兩億「農民工」，其實早成產業大軍的核心部分，卻因為身份制度結構的固化和城鄉二元的準種姓制度，無法成為真正的市民，依舊還是「農民工」。他們雖然在城市裏勞心勞力，最後的歸宿卻多半不得不是鄉村，一個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他們的後代，或許根本陌生的「老家」。媒體和里巷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也好，「貧二代」、「窮二代」也罷，實際上均為對於階級和階層「固化」現象之濃縮描述，一腔憤懣，幾多無奈。而無地彷徨與進階無門，可能點燃社會怒火，引發社會革命，料非虛言。本來，一個正常的社會總是分層的，絕對的平等只能是法權和政治意義上的，卻不可能是社會意義上的。換言之，社會差等和法權、政治意義上的平等，有效分際卻又有機銜接，構成了現代社會的穩定機制。即便如此，機

會均等和起點平等卻是政治正義的天則，也是社會正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一個良善社會、正派社會予人活路的重要機制。否則，這個社會無公道，無盼頭，終究維持不下去。

二是政體僵化。如同下面將要敘述的，中國近代已然有過三次「改革開放」。無論是哪一次，主要依靠的，說到底，不是體制，而是「中國文明」的自我更新活力，直接的表現則是「社會」發力，「民間」推動，而它們全都基於國難壓力。正是憑藉這一活力，中國從帝制王朝政體走向人民共和，中經共產政制，一路撲騰，混到今天這個模樣，實屬不易。即就晚近三十年短程立論，今日中國憑恃列寧主義式的全能政黨，依附於世界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用兩代人的奮鬥，經濟規模上已然位列世界老二。然而，同樣正因為此，此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是沒有政治發展的跛腳前行。因此，亟需啟動政體改革，以政治和經濟的同步發展，建構健全的社會和政制，因應舉國人心思變之局。正是在此，我們同時發現，高層人士，中產階級，乃至於知識界，似乎均呈現出心智消沉、不思進取、士氣萎靡等症狀，而使得體制僵化不願意推展進一步的改革，特別是無所作為於政體改革，成為當下之痛。諸位，當一個體制壟斷權力、財富和真理，拒絕與時代對話，缺乏公共性，卻一意自我標榜，那麼，我們知道，這個體制將喪失存續和發展的活力，可強挺於一時，卻早晚要玩完的。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二年兩度再次「改革開放」，迫於內外

交困，既源於體制僵化，無法因應時代，又因為體制多少尚有活力，還能啟動自我更張，因而得以避免清末變法後的王朝命運。鑒往知今，刻下體制必須掙脫僵化，趕緊有所因應才是，本不是什麼大道理，更非危言聳聽。

三是反民主化。儘管民間思潮洶湧，知識界大聲疾呼，體制內外均有呼號，但是晚近十年，尤其是二〇〇八年「奧運」之後，既有體制的自信心極度膨脹，似乎不願再作任何進一步改革，哪怕是極為有限的政治性試探。雖然北京「奧運」之後空氣質量遽降，大街上重現戴上了口罩的人流，上海舉辦「世博」之後也馬上火燒一把，讓「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一時間抬不起頭，但是體制之拒絕民主化要求，卻並未因此而稍有鬆動。相反，一些政制舉措和因應之策，口子愈收愈小，似乎是逆民主化而動。「治安聯防」蔚為常態，連「小腳偵緝隊」都上場了，將原本屬政治領域的事情用治安來對付，不能不讓人頓生彷彿日子又過回去了的感喟。至於信誓旦旦的「五不搞」，雖說等同夢囈，但卻是某種政治意志的強勢宣示，借用「五四」以還「全盤反傳統主義」這一表述，不妨說，這是一種「全盤反民主法治主義」，早將一切政改的可能性堵塞，讓全體國人，尤其是知識界和思想界，反感不迭。真不明白他們為何非要如此。凡此種種，造成中國體制結構的困局與危局，因此，舉國要求變局，已成當下最大的民意。

此外，諸位，放眼當今世界，隨着美國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太平洋兩岸似乎出現了軍備競賽。實際上，中國軍備一直年增兩位數以上。而一旦中國陷入軍備競賽，會否遭遇前蘇聯式的結局，實在令人擔心。果真如此，則鴉片戰爭以還，一百七十年來中國人奮鬥所得的成果，必將毀於一旦。面對國內之思潮洶湧，環顧世界之風雲激盪，稍有良知和頭腦，都不能不擔憂，也不能不想輟。

置此情形下，展望未來十至二十年的發展前景，可能大家最為擔心的是中國會不會重複前蘇聯曾經出現過的現象，即蘇聯軍事上與美國抗爭，蔚為大國，也是強權，而在民生和社會，尤其是在政治上，則停滯不前，將各種社會矛盾以迴避、壓抑的方式擱置下來，一心「維穩」，全面壟斷真理和權力，終致一九九一年我們所看到的爆炸性結局。今日中國，似乎出現了此種「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苗頭，情形堪憂。

中國的下一步怎麼走？改革，特別是政體改革能否如願啟動？這一大關究竟過不過、何時過、怎樣過？值此迎新辭舊之際，據我觀察，各種思潮如春江澎湃，知識界和各種社會利益似乎都正在思考和觀望，焦躁和冷靜並存，怨憤和期盼並至。之所以如此，自然與今年政府換屆有關，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社會與政制的結構性矛盾突顯，有以然哉。同時，思想界與知識界日趨獨立思考，希望釋放自己的解釋權，亦為原因。此與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這一令人難忘的時段有點相似，也有點令人憂慮。

二、三次改革開放與六次革命

講到此處，有必要回顧一下最近這種發展趨向背後更為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其中，最為主要的一脈線索，依在下孔見，就是近代中國的三波「改革開放」。

第一波「改革開放」啟自一八六〇年代初期以還，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戰結束，為時三十來年，以洋務運動為旗幟。在此三十年間，清政府於東南沿海、沿江港口城市，興辦現代產業、軍工，啟動鐵路建設和現代公共事業，引進工藝流程和現代技術流程，正式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不妨說就是現代立國進程。中國的「現代化」，承載着數代中國人的富強夢想，讓全體國民流汗流血，當從此起步。即以重慶生產福特蒙迪歐汽車的工廠而論，它的前身是一九三七年從武漢西遷的漢陽機械廠，而漢陽機械廠長為洋務運動時張之洞所創立。以後幾經過渡，一脈流連，以迄於今。基礎既在，則發展可期。可見歷史就是歷史，發生了與正在發生，不可切斷。

第二波「改革開放」從一九〇一年清王朝頒詔變法始，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終，中經辛亥之變，也是三十多年。清末變法修律、北洋新政和民國政制踵續前行，形成了第二次「改革開放」。經此一役，不僅帝制王朝的天下變成了現代民族國家，亞洲第一個共和

國，讓中國一老大帝制王朝之身一轉臉戴上了現代政治法權的衣帽，而且整體性地推進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今天的中國，整體而言，論面子論裏子，就是承接這一規模而來的。毛澤東說自孫中山而下怎樣怎樣，說明在他心目中也是以此為正朔的，原本有一個連綿清晰的道統。在此，特別不可小覷和低估「北洋軍閥」們在此線條中的正面作用。鑒於國史累牘，偏偏於此語焉不詳，或者，只見漫畫式負面載述，故爾特作提示。

第三波「改革開放」自一九七八年以還，特別是一九八〇年中央發佈關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七十五號文件」開始，中經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迄而至今，也是三十來年，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說。大家通常認為這是一個完整的改革進程，也有人指認一九九二年鄧公「南巡」之後分明是第二次啟動改革開放，由此分為兩個時段，或者，兩次改革開放。一說此波改革開放依舊在進行，一說「改革早已死亡」，需要重啟改革，云云。

撇開雜說，總而言之，凡此三波「改革開放」，前後綿延一個半世紀，我們稱之為長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一歷史至今尚未結束，正在進行中，有待於未來兩代人的接續奮鬥，求其水落石出，有望終成善果。前面曾說今日中國「用兩代人的奮鬥」如何如何，其實，講到這裏，大家都明白，客觀全面的講法應該是：這是一百多年，超過七代中國人接續奮鬥的結果。

把眼光放遠，最近三百多年來，這個世界上發生了和發生着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六次改變世界歷史面貌的重大革命，重塑了地球的政經格局和人文生態。不妨說，晚近世界的歷史就是革命的歷史，特別是漫長的十九世紀和狂飆突進的二十世紀，更是革命世紀。細數下來，第一次革命即英國革命，率先把一個叫做「現代」和「現代國家」的東西呈現於世界。第二次革命是美國革命，給人類提供了如何於一個大國實現民主政體和優良秩序，達致自由和秩序二者平衡的實例。第三次革命是法國革命，第四次革命是俄國革命，第五次革命是中國革命，第六次革命是刻下正在進行、尚未完結的北非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政治轉型。中國的漫長「改革開放」與此刻所說的「三化」現象，均發生於此宏大歷史背景之下。

三、中國轉型的四大任務

在此三波「改革開放」、「六次革命」的總體背景下，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的長程革命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大率而言，當然是要實現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現代化轉型。不

錯，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類似的重大轉型。春秋戰國費時八百年，中國自封建天下轉化為郡縣帝制一統，由此而下，兩千年相沿不廢。一八四〇年至今的轉型，尚未完成，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重大轉型，其任務和目標，在「現代化轉型」這一總題目下，具體不外下列四項。

第一，發展「經濟—社會」。此即形成工商立國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多元開放社會。就工商立國的現代市場經濟而言，意味着其以經濟理性為綱領，例屬基於生產與交換關係而逐漸形成的商品社會，一個國民財富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完整體系，其主旨在於解決國民財富的創造、流轉、佔有和消費的問題。單就社會而言，就包括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和正派社會等多維、多層結構。的確，所有的社會首先以財富的創造、傳佈、分配和消費為目的，因而任何社會首先都必定是「經濟社會」。在此社會中，人人以自由消費、身心愉悅、「小資麻麻」為指南，於私性狀態中打理日月，此即「市民社會」。而且，既然人為情感動物，起居於倫理，則「倫理社會」為題中應有之義。百年中國一意摧毀社會的倫理結構，惡果昭彰，今日中國怕是恰恰要重建社會的倫理體系呢！同時，人們除開私性生活，尚需公共領域討公道、設法和平共處，少不了要與政府抗衡，通過公民之間的橫向聯合，於組織化生存中實現自己的公民身份，由此

形成「公民社會」。換言之，社會的自我發育所形成的公共空間，是自由的蘊涵之所。在此空間內，個體有望成為公民，「人民」不再只是「百姓」，而進階為一種建構性的政治存在。進而，凡此社會具有高度的利益自覺與文化自覺，於社會與政治、內政和國際事務之間，協調有致、應付裕如，展現出高度成熟的心智，庶幾乎得謂「政治社會」。在此格局中，大家都想活得體面，獲得尊嚴，注定了這個社會必須是個「正派社會」才可能是個愜意人間，也才是一種可欲的人間秩序。至此，羅列既盡，答案亦出，就是說，健全而正常的社會，必定包含凡此六種社會維度和層面，而予人以各得其所的生存環境。

此刻中國，經濟社會初步建成，「倫理社會」有望慢慢恢復，「市民社會」似乎已然發育到一定程度了，尤其是在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市民社會」的生活方式逐漸成形，大家均耽溺於太平世道的搓麻搓腳，忙碌於洗澡洗錢。至於其他社會形態，則有待發育滋長。北京的出租車司機見面動輒神侃「最近中南海開會了……」，如何如何，將政治掛在嘴上，但這屬市民的巷議，百姓的輿情，跟政治和政治社會其實不搭界。至於舊日「運動」連連，好像大民主，其實屬偽政治社會，恰恰反政治、逆政治，將政治放逐殆盡。社會的發達，以及社會與國家之比翼齊飛，是真正的軟實力。中國政府獨大，財政汲取能力尤強，比諸朝代改制，可見建設現代國家體制已見成效，但於自由民主的立憲政體立論，則又難

見公共財政和稅收國家的擔承。因此，雖時見國民秉持私利各行其是，但社會卻又羸弱不彰，在此可謂軟肋。²

第二，建構民族國家。百年轉型，不期然間，有意無意，旨在使中國從朝代國家蛻轉為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現代世界的基本政法單元，自西徂東，鋪展而來，中國無法避讓。作為一種現代政治形式，也是一種現代統治體制，一方面，迄而至今，這個任務基本完成。另一方面，由於存在所謂「海峽兩岸四地」，所以又可以說這一任務尚未最終全部完成。未來十年，稍有鬆懈，則西北邊陲難免有事，更是使得情勢愈趨複雜。「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在於民族國家建構任務尚未全然恪盡，卻又遇上了西方意義上的「後民族國家時代」，使得歷時性和共時性問題交結一體，需要話分兩頭，分別因應，不可不察。

第三，建設優良政體。形成有效政制，並為之提煉出和裝備上優良的政體，是「現代中國」的應有之義，一國最大之軟實力。而優良政體的核心內容，牽連多端，核心不外乎民主、法治兩項。民國肇始，終結王朝帝制，以共和體制與三民主義立國，蔚為道統和政統的轉換。但於此兩項，只具初級形式而已。後來的發展，眾所周知，不堪回首。其實，

所謂「現代中國」，大家念茲在茲，不過就是「民族國家」加上「民主國家」的重疊複合體而已。就大中華地區來看，台灣和香港分別昭示了中國「先民主起來」與「先法治起來」的兩塊樣板。中國大陸於此亦有進展，但有待努力之處多多，相信大家均有同感，亦多痛感。制度競爭，特別是政體優劣比較，歷來就是文明社會的基本現象，於今尤烈。這一關不過，終究不是個事。

第四，重締意義秩序。世俗的社會和國家，卻有賴於超越意義的支撐，說來不是什麼大道理。況且，每一政體的背後必蘊含着思想和價值，更鋪展為文化歷史傳統。百年中國，面對西潮，歷經三千年積攢的固有意義世界頹矣，超越維度墮矣，一倒至今，尚未完全恢復，而有待於「融會中西」的努力中逐漸成形。現下流行的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和消費主義的市民意識，所分享的不過是「市民社會」的價值目標，充其量極致是「富強」，難以支撐文明的崛起，更無法提供全球視野中的典範性的文化意義。而一個可欲的、愜意的人世生活，既有富強所表徵的充沛物質分享，更有價值層面的精神文明，而托起一個有尊嚴的、具備充沛精神向度的生活方式。因此，重構中國文明的意義世界，包括人生哲學、生命義理和宗教信仰，是當下中國的一大難題。一般媒體和社會上感喟「核心價值」

闕如、「信仰缺失」云云，即因此而來，並緣此前行，有以然哉。同時，也恰恰在此，「發展文化」首先意味着精神鬆綁，心靈自由。國家主義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招數，在此不僅無效，相反，適足以窒息文化和文明的自由生長。

四、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

以上四項，連綴一體，講述的是建設「現代中國」的故事，由此牽扯到一個概念。這個概念不是別的，就是「國家理性」。「現代」和「現代中國」也好，「現代世界」和「現代政治」也罷，均離不開它。它們之間千絲萬縷，如影隨形，互為表裏。世人起居其中，回頭理述，無法迴避。大致說來，十六世紀中晚期以還，首先從地中海北岸諸邦，嗣後至歐陸，然後到北美，迄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這個叫做「國家理性」的概念即走即停，流播全球，撩撥人心。它所因應和回答的是現代人「為何需要國家」、「如何才有國家」以及「國家應當為何」這些大是大非，而為其構築大經大法，是關於國家建構的歷史解釋、政治期許、法權規範和道德訓誡。由此，人類文明的現代版圖經歷了「地中海文

明」、「大西洋文明」以及此刻有可能出現的「太平洋文明」等三大時段。而無論是何種文明時段，其基本特徵均繫於國家理性的發育滋長，均以國家理性的發育和成長為經緯，誰於此捷足先登，誰就趕上「發達國家」這趟車。³

今天回頭一看，不難發現，自地中海文明下迄美、法革命，現代國家的興起及其轉型，與現代政治理性的逐步發育成長相表裏，而構成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徵，最終落實為普世性的自由民主的立憲政體，儘管民主法治總是操着一口方言。就此可以說，現代國家的成長就是它的政治統治形式，也就是主權空間內的政道和治道的自我完善。從十六世紀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國與西歐的君主制，到十六世紀晚期、十七世紀開始的王權國家或者絕對君主制，再到國家的絕對性受到結構和限制、絕對君主政制解體並逐步為共和政體所取代，以及特別是最終自由民主立憲政製成為構建國家的普遍形式，實現了政治權力與國家利益的一體化、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的最初憧憬。在此三百多年的歷史中，現代國家的完善就是現代政治特別是自由民主的立憲政體的興起、建制化和完善的歷史，活生生地演繹出「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的現代故事。值此宏觀世界體系中，中國百多年來建設現代國家的歷史，同樣是試煉、建構現代政治和及其政制的歷程，也就是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

和政治理性同時提煉和發育成長的進程。今天中國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上述四大轉型任務，最後需要落實到一點，就是提煉國家理性，並且，以優良政體宣示和承載國家理性。

問題在於，如何將優良政體導入現代國家的成長進程，並且使得國家經由自身的建制化將自己託付於優良政體？以及，何為優良政體？前者是一個發生論的敘事，對於後發國族來說，也是一個目的論的敘事。後者則為一種規範論命題，後發國族的現代國家建構和優良政體成長的歷史，常常恰恰是以規範論意義上的論述為先導的。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僅就後者略陳管見。

在此，現代政體林林總總，總體看來，最具優勢的不外「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種政治形態。而且，大凡得謂優良政體，總須「有德有方」。總括而言，「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屬一種較為「有德有方」的政體，故爾在當今世界，也是最具優勢的國家政治形式。實際上，既有德性，復秉方略，而成為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國家」，是國家建構和政治憧憬中最具感召力的理想圖景。簡略而言，所謂「有德」，首先是指政權立基於「同意」，即公開、開放而具競爭性的合法性授受，據此而有政治正當性，獲秉權威。這一點最為重要，因為它解決了政權的更替問題，保證和平，為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奠定了政制基礎。其次，大凡優良政體，必定秉持道德理想，遵循公民理性，以人民共和為鵠的。再

次，遵循政治理性，恪守程序理性。第四，以「為人民服務」自相標榜，而政治機理則在「以自由立國」。第五，必為一種王道政治，在充分明瞭自然法權的同時，奉行友善法權。

在此徵引上述「六大革命」的話題，特別重申政權之基於「同意」這一現代國家德性這一話題，筆者意欲強調的是，「革命」是一個開端，意味着解放，但未必帶來自由。僅當革命締造了公共空間，使得私人轉化為公民，即進入公共空間和政治議程，成為公共存在，才能實現自由，而獲乘一種政治生活方式。而「政治」不是別的，如希臘先賢所言，它恰恰是一種城邦與靈魂的一元結構。在此，自由的承載體不是國家，也不是個人，而是作為具有公共相關性的公民政治生活方式，一種政治公共空間。說到底，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由此，它消解了或者調和了國家與個人的緊張，一統於一個「分享着公共政治空間」這一生存論意義上的人類境況——不是最好，但是較好的瞬間。就是說，不能將億萬人對於公民自由的追求簡單化約為民生項目，更不能以迎合民粹來獲取對方的政治支持，一如不能以治安來對付政治。畢竟，政治是一種公共事務，自由則屬世界性、公共性的利益。⁴

所謂「有方」，關乎政制的合法性，特別表徵為對內最大限度地提供秩序，保障公民自由，捍衛國民福祉，實現公義的國家能力；對外有效維護國族利益，維護集體尊嚴，秉

持文化自覺和政治尊嚴。一定意義上，所謂「有方」就是有效率，能夠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內的基本公共產品，特別是能夠有效形成國家意志，提煉和提純政治理性。但是，好的政治同時一定是好的公共秩序。就此而言，任何「效率」都應接受是否有利於「公共秩序」和「公共福祉」這一標準的檢驗。在此意義上，敞開來看，如果說「有德」着重回答的是政體的德性倫理，關乎政治之「內聖」，那麼，「有方」回應的是政體的責任倫理，關乎政制之「外王」。

再說一句，今日中國國家建構之急務在於建設優良政體，將國家建構奠立於並託付給優良政體。優良政體表徵「現代中國」，承載着國家理性，建構優良政體的努力實質上就是提煉和形成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的有機進程，同時，也是將國家理性肉身化、建制化的國家建構努力，一種國家理性的自我制度武裝和理念昇華。而以優良政體來承載國家理性，也就是在規訓國家理性和權力意志，確保國家是並且永遠是一項公共事業。只有承載於優良政體的國家及其國家理性，才能獲秉偉大的道德尊嚴。就「現代中國」而言，國家作為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的交匯之所，理當成為全體公民和平共處的共和家園，使得國家建構的努力同時是一個兌現民族理想和落實公民憧憬的雙重政治建構進程。優良政體作為這一政治建構進程的核心，百年轉型追求的重點，從來就處在這一交匯的中心，將眼前現

實政制和浩遠政治理想的參差表露無遺，使政制功利與政治公理的扞格輻輳一體。就此而言，建成優良政體同樣是，或者，更加是「現代中國」最終圓滿呈現的加冕典禮。在此，考慮到今日中國依舊處於改革的中途，半新半舊，因而，以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用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構成了刻下中國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下探尋優良政體的一條可欲進路，以及獲秉與維持政治正當性的現實與歷史條件等諸項考量中的一個必然選項，更是力保這個叫做「中國」的政法時空成為億萬公民和平共處的愜意居所的政治社會基礎。無此優良政體，則建設「現代中國」、長逾一個半世紀的長程中國革命將頓失意義。一日無此優良政體的確立，則一日難言轉型的完成，更難言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挺立。而且，歸根結底，沒有優良政體作為制度支撐，一切有關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均無落實的現實基地，寄託其上的理想而愜意生活的可能性更將不復存在。

優良政體必定是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建制。這裏，尤需重申的是政治的公共性。本質而言，政治本就是一種公共事業。現代民主政體不過將「承認」與「同意」等法權元素訴諸程序性、公開化的競爭過程，承認和兌現了政治的這一根本品格。換言之，以法理品格落實政治定位，實現國家的公民政治期許與法權規訓的統一。政治的公共性意味着可協商性和開放性，前者基於相互承認的法權，後者表明大眾參與和治理，使得政體獲享正當性與

合法性，也保證了政治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由此而與強權政制、霸道政制和腐敗政制劃清界限，呈現出「平天下」而「公天下」的景象，達成的是一種新型的「王天下」的政治景觀。今日中國政制所當用功之處，不止於此，而必得包含於此。

諸位，說到這裏，引申開來，我想說的一點是，當今之世，為何英美大國抱團擠兌中國，周邊小國起哄攪擾中國，就因為它覺得這樣一個政權，一旦強大了，將會如何如何。我們不會天真到以為中國實行自由民主立憲政治它們就會停止打壓和攪擾，但是，我相信，價值觀之融入普世文明，可以大大減壓，有助於緩解這一氛圍。「民主制避免戰爭」曾經是一種國際關係的樂觀派理論，有幾分道理，卻無根本解釋力，根本無法直面現代國際關係的叢林局面。因此，回觀自身，刻下中國政制是一種過渡政體，要在未來兩代人的時間內趕緊完成民主轉型，就不僅是國家政治的自我完善，同時是因應國家間政治的自我武裝。真切希望二〇一二政府換屆之後，新一屆政府上任，能夠有效推動這一進程，讓社會的歸社會，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如此這般，始有長治久安。

古典希臘哲學和中國先秦諸子政論，雖相隔萬里，卻分享着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直接面對人類的政治生活。人類生活形式上必為群體生活，決定了其本質上一定是政治生活。作為政治生活的參與者和觀察者，直面政治生活，而發育出自己的問題與問題意

識，構成了古典希臘政治哲學和先秦諸子政論的共同致知理路。這個問題與問題意識不是別的，就是「什麼樣的政治生活是最好的政治秩序？」以及「什麼樣的政體是我們可能有、能夠有的最好的政治秩序？」兩千多年來，希臘古典政治哲學和中國先秦諸子政論澤被後人、嘉惠吾輩，其中最為核心的一條就在於此。今日中國所當思考，並且需要形諸具體政制的，同在不出此一問題和問題意識；今日中國政學各界所當做，並且亟需努力打拼的，依然旨在解決這一問題，從而有效回應這一問題意識。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五日，修訂於清華無齋

註釋

* 本文為2012年1月7日作者在復旦大學哲學院人文智慧講堂「新年文化論壇」的演講整理稿，原刊於《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5期。

1 截止本文殺青之際，「烏坎事件」終以村民選舉落幕，好歹蔚為吉兆，表明地方當政者的良性政治措置，可以為特定地域內的政治轉型提供有限轉圜空間，而其示範和放大效應，卻適足以突破「特定地域」。

2 參詳許章潤著：〈國家建構語境下的「社會」的中國意義〉，載《戰略與管理》2011年5-6期。收見本書。

3 參詳許章潤著：〈國家建構的精神索引——今天中國為何需要省思「國家理性」〉，收見《國家理性》（《歷史法學》第四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頁3以下。有關於此更為宏闊多元的論述，參見許章潤、翟志勇編：《國家理性與現代國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4 泛詳漢娜·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論革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第二十一章

南海、中南海與太平洋

——南海的邊疆政治與國家理性的法政
哲學背景

南海濤急，輿情鼎沸，民間更是喊打喊殺之聲一片。和戰兩難，進退維艱，專業人士自有判斷。在下身役法學，此刻只想就其逸出效應，自外圍作法政哲學的背景梳理，而為邊疆政治和國家理性這一當下難題提供純粹理論之思，卻非策論之應。畢竟，此事牽連南海、中南海和太平之洋，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哪裏是隨便說說的。

總的感想是，此事表明「現代中國」真的成長起來了，巍峨聳立，才會有左鄰右舍的不安與覬覦、既有權勢的深懷忌刻與大事周章。因而，和戰之間，對內考驗着刻下政體的政治決斷意願和政治決斷能力，對外等於亮明中華文明有無政治判斷智慧，是否提煉出堅卓雄厚的國家意志。全世界的目光在此，等着你出招，端的難為人呢！

一、「四喜四憂」：需要降溫

首先，此次國內輿情開放，或者，有限度開放討論南海問題，甚不尋常。央視第一頻道晚間黃金時段設壇連線，八方名嘴，唾沫橫飛，念經賭咒，以常識應對問題，聚攏了一般百姓的心，讓萬萬人看花了眼。而據在下體認，恰恰是此等官方姿態和民間輿溫，反倒

讓人感覺事到如今，別再煽風，適當降溫吧。

因為，其間纏夾着「四喜四憂」也。

第一，喜的是當下中國，雖非鐵桶，卻為輿情嚴緊管控之邦，而南海風濤事關邊疆政治、國家利益及其政治正確之大是大非，牽連於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居然容忍公開討論，甚至主動採取公共討論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訴諸公共理性，可堪訝異者也。諸位，以中國之大，轉型關口，問題成堆，「壓力山大」，單挑此事說事，這本身就非尋常之事，耐人尋味之際不免讓人浮想聯翩。以「互聯網時代」云云，一言以蔽之，等於什麼也沒說。朋友，什麼時候「中央」電視媒介就國人揪心的政體改革討論過？從來沒有過嘛！至於宗教和族群政治，民間反抗與知識界的異議，以及礦難連連、失獨失怙，同樣迫在眉睫，同樣事關邦國大端，也未曾如此陣仗地訴諸傳媒嘛！更不用說權貴資本駕臨邦國，整體接班，階級固化，已成國之大癱，而輿情根本無庸置喙者也！雖則如此，此時此刻，居然單就也僅就南海問題公開討論，見仁見智，七嘴八舌，敞一個小口子，不管怎麼說，總是好現象呀！

這同時卻恰恰是令人憂慮之處。因為經此討論，媒體火上澆油，民族主義發酵。民族主義本身是中性詞，而為一切成熟國族之必要立國理念。沒有民族主義，哪來民族國家。

愈是成熟國族，民族主義愈是深厚，其為不顯山不露水的矜持與練達，端的是大戶人家經久練就的呢！就現代立國最為重要的理念支撐來看，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的隱蔽命題，本不是什麼高深大道理，恰恰是現代立國的張馳二柄。總體而言，雖說民族主義是一種更為高尚的情感，然而門檻較低，似乎人人皆能插嘴，這便魚龍混雜了。草根不明所以，逞匹夫之勇，終不能應大局，史有明鑒。況乎以當今之世態，神州虎狼環伺，民族主義時刻蓄勢，卻不能囂張，同樣本不是什麼高深大道理。否則，壓力之下，情急之際，雙方均無轉圜餘地，整個政治層和知識界政治盲動，則局勢失控，上台台下皆非，上台下台都難。那時節，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外人隔岸觀火，坐收漁利，伊於湖底？另一方面，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民間愛國主義，源自國民對於邦國的歷史文化自我認同和有關國家強盛的真誠願景，政治高層對此眼睜眼閉，無法做出切實呼應，則政治正當性銷蝕，反過來引震內政，亦未可知也！

第二，喜的是此次討論表明，政學兩界，一般民眾，對於國家利益邊界的自覺前所未有。比諸「火紅的歲月」動輒勒緊褲腰帶「支援亞非拉」，將這個島送給此君做禮物，讓那個島予彼公為飛地，再一筆劃條線讓出三萬平方公里，徜徉於虛矯的世界主義烏托邦，而了無國家利益自覺，這股「南海潮」引發的公開討論，說明邦國政治成熟多所提升。因

而，對於國家利益的自覺，就是文化自覺，也就是政治自覺，而有助於政治成熟，表明「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國族心智成長，至此算是有點眉目了。說起來，近代中國的國族意識與邦國政治，還真是伴隨着外敵入侵而頓悟，由救亡建國而自覺。洋槍洋炮，猛然提示了國族利益邊界和政治邊界，痛苦而無奈。凡此自覺，為成熟的政治社會和文明國族所不可或缺，也是「先成熟起來」的國族所昭示天下者也。一日無此自覺，一日難言國族的政治成熟，國族終究是懵懂而脆弱的，經不住折騰。而折騰，有時是死命地折騰，不顧死活地折騰，始終是國家間政治的恆常主線。君不見，這大千國際，一種國家自助體的錯綜體系，哪天不在折騰！哪裏不再折騰！人性乖謬，人世滄桑，人生有常而無常，有以然哉，期以然哉，不得不然哉！

只是喜憂聯袂。這不，正是在此，鑒於刻下政體，雖說「黨指揮槍」，但軍方坐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其實，聽說外媒就已「敏銳」觀察到，軍方的外交話語權經由南海危機而多所提升也。而一旦軍方在此掌握話語主動權，利用輿情逼迫當局有所動作的話，就大局而言，未始為福也。少說，也是軍費之大幅提升也。實際上，最近幾年，多多少少，中國已經於不知不覺間被拖到軍備競賽的軌道上了。歷經一百多年七代人奮鬥，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經濟改革紅利，究竟如何分配，我想，軍隊不甘置之度外。國家成長到這一步，

利益邊界拓展了，客觀上也需具備相應的軍力，以護持這來之不易的果實。除此之外，尤有甚者，此番官媒大張旗鼓，連篇累牘，實予人產生有意將公共視線自「中南海」移至「南中國海」之感，就更是憂之所在了。海分南北，天道同風，北邊的海潮漲潮落，南邊的海聲氣相應矣！反之亦然。雖則本心並非如此，而效果如此，恐怕怨不得別人如此揣度也。

第三，喜的是南海潮湧突顯大國成長，已經到了讓遠鄉近鄰們不得不正視的地步了。跳出國門，遠端審視，的確，中國現在是大國了。不是區域性大國，而是全球性大國，一個全球性政治大國。這個人均GDP全球排名一百開外的國家，經歷歷劫，踉踉蹌蹌，以七代人的慘烈奮鬥，終究是成長起來了。無論全球話題抑或地緣政治，沒有中國的參與，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可想像的。因而，權勢與責任齊至，集體尊嚴與尊嚴政治意識隨之水漲船高。體量大，一動一靜，容易招風。周邊小國產生了嚴重的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躁動盲動，實乃情理之中。此為事端，亦為緣分，而恰恰是用力所在也。

憂的是和戰兩端繼續齟齬，長此以往，恐會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實際上，官民之間，軍政之間，知識界和民眾之間，乃至於左和右之間，「普世」與「地方」之間，此脈線索彷彿滋長，已有端倪。「社論」連連，總是無風不起浪。台島政治弊在族群分裂，大陸果若因此造成政治分裂，則得不償失。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國內輿情告急，國際逼迫太

甚，可能迫使中國提前攤牌，而情形似乎是有人盼着中國提前攤牌呢！——畢竟，攤牌是早晚的事，哪有不攤牌就崛起的好事。但是，時機未到，還不到攤牌的時候就讓你攤牌，這便為難了。——又或，這其實是攤牌的最好機緣？

第四，喜的是南海問題年來日顯，中菲黃岩島之爭直接面對面歷時將近半年，不管是媒體、策論家們，還是知識界、決策層，其發聲，其思考，表明中國的智識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場。實際上，晚近十年裏，網絡空間的誕生催生了一種新型議政方式，而這也是漢語思想的錘煉方式，更是提煉中國的國家理性的絕好良機。不管是專司國際政治的專家，還是一般外援的知識階層，其所展現的智識力量，集思廣益，影響着官民兩界。這便是大眾政治時代的輿情，也是一種平庸時代的政治情貌，優劣一體，喜憂俱在。尤其是一般民眾，嚷嚷，似乎很有主見，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在跟着智識界、傳媒和思想界的調子走，尤其是跟着傳媒的調子走，只是他們未必意識到自家所受的影響罷了。

憂的是知識界也好，傳媒也罷，雖說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漢語思想的智識力量，但卻存在着學理準備嚴重不足，大視野闕如，以及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問題。例如，須知，國際法通常只是妥協政治的產物，至多，一種情境性的國際道義，萬不可完全等同於人類普世公義。而且，公義與否，還要看是否切合邦國利益。「十一段線」還是「九段線」都講

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來」如何如何，何以應對？以義憤應戰政治，恰恰是大忌。國家間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馬基雅維利早已有言在先，兩百多年來，洋人就是照此導師訓誡行事的，既暴且詐，卑鄙無恥卻落落大方。迄至小拿破崙，伸言「政治無肝腸」(La politique n'a pas d'entrailles)，延續的是馬老師和黎塞留們的路子，若謂用於解析國家間政治，倒是大實話。由此，對比而言，對於海洋法與國際政治的精深研究，對於區域政治和地緣關係的專家級人才的培養，爭得話語權，今日漢語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對於《京都議定書》的拒斥，堅持美國大兵任何情況下不受國際刑事法庭管轄，以及二十年來拒不加入《國際海洋法條約》等等，無不基於一己私利，而骨子裏則以國族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這一國家理性原理相撐持，哪怕由此撕破臉皮。——當然，手上有牌，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臉皮呢！

二、「國際維穩」：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

手上牌不多，要頓時拉下臉來攤牌，就比較困難了。菲律賓小樣兒，不懂這個道理，

急了，也想玩「離岸平衡」一套，結果一鼻子灰，不奇怪。然而，其於中國之為「麻煩」，也確實「麻煩」得很，卻是有目共睹的，窩心得很。相較而言，總體來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接近於做得最好」，但也不過是以「拖」字訣應對，就在於希望藉由「大國的成長」，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獲得主動權。前面六十年疏忽，先機已失，此刻只好如此，似乎也只能如此。據專業人士言，不說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海上一擱，誰還能怎麼着。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樣不是一天就煉成的。因而，刻下中國在展現政治意志上有所作為，已經給予世界為了捍衛核心利益絕然不惜一戰的印象，但卻又似乎不具絕然堅卓之政治決斷力與軍事決心，堅韌而溫吞，動機和結果皆在於此，甘苦雜陳。

說到底，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兩相互動的視野下，其間牽扯的是日常政治下的「政府危機」與轉型時段的「政權危機」這一嚴峻問題。中國今天之所以奉行「國際維穩」（仿效國內政治中的「維穩」表述），就在於百多年的中國轉型到了關鍵時刻，因而，南海熱應該降溫。換言之，「中國問題」所包含的發展「經濟—社會」、建設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等四大指標，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兌現，尤以政體轉型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刻。照目前勢頭來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於一代人時間內，也就是二、三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隨意打斷這一進程。朋友，好不

容易捱到這一刻，機不可失嘛，揪心着呢！正是在此，一日轉型未完，雖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卻難言政權的正當性，則風雨飄搖之憂戚，如同日頭下必有陰影，總在心底盤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這一現代政體轉型的國家，無論歐風美雨，還是此刻正處發展進程中的其他亞非民主國家，其政權的正當性高枕無憂，怕的只是政府危機。存在政府危機，卻無政權危機，使得此類政體伸縮空間較大，轉圜餘地相對較多。因為，從整個邦國立言，大不了換一個政府接着幹就是了。不管怎麼換，政權在那兒立着，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則只能「維穩」，無論在國內抑或國際。

說白了，今天中國不僅存在政府危機，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們尚未完成政體的現代轉型，尚未建立起標領正當性的優良政體，因而，政權時刻處在深刻的危機和危機恐懼當中。所謂優良政體，不外乎「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普世模式適當予以中國化處理後的形態。中國現在犯難的是此，而非彼也。這是百年老帳，不是一夕淺疾，有待接續努力漸恪其功。刻下之所以奉行「國際維穩」，但也不敢放手實施，就在於搞不好不僅政府危機突顯，更要命的是政權危機降臨。而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為何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的原因所在。「保大清」與「保中華」的糾結，曾經如同夢魘，徘徊於近代中國轉型之初，結果玉石俱焚，讓後人夜深披史，總不禁涕泗滂沱。不料想，百年之後，

人非而物是，則事理必致，情理兩非矣！今日剖析南海的邊疆政治，不能無視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原是聲氣相連，牽一髮而動全身也！

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的確，世界正在考驗成長中的中國的政治意志，到了一個關口。這裏，把背景再往深裏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及其國家理性的成長歷史，有助於我們審視別人的考驗，擺正自己如何作為「正常國家」的位置。

在本文語境下，晚近一個半世紀，略分三段。自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五年，一百來年，是朝貢體系解體，中國作為弱勢後發國族奮求生存的阶段。「救國建國」蔚為時代主題，救國必引致建國，建國需要建政，「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於是登場。有人說，「救國」從來都是一個偽命題，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小日本侵佔了半個中國，難道是要將黃種人從白種人的鐵騎下解放出來？自由主義教條滑落至此，夫復何言。話題收回來，在此時段，中

國是所謂世界體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時逐步了解、適應乃至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世界體系。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蔚為「世界五強」，為此象徵，也僅僅是象徵。此後積極入聯，合縱連橫，終於一九七二年遂願。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類」，就意味着並未屈服，也並不完全認同這一體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憑實力說話，沒辦法而已。

從一九四五年到二〇〇八年，算是又一個時段。期間，可以分為前後兩段。前一時段大約止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角色類似於此前，如前所述。後一時段逐步轉化為既有世界體系的接受者與適應者，進而，以列寧主義政體搭上國際資本順風車的二合一形態，成為現有世界體系的受益者。不過，搭便車搭到現在，做大做強，別人似乎警覺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約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當然，也無可奈何，雙方都無可奈何。

「二〇〇八」以後，是第三時段。隨着某種「中國之世界」時代的來臨，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體系的塑造者角色進入大國博弈，話語權日益突顯，隱伏的矛盾漸多。有關氣候變化的談判，就是適例。說是塑造者，不如說是「共同塑造者」。當今之世，早無一家獨斷獨行的可能性了，就連「老美」也不例外。

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國似乎多少有點像是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前夕的樣子，或者，

益且甚之，而就環境而言，益且差矣。那時候，美國崛起，歐洲列強似乎不太樂意接納，可也無法不承認，還在考驗這個新興邦國的政治意志。最後，沒辦法，年輕的「老美」一仗打下來，將現在的南加州、弗羅里達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併，悉數攬入懷抱，奠定了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甚至頭號強國的地位。不妨說，美國的頭號強國位置早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後已然奠定，「二戰」結束不過為此舉行了正式的加冕禮罷了。當年的西班牙早已淪落，暮氣沉沉，年輕的美國拿它開刀，最終完成了大陸擴張，既展現了政治意志，又不會有太大風險，運氣好，它也抓住了運氣。中國現在或許身處「美西戰爭」前夕，倘若哪一天沒轍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類似於此，數十年後人們寫回憶錄說這一仗打得好；假若戰敗，哪怕是平手，其於中國成長的負面影響，怎麼說都不過分。

此事說易行難，手上有權，需要決斷的主兒，此刻肯定比我們為難。

朋友，瞻前顧後，五百年泱泱，「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到了嘛！

四、邦國生存的國家理性

此一「到了」的最近時段，就是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建構趨於完成期，同時，是國家理性的成長和成熟期，也是恢復自己的世界性大國的歷史時刻。因此，邊疆政治的背後，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嚴政治的邏輯，更是世界體系中權勢轉移的邏輯。十六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以「權力政治」與「權勢國家」為現代國家接生，國家理性流轉四方，為此張本。不想世事輾轉，此情此景，於當今世界再度原形畢露，益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真是讓後人復哀後人矣。「二戰」後世界暫時「擺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輪「擺平」的進程之中，好一個春秋戰國。在此情形下，處理邊疆政治，重塑世界體系，不能忘卻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邏輯，所當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謂的「國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點是，當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們老辣，將朦朦然即將現形人世的現代民族國家看作「政治生命體」，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為主題，將「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當性」當座右銘，由此區隔「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兩界。國家政治講正義，講道德，講普世價值，奉守公民理性；國際政治講利益，講現實，難講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衛原則和政治現實主義，甚至是所謂

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其實，這就是「城邦之外無政治」的希臘政治智慧，其之一脈綿延，而有所謂「政治止於水邊」的北美式戒條。以「政治是眾人之事」為憑，是不明此間區際的懵懂。倘若非要將此推展至國家間政治，則可期待而無把握者也，是懵懂的平方。看官，國際政治從來都是霸權之爭，權勢的較量，無政府的預設下，以邦國利益邊界的最大化為鵠的。因此，誠實的自由主義者面對國家間政治，或者，國際政治，從來同樣都是清醒而誠實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否則，自由主義了無理論張力，難擔治平大業，便一無是處了，也太小瞧它了。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義從來都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隱蔽命題嘛！那麼，何時圖窮匕見，不再隱蔽呢？就是邦國利益受損之際。想一想，當年大英帝國議院上下矢口開戰，決議「懲罰」滿清，便知道此種懵懂是多麼可笑而可憐了。

此種老到成熟，還表現為它的「虛偽」。《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即曾坦承，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因而，在公開場合他們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口吻」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訴諸理想主義術語。可是，一旦關起門來，自家人說體己話，「籌劃國家安全政策的精英們卻滿口權力語言，而不是什麼法則」，秉持的是現實主義行事方式了。¹ 不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蠻，卻口口聲聲真理在手、道義在肩，將對手抹黑為邪惡、野蠻之徒。可事實上，為了達成目的，他們自己同樣無所不用其極，動不動要將別人「炸回舊石器時代」。²

顛覆、暗殺和戰爭，金錢美女學位旅遊援助行賄受賄敲詐勒索，有什麼用什麼，能用什麼用什麼，什麼管用就用什麼。這也就是為何深諳此道中人不免喟嘆，「道義」啊「道義」，其實在國際政治中難能發揮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義」之思，才是常態，重複的也不過就是馬基雅維利們、霍布斯們早已言之諄諄者也。³

這樣說並非意指「老美」如此，別人應當同樣如此；更非是說只有「老美」如此，別人皆家風清白。毋寧，只是想說，在國際政治的「霍布斯體系」、「格勞修斯（Hugo Grotius）體系」和「康德體系」之間，存在着萬水千山，道不同不相為謀呢！朋友，這就是所謂的國際社會，一個無政府的亂局，你說有什麼法子。因而，將康德願景誤以為當下現實，不待人笑，當先自笑；以「道義」為國際政治開藥方，人尚未悲，恐已先悲矣！

五、實力政治與文明國家

上面說到近世地中海文明和國家理性，牽扯到近代政治和世界範圍內的權勢轉移問題，有必要多交待兩句。依據歷時性敘事，就世界各主要民族國家來看，現代民族國家的

誕生史經歷了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到「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再到「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等三大演進階段，講述了一部有關「富強、民主與文明」的章回故事。群雄逐鹿、血流成河，或者，什麼「大發展」「大繁榮」，都是此間的故事。

其中，馬基雅維利—博塔羅時代以降直至黎塞留專權、俾斯麥鐵腕統一德國、俄美兩國的強力擴張，所謂「地中海文明」時段，民族國家由雛形初現而逐漸完型，其總體追求的是所謂「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英、德、俄、美的建國歷程，均將「實力政治」的國家理性故事演繹到登峰造極。期間，約略靠後，另有一脈線索逐漸滋長，就是大約自博丹倡議開始，為美、法革命所率先實踐，「憲政國家—憲法政治」作為一種被逐漸把握着的人類理念，進而作為一種歷史存在，慢慢浮現，並終於在兩百年間獲得了自己的肉身，成為一種「理想國家類型」。由此，國家不僅意味着「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而且是權勢國家與憲政國家的合一，以憲法政治與權力政治分別因應「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此後，「文明國家—文化政治」觀念漸顯，國家理性命題由此拓展了自己的視域，不僅意指國家本身應當成為涵育文明成長的最佳基本單元，而且，必須是一種文明共同體，並由此成為一種國民空間和全體公民的共同政治家園。同時，它意味着國家必須着力於人類知識、文化和思想的建設，而偉大的國族無一不是挈領人類認識未知世界、發掘普世價值的

引擎，從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導性與文化領導力。不是霸道，而是王道與文化，致誠天下，始為偉大國族。由此，國家理性提供的是從「為何要有國家」，到「如何才有國家」，而終歸於「國家應當為何」的連續、綿密的致思進程。

當今之世，地中海文明肇始的「權勢國家」與「實力政治」依然健在，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甚至於叫囂於東西，隳突乎南北。國際舞台從來憑實力說話，近代中國於此保有深重歷史創傷記憶。與此同時，「憲法政治」與「憲政國家」命題蔚為普世價值，中國缺這一課，正在補，有望補上，實際上，台島已然補上了。進而，以「文化政治」與「文明國家」標榜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漸成正派社會與良善人生。對中國來講，此為願景與目標，有點眉目，慢慢終究要完型的。

在此需要關注的不是它們的線性發展，而是其間的糾結。例如，共同體意象恰與「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相對立，標榜的是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其間緊張，彰顯的是格勞休斯秩序與霍布斯秩序的對立。與此同時，此種共同體格局卻又為「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所當追求，並靠它去實現。否則，至少就「國家間政治」而言，「權勢」何來？靠什麼來維繫？特別是對於體量較大的國族而言，幸運和悲劇皆在於此，天造地設，躲不掉，沒法子。帝國——不論是何種形態的帝國——的出現，因應的是提供全球性公共秩序

這一時需，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借用流行詞，「文明國家—文化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共同體局面屬所謂「軟實力」，作為硬實力的「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恰恰不得不依恃於它，在當今世界，恐怕更是須臾不可離開它。否則，便為「邪惡帝國」和「無賴國家」，以及「失敗國家」。其他種種，所在多有，概可類推。它們所講述的，一句話歸總，大致還是可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糾聯為綱，各種具體矛盾，不過為此總體格局的外部展現和臨床應用而已。

據此歷史背景和理論線索，再來看「國際政治」，事情就清晰多了。即以《國際海洋法公約》為例，源於所謂的七十七國集團的主張，其實基本上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擬定的，其他國家逐步加入，似乎成了普世公理。其實，哪有那麼簡單。其間涉及的一個法理問題是，既為條約，大家可以自行決定參加與否，也可以修訂。能否如願修訂，就看有沒有朋友吆喝支持，同時，有沒有實力動用修法提請權了。「老美」一直堅拒，就在於霸權不願自設樊籠。置此情形下，法律話語權的背後是政治話語權和文化解釋權，關聯道義與實力雙方。

沒有朋友不行，假朋友不管用，酒肉朋友可能壞事。中國搞「上合組織」，費力不少，基本屬雞肋。可明知是雞肋，還得要搞。否則，吃什麼。當年，陳寅恪先生對於西北邊患

尤為憂心，其實今日猶未根本紓解也。這便再一次說明，朋友之道，關聯道義與實力兩面，缺一不可。有無共同理念信守，尤為關鍵。此為「國家理性」，雖不過是它的區區末端而已。

六、小結

總之，南海是表象，是枝節，是肘腋；中美互動才是本質，是主幹，是心腹。中美互動良好，各有所需，彼此依賴加深，則小國可乘之隙少，覬覦之心也會有所收斂。而為了平衡中美互動，則需做足中俄、中歐、中印、中日和中非、中伊（伊斯蘭世界）關係的功課，手上才有牌出。聲東而擊西，圍魏方可救趙。當年鐵血首相俾斯麥就曾喟言：他的非洲地圖就是歐洲地圖。若要其承認中國的亞洲強權地位和世界戰略地位，手上無牌，僅只維穩了事，終究不濟事。因而，此時此刻，若將眼光既非聚焦於中南海，也不放在太平洋，卻全力凝視南中國海，恐怕聲東卻未能擊西，因小而失大矣！這一切不是別的，就是所謂「國家理性」，而面對國家間政治和國際政治這座大廈，「國家理性」而非天真的「政

治乃眾人之事」，才是開門的鑰匙。「芝麻！芝麻！」一喊就應。如同在國家政治層面，奉守「政治乃眾人之事」，以公民的福祉為天條，乃不二法門，不能有絲毫含糊。

近世中國百年，變法自新，救亡圖強，三句話最足以表徵時代精神。一是中西交匯之初、古今之變最烈之際，道術崩裂，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時間接應了青黃不接，暫定心性。二是轉型肇始，民國初立之際，孫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權、民生」綱領，擘畫未來願景，真實豁然開朗。三是晚近鄧公提綱挈領之「發展是硬道理」，略陳「國家理性」。上下五百年，縱橫八萬里，今日面對這南海、中南海和太平洋，三片肆虐之汪洋，在下體認，還是這三句話最到位，最管用，似乎也最關情。至於是不是、能不能「和平崛起」，或者，什麼「科學發展」不發展，不是自己一家說了算的事情。

而千言萬語一句話，朋友，說到底，發展是硬道理。打還是不打，就看你手上有沒有這個硬道理，包括優良政體這個硬道理。當年夫子權衡內亂和外患，喟言「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此話今日重溫，尤見仁宅，再次說明歷史理性從來都是一種政治理性。

註釋

* 本文為2012年6月14日作者在天則所舉辦的「南海爭端：國家主權與國際規則」研討會上的發言記錄整理稿。

1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4。

2 同上，〈中文版前言〉，頁39。

3 參詳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著，張小明譯：《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34。

第二十二章

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
誰是真正的敵人

謝謝馬立誠先生的邀請。聽了各位歷史學家的發言，由辨析史實而抉發史義，在爬梳史料中鉤沉世道人心，而將家國興亡連貫於五洲風雲，多有同慨，很受啟發。尤其聽老劉講軍事上的這些事情，或聞所未聞，或親耳佐證，真是受用。

我是學法律的，一直在法學院做學徒，只能從法權政治視角插話，講五點。

一、東方地中海意象

首先向大家陳述的是所謂的東、西兩方的「地中海意象」。如所周知，地中海連接歐亞非三洲，再經直布羅陀海峽和蘇伊士運河，西貫大西洋，東接印度洋，也就是聯結起世界。尤其從大航海時代以來，其將歐洲和大西洋串聯貫通，進而將整個世界聯貫一體，蔚為象徵。概而言之，地中海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地理概念，而且，輾轉推陳，已然成為一個文明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實際上，所謂的現代世界，就是由十七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氤氳涵養，而逐步推展為「大西洋文明」，再呈現出今日這般「太平洋文明」之曙光初現，由此三波疊加，也是三個時段，層累地形成的。

在東北亞地區，不僅中國渤海、黃海和東海以及日本海，概為一地理與政治空間，而且，北從庫頁島至日本諸島、朝鮮半島，外擴至關島，一直南下到台灣、菲律賓，甚至擴展到澳洲，整個的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和澳大利西亞，實際上是一個類似於地中海的地理空間、文明空間和政治空間。不折不扣，這是今日西太平洋的「東方地中海意象」，串聯起太平洋和印度洋，形成跨太平洋的亞太大格局，進而，連貫起整個世界。另一方面，有人說，南中國海之於中國的意義類似於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之於美國，也有道理，也講得通，只是格局小了許多。

在此大框架裏，中日關係問題是兩百年來東亞歷史轉型到了最後收尾時段的最後一場博弈。細而言之，這一問題可從近、中、遠三個角度來看。從眼前來看，中日關係問題涉及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空間中，誰是東亞經濟、政治發展以及文明發展的引擎，一個領導者角色的遴選分配問題，由此而有中日之爭。雖說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長期位居亞洲最發達國家，率先進入世界體系，卻是不爭的事實。故而，風水輪流轉，今日亞洲雙雄爭鋒，已到分曉時刻，中日關係遂成一大「問題」。而從可見未來觀察，則中國「後來居上」，不僅是趨勢，想必也是事實。如此這般，則日本心態失衡，壓力倍增，可想而知。窮則思變，此時此刻，沒事也會找出事兒來的。從中期來看，可能

牽扯到戰後六十年了，《雅爾塔協定》所建立的世界體系是否還適用這一問題。實際上，早在戰後不久，基於冷戰需要和全球佈局，倒是這一體系的締造者「老美」率先將此體系撕開了一個口子。實用主義主導下的戰略理念，從來以國家利益為先，哪管什麼體系不體系的，自己這麼做，就是體系。在下以為，在這個地方，要有思想準備。畢竟，現在日本的主要勞動人口已經是戰後第三代人了，他們成長起來了，不再想背負沉重歷史包袱。值此情形下，如果一再要求對方就歷史問題不停道歉，有沒有現實可能性？有沒有意思？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我接觸到一些日本青年，我感覺，如果你要他就爺爺的事情一再道歉，他嘴上不說，心裏可能很反感；雖說明知應該道歉，但卻依舊不舒服。那邊廂，德國現在的青年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這就是心理，一種人類心理，需要我們共同正視。

朋友，異族入侵，待我如牲畜，生靈塗炭，家園成灰，如此血海深仇，豈能忘懷。但國族記憶以及由此挾發的政治正義和道義情懷，不能簡單積鬱為一種自家排解不開的歷史情結，更不能為此而於操作層面對複雜而現實的國家間政治做簡單化、模式化處理。反而以此為道義制高點，而在時刻警悚中共同正視歷史、面向未來，才是福音。抓住是非不放鬆，撇開恩怨論沉浮，才是正道。

在此，還有一條，就是日本要解禁自衛權，逐步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此舉不惟針

對中國，實際上也是針對美國所主導的戰後世界秩序。日本希望成為正常國家，而且，終亦必夢想成真，我覺得這一條中國不僅要有思想準備，也要有一定的同情。因為日本現在是一個半主權國家，大量美軍駐在，暗中處處受控。當年民主黨上台，鳩山由紀夫拜相，圖有所變，遠「美帝」而親華夏，結果立馬遭致反彈，可以為證。期間，「美帝」背後下手，大家都心知肚明。作為一個具有悠久立國立政歷史的國家，日本希望擁有完整主權，於情於理，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位居世界經濟老三，在他們自己看來具有高度文明，尤其戰後建立起成功的民主體系，確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值此情形下，它要爭取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中國對此無效抵制，還不若給予同情的理解。可能，未來幾十年間，中國必須對兩件事保有充分思想準備。一是南北韓的統一，這是早晚的事情。屆時，卧榻之側，一個擁有一億人口和核子武器，而國民懷持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國家出現了，其對中國未來的地緣政治和東北亞局勢將會造成強烈的衝擊，是不難想見的。單是長白山「高句麗」這一壺酒，就夠喝的。二是日本早晚會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你可以通過大國博弈阻止或者延緩這一進程，但是，終究而言，它不成為正常國家才是不正常的。從國族利益和國家理性出發，對於上述進程能夠抵擋一陣就抵擋一陣；在無法搬走、只得相處的鄰居的意義上，敦睦比交惡好，卻應給予同情的理解，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而言，可能利大於弊。凡

此種種，要有足夠的意識和思想準備，要有政治預案。在下如此陳言，料想會遭謾罵，但理性在此，不得不說。

從長遠來看，過去中日之爭，甲午之戰，是已然步入到現代世界體系裏的初步現代國家和一個還沒有進入現代世界體系的東方帝國之戰。中國八年抗戰，實際是都進入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兩個國家在較量，各有盟恃，各擁資源。時值今日，這個問題要重新看。可能有一個超越既有的世界體系，而重新塑造世界體系的問題。換言之，中美共治下的和平，會否成為世界體系的核心？日本遭到邊緣化，對此憂心忡忡，不奇怪，它要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

在這個大視野裏看這個問題，就牽扯到一件事，即中國的「一八四〇情結」和日本人的「原爆受害者情結」，中國人身為東亞老大這一「老大帝國情結」和日本的「亞洲一等公民情結」。日本之有此一情結，源自「我」是亞洲最先發達的、最好的現代化國家，「我」也是亞洲民主建設、經濟社會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面做得最好的國家的這一自負。凡此情結交集而糾結，實在不容易釐清。冷靜處理，不僅要有大格局，而且要看到「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點。在此，民粹主義最壞事，簡單幼稚的民族主義同樣壞事，無裨於調處這些關係。晚近十多年來，雙方的格局都很小，令人遺憾。

另外，甲午一戰，日本覺得中國海軍不堪一擊，彷彿至今在文化心理上仍然不願平視對方，姑且不說因着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的差異，一般的日本人多少看不起中國，多數似乎也不太了解發展中的中國。另一方面，以日本作為一個國族和文明而言，就其資源、人口和文明的時空含量來看，迄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然登峰造極，功力已然發盡，不可能再攀高峰了，垂垂老矣。而恰恰就在同一時段，旁邊這樣一個龐大的中國文明實體歷經曲折，逐漸崛起，如日中天。值此情形下，他要了無焦慮，才不正常呢！在此，以仁恕之心待人，中國也要充分考慮到「你」的鄰邦，只有一億五千萬人口，在歐洲是一個超級大國，跟中國相比卻不能算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力量，其焦慮是正常的。然後怎麼來適予安撫，讓他打消顧慮，而這也就是在為自家營造和平發展的環境。我接觸到一些日本教授，他們似乎有一個感受，「你們會不會以及什麼時候報仇？打我們？」正如同我們同樣也有「日本什麼時候再會侵略中國？」、「日本重新武裝後會不會再度野蠻侵略鄰邦？」這樣的擔憂。我覺得這個事情涉及雙方文化心理和民族憂患，需要從鄰人相處之道來考慮。為什麼他們和我們會有這種焦慮？光嚷嚷你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你們犯下過滔天罪行，你們法西斯軍國主義，解決不了問題。

二、誰是真正的敵人？

第二點，也是中日關係與東北亞局勢中所涉及和反映的，而恰恰是最為重要的關鍵，就是政治。——再說一遍，此亦非他，政治也。中國的大轉型行進到今天，如從一八六〇洋務運動算起，已然經過了一百五十四年，不外乎是一個政治建國的進程，指向「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四大指標，而以「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四位一體籠而統之。在此進程中，什麼是政治？政治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不僅一直伴隨着一個半世紀的轉型，而且，應當在建設現代中國和建設現代世界的意義上重新加以思考。此為大是大非，大經大法，須臾不可忘懷。

我們說政治旨在「確立主權，提供秩序，分清敵我，劃分公私」。但在非常政治的大轉型時段和國家間政治中，分清敵我，最為關鍵，堪當核心。換言之，當今之世，究竟中國最主要的敵人是什麼？誰才是中國的大敵？在這個問題上不清不楚，焉能安邦治國？怎能建制立政？過去陳寅恪先生說環華危機，而以西北邊患和東邊倭寇對我華夏文明危害最大，蓋先生對於沙俄擴張和日寇進逼的來龍去脈，每多歷史眼光，保持政治清醒，故而提示同胞，警策世界。今天，從國族的政治成熟的角度來說，究竟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誰？同

樣需要在政治上進行省思。否則，四面出擊，八方樹敵，不智、不祥。進而言之，就今日情形而言，日本是不是中國的敵人或者最大敵人？這需要討論。中美兩國有矛盾，而且是結構性矛盾，因為大國的成長總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進程，但是，是不是一定就會打起來？和日本能打起來嗎？西北邊陲的老毛子靠得住嗎？或者，最靠不住？這些問題均需考慮，深長思之，決不能容忍媒介的叫囂和民粹的鼓噪誤導心智。「人民群眾」在此恰恰是最盲目的，信不過，不可信，不能信。可能，老劉，你是軍事專家，自有考慮，比我們清楚的。

說到底，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環顧之下，沒幾個盟友，更無堅定的盟友。過去還有一個北朝鮮，包袱背着，現在也快鬧翻了，玩不轉，不好玩。「金磚國家」、「上合組織」，鬆鬆散散。尤其是後者，胡越同舟，雞肋，靠不住。有比沒有強，但無幾個堅定鐵杆盟友，要在當今國際上混，總不是個事。看看英語國族，英美加澳新，在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即可想見。值此情形下，這樣一個大國會不會因為孤獨而孤注一擲？這是西方的疑慮，值得我們思考和回應。雖說國家間關係裏只有永恆的利益，但文明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還是要考慮的。由此涉及中國的政體與文明，其成長與發展諸項，而恰是在這一點上，刻下中國有軟肋。換言之，現代世界，一個轉型成功的國族，必然解決了政權的來源問題，而以「權為民所賦」所奠立的「主權在民」來支撐，獲得國內政治的

正當性，進而，穩定性。換言之，由此一舉解決「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來表徵和兌現，從此便無內憂也。刻下中國，「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尚未完全解決，致使中國政治未能完全上軌道，意味着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轉型還沒有完成。在這種情況下，你以一個未完成轉型的、正在向現代國家進發的龐大實體，四面出擊，是不是到時候了？難道這不是軟肋？我覺得還不到時候，還要埋頭幹活才是。這樣說，不是所謂的「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想說明，國家間關係牽扯到內政，而引發出更為廣泛的一些問題，比如政體與文明的問題，需要切實打算和深長思之。

說到文明，則歷史記憶、歷史意識及其塑育，涉及一般民眾，頂頂要緊。我看到一些文章，也聽人說過，有一些越南人，包括越南的普通民眾，他們有一種想法，彷彿是一個歷史記憶，說「當年我們越南和中國劃江而治的時候」，如何如何。江者，長江也。老天爺，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怎麼會有這種歷史記憶呢？據說越南不少人有這種想法，以為當年長江以南都是「我們的」。剛才誰說到高句麗問題，他們的激烈民族主義者聲稱要建一個跨長白山的東亞大國，其間同樣涉及到政體、文明和地緣政治諸項，而這些問題恰恰是現在中國這一孤獨者還沒解決的。這是我今天想說的第二點。

三、意識形態、國家關係與民主和平論

第三點，我想順着「政治」這個主題，談一下意識形態與國家關係的問題。過去有一種講法，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此即國際關係理論中所謂的「民主和平論」。可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間的內戰，也是一場帝國主義的混戰，真正是春秋無義戰。還有一種講法，意識形態一致的國家不會有戰爭，可越南和中國意識形態基本一致，卻因為國家利益之爭而鬧得不可開交，幾番交惡又交戰。過去的中蘇關係，發展到珍寶島交火，發展到「亡我之心不死，陳兵百萬」云云，亦可為證。凡此種種，說明國家間關係所涉因素眾多，遠非某一因素所能獨力解說。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日本、南韓、澳洲和美國的意識形態不同，換言之，在他們眼中，此為一個集權國家和民主體制的對抗。他們自負佔據着道義制高點，就美英澳而言，內裏延續着大航海以來的西方強權的思維慣性和強盜邏輯。如此一來，是不是戰爭的危險性隨之增高了？是否姑且不論，它至少提醒我們，既有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分析範式，成長中的強權與既有的強權，乃至於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等概念，可能無法解釋當下的千般複雜，萬般糾結，而需要我們在既

有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充分了解其複雜性與長期性。不過，既然說到道義制高點以及文明的轉型，我想舉一個例子。前不久，現任日相訪問歐洲，有人問到你對過去日本侵略戰爭的看法等等，我記得，此君要小心眼兒，王顧左右而言他，在東拉西扯幾句敷衍搪塞後說，他們非常自豪，在戰爭的廢墟上，通過認真反思，日本建立起了一個成功的民主法治國家，云云。各位，不要小瞧了他的聰明，他在宣示一種自豪的同時，等於將對手貶抑到道義低地，而這恰恰是西方媒介心領神會、人云亦云之處，可能，也是某種現代的世道人心。我們知道，不可能一旦中國轉型為民主政體，國家利益之爭隨之煙消雲散，戰爭陰影蕩滌殆盡。無此天真，國族成熟。然而，從國家間政治場域回到國家政治語境，它說明內政意義上的政體涉及到國家間政治中的道義制高點，不完全是打一仗的事。

四、國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漫長的政治建國，目標之一，就在於形成理性充盈而剛健博大的國家理性。迄而至今，多有成就。筆者接觸一些日本學人，在他們眼中，晚近以來，中

國政府步步為營，有章有法，不若東瀛之政亂心迷，所謂的政治不過衰退為政客們自拉自唱的權力遊戲，一種政治營銷術。在吾人「內在視角」觀察，則華夏國家理性不彰，恰為時弊，也是積弊。毋寧，「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雖說理念和政制有別，卻分享着一個共同的治理技藝。此即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用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國族的成長，如同人身，任何一極獨大，心智和心性失衡，則肢體必然翹起，終非善也。

地中海文明以還，「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蔚為時勢，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精神，由此而有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全球凱歌高奏。然而，這只是現代國家的1.0版。後來升級成2.0版，民族國家以「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立國，迎來一個大眾民主時代。二十世紀以來，尤其「二戰」以後，「文明國家—文化政治」更上層樓，民族國家迎來了3.0版，在此層次展開博弈。在後兩個維度上，中國多所欠缺，一些人的心智還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紀「落後就要挨打」這種「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的國際關係理念上。不是說「落後就要挨打」這一歷史和政治理念過時無效了，誰都知道「戰敗國家」和「失敗國家」是什麼滋味。對於我們來說，這也不過就是昨天的事情，怎能忘懷。毋寧，是說不夠用了。沒有「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這一大框架奠立國本，則國族難立，國家理性是有嚴重缺陷的。

從政治理性來講，審慎、克制，概為政治德性，現在好像比較欠缺。民主政治以大

眾參與達成政治正當性，但卻以賢者治國為理想，追求的是一「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互補格局，由此造成一種審慎、克制的政治理性品格。過去大家覺得中國太軟，只知道「棄權」，現在彷彿硬起來了，以至於一年多來，一時間狼煙四起。剛才兩位先生爭論一旦打起來，「輸得起輸不起」，在我看來，中國輸不起。為什麼輸不起？因為一旦開戰，人家政權不會倒，倒的是政府，而中國要是輸了，則政權危殆，說明上述關於「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這一關還沒過，缺了國家的2.0版也！

還有就是公民理性。若說晚近治道，則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蔚為一端，一如「以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為此，培育公民理性，以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讓國家理性回歸國族利益中軸，恰成時需。在此，公民情懷不能被簡單激進的民族主義所裹脅、所遮蔽。說到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對於日本同樣適用。最近這十幾年，中日領導人都換了好幾任，但格局都很小。我不知道我的觀察對不對，日本最近十幾年換了那麼多首相，格局之小，真讓人感喟。從政治理性來講，兩國領導人格局都很小，而且有時候有點意氣用事。還有，現在辦外交的，聽說多半是學外語的，歷史和文化基礎有限，現代政治理性訓育更是有限，甚至等於無，搞搞迎來送往，辦一點安排吃住旅遊的具體外事活動行，操盤不行。據說選拔外交人員，強調思想要紅，業務倒在其次，這怎麼行。不過，進步是真實

的，比起在下當年留學時見到的那些上班穿着拖鞋，煙不離嘴，隨口吐痰的外事爺，現在好多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成長，需要全民族幾代人的接續努力，我們大家不僅是見證人，也是責任人啊！

說到這裏，想到一件事，可謂集國家理性、政治理性與公民理性三位一體之儀式化。現代中國每年紀念抗戰勝利，都是一家獨唱，孤單。不妨仿效諾曼第D—日登陸紀念儀式，邀請日、韓、俄、美以及東南亞、澳洲等國的元首與首腦，以及台島的領導人，一齊聚首，同台唱和。既在志念，亦在敦睦，更孜孜於和平。當年的侵略者身臨此境，只有認罪懺悔的份；後來的勝利者歡聚一堂，更不忘生聚教訓。如此這般，大場面、大格局、好祥和、好兆頭。

五、中夏安，遠人服

最後再說一點，將視野從國際政治拉回到國內政治，古今互鑒，以為收尾。中國有一幅名畫，榮劍兄想必熟悉，就是唐代閻立本的《職志圖》。據說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貞

觀五年，西域的婆利、羅刹和林邑三國遣使長安，朝拜中原大國。可能，這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辨和朝貢體系吧。廷召之際，林邑國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遜，乃有大臣忿然，奏議派兵討伐。太宗稍加沉吟，開口說魏徵曾經告訴他，「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服」。閻本所繪，即此遠人來朝景象，其服色雜陳，深目亂髯，為中原所未見。逮至宋代，蘇大學士觀畫有感，乃有一貞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江海吞萬江」之嘆。

鑒古知今，在知得失，不難想見太宗的心胸氣度，遠見卓識。當今華夏，雖說經濟總量世界老二，但政治修明、文化建設以及一般人民之行止出處的文明修養，有待提升。因而，遠人不服，也是意料中事。當然，之所以不服，不僅在於兩相比較，高下立判，而且，在於國際政治中的權勢轉移，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先發國族面對鄰居的旺勢，需要一段適應期。但是，即便如此，吾人須知，一個尚未完成現代轉型的國族，其之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和全球治理，必有賴國家政治走上正軌，無心腹之憂，才可伸展手腳，也才能於國際博弈中添籌加碼。那時節，即便有肘腋之痛，卻無心腹之患，怕什麼！

一句話，「中夏安，遠人服」，先把國內搞好，然後有需要的話再亮肌肉，跟周邊最好是不打，打也不怕。

註釋

* 本文為2014年7月12日作者北京「甲午兩甲子與東北亞關係」懇談會上的發言整理稿，交由IPX網和共識網發表。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再閱。

輯四 社會基礎

第二十三章

國家建構語境下「社會」的中國意義

重整社會，是晚近百多年來「中國問題」的重要內涵。沒有對於社會的通盤重組，中國既無「攘外」之力，亦無「安內」之望。社會衰朽，則政治無立身之基，國家建構無從談起。實際上，自傳統小自耕農格局所成就的「一盤散沙」轉型為現代社會與經濟形態，非得經由生產方式的重組而引致生活方式的改換，進而引發社會變革，造成新型社會形態，繼而提煉出新型政治形態不可。否則，「中國問題」之解決無望，固無疑義，「人生問題」亦且無出頭之日，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重整社會」講述的是中國的社會建設或者社會重建這一主題。而「社會」一詞與政治、政府或者國家相對應，至少包括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等諸項願景。實際上，就晚近中國的歷史邏輯來看，它們啟自市場經濟的發育，次第登場，而終究勢必導向政治社會的成長，匯入中華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洪流之中。

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就晚近「中國問題」視野下，在國家建構的意義上，「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核心願景逐一略作剖析。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凡此論述，既非一種歷史類型論梳理，亦非有關「中國社會」的理想類型式闡釋，而旨在揭示在「中國問題」和「國家建構」的語境下，「社會」的多層次含義和多元化願景，凡此含義和願景，有些已然成為中國社會的現實，有些尚需假以時日，才能從應然變成實然，獲得自己的中國式肉身。

一、經濟社會

百多年間，「發展經濟」蔚為主旨，無論政體如何變換，而此項宗旨貫穿如一。¹但是，就採行何種經濟模式或者進路以求「發達」與「繁榮」而言，則經歷了一個正反合的過程。自洋務運動以降，為使傳統中國的帝制經濟、諸侯經濟和小農經濟變身為現代經濟形態，中國經濟轉型的總體趨向是學習「商業民族」的西方模式，以建立現代中國的工商業體制，訴諸經濟強國的願景。而自民國肇始以還的四十年間，主流取向是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發展民族工商業，形成以國家調控和市場運作並行、訴諸現代法權安排為基本形態的經濟形態。此後官僚資本的產生及其權貴壟斷性經營，其弊日顯，在政治革命之後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取代，歷經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於二十世紀後半葉重新回歸起點，再度開始自己的市場化進程。

有見及此，刻下已逾三十年的第三波「改革開放」，其實接續的是「清末—民國初年」的第二波改革開放的市場化理念，以形成所有權自由、交易自由和營業自由、消費自由為基本目標，同時着力於建設兩相配套的法制體系。因此，才會有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申說。可是，不論怎樣，如何創造財富，使得國民財富極大地湧流，同時，確保財富的創

造者享有和消費財富，依法保護財富，構成了三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線索，引導中國經歷和經歷着自經濟社會向政治社會的成長進程。

的確，在此總體歷史進程中，「新中國」的願景可能首先意味着它是一個經濟社會，即以經濟理性為綱領，基於生產與交換關係而逐漸形成的商品社會，一個國民財富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完整體系，其主旨在於解決國民財富的創造、流轉、佔有和消費的問題。用最為通約的話語來說，經濟社會是法治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社會生態，十九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所說的「農工商階段」，構成其最高形態。實際上，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同時也就是現代市場的誕生歷史，建構現代政治與形成現代市場，是承載現代國家建構這一機車奔騰向前的雙軌。而歐西現代國家的產生歷程，特別是「現代英國」呈現於世的歷史說明，實現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政治與市場，恰恰是現代國家建構中首需解決的問題，可能，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而形成市場與政治的並立之勢，社會與國家的一「雙強」格局，從而建設國家能力，是現代國家區別於古典國家形態的卓越之處。換言之，現代國家建構是實現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秩序前提。因此，現代國家提供的不僅是一種特定的政治單元，同時，還是一個既定的經濟單元。國家建構過程中所實現的內政的一體化，恰恰是市場誕生的始初條件，就像市場經濟是現代化的經濟產物，市場

經濟同時也是現代國家努力推進、着意營造的結果。實際上，現代國家得以出現的一個重要契機就是人們希望運用國家推進經濟發展。畢竟，商船的前後總是炮艦，是晚近以還迄今音響未息的政治二重奏。因此，諸如以「五年計劃」一類的反市場化行為來推動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同樣需要置於這一歷史語境，才能獲得真確理解。

在此市場和政治一統於現代國家建構的進程中，產權意識的覺醒是公民的溫床，也是敲動那個叫做「現代」的人間秩序的槓桿。諸如產權意識、階級意識和公民意識，均屬所謂「現代意識」。作為構成此種社會形態的要素，政治和法權設置不僅在於保障產權關係，特別是提供私有產權的法權屏障，而且，經由此種保護以鼓勵創造國民財富，滿足市民階級的財富追求，形成一般生產和交換的政治與法權條件，一種穩定的、具有可預期性的普遍制度形態。經此安排，國民既是財富的辛勤創造者和正當追求者，而且是財富的合法消費者與生活的當然享受者；國家權力與國民財富達成良性互動，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互為基礎和條件，而一體訴諸各自抽象一體性的法權安排及其總體性法權安排——政治正義與憲法政治，共同致力於提撕國民福祉、實現和平共善的國家目標。

就晚近中國三十年間的情形而言，全能主義的政治形態退潮之後，經濟社會逐步成形，堂皇登場。但是，其特殊性在於，迄而至今，一定時期內國家作為經濟主體直接下場

博弈，以公權的統轄性打通國內市場，運作海外市場，捍衛國家利益，這一基本格局並無重大變化。由此進路，迄至加入「世貿」前，形成了某種類似於十九世紀後期德國式的經濟社會格局，強調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高強度干預和主導地位，導致國家對於財富的廣泛直接掌控，採取重商主義的國家經濟學與一切服務於「維穩」的政治政策，形成了某種「GDP合法性」的政治經濟學取向。因而，其與當時德國經濟社會形態的差別在於，德國對內施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對外奉守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對內施行有限度的自由主義改革，對外推進以「接軌」為標幟的甚至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二者同時並行，信誓旦旦於致力「復興中華」的長遠目標，不僅說明一段時期內，中國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其「成熟性」尚不足以看清、應對西方主導的全球政治本質，也在於非如此不足以「取法乎上」，被迫於「不得不然」間求取「有所然而然」。因而，它引申、催逼出了復興倫理社會、促使「中國」進境於政治社會的現實必要性。

二、倫理社會

本來，老中國就是一個倫理社會，其以宗法禮制相維繫，與上端的帝制政治同根同源，兩相磨合，蔚為形影。晚近以還，歷經百多年衝擊，這一社會形態基本解體。期間，新文化運動、「一大二公」的集體化以及城市化工商業生活方式，遞次降臨，着力尤巨。期間，個體主義的自我定位，消泯私利和自我的共產集體哲學，以及經濟理性人，因應時需，分別成為它們相伴相隨的理論形態。

百多年間，如果說中國的歷史進程主要着力於一個「破」字，矯枉過正，而使得倫理社會不復原型的話，那麼，時光流轉，今日中國反倒亟需重建新型倫理社會與社會倫理。破字當頭的急遽轉型時段已過，日常政治正在登場與必將登場，至少是社群主義意義上的倫理社會和社會倫理，重新成為人們的情感需求，也是社會的自我療傷，而日益顯現出其現實性，自是順理成章。就此而言，歷經市場化、城市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等諸般衝擊，正在面臨着社會分裂與人生倫理殘缺窘迫的當下中國，亟需重建社會倫理，其實是社會自身走到這一步的必然結果。對於初嘗市場經濟與經濟社會的冷面理性滋味的中國人來說，復興倫理社會的禮法內涵，並佐以社群主義理想來建設良善生活，可能是一種較好的選

擇。² 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當口，「衝破宗法禮教束縛」，如同「砸爛孔家店」，雖然過頭，然而確有其悲情與「不得不然」的話，那麼，此刻重申新型倫理社會重建的現實必要性，同樣是一種不得不然，而且，勢所必然。此種必要性和迫切性，因着「文革」對於傳統社會倫理的摧殘性打擊和市場經濟對於常態社會倫理釜底抽薪般的洗劫，導致社會大眾出現普遍的挫折感和無所歸依的破碎、游離狀態，而愈顯必要與迫切。

也就因此，重建倫理社會，不僅意味着對於近代以來迭遭摧殘的中國人生倫理的回歸，對於曾遭簡單幼稚的現代性思潮否定的一般倫理的「撥亂反正」，而且，意味着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法治社會的新型倫理的尊重和接納，賦予當下生活催生的諸多價值以「新倫理」的位置，特別是於此過程中，給予人類的普世倫理以應有的重構性闡釋。在此過程中，基於孝道的傳統倫理與有關贍養關係的法律調節的統一，關於信用的法權建構和倫理闡揚，凡此種種，關乎新舊，事涉道德和法律，跨越人生與實用，均為今日法權秩序下的倫理社會所要調理的實際問題，也是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文化一直孜孜致力的漢語學思。³

三、市民社會

在此，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景觀和社會生態，自始就是「中國問題」的派生內容，屬「中國問題」的二級問題。與「倫理社會」相仿，老中國自宋明以降即已發育出繁華的市民生活，而同樣在後來的共產集體主義體制下遽歸殞滅。說來話長，二十世紀的世界，不分東西，都曾遭遇過「左」「右」兩翼的極權體制。其中，右翼極權體制以壟斷政治為已足，而對信仰世界和私性生活網開一面。換言之，只要政治上保持一律，免於對政權發出公共質問，則「甜蜜小日子」隨你過。因此，「馬照跑，舞照跳」，成為此種體制下市民生活的具象展現。與此相反，左翼極權體制不僅壟斷政治，而且，將信仰世界和市民生活一並收入彀中。此時此刻，不僅沒有此在世界與超越世界的分際，而且，也沒有公共生活與私性生活的區別，或者說，它們一體壟斷於獨裁政治，導致了一種無世界性的世界與無政治性的政治局面。於是，溫情脈脈、「小資麻麻」和俗世享樂均為罪過，均不復見，人性被壓縮為單純生物形態，人成為服務於特定政制、聽命於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螺絲釘」。

就帝制解體之後的百年而言，民國政體類屬右翼極權，其後的共產集體主義正相反對，晚近三十年重回起點出發，以回頭接應「一九四九」或者「一九一一」的方式，開啟

了市民社會的大門，逐步營建出世俗化浪潮下的浮世景觀。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洗澡」與「洗錢」同時登台，「搓腳」和「搓麻」遍於國中。普遍的墮落景象，繁華光影中幽暗人性的悄悄滿足，其實講述的是政治放了社會一馬，而一起回歸人性基本面的社會重建故事。

四、公民社會

正是在此，公民社會的登場卻愈顯必須，甚至急迫。否則，「娛樂致死」的格局將底線倫理相對化，放縱畸形人性需求，同樣是一種摒絕人世生活的公共性，使得世界無世界性的經營管理式打理人生方式。禁止或者無形中使得人們放棄對於公共事務進行自然法追問，不僅有違人人得享自我提升的道義，而且，徹底消泯了人世生活的公共維度，結果是人世生活本身亦將不保。因此，不難理解，即便是單純耽溺於俗世享樂生活的格局，面對強大權力，實際上也時刻處於自身難保的局面。長遠而言，可能連俗世事務的享有亦且不保，終也是早晚的事。因此，公民社會的登場不僅在於滿足從市民身份向公民位格轉型的

現代人自我定位需求，而且，它說明了只有公民社會才能彌補市民社會的不足，進而保障市民生活順暢延續的政治原理。

公民社會意味着在容忍和保衛私性生活的同時，滿足人性中的利他衝動與公共需求，以公民共同體的自我組織化生存，在市民社會與公共權力之間形成一個間架性結構，既為其緩衝，又為其聯結，而恰成一道促進雙方各守其分的屏障，最終致力於可欲的公共生活。其間，一個致力於此的機制，也是最為重要的訴求，就是公民社會立基於平等主體相互承認的法權，重在賦予全體公民以集體行動的聯合權能。由此，公民不僅可得抗衡國家的擴張勢能，而且有益於救濟國家權能的不足，形成公私分際清晰、又相互貫通的社稷格局。臻達此境，才是整合一體的成熟國族形象。

公民集體行動及其聯合權能意味着私性的市民由此變身為公共存在的公民，集會、遊行和示威等集體行動是他們聯合權能的實現機制，也是彰顯其公民位格的分享着的公共表達方式，更是公民位格落實於生活場景的自我展現。而公民共同體的組織化生存，決定了公民結社的正當性。其中，其最高形態是訴諸政黨政治。藉此最為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公共關懷，構成了現代公民政治的最大特色。由此，公民社會與政治民主化天然結盟，而後者同樣是「中國問題」的政體指向，屬迄今尚未解決的難題。

百多年來，「中國問題」的解決主要表現為國家建構的政治維度，強調藉由國家強力重整社會，卻多少忽略了社會建設，特別是公民社會建設的必要性。晚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最近十來年間公民維權的政治實踐，表明「人民出場了！」、「公民出場了！」再度將此必要性彰顯無遺，要求國家建構的政治之翼，以凝集為憲法政治的政法安排，對此做出有效的、而且是有誠意的回應。

如果說連連頻發、牽涉廣泛的各類「群體性事件」，表明「人民出場了！」，那麼，在城市徵地拆遷過程中出現，以捍衛私有產權為始初目的，藉由《憲法》和法律為屏，慨然登場的「拆遷戶」個體，表徵的就是「公民出場了！」公民個體以「挺身而出」的方式來自我兌現法權立場，冒險犯難，追求的是一種基於法治主義社會理想的民主憧憬。而且，「拆遷戶」甚至打出了「祖國萬歲」和「擁護憲法」的橫幅，說明作為普通人的中國公民對於民主政治和共和德性的理解、渴求與護衛的衝動，早已遠遠超出公共權力的政治想像力，一次又一次地彰顯了公共權力的道義破產、政治頑劣和行政顛覆。

五、政治社會

正是在此，中國的經濟轉型和快速成長，社會的發育與國家建構的努力，必將導向以「政治社會」作為自己的最終願景。首先，作為近代早期歐洲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⁴「政治社會」旨在於現代民族國家框架內，提煉和建構一套整體性的秩序形態和制度框架，用布倫南（Geoffrey Brennan）和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話來說，即一種「立憲的政治經濟學」安排。⁵其為一種「立憲背景」，處理的是民族國家屋頂下人類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旨在為人世生活鋪墊基本的制度形態。「中國問題」所映照的恰恰是「天塌地陷」之後基本秩序和總體制度安排的問題，是百年中國和此刻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大是大非」與「大經大法」的問題。因此，政治社會這一整體性制度形態和秩序安排，正為「中國問題」不可迴避的組成部分。換言之，努力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社會，是此刻百多年轉型收尾階段的最後一役，決定了前述一切努力，最終指向的不外於此，而且，也只有收攏於此，才能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其次，政治社會意味着民族國家是一種政治共同體，而且，也只有將民族國家整合、形塑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才能享有良好人間秩序的功能，進而也才可能塑造出這一秩序的

自我期許的善境。換言之，成形而愜意的政體，充沛的公共政治空間與奠立於此的完備的政治秩序，可欲的國家權力的基本結構，以及關於公共權力的來源及其正當性的論證，凡此種種，構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構件，也是政治社會的基本藍圖，而為民族國家這一宏大人間秩序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制度條件。就此而言，中國百年轉型所要奮力達臻的，正不外乎此，而仍然有待努力的，同樣不外乎此。

再次，由此推展開來，政治社會所提供的秩序願景意味着一種關於國家形態的完整制度安排，其將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統括一體，蔚為特定文明秩序下的國家形態和人間秩序。也就因此，「政治社會」意味着民族國家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和倫理、文化的共同體。在政治自由主義的意義上，其理想狀態是實現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威的平衡，經濟生活與政治秩序的恰當分際，個人幸福與公共福祉的相輔相成。協調、中和政治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各宗，其理想境界，借用兩位當代西哲的話來說，不外乎羅爾斯式的「自由與平等的個人在公正條件下進行社會合作」的社會想像，以及德沃金（Ronald Dworkin）式的「追求理想的人生」的政治道德理想。也可以說，就是一種憲法政治景象。鑒於中國的大陸式國家傳統下行政獨大的黨國體制國情，在此進程中，需要留意的是如何更多地防範公權力一家坐大，確保公民私權，避免出現濫用公共利益之名侵

害市民社會。同時，特別是需要更多地汲取諸如英國近代立國的智慧，記取十九世紀中葉後德國式理路的教訓，以確保個人自由，賦予公民自由以切實的法權安排和程序正義，將在中國實踐「政治社會」這一源自歐洲近代早期的概念的努力，同時變成一個落實憲法政治的進程。

第四，「政治社會」作為一種民族國家秩序下的總體制度形態，意味着凡此國族具有明晰的政治自覺，充沛的政治熱情。此時此刻，國家不只是一種包括公與私、經濟與政治、國民與權威的容器，而且，國家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存在。也就因此，「政治社會」在強調經濟與政治分際、市民生活與政治權威各守邊界、奉守寬容和多元文化，以及法權安排的中立性的同時，拒絕市儈式的政治短視和普遍的政治冷漠，鄙視一味沉湎於私性生活的市民階級的庸俗和放逐對於政治、法律的自然法追問的墮落。對外而言，它意味着對於國族利益邊界保持清醒的警覺，同時又懷持普世情操和大同理想，持守「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政治自助體底線倫理和天下情懷的統一。

第五，如果說十七世紀地中海文明以還、下迄十九世紀的歐洲首先致力於一種「政治社會」的建構，然後在此基礎上循時應事，次第開闢出市民社會與多元文化等新型價值理念和生活秩序，換言之，由「政治社會」這一級問題和一級秩序衍生出後來的二級問題和

二級秩序的話，那麼，中國此刻可能恰恰相反，需要在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基礎上，經由進一步選擇和整合，提煉出自己的總體的制度形態，特別是可欲而愜意的政體形態。它們匯流合聚，共同促成中國政治社會的誕生，形成憲政之治下的國家能力，完成將近兩個世紀的文明形態轉型這一歷史任務。⁶

職是之故，其方法論進路相應的不能只是近代學科分際下的科際性研究，如形式主義法學，功能主義政治學，汲汲於統計、圖表和數據的精確性的經濟學，特別是訴諸西方想像的「後」什麼，而必須訴諸一種全域性的宏大視野。換言之，西方近代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路，可能是一種更為可欲的工具。「發展經濟——社會」這一整體性思考，特別是「政治社會」概念，提供了一種可欲的致思工具。正如百多年前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所言，「使國家從野蠻轉變到文明，從弱小轉變到強大，尤其重要的是使它獲得長期生存的保障，這些都是政治任務。要完成國家的經濟發展，為它進入將來的世界集團做準備，這卻是一個政治經濟學任務。」

六、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

說到這裏，必須對「小康社會」概念略予理論回應。在中國奮力完成此一「政治經濟學任務」的百年進程中，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後，「小康社會」概念於晚近三十年間應運而生。究極而言，「小康社會」是一個更具中國文化色彩的概念，其所懵懂指向的社會願景，似乎展示了一幅中國人世代追尋的愜意家園景象與美滿人生訴求，含混而動人，不知所以卻充滿溫馨。它所提供的意象，或者，引發聯翩想像的，或許還要加上炊煙裊裊、牧童歸牛的人間秩序元素，而讓身處轉型進程、飽經屢次折騰的億萬國人為之動容。作為一種理想社會願景，這一概念似乎一度努力要成為一種新型意識形態，或者，作為舊有意識形態坍塌後的暫時性替代品，而為中國人生引領方向，並為現實政制提供政治願景。但是，細加推敲可以看出，這一概念駐足於小農經濟條件和市民社會層面，基本不脫農耕條件下的簡單「衣食」願景，滿足於一統秩序下的太平景象，絕無有關類似於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公共性追問，更無人類精神向度的深究。而我們知道，現代大型社會的存續，恰恰以公共性為前提，靠分享着的價值來維繫。因而，其之不足以擔綱「政治經濟

學任務」自不待言，無法恪盡現代意識覺醒後的公民個體自我定位的需求，難以滿足政制的政治託付，因而，很快喪失其道義和社會感召力，同樣不出意料。

正是在此，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作為一種理想社會形態，也是一種人生境界，不僅可以拓展人間秩序的公共維度，而且，更重要的在於豐富和昇華了社會建設的德性內涵。不是別的，正是「正派」和「良善」的價值取向與人格型範，有助於避免經濟社會對於人格意義的着意模糊，沖淡市民社會的腐敗和市儈，防範政治社會消隱生命尊嚴的生存意義。因此，它們其實彰顯的是一種共和主義價值，即致力於共善的政治共同體同時不可能不是一種道德理想，而且，不可能不是一種蹈揚公民理想和公民美德的生活形態。在此理想之中和形態之下，公民的尊嚴、人類基本的道義感和普世的公義觀，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恰恰應為全體社會成員高懸理想和一切制度安排的鵠的。而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市民社會，也無論是公民社會抑或政治社會，其落腳之處必定是也只能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是別的，所代表的就是這種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可能，正是在此，秉持共善理想的共和國恰可能意味着同時必定是一種「福利社會」，即一種時刻以社會公正來拷問經濟成長，而將效率的盤算與公正的追求恰予平衡的體制安排。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秉持市場理性絕不等於放任社會貧富差別無限擴大，更非等同於放棄社會公正和均富共善的人道理想。

從而，它意味着就刻下可能有的「路徑依賴」而言，理想的社會也許存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體制的取長補短之中。

還需指出的是，在上述自經濟社會到政治社會的序列中，經濟社會和政治社會是現代國家的核心構成要素，蔚為人間秩序的基礎。不論是洛克一脈的「市民社會先於或者外於國家」敘事，還是黑格爾理念中的「國家高於市民社會」理路，都不曾改變或者否認凡此兩者作為現代國家形態的核心構成要素的性質和地位，更不曾扭轉中國以「國家轉型」為路徑依賴的現代國家成長進程中，國家藉由政治發育市場，從而最終走向政治社會這一總體趨向性。實際上，總體而言，晚清以還，中經民國政體，包括北洋時期在內，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歷程也是政治強力推導市場發育的過程，由此才會產生「政治和市場」的各自邊界的問題，也才會出現經由法權鋪墊來釐定二者進退的當下努力這一「三十年改革開放」。通常而言，無論東西，現代國家建構均具有人工理性的特徵，而社會和經濟的成長具有更多的自發性。即便如此，就現代中國的經歷來看，國家建構的相對超前性意味着它必然早晚擔負起發育市場和建設社會的責任，在引導它們良性發展的過程中營造現代國家形態。反過來，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增強，擴展了國家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供給。如果說清末以還，迄而至今，特別是「人們共和國」的前六十年，國家建構意味着以政治強力推

進國內一體化，甚至直接下海博弈，從而為國家作為一個市場經濟的單元鋪墊秩序基礎的話，那麼，此時此刻，強調政治與市場兩分這一政治社會主題，營造現代政體，就愈顯迫切，而構成了自此以還未來三十年的努力方向。¹³

註釋

* 本文原刊於《戰略與管理》2011年5-6期。

1 當然，這是僅就百年中國的總體歷史取向和主流政治意志而言，並不排除特殊時段的特殊情形。例如，姑不論「文革」，即就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間來看，中國經濟大幅下滑，其間一個論調是，「如果發展經濟的結果是連政權都保不住，還不如不發展。」

2 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計生政策，對於中國的人生倫理造成了嚴重衝擊，長期以往，遷延數代，甚至將會負面性地改變人性。「九十後」們在不知兄弟姐妹為何物，乃至於未來的一代將在不知叔伯姑舅為何物的家庭中長大，不僅意味着宗親感覺和交往關係的缺失，構成人生完滿的倫理之維不復存在，而且，它可能會造成人性的倫理性顛覆。而自由主義的原子式個體原理之不足以造就幸福人生，也不恪良善生活的需求，早已為生活本身所證明。因此，重建中國社會必須將倫理重建納入自己的行動綱領，其理至明，尤顯迫切。

3 因此，法律之不應損害倫理，一如倫理之不應悖逆道德，否則，均為銷蝕自家正當性的自殺行為。以此觀之，二零零九年上演的重慶打黑案件，特別是節外生枝的「李莊案」，折射出了諸

多訊息。其中，當下中國社會的基本倫理和信用關係慘遭塗炭，得為重要一則。因為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構成，必以基本社會關係及其信用為基礎。基於血緣倫理的「信用」之重要，自不待言。除開它們，尚有一些基本關係，牧師與懺悔者之間，醫生與患者之間，師生之間，律師與被告之間，同為基本的信託關係，得謂這個社會的基本關係。它們不僅構成了這個社會的基礎，蔚為秩序的基石，輕易不能破壞，而且，其所涵育的人類基本情感，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更是萬萬不可羞辱的，雖法律而避涉，雖公權亦不得染指。凡此基本信託關係，奠定了社會的基礎，在賦予相互信任，羅織互惠關係的同時，為此人世營造了一方避難之所。破壞這一信用關係，就是破壞社會本身，不僅整個社會勢必蔓延着普遍的不安全感，而且，這個社會自此不再是個具有穩定預期的社會，則於社會之禍，害莫大焉。參詳許章潤著：〈有法律，不恐懼〉，以及〈保衛社會，建設政治——再論重慶「打黑」及李莊案〉，載《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第2版），頁205-220。

4 有關「政治社會」這一概念的西方理論源起及其理解上的國別性差異等情形，參詳高全喜著：〈論政治社會〉，收見氏著《現代政制五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頁204以下。

5 杰弗瑞·布倫南、詹姆斯·Z·布坎南著，馮克利等譯：《憲政經濟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3。

6 因此，不難理解，人們之所以對於「國進民退」的反市場化傾向倍加擔憂，就在於時至今日，藉由國家政治強力推導國內市場經濟的進程已然基本完成，剩下來的問題是政治退出經濟，而將經濟的歸經濟，從而最終劃定市場與政治的界限，讓「中國」成型。就此而言，大幅度的「國進民退」不僅意味着反市場化，同時，還是一個逆政治社會進程，從而，妨礙了「現代中國國家建構」這一歷時兩個世紀之久的社會歷史轉型根本任務的最終完成。有關於此的不同看法，參詳崔之元：〈國進民退在全世界普遍出現，國資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稅收，藏富於民〉，載見www.wen.org.cn（「人文與社會網」），最後訪問日期2009年12月20日。

第二十四章

重申「經濟社會」

「中國社會」承載着多重社會結構、多種社會屬性和多元社會要素。簡言之，就當下中國語境而言，在實然、應然和可欲等三個維度上，它至少包括並遞次呈現為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政治社會與正派社會等諸項「現實與願景」。本文僅就其「經濟社會」一項，略陳管見。

鋪展現代國家體制，汲汲追求並最為看重的是所謂「國家實力」。表現為增強徵稅能力以拓展財富，進而落實為強化國防以足以抵禦外侮，乃至拓殖海外。凡此兩項，牽連互動，無論是在現實主義政治立場看來，還是從歷史主義視角審視，均為「立國」之大端，而必自「經濟社會」起步。就經濟社會最早成形的西歐近代國族的歷史來看，特別是就英國的個案而言，市場經濟的發育、內政的一體化、政治秩序的建構和國家間政治之同時登場，四位一體，緣由在此。這也就是所謂的經濟立國、政治立國和文化立國的遞次推進，由此形成國族的實體。其形態，其成果，如果討論的是英國，則為「經濟英國」、「政治英國」和「文化英國」；如果是中國，則為「經濟中國」、「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由此可見，經濟社會和經濟立國之大致位置及其重要性了。

所謂「經濟社會」，意味着社會的本意在於創造財富、分配財富並享受財富，財富意志就是權力意志，也就是全民的心智，蔚為人世生活的基本槓桿。就此而言，它與古典國家形態下的倫理社會劃清了界限，也與教義立國的宗教文明秩序迥然異趣。在此命意和歷史維度上，吾國古語所謂「天下熙攘，皆為利來，皆為利往」，道出的實為有關於此的一般世態，也是此種世態之下的一般情態。而自一九七八年以還，晚近三十年倡言「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謂循沿經濟社會的路子自覺邁步，接續的則是清末「變法圖強」運動中之「追求富強」的「現代化」脈絡，也就是「第一共和」政體下的經濟政策。的確，砌築國民生產和消費的一般經濟政治學條件，從而使整個國家變成一個經濟共同體，進而塑造其政治共同體品格，蔚為經濟社會的基本稟賦。市場經濟之逐漸生成並蔚為國民生產和消費的主導性機制，也是一種較具優勝性的經濟秩序，緣由在此，不得不然。它不僅意味着結束自然經濟、小自耕農一盤散沙的狀態，而且，在肯認政治與市場、國家和社會基本分梳這一原則之下，卻又形成了凡此因素的積極聯動機制，真正是「既分工，又合作」，造成的是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為生存而進行的經濟鬥爭」之同心同德，¹ 國家遂成一巨

型公司也。所謂市場就是戰場，可謂不言而喻。其利其弊，均在於此。此種情形，經由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洗禮，以強力政治為背景，西人在國家間政治方面簡直是游刃有餘，讓後發國家捉襟見肘，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而甚至終究有苦說不出。當年西洋列強武裝殖民之際情形如此，今日情形雖多改善，但就主導權審視，大西洋兩岸聯手互動，整個世界依然未曾出此格局。

由此，轉進一層，緊隨着政治與市場分梳、國家和社會兩清之後腳的，便是區別組成「我們人民」的「市民」、「國民」與「公民」之不同位格及其訴求，經濟共同體由此可能登堂入室進位於政治共同體。不是別的，正是「市民」這一「我們人民」的原型之一，構成了經濟社會的基本主體，也是經濟社會所要處理的核心主題。「市民」的需求、心性和趣味，「市民」的抱負、憧憬和心智，成為經濟社會的源起動因，映現着現代以來的最為一般的人性。而民族國家的「政治成熟」，依然如同韋伯所言，也就是它們對於民族的永久性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的明曉和領悟，以及在所有情形下都把這些利益置於任何其他考慮之上的能力，² 為的還是這一群叫做「國民」的市民大眾的利益和福祉。所謂「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不外乎就是「富強」二字。倘若取之有道，統馭有方，則伴隨着「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於內政上向「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的遞進，有可能邁進於「文明國家——

文化政治」之境。³緣此，市民明晰自己的國民身份，進而有可能秉付公民的認同。

放寬眼界來看，私權及其法權體系的編織，創造和運用財富不僅是權利也是義務的新型倫理和法律觀念之成為國民意識，進而成為公共理性，都是順延着這一脈線索，丁一卯二，逐漸生成演變而來的。更深一層的命意則在於，人性本身天然逐利，不如因勢利導，以國家為單元，索性按照經濟共同體的法子過日子，以國民之均富實現國家之富強。清代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說儲」之慮，「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⁴由此庶幾乎得免於萬一。內政的一體化、世界市場的形成、首先表現為經濟一體化的全球化，以及社會和政治的世俗化進程，凡此種種，無不緣此而來，並順此前行。

回看歷史，無論是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還是英吉利和法蘭西等通常所謂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抑或美利堅、德意志乃至於俄國、日本等後發列強，「建國」的第一步都是首先形成內政意義上的經濟共同體，鍛煉其「經濟民族」的品性，進而再可能發育成長出「政治民族」的訴求，最終形成政治共同體格局。無此利益紐帶，難以調動市民熱情，不可能促動國民熱情，進而生發出政治向心力，助力於政治進程。相反，正是經此轉折，「民族」逐步進境於「國族」，倫理共同體獲得了自己的經濟屬性與政治品格。因而，結束諸候經

濟形態（如法、德），或者，將殖民地聯結起來實現「區域一體化」（如北美新大陸），構建統一市場，進而擴展、通聯至國家間的政治經濟學安排，均為其建國努力的要義所在。因此，內政的一體化所帶來的市場的統一、勞動力不受畛域限制的流通及與海外市場的溝通，包括原料提供地的穩定，同樣成為「經濟社會」的要求，也是建設「經濟社會」不可或缺條件和保障，而統貫它們的恰恰是一種政治思維，並導向國族的政治能力。在此情形下，現代國家如何使得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兩相整合？怎樣有效地分梳政治和市場的互動，從而形成各擋一面、張馳有度的國家能力？遂成一大難題，蔚為夢寐以求的「成功的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序。實際上，歐西現代國家的產生歷程，特別是「現代英國」呈現於世的歷史說明，實現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政治與市場，恰恰是現代國家建構中首需解決的問題，可能，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而形成市場與政治的並立之勢，社會與國家的「雙強」格局，從而建設國家能力，最終造就於國民的福祉，是現代國家區別於古典國家形態的卓越之處。

因此，總體而言，以經濟理性為綱領，而基於生產與交換關係逐步形成的商品社會，一個國民財富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完整體系，構成了近代中國孜孜追求的堅定目標，特別是「北伐」統一後的「黃金十年」和晚近三十年裏的主流政治意志，也是中國的法制一

意加以建構、維護並着力提供支撐條件的世紀偉業。實際上，如所周知，現代中國的建構過程也就是中國時空範圍內現代市場的誕生歷史，建構現代政治與形成現代市場，是承載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這一機車奔騰向前的雙軌。

二

在全球視野下的近代轉型和晚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語境下來看，凡此市場經濟與經濟社會兩項，既是「初具形態」，則說明尚未最終成形，而問題多多。其中，最大的問題有三項。

首先，「壞的」而非「好的」市場經濟肆虐。此種「壞的」市場經濟不僅無視市場倫理，放縱資本的貪婪，侵蝕德性，藐視法律，而且，以政府直接下場經營為槓桿，以權力的部門化和私性化為渠道，導致權力和市場狼狽為奸，進而形成了刻下最為世詬病的「權貴資本」統治，一種惡劣的「裙帶資本」形態。「掮客經濟」之應運而生，正為此結構性問題使然。的確，不期然間，儘管權力、市場和社會大致分梳開來，然而「市場的專制」和

「權力的專制」卻聯袂而來，卻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也是呼喚市場之後最感痛心之事，實在是事理之中，而意料之外。就此而言，相對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異常政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主旨轉型不僅說明改制「撥亂反正」，自覺回歸常態政治，同時隱含了權力直接下場博弈的內在衝動和現實可能，表達了權力直接「經營國家」的強烈自負，則中國政制固化卻難言最終定型，使得政治依然處於一種非常態情境，同樣是明擺着的事實。

本來，政制和權力的恰切定位不在別處，而在制訂公共政策、提供與捍衛公共產品，以此分梳，逐漸形成現代治理結構下的權力、市場和社會大致分治的格局，而這就是政治，最大的現代政治。如前所述，現代早期西賢所憧憬的現代治理，即此格局也；百年來華夏有識之士踵續前賢，所要具象呈現於中國的現代場景，同樣為此格局也。在此，儘管現代治理不僅恪守國家與社會、權力與市場、信仰與政治的分立局面，而且，超大國家的出現和全球化導致了對於古典政治自由主義的修正，突顯了政府職能擴展的必要性。事實上，經濟問題的政治介入，並以此呼應市場和社會，而構成經濟社會的聯動機制，進而進境於「政治社會」的高度成熟性，蔚為現代人間秩序的極致。即便如此，恪守權力、市場和社會各守本分的基本框架，依然是顛撲不破的現代治道。就此而言，對於刻下中國而言，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退出市場和社會，現代治理早已不復當年原教旨自由主義的設想，

而是各守畛域，卻又形成聯動機制，才是當下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⁵ 正是在此，矯正「壞的」市場經濟恰恰要求權力收斂，歸位至公共政策的提供者、公共產品的維護者的固有行當之中。而這意味着民主和法制必須登場，引導出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諸題。

其次，與上述「整體性權力結構」相應，私人所有權未能獲得肯定無疑的法權地位，特別是地權懸置，釜底抽薪般地傷害着經濟社會的成長，制約了市場經濟與經濟社會的發育，導致經濟社會已然登場卻尚未最終成形。它們不僅未能獲得真正的法權界定，而且，事實上處於隨時遭受侵犯，特別是公權力侵犯的境地。「普天之下」的「國有」屬性使得政府成為事實上唯一的地主，將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型「地主國家」，等於窒息了經濟社會賴以生息的多元產權屬性，使得上述「地方政府的經濟衝動」常常指向地租貪婪。由於私有產權特別是地權懸置，導致大家對於財富安全普遍地無預期感，致使轉移財富，包括經由移民將財富轉移到「安全地帶」，成為新富新貴們的大眾選擇。所謂「安全地帶」，不外乎就是嚴格保護私有產權，具有明確的產權可預期性的發達西方國家。產權及其法權肯認對於經濟社會的基礎意義，由此再度獲得了證明。在此情形下，與中國不斷增持世界首富美國國債相映成趣，居然出現了一種發展中窮國向發達國家巨額輸財的悖論。千呼萬喚始

出來的《物權法》之不完全物權規定、《民法典》之遲遲不見頒行，正是此種格局的反映，也只有置此背景下才能理解。

由此也可以看出，產權制度不僅職在保護財富，同時具有創造財富的功能。正如筆者在〈地權的國家德性〉一文中所言，地權是憲制的基石，包括地權在內的市民的財產權是國民人格的構成要素，而構成了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基礎。⁶ 所謂市民社會生產與消費的一般關係及其條件的制度化，首先和主要的就是私有產權的確立，由此實現政治與社會的清晰分際，在培育財富主體的同時，形成主權的主體和主題。由此而有經濟社會和市民社會，進而有政治國家。因此，就當今中國而言，啟動地權確認的進程，將財富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原理落實為政治國家的法權安排，就是在為憲制打夯，而為自由立基，將「我們人民」的主權坐實，實現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法律共同體的政治統一體位格，而首先是落實其為一種經濟共同體的各項安排。

再次，城鄉分治，導致一國兩制，根本性地傷害了經濟社會的成長。有關於此，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已經多所指陳，近年來沿海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和部分都市化快速推進地區的城鄉一體化實踐，也就此出台了一些因應性的政策性舉措。僅從經濟社會視角落筆，筆者意欲闡述的是，「城鄉分治，一國兩制」根本性地阻礙了民族國家範圍內的經濟一體化進

程，導致民族國家作為一種經濟共同體之命運共同體的預期落空，不僅傷及經濟，更主要的在於傷及社會。甚而言之，它在造成一半以上的國民位列二等公民的大眾印象的同時，導致他們的國家認同困惑，以及因為絕望而產生的怨憤心理、反抗衝動和一定程度上的離心傾向。因而，此種分治格局不僅敗壞了國民情操，而且根本性地證偽了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本來，經濟社會形態的出現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晚近之事，也是所謂「現代化」的表象和結果，因而，城鄉一體化格局僅見於少數發達國家。中國既以現代富強之國自期，則無法迴避此一進程。「現代化」意味着以城鄉一體化來實現經濟一體化，進而將民族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禍福同擔、利害均霑的經濟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如同社會的發達是國家富強的標誌，也是其條件，以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為標誌的現代人世秩序同樣是構成現代國家形貌必不可少的構件，而為愜意人生和宜居生活的條件。特別是將「農民」和「市民」統一於「市民」位格，平等對待，始望發育出國民人格和公民精神，最終才能形成「人民」共同體，並以此奠定現代政治正當性的切近基礎，為其提供一個預設終極解說力的神性淵源。

三

置此情形下，作為國家理性指向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法制旨在促成統一市場，並在統一市場的發育過程中，形成生產與交換的一般政治與法權條件，尤其包括主體平等的政治和法權安排。如果承認歷史生成的物質生活條件本身創造了自己的法制安排的話，那麼，經濟社會的法制形態必定是、也只能是與之匹配的法權體制。換言之，舉凡經濟社會所標舉的經濟理性、主體平等、意志自由、契約神聖、對於產權的嚴格法律保護以及經營自由、消費自由等等，均需接應上自己的法制安排，落實為規範主義的實體規定和程序操作。循此思路，大約而言，經濟社會所要求的現代法制形態至少包含五大要素。

經濟理性人預設與個體主義的法律人類形象

法律以個體主義的人類形象為預設。據此預設，此處的「人類形象」指的是彼此陌生之人，一種個體主義的原子式存在，而且是一種明白並懂得趨利避害、將自我利益做無限擴大化的理性人。從政治自由主義立場觀之，他們不僅是法律的受眾，同時並應為立法者

本身。應然而言，正是這一主題引導着市場通向政治，將市場中斤斤計較的理性人變成秉具公共關懷的共和國公民，力避市場和權力的雙重專制，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遂興焉！

產權意識、產權關係及其法律保護

今天我們常常將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現代人和現代意識等掛在口上，說明凡此有別於古典時代與古典國家。的確，從經濟社會和市場經濟法制維度來看，僅就「現代意識」而言，「產權意識」蔚為大綱，構成了其間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階級意識、產權意識和權利意識都是現代意識，而產權意識的萌發以現代市場經濟的發育為基礎，以經濟社會為存身的條件。產權關係和產權意識要求現代法律提供對於產權關係的有效保護，特別是對於私有產權的法律保護，明確其除非基於公益目的，否則同樣「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在此，產權不可侵犯、契約神聖和意志自由，連帶而出，三位一體，構成了經濟社會的私法理念體系。實際上，凡此經濟社會安排及其催生的經濟民主，埋伏了政治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實際歷史而言，先發國家正是以此經濟民主，生發出並有效保障了政治民主可能性，兌現了政治民主的現實性。經此安排，國民既是財富的辛勤創造者和正當追求者，

而且是財富的合法消費者與生活的當然享受者；國家權力與國民財富達成良性互動，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互為基礎和條件，從而有可能一體訴諸各自抽象一體性的法權安排及其總體性法權安排——政治正義與憲法政治。

在此，不動產特別是地權的私法確認，所彰顯的不僅僅是經濟社會的意義，實際上，更多提供的是一種關於國民生息的基本可能性的信息。就是說，對於它們的確切無疑的肯認，昭示的是民族國家決意擔當基本生計安全提供者的政治意志，表達的是它確有可能履行此種擔當的政治能力。無此擔當及其表達，等於意味着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政體設計通盤破產，國民有可能並有權利另覓一種保護形式。就此而言，對於不動產特別是地權的私法確認和公法保護，是這個叫做民族國家的現代人類棲息的政治屋頂與生俱來的天然使命。

契約神聖、自由與正義

市場條件下的交換自由、經營自由和消費自由，要求主體平等和交換正義，要求法律遵循相應的市場經濟理念和消費社會價值。法律的基本功用在於一般性地提供分配正義，特殊性地落實校正正義，普遍性地保護交換正義，具體性地祈求結果正義。⁷ 而正義，正

是正義，在經濟社會的意義上，首先並大量地體現為各種可得衡量的實際利益。因此，藉由法權安排，特別是程序性的可預期性，將正義兌現為可得衡估的實際利益，是經濟社會背景下現代法制自我實現的基本理路。同時，主體平等是實現正義的必要條件。

經濟差等與階級意識

基於經濟差等而來的階級意識，要求法律提供社會正義，並且以法律正義，特別是程序主義的法權安排來彰顯和實現社會正義。同時，開啟政治協商大門，允許社會經由自我組織來彰顯政治正義，進而以此來看護和彌補法律正義的缺憾。正是在此，不妨說現代法制是政治的晚禮服，其所統籌服務的是整體的政治社會架構，一種「現代的」人間秩序。「階級意識」復萌而非「社會分層」認知，反映了社會大眾對於貧富分化的敏感及其烙於大眾心理的傷痕，值此努力趨向「常態社會」和「常態政治」的今天，未為利好消息，但卻無法迴避的社會事實。

公共稅收和公共財政

稅收和財政不是單純的經濟或者財政問題，而是屬典型的現代憲政課題，早已成為一種常識。特別是公共財政相伴於市場經濟而來，屬憲政體制下的服務公眾和市場政府經濟行為，而且，恰恰是一種「限政」財政，也是一種在社會公共領域秉持公開透明原則行事、非盈利的政府經濟行為。其收支進退，聽命於以代議體制為依憑的權力機構，而非政府獨家了斷。正是在此，憲政體制和公共財政一體兩面。就刻下中國而言，推動憲政體制自公共稅收和公共財政起步，不失為一條可欲的途徑，再次佐證了自經濟社會導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註釋

- 1 有關於此，參詳許章潤著：〈國家建構語境下「社會」的中國意義〉，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11年第5/6期，頁101以下。
- 2 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收見彼得·拉斯曼（Peter Lassman）、羅納德·斯佩

爾斯 (Ronald Speirs) 編，閻克文譯：《韋伯政治著作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頁17。

3 有關國家建構和國家理性譜系中凡此三種國家和政治形態的分梳，參詳許章潤著：〈國家建構的精神索引——今天中國為何需要省思「國家理性」〉，載許章潤、翟志勇主編：《國家理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頁3以下。

4 《荀子·王制》第九篇，《尉繚子·戰威第四》，《說苑·政理》。

5 作為一起個案，中國政商兩界、學術和傳媒等各方圍繞着「稀土」做文章，可謂適例，並將成為經典案例。從遍地開花式的開發、競相低價賤賣、了無經濟戰略和國家安全意識，到逐漸明白稀土的戰略意義和政經意味，適度有效管控，並理節健全地應對國際買家，反映了這個國族對於國家最高經濟利益的覺悟，以及調動所有資源的「聯動」機制的走向成熟，而這就是經濟社會的特徵，也是政治社會的標誌。

6 參詳許章潤著：〈地權的國家德性〉，載《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2期，頁104-119。

7 具體論述，參詳許章潤著：〈法律正義的中國語境——一種關於正義的程序主義法權進路〉，載《戰略與管理》2009年第5-6期合刊、2010年第1-2期合刊。

第二十五章

摧殘社會，必驅致一邪魅人生

或曰，後發國家，危機者三。曰「主權危機」，曰「社會結構危機」，曰「個人自由危機」。具體就百年中國的立國進程來看，一種歷史解釋認為，綜理百年，首在解決主權危機和國家建構，與此同時，照顧社會，建設社會，從而有了今天這般光景。從今往後，從容邁步，不妨多多關照人權，也不妨得閒照看一下後現代的某些錯亂與危機，修整一下無主彷徨和意義失範。照此解釋，百年變遷，左、右兩翼威權政體前後接續，彷彿均依此行事，而等因奉此者也。

若在規範意義立論，此說固無可議。但若謂實然，不免有違史實。朋友，揆諸百年中國，自民初而至國朝，無論何種政體，用心用力，事實上一直都在摧殘社會嘛！不是消極於未曾扶持社會，而是積極於罔顧社會、摧殘社會也。前半段，國共兩黨水火不容，砍斫不休，以「黨治國家」集聚力量，拿社會開刀，而為政治開路。介入程度有別，方式方法不同，而理路和目的並無二致。中國社會之凋敝，士紳階級和倫理結構之毀滅性覆亡，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進而，長遠觀之，庶幾乎可望諒解。德位恃立、理勢二分的中國式治道，以高蹈理想指引卻又深蘊於世道人心的自然法式政道，以公道為正道的政治

正義，經此磨劫，幾乎消弭無形。成王敗寇的霸道政治文化、粗厲不文的鄙俗做派與尊崇「成功」的勢利商業風尚，如鬼火憧憧，遂忽閃於神州。

就民國治下而言，雖說一九一九年後新文化運動多所衝擊，但因改制無力，且需應對割據，一時間分心無術，因而鄉村社會基本得以暫避，所受破壞較小，基本社會結構及其義理脈絡尚能多所保存。不過，國民黨從來不曾死心，藉由新生活運動和地方自治，以及保甲連坐體制安排，一心要佔領鄉村，同樣因為面對內憂外患，邦國政治轉型未久，積蓄有限，力所不逮而已。時當一九三〇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曾喟言，此刻儻論地方自治運動，無異於「莫大的苛政」，¹ 原因在此。

與此同時，中共在鄉村製造階級鬥爭，對於西洋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一理論偏鋒心領神會，活為利用，當作嵌入鄉民生活、徹底打翻鄉治結構，從而藉以翻騰政治契機的抓手。其之利用人性隱曲，正視大眾苦難，倡導社會革命和政治解放，進圖政治目的，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其後，更於位尊九五，大刀闊斧，在城鄉兩極徹底摧毀傳統倫理。雖欲「破舊立新」，而新舊脫節，新制強悍卻無道德根基，社會遂散了架子，只能依恃一統政治維持。特別是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等於取消數千年鄉制傳統，將文化中國連根拔起，真正是

翻天覆地。而生民凋敝，餓殍遍野，傷天害理，為兩千年國史所未見。社會自此不復存在，鄉民村社更是淪落至悲慘掙扎境地，率獸食人，至今未曾復原。

因此，衡諸百年中國文明的重建歷史，其進程，其軌跡，不妨說，多半時光，不是在建設社會，而一直在摧殘社會，無所不用其極矣！儻論左右威權均以建政立制和作育社會並舉，要麼是理論瞎子，見不及此，要麼是罔顧史實，另作他圖。

本來，上述三大危機迭現，而解決次序有別。可惜，既是後發追趕型國家，「世代重疊」使得「時間叢集」，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紛至沓來，一國之內，「世代」紛亂如萬花筒。期間，孰先孰後，誰重誰輕，雖說講究得很，卻又不遑細究，常常是手忙腳亂之後回觀反思，始覺次第錯亂，卻已回天無力了。從而，就立國進程所當處理的諸般重要主題而言，國家建構與社會重組齊至，追求主權與保障人權並來，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攪成一鍋粥。它們輻輳於「當下」，激盪於「此刻」，一時間俱湧心頭，沒法按部就班，只能摸着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但就這麼走過來了，過來就過來了，無法重頭再來，唯餘遺憾夾雜着慶幸。

不過，話說回頭，雖說在此時段中歷史進程自有主張，人的意志空間有限，但是，還是有一些基本底線。觸及底線，將使一切行為，哪怕是初衷良善的政制設置，徹底失去正

當性。譬如，對於基本人倫的尊重和護持，任何政制措置均不能以傷害和摧殘家庭及其倫理結構為代價，有關人類尊嚴和社會大眾維繫基本生存的社會條件等等，即為底線所在。否則，以摧殘社會和戕害基本人倫而求特定政制之伸張，結果不啻毀滅人生意義，這日子也沒法過，人世頓成地獄。這時節，任何儻論美好生活 and 理想願景的說教，要麼是眼睛瞎了，要麼是虛偽透頂，要麼是沒心沒肺，或者，狼心狗肺。

二

或謂，所以摧殘社會，旨在聚集資源，提煉「國家能力」，類似於政治生活中施行「民主集中制」以提煉和集聚政治意志，旨求統一步調，綱舉目張，「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其勢也必然，其情也憫然，其理也煌然，而其效昭昭然矣。

然耶，非耶？捨卻此途，寧有他徑？

此事說來話長，牽扯廣大，難以一時講清。自一面而言，上層政制自顧不暇，無以照拂社會，任其凋敝，在轉型國家的語境下，自可理解。前文說百年期間，政制擺佈社會，「長遠觀之，庶幾乎可望諒解」，正是就此並且僅僅就此而言的。實際上，自清祚崩潰，中

國社會便如草蒿，幾乎自生自滅，無人收束。但因數千年生聚，儒學教養深厚，早已濡化至於民間灑掃，一切早有定制，但凡政制橫力未及之處，尚可善自維持。橫向比較，但看今日「失敗國家」的情形，不僅敗在政制窳敗，而且敗在社會發育程度有限或者競無社會可言，情形多所不同，不可混為一談。迄至常態發展時段，則政制多所放手，守住提供公共產品底線，任由社會發育，更是一般通識。除非政制本來就想壓在社會頭上，謀取自家私利。實際上，正是近代自由主義學思之運作，才使得政府變成了一個龐大而深具侵略性的力量，早成社會的異在結構，自反面說明了健全有力的社會存在的極端重要性。

另一方面，倘若擺佈竟至於摧殘，甚至是毀滅性摧殘，則雖然集聚了「國力」，但何嘗不是適足以削弱了「國本」呢？難道非如此不可嗎？本若不存，所謂「國力」要它做什麼？又往哪裏投放？以聚集資源，提煉「國家能力」為憑，在某種意義上，如轉型政治和功利政治的意義上，當然振振有辭，但其傷及根本，卻也是上述「意義」難以轉圜的。實際上，拿人命不當回事，目為數目字，儻言「國家這麼大，哪天不死幾個人」，使任何意義都失去了意義。若說時當國難，譬如抗日戰爭，救亡動員，沒法不「特事特辦」，顧不了那麼多，似乎有理。殊不知，國難之際的「動員」和「參與」，恰恰是社會伸張之際，也是社會意識的覺醒，民眾的國民意識和公民覺悟的自我啟蒙，意味着中國之為現代國家

在社會層面扎下了根。歷史早已證明，八年抗戰聚攏萬眾一心，「現代中國」浴火而生，終於掙扎出一個雛形。此與常態時段動不動拿社會開刀，某些地方看上去好像有些相似，卻屬絕然不同的兩回事，同樣無法混為一談。

三

由此鋪展開來，將眼光放遠，在「國家與社會」這一西式格局中立論，不妨說，任何以摧殘社會來「集聚國力」的做法，都是反歷史的，非政治的，更是不人道的。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夫德·吉爾茲等人開題研討，會後輯集刊行，其中一篇文章〈新國家，舊社會〉，對此多所申論。² 塞繆爾·亨廷頓據此申論，指認英國是「新國家、舊社會」，造反立國的老美恰恰相反，是「新社會、舊國家」。³ 殖民地人民外放兩百年，起伏生聚，體認到皇權之下有自由，因而，問題只在改變國家間政治意義上的政治庇護制度和封建依附制度，削除貴族與平民的身份溝壑。近代以還，美國是唯一先有社會，而後立國的大國。與之相對，母邦英國「光榮革命」後率為天下先，將一個叫做現代和現代政治的魔靈引入人世，於上層建築標領新潮，於歪打正着中「僥幸」建立起一個現代國家。

美國人在此整整晚了一個時段，還誤將都鐸王制允為「先進」，架設於新社會之上，而形成「新社會、舊國家」的格局。可外打正着，誤打誤撞，後來就是別開新局，說明形勢比人強，老話並非不能解釋新事。但無論新矣舊矣，社會與國家之各有畛域，兩相搭配，決不容政制之摧殘社會，則為不二準則。

回顧這段往事，亨廷頓教授，保守主義政治哲學重鎮，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不禁喟言：什麼是美國總統？不就是「民選的皇帝」嘛！一個全世界最有權勢的民選的帝王也！⁴可見，說來說去，不過是想闡明，建設新制，集聚「國家能力」，並非一定要決絕摧殘社會不可也。相反，國力定須奠立於社會基礎之上。社會發育，民間有力，則國力不請自來。

說到百年來的中國轉型，真正容忍社會的復原，不再折騰社會，民國政體始自遷台後的「土改」，大陸實際是從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自此以後，大規模、有目的的摧殘沒有了，好歹予生民以喘息。私人，一個新型的社會物種，逢時而生，任你折騰吧！不過，也沒有完全放開，或者，完全沒有放開。相反，至多在經濟交往、市民生活和倫理領域，往後退卻幾步而已。這不，反壟斷未見效果，壟斷有理論重又甚囂塵上矣！那邊廂，曾幾何時，渝州打黑，首拿社會開刀，其「鏟豪強」、「禁絲竹」，不僅漠視個體慾

望，取消市民社會，而且，消滅私有資本的同時意味着拿下文要說的「經濟社會」開刀。這是極權主義的理路，試圖將權力覆蓋整個人世。前兩天一位社會學家儻言，建設社會須從法制起步。我說他在扯淡，因為社會建設當從自由放任開始，政治建設和國家建構才是法制的用武之地也。

按照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講法，「美好社會」是一種具有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社會願景。其中，儘管取向多元，但是，諸如個人自由、保障基本民生福利、種族和民族的平等、和平與寬容，以及分享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卻是不可妥協的指標。⁵ 它們既是美好社會的內涵，又無一不是以社會的健全為條件的，因而，給社會鬆綁，任社會隨人性而發展，正表明政制自信，而政治有德矣！

四

說到底，所謂的「社會」或者「中國社會」，至少包含六重結構、六個層面。換言之，刻下的「社會」，其實應該是「六個社會」的複合體，才算合乎實際，進而，也才算合情合理。其於理想人世和愜意人生，乃至於「國力」，均缺一不可。

第一重結構和第一層面，是「經濟社會」。當年，約翰·穆勒他爹，老約翰即已揭櫫，「經濟社會」以國民財富的創造、流轉、分配和消費為主軸，是社會之為社會的基本功能所在。其以經濟理性和互惠原則自立，講求的是人生在世過日子的基本條件。無此功用，則生計無從落實，人群無以凝聚，社會無由誕生，所謂的國家更無法存續和發育，往好處說，不過是一個空架子，往壞處說，只能是強加的桎梏。

第二為「倫理社會」。畢竟，人是倫理的產兒，終生終世，圍繞着倫理打轉，起居於倫理是人獸之別，也是人生的意義。具象來看，則血緣、親緣的家庭生活及其義理結構，形成了以人情為紐帶的人世格局，鋪天蓋地，無所逃遁。人之為人，幾希處就在這麼點兒人倫。如果「親不親，階級分」，以黨性取替人性，不是夫妻反目，就是父子相互揭發，我們還怎麼活！抽卻倫理之維，則人世不復為人世，人生頓成地獄。也就因此，公權力輕易不要進入倫理社會，容忍其自治自愈；更不能罔顧親情、友情和愛情，以與人的基本情感作對為尚為榮。正是在此，左翼極權體制將倫理附屬於政制，以摧殘倫理來伸張權勢政治，中西遍觀，可謂創巨痛深。

第三是「市民社會」。其之適應人人皆為一種私性存在之需，滿足人人皆可享有私性個體之福。如史家所論，退一萬步，使民各遂其私，實為國之治道也。「皇帝以天下為私

產，因亦徇天下人之私，使之自營自遂而不相擾，則此私產安矣」。再說了，「只循一身一家之計，不顧他人之私計，則為私；推其只循一身一家之計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使其一身一家之私計，則為公。」⁶ 因此，洗腳洗澡，搓食搓麻，任其去也。看官，將多餘的慾望打理進公共下水道，不僅是在向人性低頭，更是在順應並提撕人性呢！當政者應當樂見人民沉湎於私性幸福，而庸常人世恰恰不能沒有私性幸福。日常生活就是私性幸福，最為常態的生存樣態。在私性幸福中，其為市民。一個合格真實的市民，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守法國民和忠誠公民。可能，正因為追求這一私性幸福，他們才會時刻關注並轉而奮力追求公共幸福。因而，公權力同樣不要輕易進入市民社會，任其自娛自樂也。

第四是「公民社會」。市民是一種私性存在，藉由公益心、公共關懷和政治意識的昇華，往前邁步，便進益為公民。其之置身公共空間，秉具公共情懷，具有體認和激揚公共理性的善根，蔚為保持社會良性存續的根本。「社會」本身即意味着公共事務，「眾人之事」，因而，如何打理，光有政府和國家不夠，還要公民出場，由此形成全體公民基於橫向聯合的組織化生存，一種政治生活方式。其情其勢，蔚為公民社會。舉凡各種社會團體，不管是NGO還是NPO，亦無論「天則」抑或「地維」，只要基於公民的橫向聯合，

自由組合，守法致公，聲東擊西，均當樂見其成才是！朋友，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平天下從來都應當是為了公天下，對於公民社會，同樣需要容忍的雅量，任其自主自強也。

第五是「政治社會」。其於政治與經濟、市場與國家、社會與個人、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凡此大框架，均恰予分際，多釐清講明，使得政制及其政治張馳有度，圓融無礙，實現邦國的政治成熟。在此，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互為表裏，維新和守舊各循其轍，民主和法制各盡其責。國家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存在，意味着凡此國族具有明晰的政治自覺，充沛的政治熱情；同時，拒絕市儈式的政治短視和普遍的政治冷漠，鄙視一味沉湎於私性生活的市民階級的庸俗和放逐對於政治、法律的自然法追問的墮落。對外而言，它意味着對於國族利益邊界保持清醒的警覺，同時又懷持普世情操和大同理想。政治社會是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的最高形態。當今世界，只有少數「成功國家」臻達此境。當年，德國歷史學機弗里德里希·邁內克申說德意志必須自「文化民族」進境於「國家民族」，馬克斯·韋伯則呼求一種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國家精神人格，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此於小國寡民，譬如安道爾，或許並非大經大法，但於吾邦華夏這樣的浩瀚文明，若要成為可欲的「大共和國」，則無論如何都是應臻之境。否則，沒法活。因而，對於政治社會，需要有意照拂，促其自覺自立也。

至此，第六重結構和層面，呼之欲出，此即「正派社會」，或者，「體面社會」也。有吃有穿，能歌能哭，還不行。理想的社會應予人人體面，滿足公義，蔚為一正派人間、良善人世也。酒足飯飽不等於尊嚴，人的尊嚴尚有更高境界，包括獲得平等的關切和尊重，享有參與政治和組織化生存的權利，等等。此為社會的至上善境，也是營造愜意人生的基本條件。因此，正派社會就是體面社會，就是良善社會，而首先是一個予人以尊嚴感的社會。大家因為感受到尊嚴，因此依附不捨，你說，這個邦國是不是天下無敵！

當今華夏，以上六項，前三項程度不等，多半已成實然，後三項則有待發育。俟其完工，終成善果，則祖國是家園，中國即人生；中國為一人，天下為一家。那時節，夫復何求！夫復何求！

否則，摧殘社會，必驅致一邪魅人生。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於清華園家中

註釋

- 1 參詳梁漱溟著：〈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載《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5卷），頁241-244。
- 2 參見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 3 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校：《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107。
- 4 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校：《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107。
- 5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著，王中寶、陳志宏等譯校：《美好社會：人類議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2-5。在這本小冊子中，加爾布雷思並提出，「美好社會」尚需滿足三個經濟指標：提供必需的消費品和服務，確保生產及其使用、消費不會對當前公眾總體的安康造成有害影響，確保不危害後代的生命和健康。具體論述，參詳該書頁69以下。
- 6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76、182。

第二十六章

現代社會與法科教育

因着全喜教授的安排，今天下午得有機會聆聽兩位對談者的高論，並且，因緣際會，幸將本人最近有關這一主題的思考和盤托出，盼望大家分享，期待各位指正。

我完全同意衛東教授的介紹、籌劃和分析，對於他的努力和憧憬，也多懷同情。實際上，季教授不僅闡釋了中國法學教育在當下可得採行的改革措施，描繪了它們未來可能展現的前景，而且，對於我們全體法學從教人員，在心智、心境和知識結構上，都提出了挑戰。特別是衛東教授在交大法科主持的教改實踐，以個案努力的形式，迎應了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對於法學教育及其研究的布局要求，相信將會在整個漢語法學教育圈產生影響，並給大中華文明範圍內的法科教育提供借鑒。

我於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日遵囑入院，手術結果是切除肝臟十公分，摘除了膽囊，體重喪失十三公斤，自此最討厭的一句話就是禮贊某人「有膽有識」，也不願意聽到「肝膽相照」這一成語，因為在下這輩子再也達不到這一境界了。開個玩笑，聊將心緒流轉，且為思緒開道。出院以來，身體乏力，神思疲憊，文思盡散，心思闌珊，頗有萬事皆休之感。因此，十多天前志勇君告知我這個演講主題，既為全喜教授的安排感到興奮，同時也為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此時間段裏與兩位教授順暢對談，頗多擔心。也就因此，十多天來，

我一直在思考究竟要從何種進路切入來展開論述。剛才聽了衛東教授的闡釋，證明所慮不虛。

我想，既然講談主題是「現代社會與法科教育」，那麼，至少可以採用兩種進路。一種進路是，首先分析和總結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特別是中國近代語境下「現代社會」的基本特質，以此為據來分析這一社會形態需要什麼樣的法制形態，再切入到凡此法制形態需要什麼樣的法學形態，從而最終論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學教育和法學人才，基本循沿此種致思次第，丁一卯二，逐層展開論述。雖然說「現代法制」是伴隨着「現代社會」同步產生的，並且是後者的一個重要向度，所謂「社會」即自然包含了自己的法制安排在內，但是，此種歷史邏輯性並不排斥上述進路的理論邏輯性。相反，對於它們的釐辨和分析，我相信，反而有助於認清各自的特質以及二者的關聯。

只是，思前想後，復覺這一進路確實頗多缺陷。其中，除開可能較為空泛之外，最為主要的一點是邏輯起點的非歷史性，進而最終不免可能導致的研究結論的非邏輯性。就是說，既然是「現代社會」與法科教育，而非「現代國家」與法科教育，那麼，在高研院院長全喜教授的運籌帷幄間，選詞命意，必定是斟酌再三，決不至於容忍混淆。而歷史來看，「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頗多重合之處，若自現代社會基本特徵入手，難免將二者

混為一談，以致眉目不清，甚至以國家代社會，誤社會為國家。同時，「分析和總結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這一作業失之疏闊，流於宏觀，難以切實推導出法科教育的因應性思路，也是應當避免的歧路。特別是對於「基本特徵」或者「基本特質」的刻意尋求，有可能造成一種本質主義的還原論，反致模糊了「現代社會」的映像，切斷了我們思考「現代社會與法科教育」的可能性連接通道。

有鑒於此，決定另尋他途。今天我採取的這一進路，係從層次論和類型論的角度切入，通過逐項解析近代中國語境下「諸種」現代社會的特質，釐清它們所要求的法制形態與法權安排，過渡到對於法學的知識形態和理論形態的分析，再進而論及法學人才和法學教育諸題。因此，這是一種以「層次」和「類型」為緯，而以上揭論述次第為經的致思理路。雖說仍屬宏觀性觀照，但較第一種進路已然具體而微，因而具有較大程度的可操作性 and 因應性。特別是「層次」和「類型」貫通的是法制層次及其類型的固有形態，不僅於兩方架設了對接之處，而且，為省視二者的互動，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視角。

我們知道，「社會」一詞與「政治」、「政府」或者「國家」相對應，就當下中國語境而言，它至少包括並遞次呈現為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政治社會以及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等諸項現實與願景。實際上，就晚近中國的歷史邏輯來看，它們啟

自市場經濟的發育，已然遞次登場，最終也必將導向政治社會的成長，從而統一於「當下中國」，匯入中華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洪流之中。說是「願景」，則各項安排尚有待落實，才能自心中走向生活，進而變成生活本身。

一、經濟社會及其法制形態

近代中國的第一要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即在民族自立基礎上建設具有主權位格的民族國家，所謂「救國」、「建國」者也。欲使這一國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進境於富強文明，則增進經濟能力、創造財富是基礎。實際上，現代中國的建構過程也就是現代市場的誕生歷史，建構現代政治與形成現代市場，是承載現代國家建構這一機車奔騰向前的雙軌。政治與社會的交纏在此，國家和市場的交集與分際同樣在此，演繹了百多年間晚近中國的一脈主題。

西方現代國家的產生歷程說明，實現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政治與市場，恰恰是現代國家建構中首需解決的問題，可能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而形成市場與政治的並立之勢，社會與國家的「雙強」格局，是現代國家區別於古典國家形態的卓越之處。

置此情形下，現代法制旨在形成統一市場，並在統一市場的發育過程中形成生產與交換的一般政治與法權條件。有一句話叫現代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雖然失之於簡單，卻不失其真理性。

大約而言，其所要求的現代法制形態大概包含如下要素：第一，經濟理性人預設與個體主義的法律人類形象。其基本立腳點是法律以個體主義的人類形象為預設。第二，產權意識、產權關係及其法律保護。第三，市場條件下的交換自由、經營自由和消費自由，要求主體平等和交往正義，要求法律相應地遵循市場經濟和消費社會的價值理念。第四，基於經濟差等而來的階級意識，要求法律提供社會正義，並且以法律正義，特別是程序主義的法權安排來彰顯和實現社會正義。

由此，這一法制形態所要求的法學形態和法科教育，以「他們」為主體，而以他們的「利益」保護和規制為主題。通常所說的「民商法學」佔據了法科知識的核心地位，遂為天作之合，（中國語境下）「民商法專家」們相對「撈金」多多，亦且順理成章。所謂的「民商法學」，包括我們今天所講的一般民法學、物權法學、債權法學、商法學、稅法學、知識產權法學及其程序法學等等，構成了現代法學教育尤其是英美法系的法學院科班教育的基本知識內容。作為「現代社會」及其政治自由主義的制度形態，其所秉承的多為啟蒙立

場，持取的基本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法制觀念，並於晚近半個多世紀的磨礪進程中羈入了諸多的福利國家元素和社會建設要求。

進而，如果說這一基本內容是基於內政條件下的經濟市場生活的一般條件而來的，那麼，內政條件下的經濟一體化之向外推展，必然催生和造就國際博弈和全球治理條件下，基於經濟交往全球化而來的相關的法律規制。由此，國際私法、國際商法、國際經濟法、海洋法、海商法、WTO規則等等，成為現代法學教育的另一重頭戲。

中國刻下法學院所教授的「民商法學」，如同其他法意，源於舶來西學。就其源流而言，它們本諸近世西方的自由主義市場理念及其政治訴求，積累自對於中世以還歐洲民商事實踐的長久細密的觀照。至少在歐陸的法學譜系上說，它們曾經是並且必然是一種充盈「激情」的法學思維，也是一種富含「理性」的法學智慧。而就英美一系列的傳統來看，所謂「理性」的法學智慧，尤值允當。想想吧，曾幾何時，自由的「主體」及其「意志」對於人身依附關係、諸侯藩籬的沖決，將世界聯為一體，使得個體的心靈全權主宰自己的身心，該是多麼的決絕和驍勇。而它們居然落實為繁密細緻的法理邏輯，一如偉大的漢唐律典對於倫理關係與宗法體制的條分縷析，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但是，問題在於，同樣正如漢唐律典的精緻作業可能演變為泥化的則令，「民商法學」的創世紀並不能保證它不蛻變為一種

純粹的「致用」之器，甚至只是一種「撈金」之具。此非唯中國，今日「西方」亦然，而吾土尤然矣！本來，一旦市民理念和自由主義政治訴求肉身化為法律規則、私法理念具體化為「民商法學」，其「實用理性」乃至於汲汲於世俗欲求的本性，便不受遮擋地獲得了一盡情宣示的制度契機。迄而至今，中國法學院課堂上「民商法學」幸而不幸地變成為一種純粹的「打官司」技巧，有助於就業和謀生的工具理性，正為這一歷史過程的必然結果。因此，就此處經濟社會這一主題而言，不說回歸西方啟蒙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整體性觀照，至少，相應的法意不能失去對於自家這一演變歷史的自我意識，而保有一份對於那種「激情」和「理性」的絲微體認，是防止「民商法」的逐金性，避免民商法學成為「撈金術」的並非完備、但卻必須的思想操練。畢竟，因着整體性的中國社會的世俗化和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刻下中國法學院的教育品格太過卑下，太過實用，太過赤裸裸地宣揚追金逐利了。

回到前面的主題，這樣一種將內政條件和「國家間政治」條件下的法律規則作為法學教育的核心的知識體系安排，追本溯源，原因在此，也不得不在此。而它們均深切地關係到現代人類對於自身的重新認識，對於人性的再定位。正是在此，下述倫理社會的存在自有其必然性，對於它的體察和護持，特別是對於它的因應性法制安排，成為遭受「現代」

掃蕩後的法制和法學不可迴避的作業。對於中國現代法學而言，因其基本理論和知識多為經由文化移植而來的西方法意，包含了歐陸和英美的雜拌，因而更具現實意義。

二、倫理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首先，倫理社會這一命題講述了社會是由「倫理」和「利益」所構成的這一基本事實。它在承認現代人世的經濟稟性之際，提醒我們這一世態的倫理性，而後者同樣是維繫其存續的基本屬性，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基本屬性。的確，人類首先是一種生物的存在，同時，因為人類採行了「社會」這一集群生存樣態，而社會不過是由「社會的人」組織的網絡，首先是一種基於人倫並維繫着人倫的網絡，注定了人類及其社會均為一種倫理的存在，自有其倫理譜系。作為一種先天的規定性，一種宿命，我們不能不是人子、人父與人夫、人妻，它們先驗地決定了我們不得不活在倫理之中。同時，其他種種基於人倫的聯誼，如友誼和師誼，同樣為人世生活和圓滿人性所不可或缺。凡此種種，正為對於此種屬性的最為基本的說明，也是對於此種譜系的最好的展示。此時此刻，當我們說自己是一種

「倫理的存在」的時候，不知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是否注意到，在下頗為動情。因為「倫理的存在」突顯了我們自家的高尚與困境，講述了自古以來人之為人、人類之為一種社會性存在的幸福與不幸，道盡了人世之為人事的家園的希望和絕望。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人與人之間之所以命運相連，並且我們常常說，「是人就難免有感情」，「人心都是肉長的」，就在於並說明了我們是一種「倫理的存在」。一切均緣此而來，而首先，並且也是至為重要的是，它們決定了這個社會是也不能不是由倫理和意義及其規則所構成的。今天我們說建設「法治國家」或者「法制社會」，又或憧憬於「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以及「民主社會」與「開放社會」為奮鬥鵠的，均無法拋開社會的倫理屬性，不可能無視「倫理社會」這一人世家園的基本屬性，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

其次，置此情形下，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鑒於中國社會自「五四」以來傳統倫理慘遭塗炭，進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道德困境這一世態。重建倫理，包括重估中國社會的傳統倫理信條、恢復固有倫理、迎納新型倫理和承認普世價值，不僅構成了晚近十多年間中國心智的重要作業，同樣也是此刻法律從業者的重要職責。它們伴隨着晚近中國社會的重建和發展進程，並且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的立法進程，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司法程序對於規範的選擇性認知。轟動一時的「蔣倫芳案」和「彭宇案」，其間新舊道德的牽扯糾結，社會

價值與社會態度的折衝，鄉願和德性的衝突，均為對此互動關係的絕佳說明。

說到近代史上中國傳統倫理不幸遭受的衝擊，可用「歷經浩劫」來形容。首先是清末「中西古今」交匯之下，西方倫理對於中土文明的衝擊，一時間「天塌地陷」，自此中國精神罹患上分裂症，迄今未痊。然後是一九四九年以還中國式馬列主義共產思潮的洗禮，它既是「西潮」的偏鋒和延續，又是自出機杼的土產，真正是摧枯拉朽。第三波衝擊來自一九七八年後的「改革開放」，尤其是一九九二年啟動的市場經濟的滔天大浪。其之接續「第一共和」的市場取向的高調宣示和政治路徑的潛在姿勢，一時間中似乎重演了一遍「天塌地陷」的歷史活劇，將市場倫理與道德倫理的衝突，推展為全民性的日常個體實踐，無論廣度還是強度，均為中國近代史之前所未有。凡此種種，對於建設「新中國」蔚為必須，竟至於居功至偉，但於中國社會的倫理結構之毀滅性打擊，幾至於災難，同樣無庸諱言。遠的不說，但就計劃生育政策這一「現代舉措」而言，它至少導致了「中國代際結構上倫理性的殘缺不全」。請今天在座的同學，凡不是獨生子女的舉手（在場的一些同學舉手）。喲，不少人啊？看來農家子弟不少，或者，少數族裔同學居多啊！不過，總體而言，在你們這代人中還是只佔少數。恭喜你們、祝賀你們、祝福你們，你們的人生從一開始就保有了相對完整的倫理結構，而其他人則無此幸運，處於「倫理結構殘缺不全」之境。為

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無手足之情的體察，這一代或者未來一代亦無「叔叔」「伯伯」可叫，這不是「倫理結構的殘缺不全」，又是什麼！也就因此，扯遠點，不妨說倫理社會這一命題使得社群主義與儒家倫理可能在此刻及未來的中國社會多少有點用武之地。說白了，除了「單位」、「政黨」和「國家」，人人都需要一種切實具體的社會性歸屬感，對於此種歸屬感的回應和照拂，同樣是現代社會和現代法制的重要作業，也是它們得以鋪展的重要基礎之一。畢竟，破字當頭的急遽轉型時段已過，日常政治正在登場與必將登場，至少是社群主義意義上的倫理社會和社會倫理，重新成為人們的情感需求，也是社會的自我療傷，而日益顯現出其現實性，自是順理成章。

從法制形態來講，倫理社會不僅尊重法律和道德兩分的現代通則，而將倫理歸位至私性生活之域，在個人私德與公共德性、私性生活和公共生活、私心所向與公共理性之間做出嚴格區分，而且，同時要求法律以不傷害人倫為底線。換言之，「不得傷天害理」，既是人事的底線，也是法律的內在倫理。實際上，自古以來，一切法律的合法性都不僅在於不得違反道德，而且在於合乎人倫，積極護持人倫。正如「法律不能做不可能之事」蔚為法律之一般法則，法律之不得傷害人倫，構成了一切法律的底線倫理。一切法律之所以蔚為人間規範，就在於它們以人倫為基礎，以人情為法理合法性的準繩。否則，悖情逆理，即

無合法性可言，也就無有效性可言，法制云乎哉！因而，法律不得損毀人事倫常，力避社會分裂與人生倫理的殘缺，這應當是現代法制的基本要義之一——哪怕它是什麼再「現代」不過的法制。

在此，如何接續中國人倫日常與法制通則，一百多年來已然多所努力，而有待努力之處仍多。舉例而言，夫妻、父子得相為隱，夫妻、父子得免於當庭指控對方犯罪之責，既是古代通例，也是現代法制曲為護持之人倫要求。畢竟，相較於損傷人類至愛親情之害，其為公民的舉證與指控之責任，實在概屬末端。再如，與上述「計劃生育」政策的法律效應相反，孝道是一種基於人倫的人情，也是一種表現為人事的世事，更是一種立基於倫理的法理，作為我們關於贍養和撫養的法律規則的一般價值基礎，再妥帖不過了。同理，誠信作為一種價值原則和道德信條，構成了從民商法到其他一切法制的現代信用關係的一般價值準則。去年發生的「李莊案」之令人驚駭與反常之處，正在於它違背了此種信用關係，無異於以個案的「榜樣力量」，導致法權體制這一公共領域中基本信用倫理的解體，自無合法與正當可言。

就法學形態和法科教育而言，基於倫理社會這一社會屬性的要求，審其基本價值取向和進路，可能下述四點蔚為大綱。

其一，關於法律的人性基礎。法律人和法學教育應當對於法律的人性基礎做出深切的體察。我們愈是深切地洞察人性的幽暗，人性的善惡一體，我們就愈發地感覺到運用法律調節社會關係和人世生活之至艱至難。人性之趨利避害趨向，基於人性惡而努力驅導人類向善，既是現代法律的基本功用，也是法律人看得造福社會的工具理性。法律不能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不能做人類心性和心智所不可能企及之事，凡此應當成為法學教育的通識。諸位，順說一句，每當夜深人靜，獨處斗室，捫心自問之際，在下常常不禁彷徨而尷尬：相比於探索人性、梳理倫理、致達公平正義的學術和思想，法學學術根基太淺，道行有限，因而，愈發感到法律人體味和洞察人性之必須。

其二，也就因此，現代法制和法學不可迴避的法律與人情、人性和道德的關係。

其三，基此而來，我想申論的是，倫理社會的一般法理必須重申法律就是人情，法理就是情理，也就是道理，而終不違天理這一恆久恆新之理。用清代皖籍大學者戴震的話說，人情之纖細至微處即為法理。再說一遍，法理就是情理，也就是道理和事理，一言以蔽之，法理是我們過日子的最普通的通識，如同法律本為一個民族的活法。

其四，在此意義上，「天理、人情、國法」三位一體的義理結構，真是一種絕妙、精湛、通融和深刻的安排。隨着齒德愈增，在下以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矣！真實既講政

治，又講人事，把政治和人性連起來一起講，講得是如此天衣無縫。也就因此，伸而論之。法律不是科學，而是藝術；法理不是科學，而是藝術。諸位，對於人性、人類情感和人類的內在生活的深切體察、同情的關照，此於「中西古今」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當下，依然是必要作業。

三、市民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市民社會與經濟社會、倫理社會相連，而與公民社會相對。我們暫且不去理述西方語言中對此如何表述，此處且從中文的語境觀照，略予闡述。大家知道，每個人作為倫理的存在和社會的存在，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同學們，任何人都要上廁所，因為我們是「生物的存在」。任何人都難免關心自己的健康，因為我們是「社會的存在」。任何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難免產品抑鬱不平之氣，而生發出致公天下、造福正義的衝動，因為我們是「政治的存在」。除此之外，他可能也會想到，哎呀，身乏體困，需要休息一下；窗外蟬鳴，怦然心動；路見美女，滿心歡喜。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七情六欲的存在，而

這構成了市民社會深刻根由。

概言之，市民社會就在於滿足我們的「私性」方面，而我們每個人首先所獲得並且將終身擁有的恰恰是一種私性生活。朋友交往屬私性生活，家庭親情也屬私性生活，個人感情的波瀾更是私性生活。瞧呀，對面長腿短裙的MM來了，油然悵惘：為何不晚生二十年？見衛球教授氣宇軒昂，少年有成，必老有大成，這時不免幻想連連：要是衛球教授是未婚青年該多好呀？這就是私性生活嘛！私性生活是我們人生的避風港，也是我們每個人真正能夠享受人生，甚至是使人生獲得意義之處。就此而言，不妨說市民社會就是庸俗社會（不帶貶義），一種庸常的市民生活世態，也是一種温情脈脈的市民生活情態，

私性生活破解了世界的無世界性，甚至於助力破解了政治的無政治性。就中國的具體情形而言，它道出了經過壓抑人性、抹煞人欲的「疾風暴雨」之後，政治放了社會一馬，一起共同回歸人性基本面的社會重建故事。其所造就的一個社會景象，也是最令我感到欣喜的一個結果，就是當今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一八四〇年以還，至少從一八九五年以還接續奮鬥的過程），出現了一種叫做「私人」的新型人格形態和新型社會存在，也是一種新型生命形態。此種人格形態和社會存在，庶幾類似於阿克曼所謂的「私人公民」，表徵為今天你們這一代二十來歲左右的人為代表的人身徵象。私人

是私性生活的主體。私人不是「公家」，不是公民，是私人，但也是公民，淡定自若的公民。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格形態和生命形態。我們這一代人有時免不了會問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不再慷慨激昂，而比較「淡定」。同學們，原因就在於我們不是私人嗎？相反，我們這輩人，是過去政治年代的餘孽。同學們，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遺老，也是自由主義精神的餘孽。而私人這樣一種新型的人格形態，正在你們身上出現。私人所要求的是私性生活，因此隨它而來的法制形態就必然是關於私性生活的答案，一種現代規則。也就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法律不外乎是過日子的法子，所以我常常說，法律是一種活法。

重申一句，法律是一種過日子的活法，讓「開門七件事」安全而踏實的法子。置此情境下，舉凡社團管理、交通規制和食品、藥品衛生管理的法制，諸如器官移植、個人隱私和人格權利的法制，以及滿足私性欲求的規章，如²¹之管理章程、賣淫嫖娼的規制，等等，均為其法制內容，而同樣要求法學教育做出自己的回應。

四、公民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公民社會與市民社會相對應，講述的是一種較高層次的社會政治秩序。首先，它意味着在容忍和保衛私性生活的同時，滿足人性中的利他衝動與公共需求，以公民共同體的自我組織化生存，在市民社會與公共權力之間形成一個間架性結構，既為其緩衝，又為其聯結，而恰成一道促進雙方各守其份的屏障，最終致力於可欲的公共生活。其次，公民社會奉行相互承認法權，尊重公民的集體行動及其聯合權能。在此，公民共同體的組織化生存，決定了公民結社的正當性，其中，其最高形態是訴諸政黨政治。藉此最為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公共關懷，構成了現代公民政治的最大特色。由此順流而下，集會、遊行和示威等集體行動是他們聯合權能的實現機制，也是彰顯其公民位格的分享着的公共表達方式。

公民社會的法制形態致力的是公共政治空間的法權安排。如果說市民社會旨在承認人是一種私性存在，應當享有私性生活的話，那麼，公民社會旨在滿足和弘揚人的公共存在性，提供具有公共性的公共生活。特別是基於對於濫權和暴政的慌惕而編織出來的一整套公法體系，蔚為公民社會的基本制度形態的核心內容，既立基於公民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基

礎，並且以捍衛公民的政治經濟學願景為鵠的。這一公民的政治經濟學宣告，「人民」於「立憲時刻」登場，「公民」則奔走於「立法時段」。而他們才是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因此，公民社會的起碼標誌是具備自《憲法》而至各種政體組織法的完整體系，特別是有關公民結社、遊行示威等聯合行動權能的法制體系。也就因此，體現上述法權安排的完整而豐沛的公民政治與公法學，是現代法科教育的重要內容。

就此而言，如果說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和市民社會及其法制形態所着力營造的是市民生活方式及其法制調節的話，那麼，公民社會及其法制形態所指向的乃是社會組織方式及其法制調節，更多地在於規範政府和國家等公器定位及其合法用度。凡此種種，無不旨在滿足公民對於優良政體和國家良治的憧憬，而立基於對於公共生活和公共理性的深刻體察。

前述「經濟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部分，曾有一「經濟理性人」云云。在此尚需補充說明的是，現代法制的人類形象預設的不僅是一個趨利避害、將自我利益無限擴大的理性之人，而且，還需肯認，他／她同時是一個具有利他傾向、秉持公共情懷之人。所謂理性，如果僅指經濟理性，而獨缺公共理性，非唯片面，亦且有害。說片面，是因為它遺漏了現代國民的公共性格，正因為秉有此種性格，所以國民才進境為公民，國家這一倫理共同體進益為政治共和國。說有害，是此種赤裸裸的密爾式個人，不足以支撐共和的

天下。而個人的存續、發展和幸福，恰恰不僅需要個體主義的打拼，而且需要共和家園中無數康德式個體的合作。倘非如此，不僅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無望，就連倫理社會和市民社會也沒有存續的人性可能性。也就因此，公民社會的存在對於現代法制提出了不同於純粹「經濟理性人」的人類形象預設，而聯動於並坐實於公民行動與公法體系。

五、政治社會及其法制形態和法科教育

首先，政治社會表明的是這樣一種秩序狀態，即它旨在於現代民族國家框架內，提煉和建構一套整體性的秩序形態和制度框架，一種基本的制度形態，即一種「立憲的政治經濟學」安排。其為一種「立憲背景」，處理的是民族國家屋頂下人類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旨在為人世生活鋪墊基本的制度形態，蔚為國族生活的「大經大法」。因此，它所要總體性地調理的是多維、多層級和多向度的錯綜互動，涉關國家與社會、市場與政治、權力和權利、民族與族群、內政與國家間政治，等等。

其次，政治社會命題意味着民族國家是一種政治共同體，而且，也只有將民族國家整

合、形塑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才能享有良好人間秩序的功能，進而也才可能塑造出這一秩序的自我期許的善境。因此，它必然意味着國家是一種公共政治空間，而政治之本在於經由一國人民永久和平意義上的公開博弈所獲得的正當性論證，基於公民的行動——實踐的不斷印證。

再次，政治社會所提供的秩序願景意味着一種關於國家形態的完整制度安排，其將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統括一體，蔚為特定文明秩序下的國家形態和人間秩序。也就因此，政治社會意味着民族國家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和倫理、文化化的共同體。在政治自由主義的意義上，其理想狀態是實現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威的平衡，經濟生活與政治秩序的恰當分際，個人幸福與公共福祉的相輔相成。

最後，國家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存在。意味着凡此國族具有明晰的政治自覺，充沛的政治熱情。此時此刻，國家不只是一種含括公與私、經濟與政治、國民與權威的容器。也就因此，政治社會在強調經濟與政治分際、市民生活與政治權威各守邊界、奉守寬容和多元文化，以及法權安排的中立性的同時，拒絕市儈式的政治短視和普遍的政治冷漠，鄙視一味沉湎於私性生活的市民階級的庸俗和放逐對於政治、法律的自然法追問的墮落。對外而言，它意味着對於國族利益邊界保持清醒的警覺，同時又懷持普世情操和大同理想。

從上述內容可知，「政治社會」是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的最高形態。當今世界，只有少數「成功國家」臻達此境。就中國而言，對於政治社會的追求早於辛亥「第一共和」之際即已進入中國心智的思考之中，而且，自覺或者不自覺的，百多年來的國家建構實踐所不斷指向的，就是這一社會形態。但是，從以上鋪陳還可以看出，它尚未成為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現實」。本文開篇第一段就說，在「實然、應然和可欲」等三個維度上，「社會」至少包括並遞次呈現為經濟社會、倫理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政治社會以及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等諸項「現實與願景」，之所以特地拈出「願景」二字，就在於對於當下中國來說，「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二項，均尚未成為「現實」，乃「願景」也。

政治社會要求現代法制提供公共政治空間及其法權安排，着力營造體現一個國家的政體張力和一個國族的政治成熟的政制與政治，建構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相配套的公法體系和程序共和國安排。同時，基於國家間政治的背景，因應大國成長的要求，將全球治理、國際法治和人類的永久和平與內政安排統籌考量。

在此，晚近以來儒學界和政治哲學界提倡的「新王道」應當納入法學研究和法科教育的視野，而造就法科學子打開大合的心性和宏博悠遠的心智。也就因此，理述現代政制和政治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講述現代國家誕生故事的「國家理性」，應當成為法科的選修科目。

六、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

「正派社會與良善生活」這一命題旨在豐富和昇華社會與社會建設的德性內涵。我們知道，上述各種社會形態，自經濟社會而至政治社會，分別狀述了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特質和內在屬性，而均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點。作為一種生活樣法，倘若它們不能營造一種正派的人間秩序和良善的人世生活，對於「我們人民」來說，則毫無價值。正是在此，「正派」和「良善」的價值取向與人格型範，有助於避免經濟社會對於人格意義的着意模糊，中和倫理社會之太過私性化並防範「鄉願」登場，沖淡市民社會的腐敗和市儈，防範政治社會消隱生命尊嚴與個體位格的生存意義的權力衝動。因此，它們其實彰顯的是一種共和主義價值，即致力於共榮的經濟共同體不能不是公民的辯證法，營造共善的政治共同體同時不可能不是一種道德理想，而且，不可能不是一種蹈揚公民理想和公民美德的生活形態。在此理想之中和形態之下，公民的尊嚴、人類基本的道義感和普世的公義觀，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恰恰應為全體社會成員的高懸理想和一切制度安排的鵠的。

一言以蔽之，正派社會旨在於德性內涵上豐富和提升上述五種社會建設的內涵和品質。否則，則眼面前的教訓就是，例如，曾幾何時，有鑒於集權主義的萬般窒礙和物質匱

乏的生活窘迫，大家呼喚經濟社會和市民社會的回歸。可隨着市場經濟登場，並漸次深化，無德性引導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走向極端，導向了一種短視的、市儈的、一切向錢看的重商主義，讓我們感傷不已。同樣，政治社會的權力中心主義藉由全球化條件下對於國家治理權能的更高要求而不斷擴展，防範此種趨向對於我們生存尊嚴的侵蝕，同樣需要以「正派社會和良善生活」為憑。如此，庶幾乎得能有所舒緩，多少能夠做出些抵抗。

在此，這一命題警告我們不能忽略法制的德性之維和信仰維度。保持俗世法制以超越品格和道德緊張，藉由公共討論提煉法律的公共理性品質，是建設可欲的現代法制的基礎保障。從法源來看，立法民主和立法公開是錘煉法律的公共理性，從而實現公共理性對於立法的規訓的不二法門。也正是在此，近年來民眾對於公共空間和公共理性的關注，不僅擴展了公共空間，提撕了公共理性，同時，它也表明，公共空間的闕如是中國社會的軟肋，公共理性不彰正在妨礙着中國的社會成熟和政治成熟，也有害於中國的法治進程。

由此，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旨在溝通民族國家利益與普世價值，協調個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和社群主義的倫理要求，糅合市民倫理、國民訴求和公民德性的內在關係，而統籌於共和主義的法權安排，一種開放的、德性的、有節制的、審慎的政體和政制。它們構成

了當下中國法政哲學的思想重點，也是我個人近年來一直用心用力之處。我想，因應法律哲學的政治哲學化，它們同樣應當成為法學教育的重要內涵。本書〈政治秩序與良善生活〉一文，對此多所致意，不再贅敘。

註釋

* 2011年4月23日在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演講。感謝高全喜教授的邀請和主持，《經濟觀察報》和「超星網」的協助。其他兩位對談者是上海交大法學院的季衛東教授和北航法學院的龍衛球教授。

第二十七章

保衛和平，才有法治

各位所論，在下均有同感，同時覺得還有另外一脈理路，需要理述，有待展開。為什麼？因為，「中國法治的當務之急」這一命題講的是：如何在現有條件下，將法治作為一個可欲的現代治理方式和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往前推進一層，再落地一尺。刻下「法治中國」之聲嘹亮，而實際情形不如人意，似呈僵局，遂有「破局」、「開局」和「佈局」之議。日前落實有關司法機構人財權力由省級最高法院統籌的設計，也是基此展開，而另有寄託，別有思路而已。

問題在於，法治講的是一國之內，和平條件下的規則之治。避免革命是其中應有之義，落實產權關係、達致黨政權力的平衡，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乃至解決生活方式層面的「過馬路」諸題，旨趣各異，解說有別，而其實均指向如何過一種和平的共同體生活這一共同問題意識。所以，不是別的，和平，正是和平，實乃當下中國綢繆法治「布局」之「急所」也。

細而言之，之所以用「和平」來破題，乃基於這樣六點考慮。

一、戰爭讓女人走開，戰爭更讓法律走開

古羅馬法諺所謂「槍炮齊鳴，法律滾蛋」，實為經驗之談，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無論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還是國民內戰，起因不同，標榜有別，但均以有效殺傷對方的戰鬥力為目標，竭力摧毀其軍事和工業設施，無所不用其極，則無差別。置此情形下，殺人第一，破壞第一，世界成為叢林，還有什麼規則和法律可言？那叫做「戰爭法」的法律，其實是殺人規則，與此刻所言法治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遠的不說，只看一百多年來，但凡戰爭爆發，或戰爭的陰影籠罩之際，則法治輒遭厄運，例證多有。當年，美國這樣一個據說特別法治的國家，在麥卡錫時代居然也有無法無天的行徑，為地球人所熟知，如今說起來不免齒冷，納悶，當時究竟怎麼了，又是為什麼，打算怎麼着。而自美國進入反恐時期以來，囂囂然，驕驕然，法治亦且屢遭侵犯，更是眼面前的事。政客無恥，自有黨派利益作祟，齜牙咧嘴，哇哩哇啦。吾輩隔洋觀火，着眼芸芸眾生柴米油鹽，掛念區區身家性命，則不可不察。朋友，陰暗心理、無端恐懼和敵我思維，選邊站隊的二元對立觀，令政客漁利，而將國家拖入瘋狂。舉國張狂，一派喊打喊殺之聲，不智、不祥、不妙，盛世所不為也。此時此刻，公民自由擱置或者收窄，法治

定會遭殃。除非渾水摸魚，火中取栗，別有用心，否則，哪會如此錯亂，置天下於不顧。

當今之勢，周邊諸國，包括日本，不思悔過，焦灼而急惶，與中國作對，彷彿黑雲壓城。軍備競賽、戰爭烏雲籠罩之際，就是法治中國半途而廢之時。就此而言，「倭寇們」不僅對我華族欠下累累血債，也是中國法治的破壞者。助紂為虐者、把事情搞大乘機渾水摸魚者、逞一己之快而罔顧大局者、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挺能耐而二楞子一般行事者，事同、理同、罪同。

二、為何立憲民主共和國內部沒有敵人

只講到這裏，還沒切入主題。最為根本的，也是今晚在下意欲陳述的主題在於，一個立憲民主的共和國，國家之內，並無敵人，只有違法犯罪者。各位，在立憲民主的共和國，國家是一個公共事業，整個中國是一個公共場所，人民是這個公共場所和公共事業的所有者與主權者。此為大是大非，大經大法，模糊不得。

在此格局下，只有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摩擦，而無一部分人對於另外一部分人進行專政

這種敵對思維。所以，一個實現了立憲民主的國家，在國家政治裏是不存在敵人的，只有違法犯罪者。此不惟針對一般違法犯罪而言，即就所謂「反恐」來說，亦且適合。

就此而言，促使中國成為一個立憲民主國家，向真正的民主邁步，從而在國家政治中消除敵對勢力思維，這是中國法治的「急所」，也是意識形態深層有待解除之桎梏也。

若問為何立憲民主的共和國之內只有違法犯罪者，卻無敵人，就在於經由艱難轉型，此等國家蔚為一大整合有序的政治共同體，實現了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的平等承認這一民主建構和民主的憲政化。此時此刻，因為解決了政權的永久正當性，剩下需要面對的不過是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因而，就國家政治而言，它沒有敵人，只有違法犯罪者。當然，在國家間政治上，只要世界政府和全球正義還只是個理想，則敵人是永恆存在的。這也是國家的自我賦權的合法性所在。政治的本質在於建立主權、提供秩序、區分敵我、劃清公私，前提則在於政治本身是一種通過法律而確立的具有自我主張能力的統治權。此於國家間政治場域，最稱恰切。至於政治統治總是借助法律統治的形式來展開，則主要適用於國家政治；和平時段，它也是強勢的國族，多半是既有國際秩序的獲益方用來施展國家間政治的文明手段，冠冕堂皇得很呢，文雅體面着呢，哪裏只是擗胳膊拍胸脯的喊打喊殺！

三、法治是日常政治下的治國技藝

由此往下推展，中國今天處於一八四〇年以來還沒完成的大轉型時段，換言之，約需兩百來年才能完成的中國革命的長時段還沒結束，有待收尾，萬萬懈怠不得，囂張不得，也急躁不得。既是收尾，則由非常政治轉換為日常政治，堪為選項。值此情形下，我們只能「勸進」，希望拋棄革命思維與革命方式，採取一種和平的日常政治下的治理方式來打理這個國家，來對待它的人民。

日常政治下，最為精妙、最為成熟的治理方式，一種治國技藝，可能也是代價最小的技藝，而最能獲得同情和認同的技藝，不外乎法治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轉變治理方式的問題。今日中國，如果說真有推進法治的誠意，就要放下革命思維，不搞運動，也不搞運動式治理，而當留意制度建設，鋪展新型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畢竟，大哄大起，卻無制度遺產，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陣風過後，容易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反四風」，雷聲大雨點也大，舉國額慶，迄今有效，但無建立在輿論公開等項制度基礎之上的長久體制性安排，一旦上頭鬆口風，則下頭肯定鬆口腔，報復性反撲，變本加厲胡吃海喝。不信等着瞧。實際上，已經悄悄地在反撲了，君不見，高檔餐館的營業額正在「回暖」，流水嘩嘩嘛……

四、政治德性

由此，整個國家治理要講究和平、中道、審慎的品德，不能用鬥爭的方式講階級仇恨與敵我思維。因此，各方合力，促使治國者理性治國，這是政治的永恆事務，也是當務之急。而最為理性的方式，不外乎法治也，一種法權程序主義的規則之治也。審慎、中道、和平與理性，既是政治德性，當為有守有為的政治家所銘記謹行，操切不得。四面出擊、八方樹敵，絕對不是個好主意。

五、民主

再往前推展，則於一國之內如何實現和平，達成一種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格局，從而實現法治？最好的方式不是別的，是民主。

正是在此，問題遂從法治推延至民主。如果問今天什麼是大是大非，我要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如果真想建設法治，請從推進民主開始。為什麼？因為民主要解決權力的永

久正當性，通過讓人民成為主權者，把人民還原為公民，從而作為選民進入公共領域，秉持公共理性進行博弈，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在共和國統一體這一政治法權框架內，施展手腳，不逸邊界。如此這般，「人民」這個集合體，遂成國家的股東，從而一舉落實政權的來源問題。權源解決了，落實了，大家心平氣和了，它就正當合法了，剩下的只是政府治權的行使和運作，用公共財政和公共政策來打理，而無需日日夜夜「維穩」也。那時候，權力的制衡和經由獨立司法來捍衛各方循沿規則之治以各得其所，才能真正給力，也就是法治登場也。

法治是和平文化，一種規則之治，最為核心的部分是對最高權力的限制。如何限制？首當其衝，民主、民主，還是民主。民主解決「權為民所賦」，憲政提供權力的配置方案，法治旨在為它們包裹上程序主義的規則之治。三位一體，榮損與共，而國之治也！

重申一句，所謂和平，主要意味着在立憲民主國家，不再有敵人的概念，不再有敵我之分。經由上述民主設置，解決了政權的永久正當性，則天下安穩，不再需要「維穩」式治理。通過民主代議體制，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權力轉移和交接，則天下太平。中國兩百多年的轉型艱難捱到今天，還沒有完成、有待於可見的未來完工的，就是這一步。在此，革命和戰爭均非首選項目。不到萬不得已，戰爭從來意味着將法律和政治雙重放逐。所以，

和平理性，漸進積累，最終達至民主，實為可能有的較不壞選擇。以暴治暴，則打亂進程，和平灰飛煙滅之際，法治和民主云乎哉！

民主和法治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要件，至於如何落定，孰先孰後，並無千篇一律、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我們看到，比較幸運的國家，多半情況下是先有一個民主的架子，然後逐步填充規則，於接續努力中實施法治。當年美國人制定憲法，也只是確定了一個民主的大架子，其所謂的法治，還不是一步一步，用層累地積攢的精細規則慢慢填充起來。包括三權分立這一憲政架構，其有效兌現，根據一種說法，也是馬歇爾（John Marshall）主政最高法院之後的事情。與此相對，同為普通法國家，而且是一「老美」的文化祖邦，法治和民主的創生其所卻屬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英國約從十二世紀開始，通過確定所有權，特別是地權，通過裁定國王與貴族、佃戶與地主之間的各項產權與侵權關係，不意間先有法治，最後再推行民主。

放眼世界，俄羅斯是一個具有初步民主的國家，但很難說它是一個具有完善法治的國家。像中國的香港地區，秉行法治，卻尚無政治民主。那邊廂，台灣地區堪當大中華地區的民主範例，但其法治狀況似乎相形之下並沒有我們期望的那麼高。至於鄰邦泰國，不缺民主，但缺優質的民主，基本原因則在法治未曾跟進，而根子在於其基本社會、經濟和政

治結構未能完全配合上民主政體。其間，以秦王為首的權貴資本勢力過大。此事無法經由即刻的虛君行動所能奏效，只要等老王駕崩，自有起色，不信等着瞧。說來有趣，民主抗爭繃得太緊，需要軍隊登場暫時凍結民主，恢復秩序，然後再經由大選還政於民，卻未曾發生戰爭和崩潰，說明泰國的基本憲制和民主體制依然管用。

就中國今天而言，通過社會發育所造成的多元化來撬動政治空間，以政治空間為法治提供社會基礎，進而反哺政治，撬動民主的發展，未必完全沒有可能。此處所講社會的多元化，是指在實然、應然和可欲三個維度上，漸次形成倫理社會、經濟社會、市民社會、政治社會和正派社會，最後齊心合力，造成一種排山倒海之勢。各位，俗世層面，社會力量最管用。什麼叫社會的力量？三十年前男女學生戀愛，一不小心肚子大了，天大的事啊！今天小男小女生，唧唧我我，假如發生了這種事，小菜一碟嘛！生了孩子，抱着參加畢業典禮，全場歡呼、萬眾祝福呢！這叫什麼，這叫社會的成長，帶動人心變遷，而造成整體的寬容。三十年前男女學生同居，一話不說「開除」，今天學校據說不支持也不反對，OK，玩兒去吧。這，依然是拜社會成長所賜。

暢想、推崇、宣示一種和平文化與現代政治文明，無論肉食者抑或芸芸大眾，皆無所逃，可得違忤乎？

六、國家理性與公民理性

最後再說一點，往國家理性這邊靠靠，旨在深化主題。諸位，內政一體化的政治共同體格局下，以暴制暴，則天下大亂。和平、理性與文明，講的是公民理性所彰顯的公民文化，堪為立國之本。國家理性需由公民理性來制約，一如以優良政體來承載國家理性，國家才會是國民的家園。它們用力指向不同，都是現代立國的樞機。而法治，正為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之交集契合所在。事到如今，法治蔚為治國通則，本不是什麼大道理。

事實上，百年中國，一直在朝此努力。經濟上的世界一體化，香港昭示的法治榜樣，台灣作為大中華文明圈有機組成部分而將民主落地的實踐，早已為整個中國的民主法治預演。因此，拋棄革命思維，在一種心平氣和的氣氛中推進和平文化，漸次造就公民文化，以公民文化推展法治文化，藉法治文化促進民主文化，慢不得，急不得，正需點滴推進，一步一部往前邁呢！而前提條件正為「和平」也！也就因此，佔東佔西，佔南佔北，都
沒用。

各位，現在許多事情很奇怪，說和做脫節，不只是一個知行關係的事兒。我想，「真誠」是一方面，因為利益在棋盤上，但更多要從制度層面找，要從制度文化的培育下手。

比如，中國高度空前的市場化改革方案要求放權，要求落實包括地權在內的一系列公民權益。但為了推進這一切，有人認為必須依恃高度集中的權力才行，因而出現了集權化態勢。這樣一個緊繃的局面，不自相矛盾嗎？

當前，需要一個廉潔政府打造法治形象，從而為政治合法性加分，但問題在於，法治於此恰恰經常缺位，不起作用；自上而下的政令，看似雷厲風行，有時也面臨「不出中南海」的窘迫。怎麼辦？只好通過集權式、整風式的反腐運動來收束權力。雷霆之怒，立竿見影。可是，整風式的反腐敗運動，本身就是對法治的某種逾越，其得延續乎？而且，反腐本身若無體外監督，也可能成為腐敗的滋生之地呀！從積極的政治期待而言，無法仰恃反腐來破局，已然不言自明；在消極的結構——功能意義上，治理結構的增量改良與制度修復能力，早已喪失或者弱化，正有待於立憲民主從根子上來打理呢，哪裏是反腐所能做到的！這不是說反腐不重要、不亟需、不應該，而是說推進制度文明建設更重要，也更急迫。沒有制度遺產，反腐白反了。這些內在衝突和政制緊張，一日不解決，所謂「法治」之為一個問題，是沒法解決的。

怎麼解決？法學家的思路是點滴推進，和平前行，一點一滴。是啊，轉型時分，牽連內外；進退之間，千奇百怪；不是學好，就是學壞；上上下下，你拉我拽；一朝落地，三樣開態。

只是，首需保衛和平，以雙向承認實現全體國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大地和平，才能有那個叫做法治的治國技藝登場。

註釋

* 本文為2014年6月2日作者在北京大學「中國法治的『急所』」論辯會上的發言。該次活動由《中國法律評論》主辦，參辨學者包括張曙光、任劍濤、賀衛方、董彥賓、鄧子斌。

第二十八章

人性之惡與政制之殤

關於「邵氏棄兒」，最先得知是從《新世紀》的報導，當時看了雖不感意外，卻極受震動。今天聽了張進主編的介紹，了解到有關本案的一些背景資料和未曾知悉的細節，依然心頭震顫。

一個基本的看法是，無論是在德性倫理還是規範倫理的意義上，也不管是基於體制立場抑或個體視角，更無論是以「職務行為」還是「個人行徑」定位，此案之「傷天害理」，在道德和法律面前，一切當事人均無任何辯護理由，當無疑義。而政法體制至今未能有效啟動真切問責，致使國民的公義願景落空，政體德性流失，規範倫理嚴重虛脫，彰顯了既有政體和這個國家的真正危機，也是事關當下國民人性的道德危機。

—

公權力棄置公共產品提供者主角，卻孤自標立經濟主題，蔚為利益主體，明目張膽地服務於自身的逐利衝動，導致逐利行為的體制化，是晚近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也是本案首先講述的當下中國政制生態中的一個嚴重問題。猶如人體潰瘍，見微而知著，此一問

題，將體制公器之惡質化彰顯無遺，乃是政制的潰瘍，也是政治的創口。它們隨着市場進程的深入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囂張而突顯，卻是權力本性使然，「市場經濟」使得它更加原形畢露而已矣。如同剛才張進主編介紹的，計生部門逐利行為的體制化採行兩頭並進之勢：一頭是你超生我罰款，多超多罰，只管罰就是了，先吃一口；另一頭是製造「棄嬰」，倒賣「棄嬰」，再從超生或者「棄嬰」中吃一口。算下來，裏外通吃兩頭賺。所有公共權力部門都有轄地，各有油水，惟計生部門無生產功能，亦無經濟性審批權力，但卻卡住了「人口」，竟然藉此撈油，等於做起了人口販子，真叫人無地彷徨。

此番看似行使公共權力，實則逐利驅動下的公器私用，而且是體制化的一條龍尋租套利，使得公權力、公器的大眾預期徹底瓦解，事實上將「權力與人民」的對立和「利益和人性」的緊張具體化了、地方化了，當下中國化了，或者，「邵氏化」了。在此，可能為迄今的討論者所忽視，實際上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過去我們有句老話，叫做「以組織的名義」如何如何，今天聽了介紹，始知此番「逐利的體制化」恰恰是「以組織的名義」，或者，一體兩面，互為體用。實際上，公然逐利的名頭是「維護國家計生政策」，而且採取了計生幹部、村鄉兩級政府、派出所、相關外事部門等一條龍的公權力配合運作，心照不宣。個人及其牟利衝動經此組織化和體制化而隱匿不見了，一切居然冠冕堂皇，所有的

惡行和交易儼然堂堂正正。所以，它是基於個體的利益驅動而來的，卻又不是個體性運作的，相反的，的確確，是「以組織的名義」，動用的是體制的力量。

更為令人恐懼的是，同樣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組織」和「體制」似乎默許、容忍甚至慫恿了個體「以組織的名義」作惡。是呀，計生工作得罪人，不好做，沒人願意做，或者，是「禿屁股」、斷子絕孫的事，不給他們點甜頭或者寬鬆的政策，誰來幹這份差事呀！就像「火耗」，是大清公然容忍各級官吏的好處，否則，銀子更是上不來。一旦「火耗歸公」，誰都沒了積極性。在此，個體和組織各有所圖，各得所需，相互利用，彼此倚靠，早成利益共同體。計生部門不過近水樓台，靠山吃山，臨水吃水，終拿母嬰開刀，敍說了一個利欲熏心的資本初臨時代、世俗化世態到來的瘋狂時刻，以及個人、體制和德性全面潰敗的中國故事。說是轉型期「陣痛」的表現自然沾上邊，直指政制的失控、腐敗和國民的腐化也有道理，而終究演繹出了當下中國式的惡之殤。

我注意到本案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也是「公權力行使技巧化」的重要進程，就是除開「以組織的名義」外，公權力的體制化逐利行徑採用了某種「法權技巧」。本來，權力行使的技巧化是一種權力的自我現代化現象，伴隨着科層制和官僚制的降臨而來，使得一切個體性、人情化和例外，無所遁逃。置此情形下，比方說，過去計生幹部到你家，

動輒徑直野蠻扒房子，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搶人、打人、關人；產婦不在抓丈夫，丈夫不在抓爺爺奶奶；把他們關起來，看你要人還是要孩子。不少農村婦女是被綁到醫院，強行施行結紮手術的。權力的猙獰面目怒向霍布斯的「雜眾」，毫不遮掩，甚至有意突顯，以收懲戒威嚇之效。據說，少數鄉村醫院發生過將新生兒當場摔死的事件，或者，經由注射某種藥物，使得嬰兒剛出生就「自然死亡」。不少傳聞都講述了鄉鎮醫院的醫生和計生幹部合謀以致孩子一出生就「自然死亡」的故事，相信並非全屬空穴來風。但是，今天我發現，這套野蠻行政逐漸退場，或者，偽飾化了。猙獰雖然依舊，並未全然遮蔽，依然直接進屋搶孩子（叫做「沒收小孩」），但是不少時候，至少就本案來看，卻轉而「技巧化」了，「法權化」了。公然搶奪「棄嬰」的行徑猶然，但多數時候採行了法權技巧。比方說，以「超生」或者未交什麼費用的名義，以及「收養」和「國際收養」的制度文飾和環節，在匿名化、非個體性、體制化的「程序」之下，行反人類之惡行。利益驅動下的逐利行徑就這樣包裹上在他們看來似乎義正嚴詞、合理合法的外衣。因而，「製造棄嬰」與「被棄嬰」，成為這一體制行為的一體兩面。如同莫斯科中央藝術館前公園內的極權主義雕塑園，陳列着史太林和昔日克格勃首領的雕像，但經由引入「藝術」邏輯，搖身一變成為擁有一條玫瑰路和咖啡館的「藝術公園」，所有不愉快的歷史記憶遂在「藝術」面前風雨飄搖，

被害人與加害者一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紀念碑式的藝術效果和歷史意味。本案製造棄嬰並據此牟利的罪惡行徑，技巧化為貫徹計生政策、一切為了基本國策、按照「組織」部署的「合法行為」，致使體制和德性雙重遭殃，個體與社會齊齊淪落。

二

那麼，這個體制是如何應對個體在此之輾轉騰挪的呢？或者說，經此一役，體制本身又有什麼變化呢？在我的記憶中，晚近十年間，媒體曾經報導過大規模的販嬰行為，甚至廣東和台灣的老闆以「嬰兒湯」補身的傳聞。好像幾年前崔衛平教授專門為此秘訪親觀，痛陳檄文，一時間讀者雲集，淚如雨下。四川某地「購買」精神病人，轉手賣給私立精神病院，後者再將病人作為廉價勞力發往外地承包工程。這是近年發生的又一典型案例，時隔不久，大家都還記得。凡此案件，表明了一個共同問題，也是此處所說的既有體制的一大蛻變，就是公共權力的「私性化」和「準黑化」。它已不再是公器，相反，經由局部流失、分包的方式，逐漸變成了私主體逐利的行頭。私主體的逐利和公權力對於權力

的批發、分包，彼此勾結，「互利共贏」，將這個體制「私性化」了、「準黑化」了。流行語所謂「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首長化，首長權力私人化」，說的就是這一現象。惟不限「首長」，實則包括各級各類胥吏。凡掌一角，既卡又拿；既佔一位，必露其漑；扭捏之間，權利兩得。

本案中，凡此兩「化」與兩「得」體現得也很充分。高平鎮計生辦對於「超生」或者「非法收養」的嬰兒，以「沒收小孩」對應。其方式是工作人員直接走鄉入戶，「抱走」了之。而領回小孩的條件，無一例外，都是「交錢」。至於數額多少，如報導所述，並無定數，全憑計生幹部們張口。僅以該鎮袁朝容為例，他於二〇〇四年收養一名棄嬰，翌年七月二十八日，計生幹部「以非法收養」為名入戶奪走孩子，稱需繳納八千元才能將人領回。該鎮袁名友的情形類似。據他向《新世紀》記者敘述，「他們把我女兒抓到了鎮計生辦，說我非法收養，要拿四萬塊錢贖人，否則不會放人。」兩名女嬰後來要麼下落不明，要麼經由「國際收養」到了大洋彼岸。在此，可以看到，「計生政策」和「計生辦」均已成為斂財之具，對於「沒收」來的孩子之利潤前景，計生人員和福利院都心知肚明，而彼此為用矣！如此這般，公器私用，狐假虎威，牟利套租一條龍嘛！

三

由此透露了一個重大信息，也是令人深感無邊悲哀的一件事情，透心涼的，就是現有國家體制下，公共權力對於農民的「超人身代際倫理盤剝」。曾幾何時，中國體制對於農民的剝削主要是利用剪刀差、城鄉分治、戶口等各種準種姓制度和治理技巧，落實在人身剝削和經濟掠奪。但是，最近十來年，隨着城鄉流通頻繁，農民生計逐漸有所改善，我發現，此種剝削居然已經發展到（轉型為……？）反人類、悖倫理的境界。比如在城市，基本上不會發生「邵氏棄兒」事件，似乎公權力不敢作如此夢想。但在鄉村或者鄉鎮，居然了無顧忌，胡來起來。這表面看來似乎匪夷所思，實則透露了共和國的天空下，農民依然是二等公民這一殘酷現實。市場經濟多少解放了勞動力，特別是改善了它的自由出賣的可能性，而為農人謀生開了一條縫。但是，在倫理、政制和行政諸端，依然不把他們當人，依然處於受損害與被侮辱的位置。本案說明，損害和侮辱他們還不夠，居然對他們進行超人身的代際倫理盤剝了！老天爺、雷公地母，你們說說，天理何在？

據說，在一些鄉村，出現了一個特別的行業，專門有一種人，沿村「收破爛」。就是專門收棄嬰。棄嬰略分三種：一是有生理缺陷的，生下即被拋棄；二是未婚先孕的，出於

壓力，丟棄了事；三是女嬰，可能是重男輕女觀念的犧牲品，更有可能是迫於計生政策，為了後面還能再生男嬰，只好「犧牲」掉這一個，依然牽連於第二個原因，但非第二個原因所能盡述。有人說收了後可能是到外地販賣；也有的說是拿器官賣錢，可孩子太小拿器官賣錢好像不太靠譜，但也不能絕然排除這種情況；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向國外的收養機關出售，而且可能存在「中轉」現象。比如你負責這個村，他負責那一片，然後再交轉給上家，至於最終落向何處，在所不問，全憑產業鏈運行。就像各地都有收貓收狗的，偷貓偷狗的，集中一批，往廣東運送一批，其間靠的是一條龍產業鏈，幾經輾轉，最終可能出現於「老廣」消費者的餐桌上。

朋友，此種對於農民的「超人身代際倫理盤剝」不是什麼新鮮事嘛，其實早已流行國朝。君不見，幾十年間，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農民的女兒賣身，農民的兒子賣力，賣了這一代再賣下一代。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城市繁榮昌盛的基本條件嘛。有理論家證說，這是「中國模式」呢，好得很呢！事到如今，身份的代際傳承和複製，不論是富貴還是貧寒，居然流轉不息，表明我們這個社會距離「健全而愜意」依然路途遙遠。在中國社會結構城鄉二元兩極分化的狀況下，農人常常是犧牲品，似乎早成慣例，大家視作理所當然。比如，經濟危機來了，鄉村成為剩餘勞力的「蓄水池」，等於將負擔無償轉嫁給農民，使

危機移形於農村。一句話，農民作為一個超弱的群體，一盤散沙，以個體面目為權力和資本所分而治之，而成為超人身代際倫理盤剝的對象，觸目驚心，道出的卻是我們普遍的麻木不仁和倫理底線的潰敗。

四

說到「普遍的麻木不仁」與民族「倫理底線的潰敗」，本案同樣蔚為表徵。此事一經報導，從上到下，從一般村民、計生幹部到當地兩級政府，再到做出批示的高層人物，他們各就各位地做出按照體制要求的慣性反應。如此而已，僅此而已，不過而已，只好而已。同樣依舊無助的，是那些受害的家庭和孩子們。以賽亞·柏林曾經講過，時當蘇俄極權政制之下，面對酷烈高壓和指鹿為馬、是非淆亂，經年累月，人們逐漸陷入「普遍的麻木不仁」。此刻，中國，如此反人倫、反人類的事件，多年經行，一朝揭發，最後卻基本不了了之，就說明這種「麻木不仁」已經同樣普遍化了，體制化了。換言之，當德性倫理淪喪之際，規範倫理無所作為，表明的是整個民族倫理的退守、蛻格或者潰敗。其之在所

不免，終致社會解體，並非聳人聽聞。

不寧唯是。截止目前，根據「財新」的報導，僅有一位當事人接受「雙歸」，好像是一個連小蘿蔔頭都算不上的人物，此外並無任何人受到法律制裁。最終糾錯機制失靈，表明這個體制有意無意對於自家過錯採取包庇、縱容之態，這個體制將自己的行為執行者包攬於蔭庇之下。一句話，糾錯機制的失靈表明德性倫理潰敗的同時規範倫理同樣失守，而這是社會解體的前兆。可能，任何體制都同樣需要打手，或者，幫手，或者，走狗；再者，「維穩」壓力之下，只能採取震蕩最小的處置，儘管如此一來，真相和公義遭到了流放。

說到「維穩」，我想說的是，明末和晚清都曾經「維穩」過。就晚清言，主要針對的是太平天國和小刀會之流，之後就是孫文一輩。面對亂局，內憂外患，既要「維穩」，自家力量有限，只好借助地方豪強，遂使地方坐大。的確，「維穩」了，但由此造成的地方坐大這杯苦酒，也須同時飲下。在平亂烽火中形成的地方軍功集團，不免多所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朝權旁落，勢所難免。對比而言，此刻中國政制面臨的難局是既要「維穩」，同時並須發展經濟。而無論是前者抑或後者，均須仰賴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地方政府既有經濟衝動，就會不擇手段前行，「發展經濟」和「維穩」不僅由此成為中央考察地方政府政績、馭控地方的一個龍頭，而且埋伏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必然遞減的隱憂。因為地方政府

可能有錢，可能缺錢。有錢，既然財大氣粗，不求人；缺錢，眼睛朝上，而中央又不可能濫發銀兩，也不可能有這麼多銀兩。有錢沒錢，都犯難。位處「維穩」一線，你上面千絲萬線，最後還不是要落進我這根針眼嗎！沒我們辦事當差，你行嗎？如此這般，總的情形是，中央只得容忍「地方的胡作非為」了，只要事情不要鬧到不可收拾，而總體有利於政制之穩即可。我想，剖析此案，考察地方政府的計生部門為何如此明目張膽，又為什麼這般無道斂錢，需由此層遞進，方能看出實質。想一想吧，愈是經濟落後地區，生存無道，官家才會愈是想出此轍，一切就不難理解了。

五

由此，涉及到所謂「情境倫理」與「普世正義」的問題。就情境倫理而言，包括計生問題在內的許多事，都與剛才講的鄉村治理有關。諸如「統支統收」、「現收現支」等招數，都是動手動腳找財源的問題，同樣源於鄉村治理，或者，通常所說的「三農」問題。是呀，上面萬條線，底下一根針，「下面的」逐利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個案式的「為

難」，不足以提供合法性，更非等於無限展延「容忍下面胡作非為」的闕限。就普世正義來看，說一千道一萬，一言以蔽之，本案的關鍵在於它是一種反人類行為，胡能為普世正義所容忍。

退一萬步言，本案至少是對「倫理社會」的極大嘲諷和傷害。諸位，不論東西古今，社會的基本屬性在於倫理，因為社會不外乎是基於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等人倫關係演繹而來的人類大群，基礎在倫理，要害在倫理。無倫理，即無人類，亦無人類社會。就此而言，所有的社會均為倫理社會，而不論古代還是現代，中國抑或西方。也就因此，捍衛倫理底線就是保衛社會，從而是在護衛我們人類自身。本案告訴我們，普遍人性在誘惑和衝動面前的失守和潰敗，觸及到了「嬰兒」或者「孩子」這一情感的命根子，將我們日常起居的倫常秩序破壞無遺，甚至徹底顛覆。倘若社會再不振起啟動修復機制，就真要「出事」了。

六

正是在此，本案中的一些人，包括負有一方職責的行政官員，面對調查和記者採訪，以「吃國家的飯，替國家做事」為由，將自己置於官僚體制等因奉此的上下鏈條之中，由

此在心理、行政和法律上洗刷自己，似乎問心無愧，泰然自若。換言之，他們等於是在說，「你不要怪我，我沒有責任，因為我在執行命令」。而且，經由搬出「國家」這一清晰巍然卻又模糊無形的後盾，大樹底下好乘涼，渺小的自己頓時轉身為毫無自由意志的制度造物，亦無利己衝動的中性存在，如果說不是無辜的存在的話。

這一說辭讓我想起漢娜·阿倫特，她在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個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中對於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這起名案的分析。身為血肉之驅，一個人，意味着你已天然承擔了必須對於自己的行為進行判斷，對於行為的後果承擔責任的知與能，而不論你在哪個「崗位」上。正是在此，每一行為都意味着「選擇」，意味着「選擇」後的「決斷」，以及對於「選擇」和「決斷」的社會、法律和道義評價。迎拒之間，彰顯的恰恰是自家的道德感覺、社會意識和法律認知。所謂「執行命令」，並非等於將自己無名化為傳聲筒。事實上，只要是人，身處父母、兄弟、夫妻、師生和朋友等倫理之網中的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無動於衷，就不可能純然是這樣的傳聲筒。面對母嬰分離的親情悲劇和倫理破碎，你也許會心頭一顫，也可能在參與分紅中冷不丁油然升起一縷愧疚。因而，作為一個個體、一個國民、一個公民或者現行體制中的一員，面對或者參與如此大規模、連續多年、成套複製性的搶奪、販賣「棄嬰」的行徑，你不可能無動

於衷，至少，一開始時不可能無動於衷。你也不可能不明白它的悖德逆理、違法犯規的性質，否則不致於下手之先「選擇目標」、找足理由，事發之後將事件中中性化，並且拉出「國家」為自己洗刷，更不會以就算是製造「棄嬰」，販賣「棄嬰」，「可小孩子到了美國反而能過上好日子」為由，就是說最終「結果是好的」，來竭力辯白。問題就在於，一開始心頭的震顫可能慢慢因為「習慣了」而不再出現，拿起錢的手想到家中的母子因此多了一份保障便只剩溫馨。可正是在此，伴隨着善的出現，惡出現了，對於惡必須承擔的責任出現了，任何辯白的理由也都隨之消失了。因而，當你的良知實際上等於告訴你此為惡行之際，你在做抵抗，而終究沒能抵抗得住。此時此際，以「吃國家的飯，替國家做事」辯白，未免太過蒼白，也未免在糊弄自己的同時太過低估了人類的平均德性。這裏，用不着西方的「自然法」那一套理據，也無需「高級法」的道德律令的理論演繹，我們只需將中國自古形成、人人人口中皆有的「傷天害理」來印證，就足夠了。你難道真的不明白這是傷天害理的事嗎？要不然你幹麼抬出「國家」來呢？這天底下還有什麼比傷天害理更為嚴重的惡行嗎？明知其為傷天害理，卻又躬身其間，而以「國家」作為擋箭牌，朋友，你糊弄鬼呀！

所以，這起事件同時說明，就健全而愜意的人世生活而言，重建公民倫理和公民德行，呼喚正派社會和良善生活是何等之重要，何等之不可或缺。前面曾說任何社會首先而根本的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因此，倫理淪喪，特別是體制性的倫理欠缺，總是意味着社會的潰敗和解體，於全體國民，包括本案的當事人，均實在非為福也！

七

對於「財新」調查報導此案，有一種說法：國外反華勢力正在鬧事，想方設法找中國的碴子，你們將此事件公開報導，實際上是在配合國際反華勢力；計劃生育是「國策」，我們是在執行國策，誰敢違抗「國策」！

對此，我想問一句：誰在「反華」？哪家的「國策」？

先說「反華」。當今世界，中國的崛起招致鄰居眼紅，更有傳統霸權不悅，明裏暗裏，給中國找事，使絆子。雖說十三萬萬人脫貧，解決肚子問題，也解決面子問題，於全體人類而言，都是好事，但有人忍不住鬧心，事實俱在，相信清醒而自覺的國民都會看在眼里

裏，記在心上，而惟勤惟謹，克己立人。認為僅憑普世價值就足以抵擋民族國家的利益競爭，「融入世界」便會消弭文化隔閡，此份天真爛漫，早為眼前現實所擊碎，更為成熟國族所不取。因此，身在當下，不僅善予溝通，而且，更在管好自家事，掃盡門前雪。也就因此，不給外人口實，首先是要自己行得正，就是做好自家事。而製造「棄嬰」，傷天害理，恰恰是在予人口實，授人以柄，倒真正算是反華、辱華、侵華、害華、滅華呢！體制化地分享平庸之惡、一條龍地製造「棄嬰」並尋找各種藉口辯解的行徑，傷的是本，是全體國民和平共處之本，損害着中國之為一個倫理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的凝聚力向心力。朋友，要說「反華」，這才叫真正的「反華」呢！

再說「國策」。所謂國策，或者，基本國策，不外乎就是說某一項政策為政府所選定，認為對於國計民生至關重要，奉為舉國行動的基本指針。它同樣是情勢和理論的產物，隨情勢和理論的變化而修訂。就說「計劃生育」吧。其蔚為國策，強力推行超逾三十年，利弊俱在，過來人和觀察者各有體會，也各有說辭。但是，可以預言，隨着所謂「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銀色社會提前降臨，未富先老，生育率下降，男女比例失調，特別是可見未來勞動力短缺對於民族的創造力、競爭力所形成負面影響，這一「國策」之修訂或者改變，從而不再是「國策」，轉而為放開生育甚至鼓勵生育「國策」所取代，亦未可知也。

而且，更為主要的是，奉行計生政策與製造「棄嬰」、倒賣「棄嬰」，二者無法劃等號。不能將此違法悖德之舉等同於奉行計生「國策」。好比「和平統一中國」蔚為「國策」，但不等於為此不惜根本罔顧大陸果農利益，以政府行政之力巨量進口台產水果大開方便之門，根本違背市場經濟規律。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國策是國家的基本政策，並不等於天條，相反，卻需循時而變、與時俱進，不好不行的就需改變和修訂。好比說具有深厚正當性的「政權」是不容顛覆的，可能也是無法顛覆的，但是，源此正當性而承擔合法性的「政府」卻是可以反的，而且得隨時推翻的，端看授權者的心意。在此，「政權」和「政府」是兩個概念，一如「國策」和作為一國之本的「憲治」（憲法政治）是兩回事。國策可以並且應當循時而變，今天可以是國策，明天就可能不是國策，但憲治是本，表徵正當性，是撼不動的，也是不能撼動的，除非氣數已盡，「革命」到來。

可能同樣基此思維吧，根據剛才張進主編的介紹，也是更讓我們感到震驚的是，邵陽當地公共權力在財新報導此案之後，居然出現了一「反撲」，如果不說撇清或者自辨的話。招數之一，就是將事件的揭露者、反抗者「污名化」，說他們誰誰誰嫖娼了，等等。若說反華，若說違抗國策，這才叫真正的反華、違反國策，也才叫真正的反人類！

說到這裏，接着剛才一開頭盛洪教授講的那個意思，我們不得不面對媒體獨立和表達自由的問題。有時候，對於真相的揭露比做出判斷更為重要，所以財新傳媒對於「邵氏棄兒」真相的揭露，不僅展現了具體從業人員的良與能，智與勇，而且表達了新聞倫理最為光輝的一面。它不是別的，就是讓事實袒露於陽光之下，而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陽光下的真相，就是真理，也就是道理和情理，亦必引導向倫理和法理，而終究一準於天理。人類據此行止，有望免於蒙昧，得防人性扭曲。阿倫特曾經說過，在極權政體之下，當國民無法了解真相、被隔離於真相之後，將會變得普遍地憤世嫉俗與玩世不恭。當此之際，人心的惡質化就在所難免。為此，若想避免柏林所說的「充滿感情的普遍麻木不仁」，避免阿倫特所講的「普遍的憤世嫉俗與玩世不恭」，最好的方子還是將真相披露，讓國民及時了解事實。

正是在此，延展開來，有關新聞獨立和表達自由的法權保障，關於它們的政體落實和政制安排，是現代中國早已提出卻一直不見成效，而為當下中國政制無法迴避的時代議題，更是考驗既有政制是否具有致力於政治建設誠意的最佳標誌。也正是在此，隨着互聯

網的興起和進入尋常日用，可能情形續有改善，正待觀瞻矣！——就怕大家實在等不及，那時節，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九

最後，我補充一點，算是個社會問題，知會今天與會各位，特別希望成為《新世紀》深度報導的線索。諸位知道，最近兩年，自從「奧運」完了之後，北京環境質量出現反彈。西北部地區，包括海澱北部新區在內，空氣質量嚴重惡化。原因何在？最近我做了實地考察，發現自昌平區陽坊鎮往北，包括馬池口鎮和南口鎮在內，沿溫陽路、溫南路兩側，特別是西側，大約十多公里範圍，居然逐漸非法形成了數個露天洗煤場，大的有若干足球場那麼大，小的也有一個籃球場大。而從陽坊到南口，正是北京一年四季，尤其是冬、春兩季的進風口。每年春季風沙和冬天的季風，均沿此線一路往南，橫掃京城。位處如此重要地帶，居然處處煤場，還有地下瀝青作坊，排放刺鼻濁味，包括嚴重致癌的二惡英，其污染之嚴重可想而知，其於整個北京的污染可想而知。據測量，一旦風來，煤塵揚

起，擴散區域達一、兩百平方公里，其最遠端已達圓明園。本人實地觀察，無風無浪，一天一夜，床上、地上，毛巾、衣物，都有一層煤塵，觸手焦黑。一旦有風，則黑塵遮天，口鼻嗆痛。入夜，煤場大量抽取地下水洗煤，致使二氧化硫瀰漫空中。一家老小，長期生活於此環境，鄉民苦不堪言，求告無門，去年曾經封堵公路四天以示抗議，最後不了了之，「河蟹」了事。由於京密引水渠正從此地蜿蜒流過，據有關人士測算，這大大小小的儲煤場和洗煤廠，肆意污染，等於每年向引水渠傾倒百噸黑煤。已經兩年了，京城百姓飲用之水已被污染，當無疑義矣！農民的麥田一片漆黑，蔬菜上全是黑煤灰，一澆水蔬菜就被燒死了。特別是附近中小學生堪為最大受害者，甚至出現了因為大風天煤灰肆虐而不得不暫停上課的事，孩子們罹患呼吸道疾病的比例逐年上升。周圍四鄉八鎮，有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生和嬰幼兒，他們的健康和生命，可以想像，牽掛着父母親人的心，卻多莫可奈何，真是令人感慨莫名。此事始終不見報導，如果《新世紀》仁心善意，細予調研，率先揭黑，以利治理，可謂功德無量。

據說，「奧運」期間，為保京城風水，大小煤場和若干採石場，曾經遵照高層指示停運兩月。北京二〇〇三年即已立法禁止設立採石廠，因為北京周邊的山體不能再遭破壞，但是這麼多年來居然一直在開採，挖山不止，致使大好河山遍體鱗傷，久而久之，必致生

態惡化，加上洗煤場參與作孽，使得方圓幾百平方公里烏煙瘴氣。就我側面了解，並經昌平區環保局確認，採石廠均為非法「三無」企業，而煤場據說為發改委立項設立。鄉民憤慨，感嘆運營者「根子深」，不怕查，直言區鄉兩級領導和山西煤販子串通一氣所為。環保局則回覆，因為是發改委立項同意設立煤場，他們撼不動，也沒轍，則鄉民的猜想或者傳聞自當移至那個叫做「發改委」的衙門了。皇城根下，胥吏橫行，法律架空，也算一景，而與「邵氏棄兒」一樣，道出的卻是人民共和國天空下人民無力，政制和政治無德之難題矣！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修訂於荷清苑——舊河道傍

註釋

* 本文為2011年7月5日作者在天則研究所「邵氏棄兒與保衛社會」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

第二十九章

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

一、背景因素，也就是初始條件

置身今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與既定歷史時刻，圍繞着執政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文本來探討「法制經濟」、「法治國家」的可能性和可欲性，則下列四個背景因素或者初始條件，尤需留意。

第一，當今中國依然籠罩於「黨國一體」的基本體制之下。也許，已然不能說這是極權體制，但是，的確確，至少，它是不折不扣的威權體制，是後極權時代的全能型威權體制。可能，在極權與民主之間，堪為過渡形態，有時往那邊靠靠，有時朝這邊攏攏，端看情勢和心智。在轉型的意義上，所要努力爭取的就是讓它朝這邊攏攏，而非向那邊靠靠。期間，「七人寡頭」堪為綱領，其核心更是「黨政軍一把抓」，經由各種協調性「小組」分抓黨國大端，造成了一種「小組治國」的政制態勢，而蔚為核心之核心也。置身轉型時段，其為貴族寡頭制，還是一種貴族民主制，抑或全能型威權與元老院政制的結合體？可能，見仁見智，但其距離立憲民主體制尚遠，則可肯定。

第二，中國的轉型，從此刻開始，可能正在走向最後的收束階段。中國的大轉型起自一八六〇年的洋務運動，經過三個時段、各有三十五年的三波「改革開放」，駸駸乎，

已然超逾一個半世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而延綿至今的第三次改革開放，功力已然耗盡，勁道不再。實際上，其於北京奧運後即已停頓了。此時此刻，也許，彷彿，可能，是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的時候了！總而言之，從上述「決定」的文本管窺，這是中國即將走出「歷史三峽」而有可能迎來完成大轉型的結束和收尾的時段了。這是我們今天談論一切中國問題的最為基本的歷史背景，也是一切有關方案和思路之「跳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原因所在。迂迴曲折不可避免，但此大趨勢，恐違忤不得也！

第三，在比較視野中，放眼大中華文化圈，緊扣「轉型」這一語境，其發展層次、相應時段、已達境界，並不平衡。台灣是大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得為「先民主起來」的地區。香港作為中國版圖中的特區，例屬「先法治起來」的地區。而中國大陸的珠三角和京滬一帶，連同上述兩大區域，則為「先富裕起來」的地段。香港和台灣，同為中華文化圈，總體而言，基本社會文化因素和歷史條件相似，則中國大陸如何在發展經濟、社會的同時，有機整合，逐步成長為一個立憲民主的法治國家，同為「大轉型的結束和收尾時段」的題中應有之義，而為我們深感焦慮並為之衷心憧憬而馨香祝禱之事。

第四，這一波超逾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其所孜孜致力的是「現代中國」，其需建立的，不外是中國的現代文明與現代秩序。而無論「文明」還是「秩序」，法治均為其有機組

成部分，例屬「現代中國」的必有內涵。否則不成其為「現代中國」，亦無法構成現代文明和現代秩序。若說法治的意義，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按照某一種說法，法治、負責制政府和現代國家體制，三要素、三變量，一起登場，有機結合，方始形成現代政治，從而為現代轉型奠定基礎。西人近世轉型不脫此轍，中國百多年來的轉型似亦在此打轉。以此衡量，則中國今天不缺「國家」。中國的國家建構頗有成效，但法治尚未完型，有待登場，負責制政府亦正在建設之中，同樣有待完型。此為「現代中國」的基本情勢，成就與不足，滿懷憧憬卻又令人怔忡忐忑，均在其中。今日談論「法治中國」，對此不可不察。

上列四項，既是刻下中國談論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背景因素，也是此刻邁步的初始條件，有以然哉，不得不然，之所以然而然矣！

二、法治政府與法治國家

立足於此背景因素和初始條件，我想自政治哲學和法律哲學角度，談一下對於此次全會「決定」涉關今天討論主題部分的想法。

總體而言，通觀全文，政治體制零進展，已有的陳述，論幅度，論境界，未曾超越三十五年前的那個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法治而言，剛才各位先生已然談到不少，江老師指出其間閃爍着若干「亮點」，我都同意。不過，我的看法是，雖然有「亮點」，但弔詭的是並無什麼起色，或者，了無「新亮點」。因為，它們所載述的不過是一九七八年以降，中國經過二三十年的法制啟蒙所達成的某些基本共識，只是因為前幾年的法制實踐對此多所背離，往後退步，大家憤懣而憂心，卻又眼睜睜毫無辦法，故爾，此番重申，才讓我們倍感欣慰，而有「亮點」之亮，晃眼睛。而且，即便就算「亮點」，雖有大框架的宣示，卻無具體行動圖和時間表，從而不免宣示歸宣示，落實歸落實，最後都是空話這一命運。看落實，就看往後三年的誠意和勁道了。希望此間別有內憂外患來打岔。

就拿此次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個提法來說，雖說估計早經再三掂量，卻未必妥當。文本中，所謂「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三聯一體，和盤托出。今天論壇的主題也是「法制經濟與法治社會」。在下以為，凡此提法均有待商榷。為什麼這樣講？問題就在「法治社會」這一措辭上，而措辭背後的用意所反映出來的法治理念之錯位，才是令在下真正不敢苟同之處。

因為，當我們說「法治國家」時，講的是國家治理及其委身於法制化安排的政治智慧，道盡了晚近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法權特質，說明了國家之為一個法律共同體的政治屬性，而它們無一不是既有文化的產物並通向文明國家與文化政治之境這一文明屬性。是的，國家治理需要依法實施，尤要立基於憲法基礎之上，而恰成一種憲政體制，通過規範最高權力，形成防範濫權與專制之權力配置的制度安排，以造成憲政國家與憲法政治。這樣運思，這樣措辭，並沒有錯。可治國家學的人都知道，國家不僅是政治共同體和法律共同體，國家同時是經濟共同體與倫理共同體，國家還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乃至於信仰的共同體，而恰成一命運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治理之委身法治，僅僅是其中一維而已。因為中國缺乏法治，現代國家治理正好必須法治，物極必反，因此我們強調法治，渴求法治，故爾「法治中國」成為時代最強音。與此同時，要切切牢記，中國的國家治理是一項綜合事業，法治僅僅是其中之一維。在下雖然以教授法律為生，但絕無抬高法治之意，而無視其為國家治理之一維這一事實，更無忽視技術、習俗、禮儀、道德和宗教等基本規範的網羅框合作用之意。否則，所謂的法治有可能流於刻薄寡恩，其將紛繁個體作物質組織般調處之時，國家成為一個單項度的機器，而非全體國民和平共處的家園，實非國民之福也。

說「法治政府」，我百分百同意。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良方。政府本身是一個問題，是我們人類群居生活和基於互惠關係以謀生存的不得已的妥協架構。它有私利私欲，如同一切權力。超大規模的政府，意味着私利私欲之同比擴張。就公民的安全、負擔和自由而言，可謂危乎殆哉。實際上，就政府本身而言，實為邪惡存在，但它是必要之惡，同樣如同一切權力。值此情形下，如何通過法律為政制設限，對政府行政設限，讓政府權力的運作在法治的規範內暢行，遂成法制之力，而為法治之局也。就此而言，「法治政府」是「現代中國」的奮鬥目標，也是成就「現代中國」的必備要件。只要中國是個「現代中國」，則不可或缺這一配件。其命意，百分百準確；其登場，適應時需，真望它早點兒完工也。

至於說「法治社會」一辭，則命意不通，理據不足。通常說話時這樣講，沒事兒，可要在「法治國家、法治政府」三元並立中如此言說，不客氣講，完全是法家的命意也，可怖得很。為什麼這樣講？蓋因社會多半是自治領域。社會自治程度愈高，社會的自組織能力愈強，公共權力介入愈少，則社會日益成熟和健壯，也更為宜居和愜意。在實然、應然和可欲等維度看來，所謂「社會」至少包括倫理社會、經濟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和正派社會等類型、層次與環節。無論是哪一類型、層次和環節，其結構治理多

半依賴自身，法律的作用有限。可能，有時候不僅難能奏效，反而介入愈多愈壞事，破壞了社會的自我成長。就倫理社會而言，法律應該完全退場，而交由它自身打理，在並且僅在「出乎禮則入乎刑」的情形下，才有克制地運用法制的必要。尤其是在中國這類國家獨大、政府強勢的政體之下，把法律不恰當引入到社會各層面，可能造成國家主義一統之下對於社會的壓抑。換言之，社會就是社會，多半以倫理、習俗和禮儀來打發，而不是什麼「法治社會」。所以，「法治政府」極待強化，「法治國家」亦須趕路，而「法治社會」一說可以休矣。

三、為何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

今天談論法治政府、法治國家，在下深切痛感，就今日中國情形而言，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法治走不下去，是因為民主未能同時登場。果若真有施行法治的誠意，則請趕緊啟動民主。

民主與法治的關係，學理上有一套，但落地於全球範圍內的各個具體時空，則水土不同，其方式和次第，隨之有別。譬如，就今日泰國而言，可說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當

下之急重在強化法治，以臻憲政。但就中國此刻而言，情形相反，「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故爾雖說基本憲制俱備，卻不見憲政。就大中華文明圈來看，香港有基層民主，也有法治，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尚無最高行政長官的「直選」，從而無政治民主；台灣民主早已落地，也有基本的法治；中國大陸的情形是一套法制基本有效，但尚無法治，使得這一套法制足能提供治安，維護住制度大架子，但在涉及民權等大是大非之際，根本上無濟於事。而根子在於沒有啟動民主進程，無民主撐腰，法制獨木難支，雖呼喚法治連連，卻青黃不接，而終無法治之登場也。

為什麼這樣講？有無道理？至少有下列四點理由。

第一，於今日中國，民主化啟動的是一種尋找正當之法的過程。換言之，誰來制定法律？為誰制定法律？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法律？抑或，真正的法律應當兼具何德何能？這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問題，也是對於正當之法的法源的追問，必須回答，無法迴避。否則，所謂的法治失卻根基，無法邁步。道理很複雜，而事情很簡單，就是源頭無活水，哪有清泉來。

說到政治正當性，則今日中國概以「人民主權」標舉，蔚為一切正當性解說的唯一合法性修辭。現行《憲法》〈序言〉在長篇大論地鋪陳中國近代歷史譜系之後，以「從此，

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作結，意味着宣示人民主權。所以，第二條緊接着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人民」。是的，既不可能信誓旦旦「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也不可能以「君權神授」虛與委蛇，更不能落諸「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式的街談巷議，那麼，你憑什麼統治？為何你有權力？憑什麼你掌有統治權和立法權？凡此之問，最後只能一概回到「人民主權」這個根子上，方能回應，也才堪回應。如果承認「一切國家權力屬人民」，人民是一切權力的源泉，那麼，不僅人民主權構成了國家主權的政治正當性所在，而且，它意味着要將國家主權轉化為人民的立法主權，則立法主權不過是人民主權的一種法權表達。此時此刻，一個超越的法的概念，即在現實法律之上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法度，它表徵天理良心，高於一切俗世的權力，橫空出世，無可阻擋也。再說一遍，這一超越之法的概念，這一高級法的概念，最為根本的價值在於徹底否定了一切俗世權力的至高無上性，釜底抽薪般地摧毀了它隨意冒充法律權威的可能性。毋寧，基於人民主權的人民的立法主權，才是一切法律的源泉，也是法治之法所得由來的程序合法性所在。

由此，人民主權這一概念意味着法治總是對於俗世最高權力的規範，經由規範而導引其服帖於人民主權的麾下。各位，沒有對於俗世最高權力的限制，法律云乎哉？法治云乎

哉？不過是撓癢癢嘛！「決定」文本一方面強調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另一方面，卻依然有這樣的表述，即要繼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利益和憲法法律」的統一。諸位，統一得起來嗎？這般和稀泥，不是起草者的智商不夠，實在是刻下遇到了難局，一時間無法破局或者解局，只好如此囫圇吞棗。黃仁宇先生曾經喟言，大意是，「歷史遇到了僵局，只好以戰爭來破局」。今天「戰爭」或者「革命」均已退出選項，遂以「和稀泥」來抵擋一陣子，也是一種選擇。

其實，眼面前就有一個扞格不鑿之處。當今中國，誰都知道，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和法理上的最高權力錯位，表裏不一。就是說，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在中南海，而法理上的最高權力在大會堂，大會堂法理上的最高權力寫在書面上，見諸本本，而真正的最高權力卻行使於日常，落諸行動。因此，落實人民主權，使大會堂的權力管住中南海的權力，尤其是管到那七個人，才是法治和憲政的根本所在，而為長治久安所必須也。就此而言，這份「決定」沒有任何新意，連三十五年前的那個三中全會「決定」都不如。

第二，現代國家賴以立國的基本國家學說理念是，國家是一個公共事業，是一個公共場所，為億萬國民所共同分享的政治家園。具體到中國，則所謂「中國」是我們廝守生息的公共空間，是我們十三萬萬國民共同分享的政治家園。建立家園，旨在分享，遮風避

兩，於是有讓渡權利建國立政的必須。可也正因如此，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國家利益之間定有衝突。換言之，有利於公民政治權利者未必有利於國家利益，而如何使公民政治權利與國家利益相輔相成，特別是如何使國家利益服務於公民理想，此為難題，大是大非。王道政治意義上的立憲民主的基本思路，約略而言，不外乎這樣三句話。此即「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授受以公，臨治以仁」。而它們不是靠法治所能釐定的，也是法治難以建功立業之處。毋寧，它們首先是一個民主的問題，也只能交由民主來打理。此處「臨治以仁」之「仁」，也可以說就是「法」，依據上述正當之法的理路，法治得為公共政治家園的仁義所在。

是的，在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兩分語境立論，可以說沒有一種政治領域超出公共領域。毋寧，政治領域恰為公共領域的核心所在。二者共存於國家，而使得國家成為最大的公共機構，也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和政治領域。相較而言，此前的宮廷政治和秘密政治，皆為私性領域，非「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一政治理念的物理時空和操練場域。正是從宮廷政治和秘密政治中蛻身而來，國家將自己進境為一項公共事業，志在打理國家的政治兌現了自己乃眾人之事這一承諾，成為全體參與者橫向聯合、彼此承認的紐帶。其關鍵在於，此時此地的參與者不再只是帝王將相或者「黨政幹部」，而是大眾民主憲制下的人民：

經由政治所武裝起來的國民與公民；也正是經由政治，國民和公民才能凝聚起來成為人民。反過來說，沒有政治和政治領域，便沒有真正的公民，更無人民的存身之所。那同樣具體化為億萬肉身的形形色色個體，叫「老百姓」，或者，「群眾」，一種前政治存在，散沙一盤，一盤散沙也。

如何形成公共領域與政治領域，事到如今，非民主政治常態化操練操練不可也！

第三，剛才講到司法問題，則司法之獨立、公正、權威和文明諸項品格，作為可欲的願景，也是現代國家的司法應當兼具之品格，同樣有待民主登場而後成。一個沒有基本民主設置的國家居然會有兼具此等品格的司法，不啻天方夜談。不信，你找出一個例子讓我們看看！

各位，刻下可能啟動的司法改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自我賦權，例屬小修小補。從「決定」來看，司法財政集中於省一級以及有關法官、檢察官任命制度的相關設想，不乏理想色彩和進取精神，看得出來，是在現有條件下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這一思路下的產物，也應當獲得拍掌和叫好。但是，我注意到，即便它們都能獲得「貫徹執行」，也無法解決中國的司法腐敗問題，更不用說達致上述品格目標了。為什麼？因為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而在一個黨國一體、自上而下自我賦權的體制下，怎麼可能談得上真正的司法獨

立，或者，「獨立審判」與「獨立檢察」？「黨管幹部」，就這一條，天花板，叫一切都止步。值此格局下，司法充其量是政治治理的一個工具，其本身並無自足的正當性，難以致達公正、權威和文明也。也就因此，刻下推行的這一波司法改革，至多只是一種行政化改制，無多新意，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即便人財之權上收到省一級，省一級不還是聽命於同級黨政，而黨政總是一竿子插到底的，「講政治」高於「講法制」，最後管個速用。

第四，司法獨立並非司法機構想做就能做到的，司法公正同樣不是司法機構獨力所能支撐的。司法者和司法機構，若無監督，同樣不免於權力之趨於腐敗這一定律。即便是在立憲民主政體之下，雖經多方監督，司法腐敗亦且恆為一種可能性。稍不留神，私貨橫行，腐敗說來就來。因此，當今中國，若以「獨立、公正、權威和文明」作為司法改革的目標，則需第三方監督，包括公民社會、自由媒體的力量，特別是「國王的忠誠的反對者」的組織化力量。而公民社會、自由媒體的成長發育，恰是民主培育和自由展開的結果，以民主為前提。而且，其成長本身也是民主的內涵之一。因此，沒有自由表達、市場的充分發育和公民社會的成長，只是自我賦權的司法改革，改不到哪裏去，恐怕也沒用，大家勿需一廂情願。

四、中國需要思想市場和政治市場

綜上分析可知，中國亟需開啟民主進程，讓思想自由馳騁。本次「決定」正式標舉「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可謂真正的「亮點」。為什麼？因為，現代早期地中海文明以來，我們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現代秩序，奠立於「民族國家—文明立國」和「民主國家—政治立國」這一「雙元革命」的基礎之上。它們遞次聯袂而來，極大地提升了人類的自我組織質素。「民族國家—文明立國」意味着文化主體性，「民主國家—政治立國」則標榜政治的主體性。現代立國，主要依恃的就是這兩項。政治立國的至高境界是自由立國。「以自由立國」，則國家就是家園，守法者就是立法者，而「中國是一家，天下為一人」矣。具體而言，中國近代的大轉型實為「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體，「民族國家—文化中國」與「民主國家—政治中國」之雙元並立，才形成「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其本質，其要旨，其樞機，繫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由此伸展，而有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的交集互補，而有國家建構、世界體系與全球政治的鋪展成長。

而無論是哪一項，我想說的是，今日中國亟需進一步培育市場經濟，趕緊開放、培育思想市場，並逐步形成中國的政治市場。實際上，從「專政」思維到「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表現了理念的進步並為理念進步的產物。為此，若以此番「決定」為起點，啟動「第四波改革開放」，正其時也。

五、法度高於一切世俗權威

或曰，此次「決定」第三十條重申維護《憲法》權威，而與此前的「三個至上」劃清界限。但是，「決定」文本同時又說「三個至上」是統一的，如何解釋？

對此，見仁見智，我的解讀未必相同。前面已經略予評論，此刻我想說的是，通讀「決定」文本，其內在脈絡扞格不鑿，於政法一端，表現尤為明顯，可能並不奇怪。相反，它是我們這個轉型時段的「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在做出正式解釋之前，我先回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剛才有一種講法，好像是強世功教授說的，叫「法律要從屬政治」，並且說這是法治的一個基本含義。如果在卡爾·施密特的意義上架設建國大綱，重述其於對抗英法自由主義學理的脈絡中鋪陳法政一體之說，而為日耳曼德意志招魂，則自有理路，各

說各話。蓋因自由主義政治大綱已定，法治乃順水之舟，不過是將前者肉身化，特別是明示為一套法權程序。但要置身今日中國語境，強作解說，則南橘北枳，在下實在不敢苟同。朋友，在今日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語境下立論，法律怎麼可能從屬政治呢？法治的基本含義在於建設「法律的共和國」，其秉持自主獨立的體系，嚴分法律與法度，而以法度作為最高的權威，也就是說以天道天理這一高級法作為最高權威，此一權威高於任何世俗權力，超越於一切世俗政治權威。在天人之際和德位之間，恆申法度之高於法律，而它們均不得違忤天意，必須循守天理正義，以符合天道為正當性之正道。相反，世俗的政治權威必須服從法律，並且以奉法無違來標榜自己的合法性。這才叫法治。否則，「法律從屬政治」，其實是法制聽命於政制，那還有什麼法治可言？那不叫法治，骨子裏，那叫「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強世功教授講司法權要從屬主權，我很贊同。問題在於並且僅僅在於，什麼主權？誰是主權者？如果主權者是共產黨，如發言人此前於自家文章中所陳說，那麼，我相信執政黨不願也不敢接受這頂帽子。為什麼？因為執政黨一再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才享有真正的國家主權，所以一切權力屬人民，「權為民所賦」也，人民主權也。有此「人民主權」墊底，大經大法，幕天席地，而後才有他們讓渡自由和權利所形成的國家主權，

展現為刻下的政權，從而有為此服務、派生而來的政府及其執政權，依據政制而打理日常行政的治權。值此情形下，如果「主權者」含指「我們中國人民」，那麼，最好把「我們中國人民」還原成、轉變為一個個手上拿着選票的「選民」，讓「我們中國人民」作為選民而完型、而出場、而兌現。非如此無法表達主權，不足以兌現主權。倘若如此，我覺得這個事就算做實了，也坐實了，也可以說從此天下就太平了。相反，如果主權者是指執政黨，我覺得這個點子斜了。這不，執政黨是打工的嘛，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主權者服務而換得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嘛，以黨組織的體系化力量來競爭、來接受、來履行執政權，然後為主權者服務嘛，怎麼反倒在強教授的眼中一躍而成主權者了呢？豈非本末倒置也。「致君堯舜上」，此非途也。這是我回應的第二點。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要講，係由江老師剛才的論說引發。晚輩以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現代轉型，已然超逾一個半世紀，在在有待收尾矣！可能，最後一役，也是最為要命的問題，還是政治轉型。換言之，在「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四位一體的百年中國語境下，「提煉優良政體」，建構中華文明的憲政秩序和政治文明，以此為這波大轉型收束，堪為命脈。政治一天不上軌道，則「中國問題」一天不得徹底解決，總是個痛也。畢竟，政權的穩定性依恃於「權為民所賦」所奠定的根本政治正當性，而非日

日夜夜、月月年年高度緊繃的「維穩」。此次全會的「決定」，在下曾快速翻看一遍，倒並未花太多工夫一字一句琢磨。既無此必要，亦無此興致。總體感覺是，在經濟、民生和社會層面，乃至於法制的邊角，都有所涉獵，而將重點放在眼下可能做的、能夠做的，又不至於出現所謂「顛覆性變革」的領域。七年之期，不算短，可也不太長，倘若多所落實，則成就不凡。

儘管如此，各位，其內容，其外延，也都不算什麼新路子。為什麼？因為過往十多年來，面臨中國政治轉型，也就是中國一百七十四年來乃至於需要前後延綿二百年的大轉型所繞不過去的這座橋，彷徨徘徊，臨危而懼，出招想折，上下忙活，而總的套路，不外乎四大套路，此即「以民生打發政治，用治安對付政治，藉行政吸納政治，靠政制反制政治」。一句話，取消政治，非政治，乃至於反政治。這條路還能走多久，我不知道。實際上，此種套路，此前半個多世紀一直在用，交錯為用，而效果不彰。時至今日，實際已到大轉型的收束階段，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是一座繞不過去的橋，其得迴避乎？其可摧折哉！江老師說那是個「未來」的事，我完全同意。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這些教書匠就要講這件事，一直講到做這件事，一直講到做完、做好這件事為止。

我們這些教書匠不講，誰來講？

註釋

* 本文為2013年11月19日作者在北京「財經法治論壇」上的演講整理稿。

後記

集中諸文，林林總總，圍繞的不外「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兩大主題。畢竟，晚近三四百年，基於地緣格局和文明脈絡而來的國族建構，天然也好，想像也罷，自西徂東，貫穿歷史，組織起一種現代政治單元形式和一整套全球列國體系，而以國家理性為經緯。與此同時，公民理性暢達，找尋正當統治，建設合意政治，將人間權力奠立於立憲政治基礎之上的不懈努力，終於促使國家建構在政治上轉型升級。兩相輻輳，造就了「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民主國家—政治立國」這一「雙元革命」。其中，「政治立國」的極致是「以自由立國」。它們分頭合擊，二元一體，攏括起現代人世，照拂着普世生活。若問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其樞機、其義理，大經大法，均不脫此境。

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近代大轉型，改天換地，鋪天蓋地，實為「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體，旨在建設「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它不僅是中國文明的自我轉型，也是現代世界創世紀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民族國家—文化中國」與「民主國家—

政治中國」雙元並立，既在編織「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也就是在以中國文明的復興來收束現代世界這一波文明浪潮。如此這般，夢想成真，則歷史終結，等待再一輪的啟蒙。

適逢清華法學教育復辦二十周年，學院出資，鼓勵教員刊行文集，遂有此冊文字付梓。以教書為業，靠教書謀生，起居不離校園，校園即家園，是吾人生。水木乃爾，十五載盤桓，晨鐘暮鼓，殼棘立世，一晃而過，惟以文字作證，而為學府之為學府祝福，並為天下之為天下人之愜意家園而用功。

「陽禽回翼，地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好一個大千人世間。

噫嘻，尚饗！

許章潤

孔誕兩千五百六十五年，耶誕二〇一四年，初秋午陽



ISBN 978-962-937-309-2



9 789629 373092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